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

华北治安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K264.33/1

华北治安战

(上)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0174



天津人民出版社

890174

华北治安战
(上)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编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6 1/8 插页 1 字数380,000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500

统一书号：5072·3

定 价：1.42元

(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华北治安战》是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一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作战史。本书比较详细地记叙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采取的各种战略、战术，及其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

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制订的“国策”，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迫切需要使华北成为它的战略根据地，以便最后鲸吞中国。“华北治安战”即为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即不断以武力威胁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之屈服，相继签订了“塘沽”、“何梅”、“秦土”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时，派遣特务机关收买亲日分子策动华北独立。敌人的猖狂侵略激起我国人民的极度义愤，终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中日战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仰仗其精锐强大的兵力，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妄想一举而定华北。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本书除系统地叙述了中日战争在华北各个阶段的作战经过外，并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斗争介绍颇详。诸如“百团大战”，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

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的所谓“肃正作战”，先后五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华中、南京一系列伪政权的炮制和操纵，以及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诱降活动等等，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工作和游击战术，以及敌人采取的各种谋略、战术等也作了分析和研究。书中一再确认：“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并且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使敌人打了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没有明确战线的战争”，“陷在泥潭里的流血战争”。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的“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本书原文共两卷，上卷自“九·一八”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止，下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止。本书编写的内容主要依据日本侵华时的档案资料，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等的回忆和笔记。因此，本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站在与我敌对的方面，其采用的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列举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见《土肥原贤二秘录》）。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本书从另一个

角度看来，仍有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日战争中敌我双方采取的战略战术，敌人如何利用蒋介石、汪精卫等执行的投降卖国路线，以及战争成败的各种因素，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全书的上卷，其中资料颇多烦琐重复之处，另外，有些地方引用早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文件等，译时大部从略。至于敌人当时搜集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国民党等的情报，其内容和人名、职称、番号、军政机关序列以及对国共关系的介绍等等，多有错误和主观猜测之处，为保持原著的面貌，便于研究当时敌人的活动情况及心理状态，均按原文译出，未加订正。此点希望读者特别予以注意。另外，有些专用名词，如“治安战”、“肃正”、“剔抉战术”等等，因系当时日军特定用语，故均用原文，从行文中当可了解其含义。有些地方译者作了注解。至于书中的“笔者注”、“注”以及括号内的说明，均为原书编者及作者所加，也希读者注意。

全书由田琪之、申泽福、李直、方克、宣继哲、张玉璞、王新崇、尹福泽等同志译出，孙立民同志负责校订。李作民、张士杰同志也做了部分校订工作。

最后，限于译者水平，难免翻译错误或不当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

目 录

译者说明	(1)
序章 华北事变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1)
满洲事变后的形势	(1)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6)
纠纷不断发生	(13)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15)
华北形势恶化	(17)
第一章 从华北事变至1938年的治安战 (19)	
一 从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	(19)
华北事变的爆发	
中国事变趋向扩大	
华北方面地面作战概要	
第八路军的出动	
平型关战斗	
二 1937年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48)
华北政权建立工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蒙疆三自治政府的成立	
1937年末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	
五 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	(73)
徐州会战及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	
攻取武汉战役及华北的治安情况	

四 中共的政治工作(83)
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边区政府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政府	
扩大党组织工作的实况——和顺县的一例	
中共党组织的扩充及后方扰乱工作	
共军的政治工作	
中共的军事工作	
第二章 1939年度的治安战(107)
一 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107)
确保安定的基本设想	
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	
二 肃正作战与治安工作概要(110)
要点	
第一期肃正作战（1939年1月—5月）	
第二期肃正作战（1939年6月—9月）	
第三期肃正作战（1939年10月—1940年3月）	
三 各方面的肃正作战(128)
五台作战（1939年5月8日—6月25日）	
鲁南作战（1939年6月7日—6月25日）	
鲁西作战（1939年7月3日—7月9日）	
驻蒙军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	
四 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164)
文教（思想）工作	
宣传工作	
经济工作	
对抗属的优待工作	
除奸工作及民众连坐法	
制造、修理枪械等工作	
山西省西北部的叛乱工作（晋西事件）	
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	
五 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收集(176)

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	
驻中国宪兵队的情报业务	
华北灭共委员会	
六 华北、蒙疆的政情	(188)
树立临时政府中央政权的准备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新民会的活动	
天津租界问题	
七 中国方面的状况	(197)
国民政府（蒋政权）的抗战态势	
中共的动向	
国共矛盾的激化	
第三章 1940年度的治安战	(205)
一 根据全面形势的剧变所采取的各项施策	(205)
针对国际形势发展制订应付时局的措施	
促进汪蒋合流工作	
国共走向妥协的努力及双方的交涉	
二 华北方面军关于肃正工作的施策	(216)
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对思想战的指导方案	
关于确立秩序的军律布告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新民会的改组	
三 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	(263)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1940年6月6日—7月8日）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治安肃正工作	
四 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工作及军事方针(283)
政治工作的重点	
行政组织与民众组织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	
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五 对“百团大战”的作战（冀中作战、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291)
共军攻势开始前的一般情况	
共军第一次攻势与日军的防御战斗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1940年8月30日—9月18日）	
共军的第二次攻势（1940年9月22日—10月2日）	
第二期晋中作战（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	
晋察冀边区方面的肃正作战	
从中共方面的记录看“百团大战”	
六 从“百团大战”中取得的教训和对中共的观察(326)
第一线兵团取得的教训	
共军方面取得的战斗教训	
华北方面军加强和调整情报机能	
方面军对中共的观察	
方面军对国共矛盾的观察（1941年1月—3月）	
七 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350)
中共势力的盛衰及华北治安的好转	
年初华北方面一般敌情	
第四章 1941年度的治安战(357)
一 指导对华长期战的各项措施(357)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二 1941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361)
方面军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冀东作战与冀中北部作战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3月30日—4月3日）	
三 对华北地区共党实力的观察(376)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组织概况	
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剿共工作的参考	
四 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411)
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进和扩大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	
作战经过概要	
政治及宣传报道工作	
教训及意见	
五 1941年秋季各项施策的推进(449)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中共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对策	
肃正作战及其成果	
沁河作战（9月20日—10月20日）	
博西作战（“汉”号作战—9月19日至10月1日）	
第二次鲁南作战（“苏”号作战—11月5日至12月28日）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内的肃正建设工作	
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	

序章 华北事变^①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满洲事变^②后的形势

日本虽于1932年9月15日承认了满洲国^③，但满洲国内治安状况仍很混乱，需要军方用极大努力进行肃正讨伐。关东军于年末扫荡了呼伦贝尔进入满洲里，1933年平定了热河省，断绝了张学良政权赖以扰乱满洲的根源。

此次热河作战，趁势越过长城线而到达华北地区，5月31日，关东军与当地中国军之间在塘沽缔结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关东军8月由长城线撤军，熄灭了日中之间在华北的战火。根据这一协定，划定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东，北至长城地区，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维持治

① 日本侵略者最初称“七七事变”为“华北事变”，后又改称“中国事变”。
——译者
后同。

② 日本侵略者称“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后同。
——译者

③ “满洲国”即1932年2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一手操纵下成立的东北傀儡政权。
——译者

安。

由此，关东军专心致力于恢复全满的治安。分散部署各兵团，积极展开讨伐作战。

中国方面于6月17日，成立了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及北平、青岛两市为管辖区，处理华北政务。但该委员会软弱无能，对于处理与当地日军及外交官员之间的悬案毫无进展。

本章仅就1937年7月至华北事变爆发期间的形势，特别是对于日本进入华北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以及相互关系加以概述。

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急于充实国防力量使之空前强大，并改革军制。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

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但正处于讨匪几无宁日的情况下，致使对苏战备迟延。然而，在这期间，以满洲对抗苏联为背景，笼络内蒙、华北使之与我方采取同步调的谋略工作，却有迅速的进展。

对内蒙，则策动新兴势力的领导者德王。1935年5月，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在东乌珠穆沁王府会见德王以后，迅速推进了内蒙的工作。

对华北，由于与南满的治安、经济关系密切，又因在对苏防卫上具有巩固满洲后方的意义，故对之抱有深切的关心。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内蒙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塘沽协定后，日中之间逐渐平静。在1934年12月，蒋介石也采取了对日绥靖的新外交政策，恢复了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通信、邮政等，形势顿见好转。但另一方面，围绕塘沽协定的实施，纠纷频出，不仅在停战地区内发生扰乱治安的情况，并波及该地区以外。

兹将当时中国的一般形势加以概述。

满洲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群众之间，民族意识、国民觉悟空前急剧高涨，出现了通过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强烈要求。1932年1月1日，南京、广东两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政府。林森任政府主席，出现了行政院长汪兆铭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的新时代。蒋介石支持汪兆铭的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对日持慎重态度。

1932年1月末，因第十九路军爆发了上海事变^①，5月停战。于是，蒋介石为完成国内的统一，再次恢复剿共作战，即第四次围剿，由蒋自任剿共总司令，在汉口设立总司令部，动员60万人的兵力，在6至10月之间，进攻以湖北为中心的三省苏区。

此次剿共作战值得注意之点，是以县为单位组织义勇军，建设公路，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等。根据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虽痛感群众及其党的基层组织很不完善，但此时为期已晚，只能依靠县长指挥的义勇军。

剿共军队虽占领了广阔地区，但由于共军采取了回避战

① “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成立停战协定。后同。

——译者

术，未能歼灭其主力，而陷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江西省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工作顺利开展，这对蒋介石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敌人。

至1933年，日本与中国的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更加激烈，但国共的对立却毫未减弱，相反在1933—1934年之间达到了顶峰。中共在1933年1月发表了抗日三原则，虽主张国内抗日势力有条件的合作，但抗日依然被当作反蒋的从属问题。蒋介石也于同年4月对国府要人演讲时强调主张“安内攘外”。提出只要彻底肃清中共这一“心腹之患”，则治愈日本“疥癣小病”不成问题，将抗日斗争的矛头极力转向剿共。

蒋介石第五次剿共作战，虽因日军对热河作战暂行延缓，但5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对日问题告一段落，蒋立即正式进行围剿准备。此次采取了加强经济封锁、扩充汽车公路、建设包围堡垒等三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还成立了所谓“别动队”的特务组织，负责督战，收集情报，组织群众、搞阴谋活动等工作。

为此，中共也加强了反围剿的态势。但在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尚未确立，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削弱了中共的力量。例如，中共对11月建立的高举“反蒋抗日”旗帜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但未与之合作，反而加以敌视。致使福建军陷于孤立，受到国府陆海空军的总攻击，于1934年1月末覆灭。

第五次剿共作战，在福建事件之后动员了近百万大军，以江西为中心，在福建、湖北、安徽等地迅速展开围剿。中

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月末，败势已成定局。1934年7月15日，中共号召“北上抗日”，开始逐步突出江西。11月10日瑞金陷落。但在此之前，红军主力已于10月15日夜，开始大规模西迁（长征——译者）。

蒋介石鉴于共军的直接威胁业已减轻，为完成最后的剿共作战及重建濒于崩溃的经济，与日本之间有必要暂时保持休战状态。因此，1934年末开始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此时，华中政情十分不稳。以何应钦为首的主张使华北统一于中央的国民政府势力，和拥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张学良系的抗日势力，推动华北五省的反蒋军阀以谋求华北独立自治的日军势力，彼此之间相互对立，各项工作针锋相对，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此时，蒋介石对日绥靖政策所提出的制止排日行动等措施尚未充分实行，而纠纷却不断发生。

1935年1月下旬，宋哲元军之一部侵入热河省丰宁县，于学忠军又于4月侵入停战区内。5月2日两名亲日要人（中国报社社长）在天津被暗杀。同月下旬，孙永勤匪团在热河停战区内扰乱治安。抓住这一机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强硬交涉，要求何应钦改变华北局势。中国方面被迫全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6月10日缔结了“梅津——何应钦协定”（何梅协定）。据此协定，中国方面应实行：（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二）从华北撤走宪兵第三团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三）撤走河北省党部，（四）于学忠属下五十一军及中央军撤出河北省，（五）解散有害日中邦交的蓝衣社及其它秘密组织，

（六）发布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命令。

在察哈尔方面，自1934年末以来，由于宋哲元军对热河西部的侵犯，在张北不断发生非法逮捕和侮辱日本官宪等事件。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交涉，于6月27日缔结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秦土协定），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势力从接壤热河省西境的察哈尔省撤走。

上述两协定是为处理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工作而缔结的，目的是要确保停战协定的施行，其内容则又前进了一步。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由于上述两协定，华北问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月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

确定由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治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察东事件），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掀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南京）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尔后国民政府对上述政权，逐步使之中央化，极力对所有机构施加国民政府的影响。自1933年长城之战以来，拥有抗日运动经验及实力的第二十九军，以执行抗日政策的第一线部队而傲慢自负。因此，以日满华亲善、建立缓冲地带为目的的冀察政权，完全改变了性质。

在陆军中央，正为1933—1934年间以来日苏战备上的均势发生破绽而担心，并且也考虑到将会带来相反的不良影响，极力主张华北自治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为此，1936年1

月13日，以下列的“华北处理大纲”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这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命中国驻屯军担负援助华北自治的任务，而使关东军从主导地位上撤出，华北工作应在幕后逐渐进行。

华北处理大纲 1936年1月13日

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示：

处理华北之主旨，在于援助其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使之得以安居乐业，并调整与日满两国的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福利。为此，应支持及诱导新政治机构，以期加强与扩大其机能。

要领

一、自治地区应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急于扩大地区，按照第二项以下的要领，首先稳步实现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自治，进而使其它三省自行与之合并。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当前应通过宋哲元氏进行之。民众的自治运动凡是公正妥当者，应尽量采纳，逐步实现真正的自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对冀东自治政府，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自治能力尚未健全期间，可暂行支持其独立，一俟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再尽快促使合并。

二、自治程度，虽尽可能使之获得广泛的自由，但当前则以不容南京政权有推行反对日满政策的余地为目标，其它则可循序渐进，应避免急剧要求独立权限等。（以下笔者略）

（三、四项笔者略）

五、对华北的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其实施原则上应直接以冀察、冀东当局为对象，并坚持以幕后指导为主旨。

（以下笔者略）

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应对上述工作给予协助。（以下笔者略）

对此，关东军方面仍很积极，但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多委由南京嫡系人物担任的情况甚感失望。另一方面，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的进展互相结合，加强了德王的政治基础，2月举行蒙古建国会议，5月在德化成立了军政府。

陆军中央部要使关东军完全撤手，但中国驻屯军现在的战斗力极其薄弱，更担心有被四周中国军队轻侮的可能。原来华北驻屯军，是根据“北清事变”协议书^①设立的。其兵力并无限制，而由缔约国举行会议决定（实际并未举行会议，各国任意施行已成惯例）。于是1936年4月18日中国驻屯军按下列部署，较过去增强兵力约二倍：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

中国驻屯军战车队

中国驻屯军骑兵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军工兵队

改编后，军司令官定为钦命（天皇任命——译者），5月

① “北清事变”指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的战争。所谓“北清事变”协议书即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
——译者

1日任田代皖一郎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1936年5月15日，日本陆军当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这次兵力增强的目的：（一）华北防共，（二）保护侨民。正当此时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当局对于治安正感头痛时，北京中共系统抗日团体及学生运动又开始激化，并发生共军力量侵入山西省的情形，引起了激烈的镇压与战斗。

上述日本方面的工作和一系列措施，均被中国方面看作是日军强行侵略的继续，终于加深了反日情绪。

对此，当时驻中国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后升中将）回忆如下：

“陆军中央部未能采取主动有效的正确领导，而是静观趋势演变，所能做的不过是控制和防止了武力行动而已。由于未能正确掌握全中国统一的现实趋势，依然固执所谓分治合作的老框框，未认识到华北自治工作是如何逆天而行，从而造成了对新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在此情况下，只有暗中期待关东军工作的成功了。”

对此，蒋介石认为如日本促进华北自治，势必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统一的破产，因此，一方面恳请日方加以制止，同时竭尽一切手段努力加以防范。”

以下概述苏联的对华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934年秋，丧失了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等共军首脑，鉴于内外形势的不利，宣言北上抗日。经过贵州、云南、四川、新疆、甘肃，历时一年有余，到达陕西北部，完成了长征。途中频遭地方武装的堵截及国民党军的追击，粮食缺乏，疾病及掉队者不断出现，加以险峻的地形，恶劣的气候等，历尽难以想象的

苦难，到达陕北时，只剩二万余兵员，不过是出发时的十分之一。

由于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加以艰难的长征，共军的势力大为削弱。之所以能够避免彻底歼灭，固因共军坚韧精神所致，但也与蒋介石对外问题的处理有关，特别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威胁，以致放松了对共军的追击。

在此之前，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共产国际会议。会议认为当前之敌在于德、日法西斯，其它一切势力均应积极纳入统一战线之中，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应暂行搁置。会议明确了通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心致志地进行斗争。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首先，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爪牙所进行的群众武装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核心。

在召开此次共产国际会议当时，中共中央虽处于长征途中，但在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所谓八·一宣言）①，号召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一、为防外敌，停止一切内战，集中所有国力、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战。

二、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对中共红军的攻击，准备对日作战。

三、红军抛弃旧怨，为了救国愿与国民党军队（除蒋介石外）携手合作。

四、不论任何政党、派别、团体、军人、一般人及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人，团结奋起粉碎日本及蒋介石的压迫。

五、组织全国性的国防政府，改编红军及抗日义勇军为统一

① 八·一宣言译文未按中文校正。

——译者

的全国抗日义勇军。

六、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与各党派团体、军政机关，共同制定国防政策。

七、在统一的国防政府指导下，组织抗日联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最后胜利。

“八·一宣言”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中共战术转变的第一步。日本华北工作急速进展，中国抗日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际，这一宣言正合时宜。此后，抗日运动发展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势力。这可以说是苏联的策略在背后巧妙指导的结果，其目的乃是驱使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入侵进行一场所谓民族解放或民族独立的战争。

但是在“八·一宣言”时期，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存在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观点，因而国民党上层分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被排斥于统一战线之外。

在宣言中，中共初次提倡全面停止内战，号召有民族意识的广泛阶层奋起抗战，其意义实为重大。

中共中央的“抗日第一、国共全面停止内战”的思想，在全党内部普遍贯彻，需要相当时日。1935年12月9日，在天津、北平掀起的学生运动（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波及全国（随后发展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日本和中、美、英的对立，德、意的兴起，苏、英、美、中的接近）、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内部派系关系的变化，使中共的政策从“反蒋抗日”逐步向“联蒋抗日”发展。

1936年2月1日，陕北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拥入山西省。中共在东进宣言中宣称，此举是为了抗日而逼近日军前线的河北省，也是为了打倒与日本妥协的蒋介石，号召立即对日宣战。随后迅速击溃阎锡山军，控制了山西广大地区。但在3月，由于中央

军的进击，受到很大损失，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或称回师通电），从山西撤退。由这一通电开始，才宣布的联蒋抗日。

注：由于蒋介石无视此通电，国共合作未能迅速进展。撤回陕西的红军，努力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继续渗入全国各个抗日组织内部。另一方面，蒋介石在积极准备第六次剿共的同时，5月5日公布了加强蒋介石权限的宪法草案，在国民党政府内更加巩固了蒋介石的地位。

纠纷不断发生

日本为适应世界形势的转变，谋求推进划时代的国防国策，1936年8月7日，决定了“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方针。外交方针，为了挫败苏联侵略东亚的企图，首先是针对苏联制订的；与英、美则要增进亲善关系；对华北仍执行下述推进华北分治政策：

当前的施策，鉴于日苏关系的状况，首先应使华北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在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之同时，应使中国全面反对苏联，靠拢日本。这是对华施策的重点。

随后在8月11日，有关各省之间所决定的“对华施策”及“第二次华北处理大纲”中，在以华北自治为目标这一点上，也和“第一次华北处理大纲”相同。所不同者，强调华北分治是为了防苏，并且应在南京政权下实行，此外，对华北的经济开发已进入具体研究的阶段，这些是新政策的特

点。

然而这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根本冲突的，特别在抗日排日气氛全面急剧高涨的中国现状下，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

如上所述，日本的华北工作从1935年秋以来，虽有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纠纷及对日暴力事件。如1936年8月24日，在四川省成都发生了4名日本新闻记者遭到群众的袭击，两名死亡，两名重伤的成都事件；9月3日，在中国北海（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北部湾北岸——译注）发生了惨杀日侨的北海事件；9月9日，在汉口枪杀日本领事馆警察；23日，上海又有海军士兵被枪杀。这时，负责保护华中、华南的日本利益及侨民的海军，态度突然强硬起来，表示了如不及时解决事件，便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

在华北，7月26日出现了中国士兵侵入丰台的日军兵营进行威吓的事件（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中国士兵再次在丰台妨碍日军行进而引起了纠纷（第二次丰台事件）。

11月，各地开始罢工示威游行。首先上海日人经营的纺织工厂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示威，其中一部形成了暴动，由此激化而演变为抗日运动。通过日方的强烈要求，上海市当局逮捕了救国会及其它抗日团体的领导者和暴徒，对共产党进行了搜捕。由于上海示威怒潮波及青岛，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12月2日各工厂陷入不得不一齐关闭的危机。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进入各工厂布置警戒。

当时在中国方面，蒋介石调中央军陆续北上，大规模动

员东北军、西北军，亲自飞往西安、洛阳、太原进行部署，并巩固山东、绥远的防务。同时，为了对共军陕北根据地发动第六次围剿，加强了包围圈。蒋介石这一措施，不单纯是剿灭共军，也是企图对持中立态度的华北各将领加强中央的统治。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日中之间的纠纷在中国全境不断发生，远在北方绥远，内蒙军与傅作义军又生战端，这就是绥远事件或绥东事件。该事件发生的经过概况如下：

1935年末，进入察东6县扩大领土的德王，迫切希望早日建立包括察哈尔、绥远、甘肃在内的蒙古国，从而首先开始了对绥远的工作，与傅作义形成对立之势。但是，陆军中央部已于1936年1月的第一次华北大纲中指示，“对内蒙工作，其范围限定于长城以北，且不得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地区”，禁止关东军与傅作义军发生冲突而进行绥远工作。

然而，关东军无视中央指示，根据其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的计划，企图以乌合之众的杂牌军侵入肥沃的绥远省东部的四蒙旗。该地区在1929年以前，曾是察哈尔省的一部分。1936年11月9日，德王向傅作义要求归还该四蒙旗遭到拒绝后，遂于14日按上述预定计划开始了军事行动。

蒋介石调20余万中央军及非嫡系军北上，采取支援绥远军的姿态。

内蒙军战况趋向不利，特别在11月24日，守备薄弱的百

890174

灵庙要冲被占领，遂即导致全面溃败。正当此时，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发生了西安事变。苦于作战失利的德王，趁机通知绥远军停止军事行动，傅作义当即应允停战。因此，事态未进一步发展，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傅作义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方面进行了夸大宣传，好象关东军已被击破。因而，中国国民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形高涨。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由于中共的调解，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得到谅解，蒋介石在12月26日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表面上虽仍否认转向容共政策，但在1937年1月6日撤销了西安的剿共总司令部。2月27日在西安召开国共停战会议。此后，两军从主要战线开始停战，并逐渐及于各地的游击战区。国民党从2月15日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根据所通过的“根绝赤祸决议案”，虽属极为间接的表现，但是从此开始迈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在这次大会上，亲日派的失势已明显可见。

中共早在2月10日即向国民党提出包括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与国民政府，停止土地没收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要点的国共合作方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抗日时期的新阶段，提出了加强国内和平，推进抗日战争，争取民主权力等口号。5月3日在延安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加紧进行抗日战争与彻底改革准备工作总的政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号召“为千百万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从1936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一有了显著的进展。1936年9月已使西南派屈服，到12月的绥远事件以后，由于中央对华北军阀加强统治及国共合作的实行，国民政府的威令几乎及于全中国。

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1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

华北形势恶化

此时，在中国当地日中之间的形势，日趋恶化。在华北依然不断发生排日行为。如2月发生非法检查驻张家口副领事及日人事件，2月—4月出现割断张庄、北仑、落岱附近日军军用电话线事件，4月在德州火车站发生监禁日人警察官事件，5月张家口发生对日侨暴行事件和北京的对日本小学校学生暴行事件，6月命令禁止满洲与华北之间的飞机通航以及要求撤销天津日军无线电台等，从而与日本之间的气氛日益险恶。

下面是5、6月间有关华北形势的各种情报。

一、6月8日永津佐比重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有关中国形势报告之一：

蒋介石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

当前正想依靠英国充实其军备的财源，并极关心解散冀东政权。

二、6月9日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中国视察报告之一：

当地攻击日军的宣传十分强烈，第二十九军上层人员对日本虽有所理解，但中层以下人员对日抱有强烈反感，约三分之二是抗日派。冀察的一般情形也是如此。

三、6月18日冈本清福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奉命向中国驻屯军重新传达早已指示过的中央方针，以打通思想，再次告诫，严禁出现类似谋略活动的行为等。其归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

四、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的井本熊男大尉（后升大佐）的战后回忆：

1937年6月，中国对日空气险恶，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的情报频频传来。为防止万一，视察了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附近的地形，于6月末返回东京。当时中国官宪严重妨碍视察，时有置身险境之感。特别是在芦沟桥上听取前宋哲元军事顾问櫻井德太郎少佐的讲解和视察一般地形时，险些受到中国士兵的拘留。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完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阅读此类报告，华北形势恰如充满可燃性的气体，处于星星之火即可爆发的危险状态，且有极大可能燃烧到中国全土。然而日中两国首脑皆不认为即将发生全面战争，当然更不希望出现此种情况。在此期间，实际上是由非理性的原因和第三者的煽动（日中双方的强硬分子、阴谋家、煽动者等），而使事态日趋严重。

第一章 从华北事变 至1938年的治安战

以1937年7月7日深夜爆发芦沟桥事变为开端，眼看战火由华北向华中扩展，尽管双方首脑努力不使战火扩大，力图就地解决，但事变终于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日本于1937年，即事变的第一年，在华北进攻黄河以北，在华中会战于上海，随后攻陷南京。一方面以武力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以各种外交手段谋求事变的解决，同时在占领地区则建立地方政权，努力维持和恢复治安。

在事变的第二年，继徐州会战之后，在进行攻占武汉及广东的作战同时，尽力施展政治谋略，图使重庆早日屈服。但是，由于中国事变始终未能解决，故不得不进入长期的持久战争。

本章主要叙述全面形势的变迁，在此期间的治安状况，以及维持和恢复治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阐明事变第三年即1939年以后，正式进行治安战的经过。

一 从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 华北事变的爆发

首先叙述事变开端的芦沟桥事件。

当时，在冀察方面驻有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该军由四个普通师、一个骑兵师、一个旅、一个特务旅、二个独立混成旅组成，此外，在其指挥下的尚有华北地区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1937年6月间，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与特务旅驻南苑，第三十七师主力驻北京西郊的西苑，以其一部部署于北京市内、芦沟桥地区及保定附近。第三十八师主力驻南苑，其它驻北宁及津浦路沿线要地。第一三二师驻河北南部，第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内。

事件发生以前，芦沟桥附近中国方面的情况，显然日趋不稳，此种情形在“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战斗详报”中有如下的记述：

事件发生前，驻芦沟桥的中国军队增加兵力，态度突然傲慢起来。其变化情况如下：

一、增加兵力的情况

平时芦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在城内驻有营部及一个连，在长辛店驻扎约一个骑兵连。但至本年5月中、下旬，城内兵力虽无变化，城外却增驻一个连。在芦沟桥附近也增驻约二个步兵连。6月间在长辛店增调步兵第二一九团所属的约二个营。

二、增强防御工事的情况

在长辛店北方高地，原有两处永久性机枪阵地，在高地上筑有野炮阵地。进入6月，又新筑了散兵壕。在芦沟桥附近，修整加强从龙王庙至铁路沿线附近之间的土堤及东方高地上的散兵壕，而且在夜间掘开以前用土埋藏的“碉堡”（过去为掩护对北平方向的进攻或退却，在以芦沟桥为中心的永定河左岸地区，构筑了十余个桥头堡）。

三、抗日意识浓厚，态度傲慢，拒绝通过芦沟桥城内的情况

关于通过芦沟桥城内一事，去年驻扎丰台时，曾拒绝我部队通过，经我提出抗议，获得解决。丰台事件以后，中国军队的态度大为缓和，并配备懂日语的军官，努力防止发生误会。但是，最近又拒绝我军由城内通过，每次通过均需经过麻烦的交涉。

四、对我演习的抗议

芦沟桥附近一带，是北宁铁路取用砂砾的采掘地区，只能种植花生等植物，因此在夏季各地高粱茂盛时期，该地区却成为丰台驻扎部队的唯一可供演习的场地。

然而，最近当我演习之际，中国军队却指称侵害农田，对夜间演习则要求事前通知，并对夜间进行实弹射击提出抗议等等，同时还逐渐加强了警备。

五、限制行动地区：

过去龙王庙河堤及其南方铁路桥梁附近，我军可以自由活动，但从6月下旬开始，拒绝我军在该地自由活动，当我军兵力不多时，则荷枪实弹，态度蛮横。

六、改变警戒部署情况

从6月下旬起，龙王庙附近以南，在已有阵地上部署兵力，严加警戒，到夜间更增加兵力。

一字山附近从来未曾配备警戒兵力，但最近发现夜间我军不演习时，即在该地配置兵力，黎明时撤走。

中国军队自本年春夏之际，北平附近战备已相当加强。至本年6月，北平各城门又增加了警备兵力，且以警备行军为名，特别是夜间，屡屡见到在北平市内及郊区行军的部队。（以下笔者略）

芦沟桥附近日军情况，在前述战斗详报中有如下记载：

（以上笔者略）驻屯军应慎重行事，尽力不使酿成事端，为顺利完成既定任务，应坚持训练，特别要加强夜间演习。（以下

(笔者略) 芦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增加，从各种征兆判明，乃是根据全面形势以及南京方面的指示进行的，但也应考虑到，由于我部队的行动刺激了他们的神经等原因，举例如下：

一、6月至10月是丰台驻屯部队的中期训练时期，在此期间对中队及大队积极进行训练，特别对中队进行了日以继夜的训练。

二、5月下旬，军方对驻丰台部队进行临时检阅，军的幕僚大部聚集在一宇山。

三、联队长对驻丰台部队的中队训练检阅，计划在该地举行，因此辅佐官屡次去该地附近勘察。

四、旅团长、联队长到该地附近视察演习。

五、本年从6月末至7月上旬，为了普及新步兵操练，在芦沟桥城北地方实行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大部分干部参加了这次演习。

联队长感到中国方面对日情况逐渐恶化，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全面形势十分严重。因而指示全体部下，高度注意，严防不测，同时命令事先作好战斗准备。(以下笔者略)

在此情况下，7月7日夜，丰台部队的一部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时，遭受龙王庙附近阵地中国军队的射击。以此为开端，8日晨在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终于进入交战状态。当时情况，由前述战斗详报中摘记如下：(括号内为笔者注)

第八中队(驻扎丰台的第三大队所属，中队长清水节郎 大尉)，7月7日午后7时30分进行夜间演习，由龙王庙附近向东方大瓦窑进行“利用薄暮接近敌主阵地”及“黎明突击行动”的演习。该中队长为避免误会，特别背向龙王庙朝东进行演习，盖因已知龙王庙附近在夜间部署有中国士兵的缘故。该中队在上述演习

中，于午后10时40分左右，突然遭受到龙王庙附近中国军的数发射击。因此，中队长当即停止演习，吹集合号。然而此时从芦沟桥城墙方向又射来十数发子弹。

在此期间，中队长命中队集合在大瓦窑西方碉堡附近，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当即一面准备应战，一面紧急向大队长报告。

夜12时前，大队长在丰台官舍接到报告后，命令紧急集合，决定立即出动，同时向联队长报告。

当时北平警备司令官河边（正三）少将，正在南大寺（秦皇岛西方）的野外营地，对步兵第二联队的中队教练情况进行视察检阅，由联队长代行其职务。联队长于7月7日零时左右接到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的电话，报告该突然事件的大致情况，并报称拟令驻丰台部队立即出动，妥善处理。联队长当即同意。一木大队长急赴现场，在作好战斗准备后，命令驻芦沟桥城内的营长出面交涉。

7月8日上午2时，联队长派联队附森田（彻）中佐驰赴现场。对事件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国方面负责人赔礼道歉。（以下笔者略）午前4时，派森田中佐带领特务机关人员寺平（忠辅）大尉，偕同宛平县长王冷斋，外交委员林耕宇等到达一字山。

第三大队于8日1时50分左右，由丰台出发到达一字山附近，监视中国军的行动，于3时25分左右，再次遭受中国军的射击。联队长判断“进行如此多次的射击，是中国对我军的敌对行为”，立即命令第三大队长，在受到中国士兵射击时即可应战。于是，第三大队长从8日5时30分，对龙王庙芦沟桥间之敌开始攻击，夺取了敌方阵地后，渡过永定河进占右岸。至6时以后战斗呈胶着状态。（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对第二十九军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声称：“在芦沟桥城外并未部署中国士兵，如有部队当是土匪。”）

中国驻屯军于8日晨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芦沟桥事件的方针。适巧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病危，因此对驻守南苑、北苑的第二十九军主力未曾积极进攻，仅将天津东机器局（东局子）附近的军方直属各部队的主力，置于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指挥之下，使之迅速向丰台前进，其它各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时，未向关东军等处要求增援。

中央统帅部8日晨，接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的电报报告，经过研究、考虑了全面形势，决定防止事态扩大。当天18时42分，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的指示。

当地的河野旅团长奉军方命令，从9日拂晓命所部准备攻击芦沟桥城（宛平）。中国方面第二十九军首脑部惟恐事态恶化，9日晨该军副军长秦德纯向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提出“为了使芦沟桥附近之中国军队向永定河右岸移动，希日军勿从现在战线前进”。我军当即允诺，并监视其行动。中国军队拖延撤退，直至9日中午才勉强由芦沟桥城撤退完了，但至10日再次占领龙王庙附近，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南下，对我进行射击，因而引起小的纠纷。

9日晚，参谋次长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下达了“关于解决芦沟桥事件与中国谈判的方针”的通知。通知指出，解决芦沟桥事件应避免涉及政治问题，谈判时提出下列要求，限中国方面于最短期间内承认并实行。

谈判提出的要求为：

一、中国军队停止在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

二、对将来作出必要的保证。

三、处罚直接负责人。

四、道歉。

当天（7月9日）将此次事件命名为“华北事变”。

中国驻屯军为迅速解决事件，桥本军参谋长去北平，10日向中国代表提出了上述通知的四项要求。中国方面虽大部予以承认，但未允撤兵。11日午后，当参谋长准备回津抵达北平飞机场时，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承认全部要求，当日18时两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

然而，就在当地签订停战协定那天（11日），中央统帅部为了保护侨民、军队自卫、保障合法权益的需要，作出了有关向华北派兵等的重大决定。当即命令关东军调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并从朝鲜军抽调第十二师团，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此外，还钦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注：香月司令官12日乘飞机到任。）

7月12日以后，中国驻屯军监视中国方面履行协定的情况，但中国方面却构筑阵地、输送军队及军需品等，正在忙于战备。又接到情报称，南京政府7月10日出动了空军部队，并调四个师集中于河南省北部省境；12日动员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省军队向陇海、平汉沿线集结；14日命令广东省空、海军出动等。

此时，双方在芦沟桥附近，不断发生小的纠纷。当时的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后为中将）回忆如下：

“停战协定成立后，仍在局部地区出现两军对峙状态。在13日夜，终于再次开火。日军方面声称中国军方面先行射击，中国军方面则声称日军方面先行射击，究竟由何方首先挑衅不得而知。经过调查，始知在两者之间竟有发射手枪并燃放鞭炮者。

日、中两军对此作了传达，要求各自警惕。但是14日以后此类情事仍时时发生。据当时的情报称，共产党员某某纠集北京文化界人士，组织北京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京津蓝衣社第四总队得到西安第六总队的增援，正进一步促使日中之间的冲突加剧等。冀察政权内强硬派的势力更加增大，协定的实行已很难有所进展。”

陆军中央部在13日夜，重新确定“华北事变处理方针”，经上奏批准后向当地驻屯军作了传达。新方针指示：“今后仍采取不使事态扩大、坚持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避免可能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传达这一指示，是由于陆军中央部方针已定，有必要再次确立对当地驻屯军的领导。但鉴于中央军的北上及平津地方各种纠纷等情况，陆军中央部判断今后形势将更加紧迫，为防止中国方面的拖延政策可能导致的危险，以及不误我方动员出兵的时机，16日训令中国驻屯军在当地进行“限期交涉”，即以7月19日为期，要求中国方面最低限度实行以下事项：

- 一、宋哲元正式道歉；
- 二、处罚负责人同时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 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
- 四、宋哲元在7月11日的解决条件上签字。

根据上述训令进行就地交涉，进展顺利。18日宋哲元到

天津访问了驻屯军司令部，表示遗憾，承认了驻屯军提出的“关于取缔中共及排日运动等有关条件”。在此期间，调来加强中国驻屯军的兵力，已按预定计划在7月19日集结完了。此后当地形势转趋缓和。

然而，25日在廊房，26日在北平广安门，相继发生了中国军突然向日军射击而引起的战斗事件。至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终于决定以武力惩罚宋哲元军，当即向陆军中央报告并请示。中央部予以同意，26日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27日对国内三个师团（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下达了动员令。这一动员是从11日以来，为了保护侨民、军队自卫而保留下来的。陆军的意见是，不扩大的方针依然不变。

27日根据临参命第64号，赋予“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在原有任务以外负责惩罚平津地区中国军队及保证该地方的安定”的新任务。

中国驻屯军原定27日开始攻击，但由于北平侨民避难迟延，改于28日开始行动。我军一举即将第二十九军的主力击败。29日扫荡北平西方地区，30日推进到长辛店、大灰厂附近，确保了永定河右岸地区。在此期间，28日夜天津的中国军进行反击，29日黎明通县发生冀东政府保安队叛变事件，但不久即被镇压下去。

以上是从日方的立场出发，对事变爆发前后至7月末使用武力为止这一时期主要情况的概述。以下再就中国方面的状况加以叙述。关于芦沟桥事件，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7月7日夜，日军在芦沟桥进行非法演习。偶然有一士兵行踪不明，日军以搜索该兵为借口，当夜要求进入附近的宛平县城。中国当局予以拒绝，日军步炮兵立即对宛平城进行攻击，我守备部队终于被迫进行抵抗。”（此段译文未与原书核对——译者）

芦沟桥事件发生时，中国民众的抗日气氛在全国十分高涨。当局虽然希望事件就地解决，但强硬派积极抗战的呼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共指导舆论，施加压力，致使国民政府不能走上局部解决的途径。

事件爆发后的7月8日，中共迅速发表“抗日宣言”，主张立即发动全民抗战，要求宋哲元军应战、国民政府援助，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战。9日更对各级党组织发出抗战指示，命令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各种抗战团体。

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部发动抗日战争的呼声和反对就地交涉的倾向也日趋高涨。11日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界、各将领，举行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5日参加正式会议。

17日蒋介石作了所谓“最后关头”的演说，强烈表明了决心。

但是，蒋介石声明，国民政府仍希求和平解决问题，惟以能否解决芦沟桥事件作为最后界限。万一不得已临到“最后关头”，中国只有发动全民进行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并以下列四项条件，作为对日最低要求。

- (一) 无论如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 (二)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位由中央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

非法变更。

(三)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吏，不得因外部压力罢免之。

(四) 第二十九军驻防地区，不受任何限制。

这一声明的情势仍未面临“最后关头”，并不认为是开战。在此期间，仍在继续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国民政府也已进入战时体制。20日前后，国民政府中央对当地协定开始采取否定态度，21日决定党政军按战时体制进行改组。

中共于15日向国民党递交了“国共合作宣言”，要求予以公布。认为蒋介石17日的声明，比过去大有进步；一味非难宋哲元的和平外交，并努力防止其实现。23日中共又发表了“关于华北事件第二次宣言”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论文，提出全国军队及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国防教育等八项要求，呼吁进行全面抗战。因此，各地抗日后援组织蓬勃发展，反对当地协定的呼声更加高涨。

当29日日军开始进攻时，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不惜一切牺牲，抗战到底。31日释放沈钧儒等抗日救国会七名领袖及其他政治犯，迅速调整了抗战体势。

笔者在本章最初，特别对芦沟桥事件加以简要叙述，乃是为了说明持续8年的中日战争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扩大的，并且搞清在此期间中共所起的作用。但因缺乏确切资料，未能达到理想，深感遗憾。如果追究事变的根源，就要涉及谁先开枪的问题。对此有种种议论，兹将当时驻北京大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中佐（后升少将）的回忆录介

绍如下：

“最初的射击是偶然发生，还是别有阴谋？对后者，有的说是日军对中国的暗中挑衅，有的则说是中共系统或激进抗日分子挑起的。

“虽然对此作了各种调查，但在龙王庙向日军打第一枪的纵火犯究系何人，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当然，事件刚一爆发时，日本方面的部分人员认为这是可以解决多年悬案的好机会，企图与中国一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中国方面，以共产党为首，还有国民党左派及西北系军人等，在事件发生前已开始宣扬对日开战，并已见诸行动。事件发生后，又极尽策划鼓动之能事，阻碍早日实现和平解决。因此，不能排除有施阴谋的嫌疑。若以怀疑的眼光观察时，人民战线派的活动是符合事件前后出现的各种事实的。据我判断，只有中共和国民党的旧西北系及其它左派人民战线，才是扩大芦沟桥事件的主要势力，这可能是没有错误的。据我调查的结果，绝对不能认为是日军所为。至少我相信，平津地区的日军内部没有那种阴谋分子。不过，也不能相信冀察军首脑人物愿意制造此次事件。

“其次，是否纯系偶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似乎存在，而且是可能的。那就是从龙王庙射出的第一发子弹，或许是被恐怖心理驱使的中国士兵由于过失而打的。换言之，起火的原因并非纵火而是失火。但当场既无灭火的决心，也无灭火的设备，更有人宁愿使火扩大，从而造成了大火。这种看法，似无不可。

“但是排除一切阴谋的说法，单纯认为是偶然的开枪，则无法解释事件前所发生的种种变故。不过再从另一角度考虑，抗日意识强烈的中国士兵对日军的反感极大，由于这种感情的偶然发作而开枪，并引起了其他同伙的开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总之，问题并不在于是何人和如何打的枪，最重要的在于

查明其后使事件连锁扩大的政治背景。”

中国事变趋向扩大

中国驻屯军在结束平津地区作战以后，以其主力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北宁沿线地区，以一部确保长辛店和独流镇附近地区，并作好进攻中央军的准备。

当时参谋本部对华作战方针，是尽量将作战范围限定在局部地区，短期内结束战争。7月29日拟定的作战计划是：

击败平津地区的中国军确保该地的稳定，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在保定、独流镇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

随后，8月2日对华北方面的情况判断和部署如下：

一、我第二次动员部队，8月10日前后紧急动员两个师团，由15日至20日止，该两师团及另一师团必须到达天津附近，8月末，全部后方部队必须在天津附近集结完了。

二、万福麟、冯占海等军在涿州、保定之间约有3万人。中央军在保定、石家庄之间约有6万人，在石家庄、顺德之间约有3万人，在河北省北部及郑州附近陇海路沿线约有20万人，徐州附近陇海路沿线约有5万人，共约集中34万人。估计这些中国军将在平汉方面，以一部阻止我军前进，以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及津浦路沿线沧县、德县附近进行顽强的抵抗。为此，其陇海路沿线部队也大有向前方增援之可能。这些中国军队以我兵力微少，或直接进攻，或阻止我军集中，或扰乱我后方，难保不同时向我发起攻击。

据判断在山东省及察哈尔省内的第二十九军之一部可能保持

中立态度。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对策，不致出现积极行动。（以下笔者略）

三、中国驻屯军的作战地区，大体为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但中国军也可能在保定方面进行认真的抵抗。为进入该线，必须有激烈战斗的思想准备。（以下笔者略）

然而，此时有的中央军逐渐进入察哈尔省东部，已威胁到中国驻屯军的侧背及满洲国的西境。因此，参谋本部决定在河北省中部作战之前，先歼灭这支军队。8月9日天皇批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歼灭张家口以东之敌，又令关东军司令官由热河省、内蒙方面支援中国驻屯军作战。

中国驻屯军从8月11日命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攻击南口附近长城一线之敌，16日又增调第五师团参加作战。关东军蒙疆兵团（混成第三旅团、堤支队、大泉支队、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后又增加混成第十五旅团）由北方进军，20日对张北之敌开始攻击。8月下旬两方各兵团分别突破冀察省境及张家口附近，9月上旬进入察晋省境。

另一方面，华北事变爆发后，华中、华南的形势也日趋恶化。8月9日上海发生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以此为开端，13日该地海军陆战队遭受中国军队围攻。以后终于发展到双方出动空军互相轰炸的局面。

因此，8月15日决定以第三、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其任务是“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的重要地带，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

同日，政府发表出兵上海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此次出兵

的目的是“严惩中国军队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醒悟”，并表明日本之企图在于日华协作，根绝抗日，改善日满华关系。总之，处理事变的目的，是要从解决局部事件进而扩大到全面调整日中关系。

这样，虽然战局波及华中，使用兵力也大为增多，但只是在9月2日，才将事变的名称从过去的“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我国政府对此次出兵仍然看作是“事变”，并未实行宣战。

此时，中国方面的状况如下：

8月6日，军事委员会在委员长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国防会议，中央政府及各地军政首脑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华北战况，随后由国防会议副主席汪兆铭报告国际形势，然后讨论国民政府应采取的最后态度。7日在对日作战不可避免的结论下，对有关战时体制的重要事项作出了决议。

8日，蒋介石以“告全体将士”为题发表演说，在表明抗战决心的同时，要求不惜最大牺牲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9日在上海发生了上述大山事件后，国民政府认为必须及早整顿全国对日抗战阵容，命参加国防会议的将领立即返回任地。

13日，上海战事爆发。国民政府14日发表《抗日自卫宣言》，表示抗战的决心。16日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全国分为第一至第四战区，形成全国战时体制。18日，蒋介石针对日军的速战速决方针，提出了以不屈不挠的抵抗，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依靠持久战挫败日军的侵略意图。而且，将中国军的主力集中上海方面，使上海决战的方针具体化。其后，国民政府军迅速进行了动员。

中国共产党8月15日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抗日

战争的基本主张。

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善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 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民族团结。进一步发展了前曾叙及的 7 月 23 日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十大纲领”译文未与中文核对——译者）

上海派遣军自 8 月 23 日在上海附近登陆以来，反复进行激烈战斗。至此，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逐步进入战时体制。8 月下旬内阁决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大纲”。为整顿战时体制，9 月 4 日召开了为期五天的第二十七次（临时）议会。5 日，近卫首相在施政演说中声明放弃过去的不扩大方针，为对中国军进行彻底打击，积极地、全面地转向了军事行动。

当时，陆军中央部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动态。虽然目前苏联参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日方根本思想则是尽快从中国撤出手来以便整顿对苏战备。

11 月 1 日，首相、陆相、海相、外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大纲”，这是军事成果与外交措施的有机结合，力争尽快结束事变为宗旨，同时对长期的准备也做了安排的大纲。

然而，在当地的作战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如后所述，8 月 31 日编成的华北方面军，在 9 月下旬开进保定附近，10 月为追击中国军更行南下，但也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结束

战争的目的。

在上海方面，由于中国军集中了主力，日军虽然投入五个师团，但战况全无进展。参谋本部于10月初决定将主要作战从华北转移到上海方面。10月上旬以新编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加强上海派遣军，编成了华中方面军。其作战目的也由当初的“保护侨民”改变为消灭上海附近之敌，以“挫敌战斗意志，创造结束战争的时机”。

尔后，随着事态的急剧变化，11月20日设置了大本营。为了统一大本营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举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废止了以前的“战时大本营条例”。17日新制订了不仅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的“大本营令”。

华北方面地面作战概要

参谋本部在7月末扫荡平津之后，为实现击败北上的中央军而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的计划，以五个师团增强中国驻屯军。然而因第五师团已用于察哈尔方面，认为以现有兵力与大量增加的中央军进行保国会战似有困难。同时，为竭尽全力创造早日结束战争的时机，对打好华北会战这一仗寄托了很大希望。因此，讨论了增兵问题，结果决定以两个军担任此次会战，并编成了如下的方面军。

华北方面军的编成：8月31日以临参命第82号，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第一、第二军的战斗序列，与此同时，决定派遣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到华北。又将原拟使用于青岛方面正在航海途中的第十四师团也派往京津地方。（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31日编成，同日以临命第480号派往华

北。)

华北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包括：第一军(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该军由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为基干组成；第二军(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参谋长：铃木率道少将)，该军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一〇八师团(师团长：下元熊祢中将)为基干组成；以及直辖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中将)、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部队。

注：其后在保定及沧县附近的会战，将第一〇九师团的主力配属于第二军，将第一〇八师团划归方面军直辖，在此次会战末期又配属于第一军。

于是，31日对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下列任务：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占据平津及附近要地，确保该地的稳定。

“以挫敌斗志，争取结束战局为目的，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

河北省中部及察哈尔省方面的作战：9月4日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到达天津，当日即以歼灭保定、沧县一线附近之中国军为目的，下达了方面军命令，命第五师团(已突破冀察省境的长城线，进入怀来平原地带)推进到蔚县(张家口

西南约150公里)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地带进行作战;命第一军进入易县(保定北方约50公里)、霸县(易县东南偏东约80公里)一线,准备攻击保定附近的中国军;命第二军(当时只有第十师团)进入马厂(天津西南约55公里)附近,准备攻击沧县附近的中国军。

11日,第二军占领马厂附近后,又迅速推进到沧县附近,随后又命主力做好向保定南侧地区前进的准备。关于以后的作战经过,在参谋本部编写的“中国事变陆战史”中有如下的记载:

“第五师团于9月1日占领蔚县,根据情报,该地西晋察省境附近之敌有进攻企图,师团长拟先行击败该敌,然后再向奉命进占的方面转进,于是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平绥沿线作战同时进行攻击,至9月中旬击败晋察省境之敌后,进入保定平原地带。”

“第一军从9月14日起,开始攻击涿州及保定附近之敌,战斗进展渐趋顺利。

“第二军以第十师团在津浦沿线作战,该师团从9月中旬向沧县进击逐次攻占要地,该军主力(第十六师团及第一〇九师团的主力)以其先头部队由天津出发,从独流镇(天津西南25公里)沿子牙河向西南前进。

“9月1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鉴于各方面的战斗正在顺利进展,决定向正定、德县一线追击敌人。当即命第五师团长以有力之一部,根据需要与关东军派遣兵团协同作战,以主力向保定进击;命第一军司令官突破保定附近敌阵后,向正定附近追击敌人;命第二军司令官以一个师团向德县压迫敌人,以其余主力向正定急进切断敌人退路。(笔者注: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地区大体

限于石家庄——德州之线以北，此乃9月25日以临命第542号所规定。）

“第五师团突破敌阵以后，师团长以有力之一部于9月下旬击败灵邱内长城线一带之敌，旋于该地附近被优势之敌包围陷于苦战之中，师团长乃率领主力攻击该敌，配合关东军派遣兵团从北方对内长城线敌军的攻击，于9月末击败该敌，以后即转向‘太原攻略战’。在此期间，师团长以一部兵力于9月中旬末，由蔚县出发，经涞源（蔚县正南偏东约50公里）于10月上旬进入保定平原地带。

“第一、第二军于9月24日分别攻陷保定及沧县。第一军于10月初由保定出发，向正定追击敌人。第二军继续前进，其主力于10月5日到达小范镇（正定东约110公里），沿津浦线南下的第十师团于10月初占领德县。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了消灭盘踞于河北平原地带敌之有生力量，命第一军适时开始攻击，在突破石家庄敌阵之后，向顺德（石家庄南方约115公里）急追敌人，另以一部兵力进击井陉（石家庄西方约50公里）以西之要地，切断敌通向山西方面的交通，同时与第五师团互相策应，命第二军由滏阳河左岸攻击敌主力之背后。（笔者注：方面军于10月5日下达命令。）

“第一军于10月上旬末攻陷石家庄，当即追击京汉沿线之敌，10月中旬占领顺德，随即进抵漳河一线。

“第二军主力于10月中旬到达宁晋（石家庄东南约63公里），以后与第一军同时并进，经京汉路东方地区向广平追击敌人，10月中旬在津浦沿线占领平原（德县正南偏东约30公里）。

“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8月下旬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向西攻击平绥沿线之敌。9月中旬占领大同后攻占附近要地。但得知第五师团在内长城线附近陷于苦战，乃于9月下旬以主力攻破内

长城线附近之敌，经滹沱河河谷向西追击敌人，进入代县（大同正南偏西约100公里）南方地区。（9月30日——笔者注。）

“10月5日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为基干，奉命编组第二十六师团（10月下旬编成）。关东军司令官命该师团长（后官淳中将，10月9日到任）指挥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取绥远（今呼和浩特——译者）、包头。该师团长以派遣兵团之一部，于10月中旬攻陷绥远、包头。

“太原攻略战”

“中央统帅部于10月初决定攻取太原，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由山西省北部进攻太原。命关东军司令官以一部兵力归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以加强对太原的攻略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据上述命令，将最近由关东军转调到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划归第五师团长指挥，同时命第五师团长负责攻取太原。”

“第五师团从10月中旬攻击忻口镇（代县南方约70公里）附近敌人的坚固阵地，战斗未能顺利进展。方面军司令官于17日命第一军司令官以有力部队，突破正太路方面敌人阵地，进入榆次（太原东南约26公里）附近，以支援第五师团攻占太原。第一军司令官奉命派第二十师团的一部兵力开往正太路方面，但因井陉之敌顽强抵抗，战斗仍无进展。21日，方面军司令官命第一军司令官以第二十师团全部及第一〇九师团之一部，继于27日又命一〇九师团之主力（由第二军转属第一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

“第二十师团于24日突破河北、山西省境，沿正太路向西追击敌人。第五师团（根据方面军命令于11月上旬归第一军司令官指挥）于11月突破忻口镇附近阵地，于同月上旬占领太原及其附近。”

“攻陷太原后，第五师团于11月中旬转进保定附近归方面军直

辖。参加攻占绥远省及山西省的关东军，其大部分也都回原驻地。此后，察绥两省（包括晋北在内）由第二十六师团负责驻守。

“中央统帅部鉴于上海战线的胶着状态，10月中旬乃将第六、第十六师团及国崎支队（国崎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九旅团、山炮兵一个大队为基干）由华北转用于上海战线。

“于是第一军以两个师团（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确保山西省北部，以其它两个师团（第十四、第一〇八师团）确保京汉路沿线。第二军以一个师团及一个支队（步兵第一〇八旅团内缺一个联队为基干）确保津浦路沿线。

“扫荡宋哲元军及山东军

“10月下旬在京汉路方面的宋哲元军，企图扰乱我军后方，津浦路方面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敌视我军（过去韩复榘对中央与日本之间采取观望态度），令其部下山东军活动于黄河左岸。因此，方面军司令官于10月下旬，命第二军司令官摧毁德县附近以南山东军的活动，准备攻取济南。

“第二军司令官从10月上旬至中旬扫荡了山东军。第一军以警备京汉路的两个师团于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对宋哲元军进行了彻底的打击。

“济南攻略战

“攻陷南京后，大本营决定戡定胶济路沿线及济南黄河上流左岸地区，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逐步推进此一作战（但对青岛及山西南部的攻取，须待大本营指示）。

“于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决定速取济南，当即命令第二军攻占该地。

“该军从12月下旬开始在敌前渡过黄河，随即占领济南，并追击敌人。从年末至年初进入泰安（济南南方约50公里）一线。”

注：在此期间，上海方面已如前述，11月7日华中方面军编成，又于

12月1日下达该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同时命其攻取南京。方面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又以一部占领扬州、滁县，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路。24日占领杭州。

第八路军的出动

8月25日发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就任通电（22日接受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举行誓师大会后，即开赴前线。9月，八路军从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乘同蒲路军用列车北上，在原平镇下车集结。当时，日军正在攻击雁门关、平型关方面。因此，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向晋东方面，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向晋西北方面分别进发，迎战日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于原平镇北方待命。9月23日，八路军按照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命其与山西军各部队协同作战。

第一一五师于大营镇（平型关西方约20公里）待命，随后进入正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的后方，9月29日在通往灵邱——平型关的山路上，伏击日军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此次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平型关战斗情况以后详述。）

以后晋东北方面在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进行游击战，并建立了根据地。其一部杨成武支队从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方面进至京汉路以西的曲阳、行唐方面，组织群众

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占领了数十个县城。

第一二〇师进入雁门（代县北方约30公里）以西的晋西北以后，活动于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同时以一个支队进逼大同附近，进行雁北（晋北）游击战。

随后，在日军的忻口镇（太原北方约60公里）附近，战斗一开始，八路军主力就协助山西军进行防御，于同蒲路北部地区展开了游击战。此时，一二九师的一部，夜袭阳明堡（忻口镇北方约60公里）的日本飞机场。彼时日军有力部队（第十二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之部队）正攻击正太路方面，其一部已开始攻击娘子关。因此总司令朱德令第一二〇师及第一一五师的主力向该方面急进。

第一二九师主力从同蒲线地区北部经太原到达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26日袭击日军辎重部队，使之遭受损失，缴获很多军用物资，同时使守备娘子关的中国军便于进行撤退。

以后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以沿正太路进攻的日军后方部队为目标，在各处进行了伏击。共军在太原失陷后，即不与国民政府军直接协同作战，而采取自主立场实行所谓“敌后游击战”，扰乱日军的后方，并且在日军占领地区的间隙部分，努力建设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及武装群众。11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确定了新的兵力部署，其情况如下：

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一直驻在五台山附近建设解放区，第一一五师主力转移到晋南汾河流域；第一二〇师依然在太原及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向晋东南移动，各师分别在敌后进行游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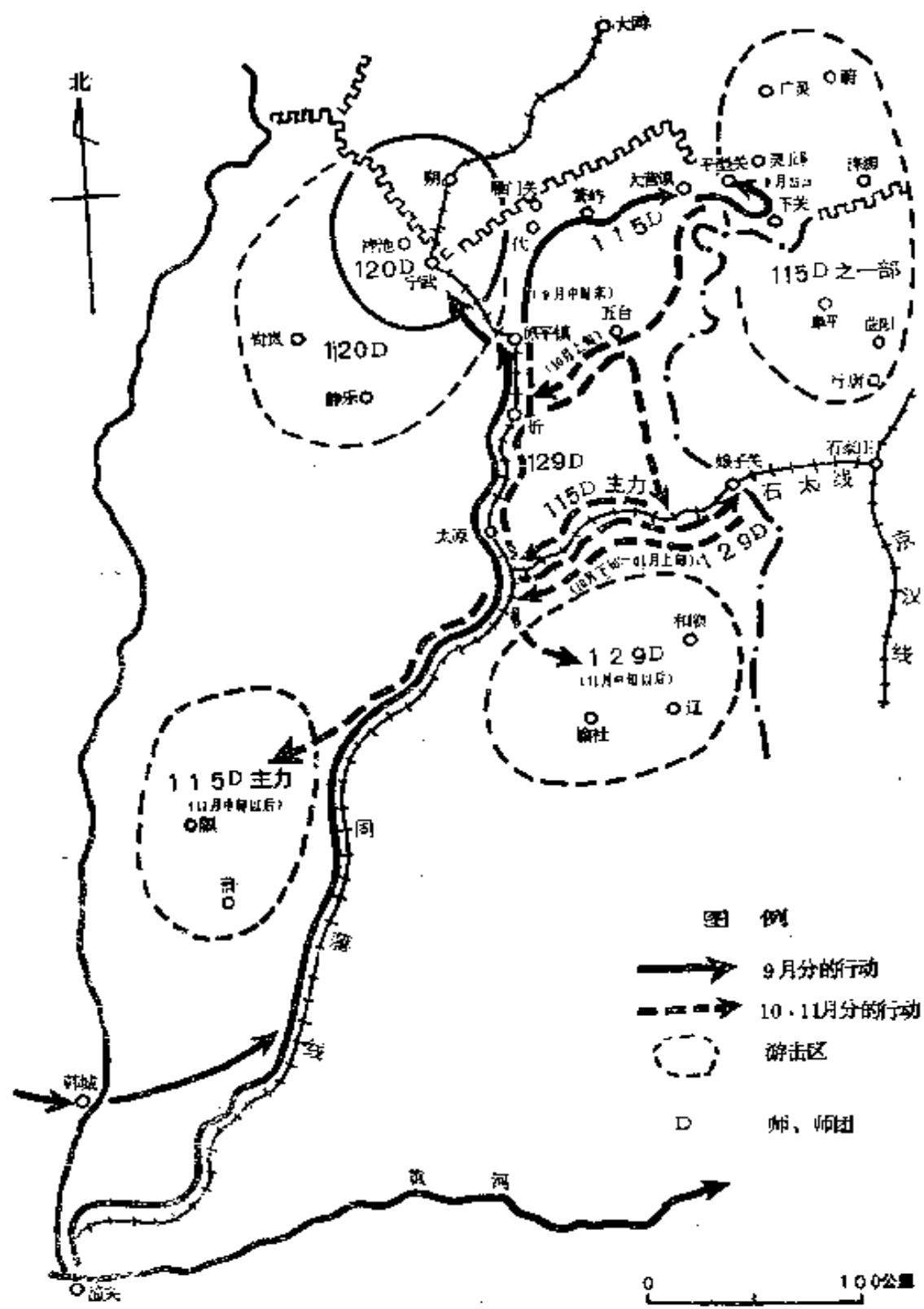


图 1· 第八路军行动概要图
(1937年9月—11月)

平型关战斗

阎锡山指挥十几个师占据了沿内长城线的阵地。9月下旬第五师团的一部开始向平型关进攻。阎锡山即将西方地区的兵力转用于平型关方面，因此该方面中国军颇占优势。

9月25日，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队受到极大损失。

第五师团增强兵力继续攻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予以策应，在茹越口正面突破长城线阵地，进入中国军之背后。因此，9月末其长城线阵地即已崩溃。

中共方面尽量进行夸大宣传，宣称这次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动以后的首战大捷，由于八路军的奋战，为中国抗战开始以来赢得了最初胜利。中共伏击成功确是事实，但从内长城线的攻防战看来，此乃一时的局部战争。以下介绍日中两国的资料。

关于第五师团的行动，在“中国事变陆战概史”中有如下的记载：

第五师团平型关附近的战斗

（以上笔者略）第五师团长在蔚县正准备转进保定，但20日得到情报称：山西军以主力于内长城线一带，以另一部于大营镇、代县间地区集结，似在构筑阵地。于是，师团长决定攻击该敌，突破长城线，彻底打击山西军并速占大营镇附近，以利于向保定方面转移。21日命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率领在灵邱的部队，沿灵邱—大营镇的道路，向大营镇追击，命步兵第二十一联队

从浑源经小道沟、西河村向涧峪村（大营镇西北约8公里）附近追击。

步兵第二十一旅团长于22日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向大营镇前进，在平型关与敌人遭遇，立即予以攻击，但战况并不如意。经过激战后，于25日占领了该地附近的长城线正面约2公里的地方，然而当日即有优势之敌截断我后方联络线，并逐渐增加兵力，因此，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于21日从浑源出发。

笔者注：以后联队转入棚子沟，翌日正在攻击该方面之敌，收到旅团陷于苦战的情报，于26日转进平型关，28日参加旅团战斗。第五师团长在25日得知平型关附近的状况，命正集结于蔚县的部队（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前往救援。该部队于26日后到达战场参加平型关附近的战斗，然而战斗进展不能如意。

笔者注：关东军司令官决定以蒙疆兵团主力（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从下社村、茹越口方面，以一部（步兵第一联队主力及大泉支队为基干的十川支队）从平型关北侧地区，攻击当面之敌，支援第五师团。27日开始攻击，29日突破敌阵转为追击。第五师团方面，29日一齐开始攻击，但战斗难以进展。至30日拂晓，乘敌退却，各部队始进入大营镇平原。

中共方面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第二章以“平型关大战”为题，其中记载大致如下：

9月中旬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将军）主力，于平型关西方大营镇集结待命。此时日军已逼近灵邱，国民党军方面再三要求我军向灵邱正面增援。林彪将军亲自侦察灵邱方面地形，根据当时国民党部队溃退及日军猛烈锐进的情况，决定取消增援灵邱的办法，而由友军（国民党军）利用平型关的险要阻止敌人的进攻，

我军则出其不意从侧后猛烈袭击敌军。此作战方针一经确定，部队即昼夜兼程向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及上寨移动。国民党的败兵只顾到处抢掠。

23日午前林师长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说明了情况和计划。此时，收到友军电报，内称：“敌之先头部队，正在进入平型关附近，现正炮战中。”林师长立即决定：以骑兵部队全部及步兵部队一部向灵邱方面出动，负责牵制敌人增援部队，以师的主力策应平型关附近的决战。

23日夜，师部率领主力向距平型关约30华里的冉庄急进。在途中已可听到隆隆炮声。附近一带居民已全部逃走。一部部队找到居民，并告诉说：“我们是八路军，不要害怕。”好不容易才使他们勉强回家，但时过不久就又逃走了。由于那时群众是没有组织与领导的，他们害怕日本及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也不甚了解，因此一见军队就逃走。

24日营长以上干部亲自到前线侦察。部队严加戒备，以营为单位进行战斗动员。党支部也举行了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黄昏后，师部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送来的“25日出击平型关计划”，估计敌人“于25日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判断，国民党军除担任正面防御以外，计划以八个团由平型关西北攻击敌之侧背，要求一一五师从平型关东南出击。

林彪师长与聂荣臻副师长于灯下详细研究地图以后，下达命令：“当夜24时出发向白岩台前进。”黑夜，部队在大雨中沿崎岖的山沟前进。拂晓前部队到达白岩台（距汽车路约1公里）的埋伏阵地。我军主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灵邱与平型关中间）之间（约6公里）的汽车路以南的山地一线。同时以一部兵力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之退路。

25日黎明，攻击平型关的敌军情况已可望见。此时，敌人从灵邱方面开来一个旅团（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兵力约4,000人，前面约有100余辆汽车，接着有200余辆辎重大车，后面有少数骑兵，完全连成一线，进入了我伏击圈内。

5时30分战斗开始。师部攻击令一下，我前线部队立即以居高临下之势袭击敌人。敌人万未料到距离他们如此近的地方会有伏兵，当即展开肉搏战。敌人最后尾的汽车被炸毁，不能逃走的汽车互相冲撞，情况极为混乱。有些敌人在汽车底下进行顽抗，有些敌人向西北山上爬，企图夺取阵地。此时我军全线展开突击，十数里长的山沟里，充满手榴弹爆炸声和刺杀声。敌人虽进行顽强抵抗，要夺取四周的高地，但是重要高地均在我军手中，我军控制了整个山沟，返复向敌人发起冲锋。

经过整日激烈战斗，终将平型关以东10里以内之敌全部歼灭。山沟的道路上被敌人死伤的人马和破坏的汽车以及遗弃的兵器所堵塞。

此部敌军乃素以精锐闻名的板垣师团，战斗极为顽强。当时虽想活捉敌人，但无一降者，至死也不放下武器。伤兵扭在一起相咬相打。敌一伤兵被我营长背负救出，他竟在途中将营长的耳朵咬掉。

我军歼灭山沟之敌以后，当即集结兵力，对进攻平型关阵地之敌军背后进行攻击。此处为友军（山西军）的攻击目标，但始终未见山西军的踪影。因未得友军适当配合，以致未能歼灭该敌。

26日敌人得到浑源方面的增援，重整阵容，在东河南镇方面也发现了敌人增援部队。同时大量敌机袭击我阵地。我军决定以一部向敌增援方向进行游击，牵制敌人；以一部打扫战场，主力向山西移动。战利品极多，搬运两天仍未搬完。此次战斗，歼

敌3,000余人，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掷弹筒20余个、战马53匹，以及其他军用物品无数。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将兵各发一件还有余。

（以上译文与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文对照，日文著者有所删节。——译者）

以上为中共方面所传在平型关附近的共军战斗情况。另在国民政府军方面对此次战斗有如下记载：

敌人企图夺取察哈尔省以后分兵进攻晋北，并占领晋北战略要地。9月下旬以来以主力从浑源、灵邱猛攻我平型关，以一部由茹越口突入。

我军为确保晋北要地，集中晋军十余师，占领平型关、神池一线的防御阵地而努力抗战，但因繁峙陷落，后方路线被截断，终于9月30日夜，分散转移五台山、代县一线。

二 1937年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华北政权建立工作

从平津地区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驱逐出去以后，派遣军内部主张在占领地区实行军管或建立新政权的意见抬头，但陆军中央部依然贯彻当初的方针：依靠民众自治，进行善后工作，我军只是予以保护。

7月30日在北平，8月1日在天津，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当时在平津地方，便衣队、残兵游勇到处横行，各种抗日团体也暗地活动，经日军不断讨伐，治安渐趋恢复。8月

20日解散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从此以“建设华北人的华北”、“打倒国民党专制”为目标的运动应运而起。

陆军中央部也在8月12日制订“华北政务指导大纲”，将当初方针稍加具体化。

然而，正当陆军中央部考虑以较稳健方法进行局部地区解决之时，当地军方，尤其是关东军，提出了积极处理时局的设想。关东军司令部8月14日决定的“对时局处理大纲”中对华北政权的设想如下：

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察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此方针依然是将华北新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的设想，是关东军对建立新政权的强力建议。在上述设想中，由大特务机关长通过顾问对当地政权进行幕后指导的方式，成为以后日军在占领地内体现其政权指导的一个重要样板。

在华北占领区内，由北平、天津、通州的特务机关担任军方的政务执行机关，归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统辖。但至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成立后，则在参谋部以外另行设置了特务部。

9月4日，喜多诚一少将被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任命为特务部长，接受了下列训令。

训令喜多少将

一、贵官为军特务部长，指挥所属部员对军方作战的后方地区（包括冀东）执行各有关政务事项，统辖指导中国方面的机关，为使该地区成为实现日满华合作共荣的基础而进行各项工作。

前项工作暂应依据1937年8月12日陆军省起草的华北政务指导大纲。

二、关于将来在华北建立政权问题，应体察华北人心的趋向，逐步进行准备。

三、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斗志，以迅速结束战局为目的，对敌军后方采取相应的谋略。

四、当施行以上任务时，应与军方参谋部、各军、独立兵团及方面军兵站部紧密联系。

五、有关细节由参谋长指示。

9月6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根据上项训令指示如下。

指示喜多少将

一、政务指导首先应迅速确立治安，并安定民心，为使日军的后方安全，着重建立并扩充各项制度和设施，逐渐开展一般工作。

二、政务指导应经常考虑当地与第三国的关系，进行适当调整，避免发生纠纷。

三、关于交通、经济等的建设，应注意与作战用兵方面的关系及国防资源的获得，努力促使日满资本的流入。

四、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准备，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

五、关于谋略问题，应抑制华北现有军阀参与会战，努力制造并扩大反蒋气氛，同时根据需要对南京施以政治及经济的谋略。应与军参谋部所进行的作战谋略紧密配合互相协力，

六、特务部与军方有关方面配合如下：

(一) 向中央部请示、建议或作其它重要业务报告时，须经军参谋长同意。

(二) 直接供作战用的中国方面交通、通信机关，统由军方直接使用，并指导中国方面机关使其协力为原则。

(三) 作战地区后方的警备，虽然依靠军方部署的兵力，但应指导中国机关使之尽量减轻军队的负担。

(四) 关于宣传及宣抚，与军宣传部密切联系，务求其圆满为要。

在此指示中，并未明确将来政权的性质。当时在察哈尔方面，如以后所述，关东军指导的蒙疆政权的建立工作有了显著进展。但是华北为中国内地，且与议和有关，问题重要而复杂，其行之不易是不难想象的。

当时特务部在此问题的配合上，研究和准备工作均未做好。该部的组织为：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其下设有总务课——政策（课长：根本博大佐）；第一课——交通、通信、邮政、建设（课长：佐伯文郎大佐）；第二课——经济（课长：井户垣骏主计中佐）；1938年1月设第三课——产业（课长：石本五男中佐）。

注：据佐伯大佐的记录，该大佐于9月15日到天津任职时，部下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办公室也未准备。总务课也只有数人。第二课的工作还算活跃。当时特务部编制细则尚不明确，后来才有明文规

定，1938年4月以军令决定的特务部编制如下。

军令陆甲第22号（1938年4月14日）

改正中国驻屯军编制修改部分

-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有关政务事项受陆军大臣的监督。
- 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秉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图，统辖军特务部的业务，负责军事与政务之协调。
- 三、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隶属于方面军司令官，掌管有关政务事项。

方面军特务部长向方面军司令官申请事项，须向参谋长陈明情况取得同意。

- 四、各地的特务机关如下：（机关长是以1938年3月2日为期，括号内是前任）

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森冈皋少将（仪俄诚也少将）

青岛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河野悦次郎大佐（代理中本四郎中佐）

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为渡边渡中佐（中野英光大佐）

太原特务机关，机关长为谷荻那华雄中佐

河南省特务机关，机关长为落河鼎五大佐

10月1日中央在总理、陆、海、外相会议上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大纲”。大纲以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为宗旨。其中作为“华北对策”，则以三、五项的规定为准则，其内容如下：

三、华北对策：

华北问题的解决，以日满华共存共荣为目标，在中国中央政府之下应以真正使华北明朗为宗旨。

注：行政虽由中央政府施行，但上述地区的行政首脑应为实现日华融洽可靠的有力者。另外，与中央政府之间，应在华北订立以日华平等立场会办及其它合作方式的经济协定。此外，并在华北设立非武装地带。

五、对华北作战后方区域的措施：摆脱“占领敌国领土”的观念，大致规定如下：

（一）不行使占领地区的行政，但治安须由军方指导确立之。

（二）行政机关由当地居民自行组织，但应对其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明朗的施政。

（三）在军事上必需的交通设施及资源开发，应在必要的统治下进行。

以上的（二）及（三）两项必须在和平局面出现后，在不影响调整邦交情况下进行。

上述大纲中必须注意：在作战区域后方的行政机关，应由当地居民自行组织，并须置于中央政府统治之下。9月23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北平治安维持会于10月12日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会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同时发出了“劝告国民政府和平停战”的通电，以打破南京迷梦，促其反省。

从10月至11月随战局的急速开展，在当地军方及陆军中央的部分人士中，主张建立华北新政权，这一政权的性质并非地方政权，而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

12月28日，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在“华北政权建设研究”中说，其所提倡的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

普遍行施。理由是，如果以地方政权为牌匾，不足以号召第一流人物前来参加，且带有分割中国的地方政权形式的嫌疑，实非善策。再者，建立地方政权乃是消极退让，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当时陆军中央部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随着和平谈判问题的进展，引起了种种议论。关东军支持华北方面军的意见，于11月末提出了尽量树立政权的强力建议。于是新政权即在此种情势之下诞生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2月7日，以由香港来北京的王克敏为中心，协商决定了新政府的组织纲领。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京居仁堂举行成立仪式。新政府是三权分立体制，主席暂时空位。成立了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定都于北京。北京、天津设特别市，北京特别市市长为江朝宗，天津特别市长兼河北省省长为高凌霨。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在15日解散。新政府的主体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部（部长：王克敏），治安部（部长：齐燮元）、文教部（部长：汤尔和）、司法部（部长：朱深）、赈济部（部长：王揖唐——救济灾区）等五部（部长后改总长）。临时政府要人均为军阀时代的政客。

新政府于14日发表如下的施政方针：

一、内政方针：

清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积弊，真正体现中国民众的共同心

意，施行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政治。

二、经济方针：

确立以农为本的农村政策，同时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努力改善民众生活。

三、东亚政策：

以体现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

四、对外政策：

前政府所负的对外义务，凡属已向国民发表的债务及其它义务，代其承担一切责任，不侵犯他国权益。

五、防共方针：

绝对排除容共政策，进一步与防共各国相协力，确保东亚的固有和平。

以后，各地治安维持会，逐次划归临时政府治下。冀东防共政府也于1938年2月1日与之合并，冀东22县编入河北省。河北省分为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省公署暂设天津。

在山东省，济南于1938年1月1日、青岛于1月17日分别组织治安维持会，纳入了临时政府的治下。4月4日建立起行政组织（全省分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四道），任命马良为省长。

在河南，1937年11月27日于彰德成立了河南自治政府，吴佩孚的部下肖瑞臣任主席。山西省在12月10日成立了山西省临时政府，提出与日满两国亲善合作、反共灭党的口号。其后随着治安的恢复，也纳入了临时政府。1938年4月20日

河南省（省长：肖瑞臣）、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分别成立。

然而，这样成立的临时政府，其自主能力及实际情况都存在种种问题。

在此以前，日本政府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进行和平谈判，拟从军事及外交两方面努力谋求事变的解决。

由12月初以来，根据“事变处理大纲”，研究了针对和平解决与不能和平解决两种情况的准备工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施策。结果，“不能和平解决情况下”的处理要点，已成了今后的基本政策。

政府于12月24日经内阁会议决定了“事变处理大纲”，在此大纲中的“华北处理方针”如下。

华北处理方针

在华北以增进中国民众的安宁福利为政策方针。在政治上以成立防共亲日政权、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促进该政权逐渐扩大和加强，指导新中国逐步形成新的中心势力。

然而，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时，上述新政权应根据和平条件进行调整。

甲、政治指导方针

（一）华北新政权不仅对华北而且对华中、华南方面也必须取得威信。为此，（1）该政权的首脑应网罗在全国具有威望的人才；（2）该政权应有适应新时代的机构；（3）应有能号召全国的主张和纲领；（4）我方对该政权的指导，应停止大纲中有关日人顾问的幕后指导，而改为配备日系官吏，但以不干涉行政细

节为方针。

(二) 华北新政权所包括的区域，虽依军事行动进展而定，但大致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撤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对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相机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此外，应与蒙疆自治政权保持密切联系。

(三) 目前为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暂不插手租界，但在租界以外，即使在新政权建立以前，也应使其邮电、税务等的行政组织正常运营。

对海关则另行考虑。

乙、经济建设方针

(一) 华北经济建设的目标，在于加强与日满经济的综合关系，以确立日满华协作共荣的基础。为此，要使当地中国资本与我方资本和技术紧密结合，使经济各部门发展完备，以维持秩序，安定生活，从而扩充日满两国广义的国防生产力。

然而发展经济建设，应尊重日满及华北的国际间收支的对等及物资供求的调节，并根据轻重缓急采取措施。同时，应把重点放在努力做到既不使中国有经济压迫之感，又不违反我国国民的期待，而妥善掌握国策进行运营。

(二) 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管理，应成立“国策会社”，以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宗旨。

由会社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信事业、主要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

关于该会社经营，则要适应日满两国主要产业计划，并经常考虑我国实情，根据轻重缓急进行经营。

以上各项重要产业以外的其它事业，除有特殊原因者外，不施行特别管理。

(三) 在发展华北经济时，尽量利用中国资本，并谋求与中国企业方面的协议。

(四) 允许第三国投资合作发展华北经济。在可能范围内，尊重在华北的各国的既有经济权益。

(五) 在谋求日满华贸易关系紧密化的同时，适当地调整华北对第三国的贸易。

(六) 促使当地政权对于改善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合作社等，逐步进行必要的建设。

(七) 在华原有企业中的主要产业，根据本方针进行整顿和调整。

(八) 目前凡能立即着手的事业，在将来按本方针进行整顿、调整的前提下，迅速采取措施开始经营。

(九) 有关华北经济发展的谈判对象，当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维持会、或其联合会及地方政权。

与南京政府尚未达成和平解决之前，拟将华北新政府扶植成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由10月前后以来，急趋表面化的我方对经济的期待，此时更为殷切。于是为管理华北的经济开发，决定成立“国策会社”。

蒙疆三自治政府的成立

关东军于8月9日接到在察哈尔进行作战的命令，13日迅速决定“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大纲”，而向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建立政权的设想。在大纲中主张建立“统辖察北、察南的统一政权”，但是陆军中央部予以反对，并训令关东军对其内蒙工作应以长城以北的察、锡两盟为限。其后虽有若干交涉，但至27日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积极展

开工作，9月4日迅速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政府以杜运宇、于品卿为最高委员，受新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吉冈安直大佐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指导，管辖察南10县，开始了政务工作。

继于9月13日占领大同，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管辖长城以北山西13县，最高委员为夏恭，最高顾问为前岛升。

关东军事先于10月1日决定了“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大纲”，该大纲决定了改组内蒙政府为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的组织要领。并从察南、晋北、蒙古三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指示该委员会协商、管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政务工作。这样，由以前察哈尔政权的设想，一跃变成建立包括绥远、晋北的蒙疆政权的蓝图。

10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将该指导大纲呈送中央，并训令蒙疆各特务机关长遵照执行。该训令如下：

训令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一、 贵官对蒙疆方面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统辖有关机关担任领导工作。

二、 关于蒙疆方面的领导，应统辖有关特务机关长处理工作。
(以下笔者略)

对松井大佐的指示(指示者为东条关东军参谋长——笔者注)

一、 晋北自治政府，在当地居民自发趋势形成时，即应迅速成立政府。

二、 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对汉民族要密切注意，防止发生摩擦。

三、三政权联合委员会应与各有关特务机关长紧密联系，以期使之尽快设立。

四、平绥线虽属联合委员会管理，但目前应由满铁华北支局在张家口设立铁道局管理其业务。

五、币制及金融机构的统一，应首先扩大改组察南银行，将来俟时机成熟普遍改变名称，并应进行有关事项的研究。

六、在确定鸦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筹划蒙疆方面的财源，并应注意防止财源及粮食流入我管辖区以外的中国地方。

七、其它矿山资源的开发，目前龙烟铁矿应以兴中公司为中心。下花园、大同煤矿应速作调查，促进开发准备工作。（以下笔者略）

八、关于各地治安的维持，应指导有关机关紧密与当地军队，特别是帝国军队取得联系，充分作好作战与警备，不得稍有疏忽。

九、附件指导大纲第一至第三，除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外，不准阅读，对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可作指示。（以下笔者略）

训令大同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

张北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少佐）

贵官对于蒙疆方面的政治工作，应遵照附件指导大纲，担任各基地政权的幕后指导。

关于蒙疆方面的一切指导，应受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的统辖和管理。

大同攻陷以后，关东军蒙疆兵团的作战更进一步发展，9月下旬与第五师团协力攻占内长城线，10月14日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根据地绥远（今呼和浩特——译者），17日占领包头，内蒙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10月27、28两日，于绥远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议撤

消蒙古军政府，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推选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将“绥远”改称“厚和”，定为首都。其国土包括察、锡、乌、巴、伊五盟（2市1县39旗）及厚和、包头两特别市。12月1日公布政府暂行组织法，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军事最高顾问为高场损藏大佐，政务最高顾问为宇山兵士。

这样，张家口、大同、绥远（厚和）相继成立了自治政府。

11月22日三政权的代表集于张家口，按预定计划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移交了各政权职能的一部分，即与各政权互相关联而且影响极大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它有关重大事项。该委员会设置日本人最高顾问一名，日本人参议及顾问若干名，委员会由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等专门委员会组成，并规定“联合委员会的决议，必须通过有关委员、最高顾问及有关顾问的协议”。金井章次就任最高顾问，依据“缔结协定时谅解事项”的规定，由金井最高顾问代行总务委员长的职务。总务委员长为“总理联合委员会和代表联合委员会”最重要的职务。

注：各自治政府也设有日本人最高顾问，规定一切重要政务时必须经过最高顾问的同意。

同一天，在联合委员会成立时，三自治政府代表向关东军司令官呈送了下列内容的函件：

一、蒙疆地方的本委员会应处理的一切命令及执行的政务，

须适应贵军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

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的主要成员，请由贵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充任。

三、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各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对此请给以方便。

关东军司令官接到上述要求，于11月25日当即函复，其内容为：“拟在我方可能范围内，尽力给以协助”。这是关东军司令官与蒙疆联合委员会之间秘密交换的文件，这就是前述11月1日的“指导大纲附件第二”中所规定的内容。依此，在正式条约成立之前，规定了日蒙之间的基本关系，确立了关东军及驻蒙兵团的领导权。

关于蒙疆（察、绥、晋北）的区域及政务领导，陆军中央部与关东军之间，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但关东军根据既成事实，推行了自己的方案。关东军认为根据经济和人口分布的状态，若将察南、晋北分离出去，仅在内蒙实现独立自主是有困难的。事实上，蒙疆的经济是以京包沿线为中心，晋北的大同煤矿、察南的龙烟铁矿的丰富资源最有吸引力。察南、晋北的人口占全蒙疆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汉人。

注：蒙疆的各种统计极不正确，根据1932年2月驻蒙军的调查，黄河以北蒙疆的总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13万人，其中蒙人23万，汉人385万，其比率是1比13.6，察南、晋北的汉人占全体的56%，其余汉人的居住地区大概在外长城线以南。

对关东军的强硬要求，陆军中央部曾持拒绝态度，思想上虽然逐渐趋于缓和，但也并未全面认可。9月4日在“察蒙处理大纲”中有关察南、晋北的归属问题，规定“目前承认关东军在政务上的指导，但将来由华北方面军担任之”。在12月24日的“中国事变处理大纲”中规定“察南、晋北两自治政府相机使之与华北新政权合并”。后在1938年初，编组了担任蒙疆地方防卫的驻蒙兵团（直属大本营）由中央直接领导。对此，关东军从未改变其设想，而努力使驻蒙兵团继承关东军的方针。

1937年末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

中国军的状况：中国军在事变当初（8月15日），分全国为四个战区（冀察方面第一战区、察晋方面第二战区、上海方面第三战区、华南方面第四战区），在战区内部署若干集团军与日军相对峙。10月上旬为了保卫津浦沿线及其以东地区，设立了第五战区（该方面的第三战区担任南京方面的防务）。12月上旬又新设两个战区而成为七个战区，华北有四个战区、华中有二个战区、华南有一个战区。南京陷落后，其战区的划分如下表：

方面	战 区	司 令 长 官	配 备 地 区	各战区兵力概况
华 北	第一战区	程 潜	京汉沿线	约25个师
	第二战区	阎 锡 山	山西省方面	约35个师
	第五战区	李 宗 仁	津浦沿线	约20个师
	第六战区	蒋 介 石 副司令长官朱绍良	陕西、甘肃省方面	约4师半

华	第三战区	顾 祝 同	江南地区	约45个师
中	第七战区	刘 湘	浙赣沿线	
华南	第四战区	余 汉 谋①	华南方面	约13个师

① 司令长官何应钦，后为张发奎，余为副司令长官。——译者

中国军虽因华北战败受到打击，但政府机关移往内地。因此，更加强了战时体制，同时重新编组军队，整备武器。

日本军的状况：在蒙疆方面，新编成第二十六师团，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统率下，自10月中旬以后指挥内蒙军及满洲国的热河支队警备该地，努力恢复治安。1月8日设立了驻蒙兵团司令部，此后即归中央直辖，负责该地区的治安。

在华北方面：第一军以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本川旅团配属于第二军，但在1月18日调归师团主力）占领山西省的中北部，以第十、第一〇八师团等占领河南省的一部及河北省西半部的各要地。第二军到1月中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分，以第十师团确保济宁—邹县—蒙阴一线，以第五师团确保胶济沿线，以方面军直辖部队（由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及若干后备步兵大队等所组成）警备河北省东部及北部。在年末华北方面军的总兵力为六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及航空兵团（十五个飞行中队）。

在华中方面：占有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以第十军确保青浦—吴江—江宁镇一线以南，以上海派遣军占领该线以北及长江北岸的扬州和滁县。到年末基干兵力为第十军的第六、第一一四、第一〇一师团及两个后备兵团（国崎支队

于12月31日调回华北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的基干兵力为第三、第九、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天谷支队。华中派遣军总兵力为七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两个后备步兵团及一个飞行团（十个飞行中队）。

为了进行华南作战，以第十一师团及重藤支队为基干的第五军，于12月下旬在台湾集结，但因停止华南作战，该兵团就在原地过了年。

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中国军由于在各方面败退，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述各点：

- (一) 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 (二) 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 (三) 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

为恢复日军占领后的治安，在各地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如前所述，在蒙疆、华北相继成立了新政府，从国民政府分离出来，开始独立执行政务。

由于对华中的占领较迟，新政府在第二年3月28日才成立，但年初已在各个要地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为建立政权做

了准备。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

方面军在12月22日揭示了“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致力于治安的恢复。

当时，方面军考虑扰乱治安的根源，在于土匪的活动及经济不稳定，以致民心发生动摇。同时由当地中国人组织的行政机关，还只限于局部，尚不能寄与多大的期望。因此，实施要领规定由日军担任警备讨伐的同时，指导整顿当地各警备机关，并由特务机关、宣抚班等负责扶植地方行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如“第二要领的第三项”中指出的“共产系统匪团”一节，表明了对共军的注意。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

1937年12月22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第一 方针

一、维持治安的宗旨，是我军存在的需要，促进军占领地区的全面安定，并以帮助奠定新政权的基础为目的。

二、首先完成军队驻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的治安，逐渐向外扩展而及于全区。

三、目前在地区内各要冲分驻日本军队，凭其威力尽快恢复民众原有的自卫能力，指导中国机关自行维持治安。

第二 要领

一、有关维持治安担任区域的划分，如附件所示（附件未到

手——笔者）。

二、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等，给以生活出路。

归顺部队根据性质另作考虑。

三、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对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政策，尽量从归顺者手中收缴武器，使其另谋生路。

四、迅速复活县及乡镇的行政组织，使之统辖于新政权之下，策划恢复发挥各地的自卫能力，促使民心之安定。

五、自卫机关由警察队（公安局）及保卫团（联庄会、民团、保甲）组成。前者常驻在县城及县内要地，担任警备与公安工作；后者在各乡镇以壮丁编组，与警察队协力担任清乡、剿匪工作。

六、警察队及保安团，由身分有保证的当地良民充当，原则上不收用归顺者、土匪及投降兵等。但在警察队编成以前，可暂以冀东保安队代替警察队使用。

七、铁道、通信线路及飞机场的保护，应组织利用爱护村。

八、为了警备通信，除军用通信以外，恢复县有电话线，并尽可能增设电话线。

九、为了便于警备兵力的移动，设法修整道路和增设飞机场。

十、在军事上许可的限度内，增开交通列车，同时确保主要道路及水路的安全，以促进物资交流，安定民众生活。

十一、加强统辖各种宣传机关，使之有重点地进行活动，号召民众主动协作，以期改善治安状况。

十二、军队指导县长、乡长、镇长等，收集有关肃正讨伐匪贼及守备兵站等方面的情报。使用警察队及保卫团修整警备用通信网及交通要路。其它一般行政事务，由特务机关长负责指导省

政府以下单位，协助军队的治安工作。

十三、在边远地区的警备队，尤其小部队，应保持军纪和风纪，特别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监督日人进入内地后的行动，并取缔其非法行为。

十四、治安工作通过扫荡匪匪，实施应急救济、促进物资交流、恢复与加强行政机关，以求迅速安定民心，严格取缔与本工作有害的军人军属及一般日人的不良行为，以防止民心叛离。

第三 实施上的注意事项

其一 自卫机关

一、警察队的编组，因各县的状况而异，初期担任治安的兵力大概在200名以下，主力在县城，其余在警备区域内各要冲，根据匪情随时出动讨伐。警察队的武器暂以步枪进行装备，尽量使用原有武器，其不足部分则发给一部分没收的武器。

二、自卫团（河北、山西为保卫团，山东为民团或联庄会，河南为保甲）在各乡镇以壮丁组成，分为常备团丁（有工资）和散住团丁（无工资）。前者驻守县城，经常进行训练，担任剿匪工作；后者在农闲时实行一些训练，平时搞家务，当匪徒袭来时，立即集合进行乡镇自卫或援助比邻乡镇。自卫团有长久的历史和传统，在未受战祸地区中可利用其现有团体，其因战祸而溃散的团体则可予以恢复（特别重视利用原来存在的自卫团——笔者）。各自卫团均使用其现有武器，其武器被军队或匪众没收者，暂时可使之徒手担任收集传递情报工作，一俟没收武器时，再发给武器以加强自卫能力。

三、警察队及自卫团所需军费，根据地方特性，委托中国方面筹措。

四、警察队及自卫团的训练，按照需要，由警备地区的负责兵团与有关特务机关协议后，适当进行。

五、铁路爱护村，由铁路两侧村民组成，在铁路（包括通信线路）保卫方面，主要进行收集情报等活动与铁路守备队协作。

爱护村所需军费，由该村负担，但应适时发给奖金等，施行奖励办法。

其二 共军的处理

一、对共军应彻底进行扫荡。为此，在共军地区，应一面进行讨伐，一面采取宣传及其它方法，尽量灌输防共思想。

对于与共军合流或被共军操纵的匪众，应迅速设法使之与共军脱离。

二、对于受南方抗日势力唆使的政治匪众，应努力予以击溃，尤其要消灭其组织及领导者。

三、对匪化的地方自卫团及当地居民，结合讨伐进行宣抚，使其重新就业。

四、对盘踞外国租界的共产党及抗日团体，主要依靠宪兵及中国警察机关，查明其动静，以适当手段使之逐渐减少，如有可能则一网打尽。

五、在劝告归顺投降时，要利用新政权的名义，以保持他们的体面，这对归顺工作有利。

其三 有关治安的行政领导

一、军占领地区有关治安肃正工作，军队（兵站）与军特务部（特务机关）之间的业务关系如下：

1. 县警察队及各乡镇自卫团的组织，根据特务机关长的指导，由中国机关施行。但在中国机关统辖力量达不到的战线地区，应与特务机关紧密联系，由军队指挥官进行指导。
2. 对警察队及各保卫团发给武器时，特务机关长应与兵团协议，由兵团发给。武器的保管和监督，按照保甲条例，打上烙印进

行登记。

3. 警察队及保卫团的训练指导员，尽量由中国人担任，需要由日本军人充任时，则由该地区警备部队派出。
4. 县警备队及乡镇自卫团，对于有关收集情报、讨伐暴匪、保护铁路、通信线路等警备业务，应受该地区担任警备的指挥官管理。
5. 铁路警察队（护路警察）的有关警备工作，受铁道守备队长指挥；有关警察工作受日本宪兵的指挥。
6. 警察队及保卫团所需军费，均由中国方面负担，军队不参与此事。
对人事如有意见，应由有关军队指挥官通报特务机关长，经其同意进行处理。
7. 警备通信网及道路网的整备工作，警备军队指挥官应与特务机关长妥善协议，指导省及县政府、乡镇公所等负责进行。
8. 有关配给石油、食品、燃料以及协助贩卖棉花和其它农产品等工作，特务机关长应使宣抚班担任之。在远离特务机关（宣抚班）的地方，当地军队应在中国方面与特务机关之间进行介绍工作。

二、特务机关长对中国地方行政进行幕后指导时，应考虑下列各条，指导省政府努力使之主动进行活动，指导县政府以下机关迅速恢复原状。

1. 在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时，尽量以治安维持会推荐的当地有声望者充当。如此既便于加强治安，并可减少与治安维持会的摩擦，同时还可防止中国官吏惯于榨取的积弊。
2. 在治安尚未稳定时期，县政府机构不必拘泥一定形式，可适应县内实际情况，建立简易的机构，随着治安的恢复，再使之完整。

3. 使县管下的各乡镇治安维持会组成乡镇公所，迅速进行联系，将其置于县的统辖之下。
4. 县长以下的薪俸及县行政费用，原则上以县的收入支付。建设警备道路及警备队的薪俸等与警备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经费，必要时由省政府予以补助。
5. 县长不得以私人班底组织县政府。
6. 在大部分受水灾的县，县的行政方面应以全力进行救济，在冬季发给食品及燃料，在来春配给耕种用的种子。县政府的机构、县长的任命，均须考虑适应上述任务。由于战祸严重荒废的地方，例如山西省境内，更应照此办理。
7. 铁路两侧500米以内，应注意不使种植高秆农作物。

其四 警备交通网的建设

一、为维持治安，整修警备电话及兵力移动所使用的道路，极为重要。

警备电话最有利的方法是恢复原有的县用电话。因为县用电话是连结县城和县内各警备区的电话，在收集情报、指挥警察队及保卫团工作上最为理想。

调动兵力所使用的道路，因即将进入结冰期，修建道路有困难，应延至来春解冻以后再修，此时可修整河川渡口的设备等。在冰冻期间，汽车于平原公路上皆可通行，必要时，部分在道路以外也能行驶，因此没有必要在此期间修建汽车公路。

其五 宣抚

一、宣抚班隶属于军特务部长，派遣至各军及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管区之内。

二、被派至各军及直辖兵团的宣抚班，其配置及担任地区，应根据军（兵团）警备要求及特务机关的行政指导，由两者协议后决定。但在作战期间，应将宣抚班隶属于军。

三、宣抚班的有关警备事项，应在警备军队指挥官管理下，一般行政事项应在特务机关长管理下进行工作。但到中国方面能发挥行政机能时，宣抚班对一切行政则不要加以干涉。

四、报纸、广播、传单、讲演等有关治安工作的宣传，在方面军管辖之下，由各兵团各部队指派负责人，进行贯彻始终的坚强有效的宣传。

其六 物资对策

一、内地的食品(食盐除外)不足，并非只是由于铁路运输力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都市周围农产品的供应被匪贼或战祸所杜绝。有鉴于此，必须在排除此种障碍的同时，扫荡天津各水路中途的匪贼，努力打开水路运输。

二、对食盐、火柴、石油、棉布等日用品，宣抚班及当地军队应与特务机关联系协助运输。

三、为控制食品、日用品价格的暴涨，应采取适当措施，按照需要规定公定价格。

四、棉花的收购是农村救济上第一件应办事项，为此，应力求棉花运输路线的安全。同时，监督收购人员不得乘农民的危困进行压价。驻在该地的军队、宣抚班、宪兵等应调查收购情况，与特务部联系后，命令不法收购人员离开收购地区。

其七 其它

一、军队及军人的举动应严肃正当，恩威并施是宣抚工作的第一要义。与此相反，部分军人军属由于不小心而对中国人民有不正当行为时，宣抚工作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有鉴于此，各部队长应对部下严加教育，并使监督机关进行监视，在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军中娱乐措施，以防发生过失。

二、军队对讨伐兵匪、守备兵站线及与此有关的军队本职工工作应力求精通，对中国方面的指导应由特务机关(宣抚班)担

任，以免增加军队的烦琐事务。

三、为防止不良日人进入内地，实行居住许可制，除经特务机关长或宪兵官员许可者外，一概禁止居住。在领事馆警察出入的地区内，对日人的取缔，在原则上属于警官的任务。

四、宪兵在本职工作以外，担任治安警察工作，根据需要，指导中国警察的业务，但不得干预行政。

三 事变的扩大化及1938年的治安状况

徐州会战及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命第二军从1937年12月下旬，继攻取济南之后，占领胶济沿线及其南方地区（山东作战）。又命第一军从2月中旬，进攻济南西南方黄河左岸的中国军。至3月上旬平定了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的黄河左岸地区（河北平定战）。

但在第一军地区，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第一军从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间，在占领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虽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对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军，未能进行讨伐。因此，为确立治安，将来必须进行积极的扫荡讨伐。

在第二军地区，自2月中旬前后，中国方面全面展开了游击战，扰乱我军占领地。当时大本营根据不扩大战局的方针，给方面军的任务也只是：“确保胶济沿线及从济南附近到黄河上游右岸之间的占领地区的安定。”但是，“第二军不能静待敌

人来袭，必须进而摧毁占领地前方之敌”的强硬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第二军决定将中国军击退到大运河以南，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到月末前后大致进入预定目标附近。中国军利用台儿庄附近的坚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同时，以优势兵力转取攻势。

大本营决定以此次作战为转机，命华北方面军及华中派遣军夹击集中在徐州附近的中国第五战区的军队，4月7日下达了有关进行徐州会战的大本营命令。由此，不扩大战局的方针遂告破产。

各部队在5月上旬开始行动，于中旬末，在徐州东方包围了中国军，但其大部从兵团的间隙向西撤出。尔后，华北方面军增加第二军兵力在黄河南岸向西追击，6月上旬末切断京汉铁路。中国军6月12日在郑州以东决开黄河堤坝，河水泛滥到第二军前线部队的后方。因此，第二军停止追击，集结于泛滥地区以东。

大本营在徐州会战后，企图攻占武汉，命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及淮河逐渐占领地盘。命华北方面军依然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同时以一部牵制华中方面的中国军而进行作战准备。

然而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因此，命华中派遣军做好从大别山北麓及长江两岸地区攻取武汉的作战准备。

在徐州会战期间，由于调用了华北方面的兵力，占领地区的警备力量减弱，中国方面扰乱活动更加激烈。此时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及警备状况如下：

一、第一军担任地区

1. 第一军占领地区警备部署的变更

在徐州会战时，第十六师团从第一军转属于第二军，第十四师团也参加了会战。因此，第一军司令官将过去警备地区作了变更。

第一〇八师团撤出潞安平原的守备，由第十四师团接防，第一〇八师团担任警备怀庆、获嘉、修武附近地区。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缺独立步兵两个大队）警备新乡、汤阴附近，并警备过去由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十六师团所担任的地区（高邑、彰德、濮阳、临清地区）。

2. 第二十师团的状况（晋南肃清战）

山西省南部的中国军，5月初逐渐增加兵力，共有20多个师，企图夺回山西省南部，在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6月30日以后为牛岛实常中将）的作战地区内，同蒲线频繁遭到破坏。5月12日，即黄河决口之日，曲沃首先遭到中国军步、炮部队的攻击。山西省南部各守备队受到优势中国军队的攻击。第二十师团努力打击敌人，但补给不够理想，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确保运城、河津、闻喜，以主力确保曲沃、侯马镇、新绛附近。

当时，各守备队，由于优势敌人的妨害，以及大雨阻断了交通，弹药、粮食均告缺乏，只能以猫狗及野草充饥。两个月后才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做好转向攻势的准备。在此期间，第一军司令官尽力增加兵力，补充弹药、粮秣。方面军司令官也将配属于第二军的第十四师团调回第一军。

第二十师团逐渐做好一切准备，在7月5日转为攻势，迫使中国军向南方退却。

与第二十师团作战相呼应，在第一〇九师团的警备地区内，

离石方面的各守备队也遭受优势中国军的攻击，但均被击退。

第一军指挥扫荡山西省内的中国军，约在 7 月下旬 扫荡完了。

3. 第十四师团的后方警备

在陈留口（兰封西北的黄河渡口）以北 的第十四师团补给线附近，中国军的游击活动从 5 月末开始活跃。担任该地区掩护任务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 6 月 1 日在长垣（兰封以北约 50 公里）及其以南地区，击溃中国军，确保补给线。

二、华北方面军直辖地区

方面军直辖地区，以第一一四师团及中国驻屯兵团（兵团长：山下奉文中将，配属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两个大队）等担任警备。4 月 8 日第一一四师团主力转调到第二军，全区 即以中国驻屯兵团及其他部队担任警备。从 4 月下旬 至 5 月上旬，再将步兵两个大队（配属于中国驻屯兵团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大队）、第一一四师团的残余部分（步兵两个大队）、平山支队（由中国驻屯兵团抽调步兵一个大队、山炮一个中队，与混成第四旅团的两个大队合并编组的支队）等转调到 第二军。因此，警备兵力更显薄弱，特别是从涞源附近撤出警备以后，易县及保定以西地区的共军游击活动更加活跃顽强。对此，日本警备队不断进行讨伐，努力防止其蠢动。

7 月，方面军司令官由于第二军（军司令部、第十、第十六师团）转调到中国派遣军，因此，划分该军担任的警备地区及原来方面军直辖地区为甲、乙、丙三个防卫地区，重新部署了兵团。

甲防卫地区（京津地方），由中国驻屯兵团担任；乙防卫地区（山东省及南方津浦线），由第一一四师团、第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旅团长：秦雅尚中将）担任；丙防卫地区（新黄河以东地区）暂由第十六师团、随后由骑兵集团（集团长：内藤

正一中将，由北满转来，7月11日隶属方面军）担任。

第十师团从6月中旬于夏邑（归德东南约50公里）、永城（徐州西南约80公里）附近集结，为了集中于庐州附近，从7月中旬开始行动。

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桑木崇 明中将）于6月25日被派遣到华北方面，7月15日与中国驻屯兵团（由第二十七师团改编，为参加汉口作战南下）交代京津地方的警备。

三、蒙疆地区

驻蒙兵团改编为驻蒙军，于7月4日隶属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奉命“除继续执行原有任务以外，应确保蒙疆地方主要地区的安定”。

攻取武汉战役及华北的治安肃正

大本营于5月末，将预定1939年攻取武汉的作战腹案提早一年，计划于今秋尽快进行。6月18日命令准备汉口作战。

政府也于6月24日决定了“今后中国事变指导方针”，作出新的重要决定，指出：“为直接解决中国事变，集中国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为前提，内外各项施策均须适应此目的进行。”

继而在7月8日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及“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前者的方针在于“中国现政府屈服时，帝国就以它作为一个政权，使之合并于新兴中央政权之下”，后者的方针是，举国家一切力量，集中用于将来攻取武汉及广东作战，以求得事变的解决。

第一 方针

帝国综合一切力量致力于作战、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促使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溃灭或屈服，同时适应长期战以加强当前各种必要的政策，从精神到物质实现真正的战时体制。
(以下笔者略)

7月上旬变更了担任进攻武汉的华中派遣军及第二军的战斗序列，并下达了第十一军的战斗序列。以后又增加兵力，步步准备好攻取武汉的作战。

在此期间，7月9日发生了张鼓峰事件，8月11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免除了后顾之忧，以利于对华作战。

8月22日，大本营命令攻取汉口附近的作战开始。华中派遣军在10月下旬占领武汉及其周边和修水一线，继以一部追击，至11月中旬初，占领通城及岳州。

在此以前，9月7日，决定进行广东作战，同月19日对担任作战的第二十一军下达了战斗序列。此一作战与攻取武汉作战同时进行，以扩大作战效果，可能时，希望就此结束事变。第二十一军，10月12日在白耶士湾（疑为大亚湾——译者）奇袭登陆，10月下旬占领广东及其周围。

汉口作战刚一结束，从11月下旬，第十、第二十七师团等乘船向南京进发，随后大部归还华北。第二军于12月15日脱离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其所属兵团主力转入第十一军。改编的第十一军，以七个师团为基干部署于武汉地区，纯属作战部队，与负责确保占领地区治安的华北方面军的性质不同。该军以武汉三镇及九江附近为根据地，负责随时打击周围的中国军、摧毁蒋介石军的战斗意志。

与上述作战同时进行的各种政治谋略，其情况如下：

武汉、广东陷落，蒋介石政权仍未屈服。以后的策略，即根据 7 月 8 日政府决定的“中国现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中的“占领要地后的对策”进行工作。该对策有如下一段内容：

占领要地后，中国现政府仍不屈服时，帝国即不急于直接依靠武力解决事变，而要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主要从外交、经济、思想方面对中国现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期采取政治及谋略手段使之崩溃。（以下笔者略）

华中派遣军攻取武汉作战时，华北方面军与之策应，牵制了中国军。除令各兵团在防卫地区积极清剿外，9、10月间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对山西北部进行肃正作战，扫荡了共军的根据地。9月15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对派来视察军情的侍从武官作了如下的情况报告。

情况报告

一、作战经过概要

（以上笔者略）方面军以一部在北方牵制敌人，以策应汉口作战，同时，以主力在占领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肃正工作，已逐渐取得效果。

命第一军主力及骑兵集团，在其作战地区内扫荡黄河及新黄河左岸地区的敌人，占领黄河河畔的要点，牵制敌人。两兵团从 8 月下旬开始行动，第一军各兵团通过险峻地形击溃顽敌收获很大。至 9 月中旬到达河岸。目前，第十四、第二十、第一〇八师团各以一部有力部队正对垣曲附近进行攻击。骑兵集团在中旬左右，以一部渡过新黄河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其它各兵团均在各

防卫地区内担任肃正工作，特别是第一一〇师团方面，由于最近冀东地区治安突然恶化，从8月中旬对该地区一齐出动讨伐，至9月上旬掌握了所有县城，肃正工作大致告一段落。

8月下旬接到抽调第五师团的秘令，逐渐向青岛附近集结，该师团原来负责地区内的警备，由9月上旬在塘沽上陆的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鹫津鉛平中将，7月15日隶属于方面军）的主力接防。同时变更了山东地区一部分兵团的部署，此项工作于9月15日前后顺利完成。

二、山西北部作战

治安肃正工作，决定按照作战地区由各兵团自行承担。但对主要地区有必要由方面军统辖。尤其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统辖所属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〇师团，自8月上旬进行准备，9月24日开始攻击，约至10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

注：据“第一〇九师团状况报告”，1939年12月21日师团将所在之敌击溃后，进至五台县附近，以后在五台县周围进行讨伐，随即驻兵五台县以西，进一步扫荡忻县、五台、代县之间的残敌。但因共军采取退避战术，未有较大战斗成果。

三、治安状况概要

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在徐州会战后一时呈现小康状态。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及至青纱帐起，游击活动更加统一，加以爆发了张鼓峰事件，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经过兵团多次讨伐，随着汉口作战的进展，治安始逐渐得到恢复。

四、情报、宣传、谋略

情报工作，由于科学谍报机关和航空兵力的减少，特将工作重点放在兵团搜索和一般谍报机关的活动上，利用中国方面和其他机关以及华中派遣军的通报，大体上可以达到目的。

宣传工作，特别加强对各机关的统制，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懂得其一切幸福的获得，必须反共叛蒋，依靠亲日防共的新政权。

谋略工作，应配合中央机关的施策，导致蒋政权及党军的分裂和内讧，同时要尽力操纵杂牌军及回教徒等。

如前所述，为了徐州、汉口作战，由华北调出很多兵力，兵力已显著减少，这对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完成方面军的任务相当困难。从当时离察南共产党地区最近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大队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困难的程度。

兹将该第三大队附田副正信少佐回忆录摘记如下：

1938年3月24日完成旅团的编组。4月3日由北京北苑兵营出发，越过长城线到达宣化。6日旅团下达有关警备、驻扎的指示，大队担任旅团管内最远的蔚县和广灵县地区的防务。

4月11日与前任部队交接完毕。大队的配置：总部和第一中队在蔚县，第四中队在广灵，第二中队在暖泉镇（广灵、蔚县之间），第三中队在西河营，以中队为单位分驻各地。大队长浅川悌二大佐决定，在装备尚未运到之前，努力搞好部队的团结和训练，准备进行积极行动。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召集各大队附，在张家口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有关游击战法的教育，这是我们完全不懂的一种战法。

大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了游击战法的普及教育。第一次讨伐战斗从4月7日开始。

警备的部署最初以小队为单位分驻各地，5月8日西河营第三中队派一个小队驻扎北水泉。此时，我军只能保持点和线。为了扩大治安圈，建筑了宿营地，从居住中心加强和扩大防御设施，减少守备兵力，增加机动兵力，扩大讨伐地区，与此同时，逐渐增多分驻地，这样可望收到成效。这种逐渐扩大治安圈的做法被称为“乘圆扩大”（马术名词，从小的半径逐渐向外扩大圆周的运动）。这种扩大的动力，主要靠积极果敢的讨伐，同时还必须进行确保治安的工作。

当时在察南政府派有日满系顾问及指导官，在各县也派有指导官。但是，这种治安工作与现实状况不相适应。例如，部队进驻之后，却立即搞起植树节活动。在这时的重要工作应该是收集情报，保护、修补道路和通信线路，训练自卫团。相形之下，共军的政治工作比我方巧妙得多。他们以怀柔、威压相结合，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处于彼此势力中间地区的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向双方纳税等，这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事实。我相信扩大治安圈的第一要事，就是掌握民心。因此，指导部队对居民注意威武与慈爱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并教育士兵每个人都要做宣抚员，保持正确行动。当时日军士兵的教育程度相当高，相信这些对治安各方面都起到了扩大效果的作用。

我军进驻时，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都有八路军盘踞，土匪也在各地横行。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土匪逐渐消灭，而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我大队在察南担任警备期间所参加的讨伐战斗，不到一年就有50次以上（向其它方面出动除外）。其中，有按大队计划施行的，有紧急援救受敌人袭击的中队的，有遵照旅团命令进行的。此外，各中队还不时进行了单独讨伐。

在5月，讨伐土匪、训练部队、宣抚居民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果。6月，八路军开始活跃，侵入驻扎地附近进行政治工作，或袭击我讨伐部队的留守部队，并破坏道路及通信线路。对此，大队除临机应战之外，还进行了有计划的讨伐。7月，八路军以一个旅及一个团的大兵力袭击北水泉警备队，并伏击增援部队。由于我军的机敏处置，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但未能将其歼灭。尔后，逐渐扩大治安圈，或寻找八路军进行远距离的讨伐，或紧急救援运输部队。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对八路军的战斗，痛感需要注意的事项为：（一）尽快搜集情报，（二）最忌麻痹大意（不论警备队、讨伐队、运输队、总部、步哨均应注意），（三）行动迅速（不拘泥于包围、迂回等旧的概念，要以奇袭、急袭为第一）。

此项笔记与前述“情况报告”表明的方面军治安确保地区，都是仅限于点和线的状态。至于向面的方面扩展，乃是今后的课题。特别由于中共地下活动及游击战的活跃，使今后的治安战的性质逐渐有所改变。

四 中共的政治工作

中共的组织特色是具有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密切关系。军和政是党的两臂。党挥动两臂以推动革命。即军是以武力推动革命的组织，政是党掌握政权领导，以推动革命的组织。华北方面军为了观察中共的政治工作，必须首先了解中共的党、政、军的组织。为此，进行了调查研究。“1938年11月方面军的情报记录”主要是依靠实地调查、审查缴获

文件、检查邮件等手段取得的，但这仅是初步阶段，仍不能完全正确地掌握中共的实际情况。

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中共长征以后，在巩固陕北中心根据地的同时，逐渐向四周扩大势力。事变爆发后，中共进入日军及国民党军势力达不到的真空地带，树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之为“抗日根据地”，并对此根据地的建设称之为“解放区工作”。

注：中共的行政组织大体完备，对其领导支配下的特区称为“边区”，对党、政、军组织健全的抗日根据地称为“解放区”，根据地周围彼此势力混杂的地区称为“游击区”。

根据中共战后发表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共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37年7月——1940年（摇篮、建设）

第二阶段 1941年——1942年（困难的斗争）

第三阶段 1943年——1945年（发展、反攻）

第一阶段：1937年，国民党军受日军攻击败退时，八路军将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派往五台山、晋西北、太行山脉的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山东地区建立以泰山、沂蒙山（沂水、蒙阴之间）为中心的鲁中根据地。以上是华北解放区的摇篮。

1938年，八路军分别东进，到达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冀中平原。一部向北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及河北省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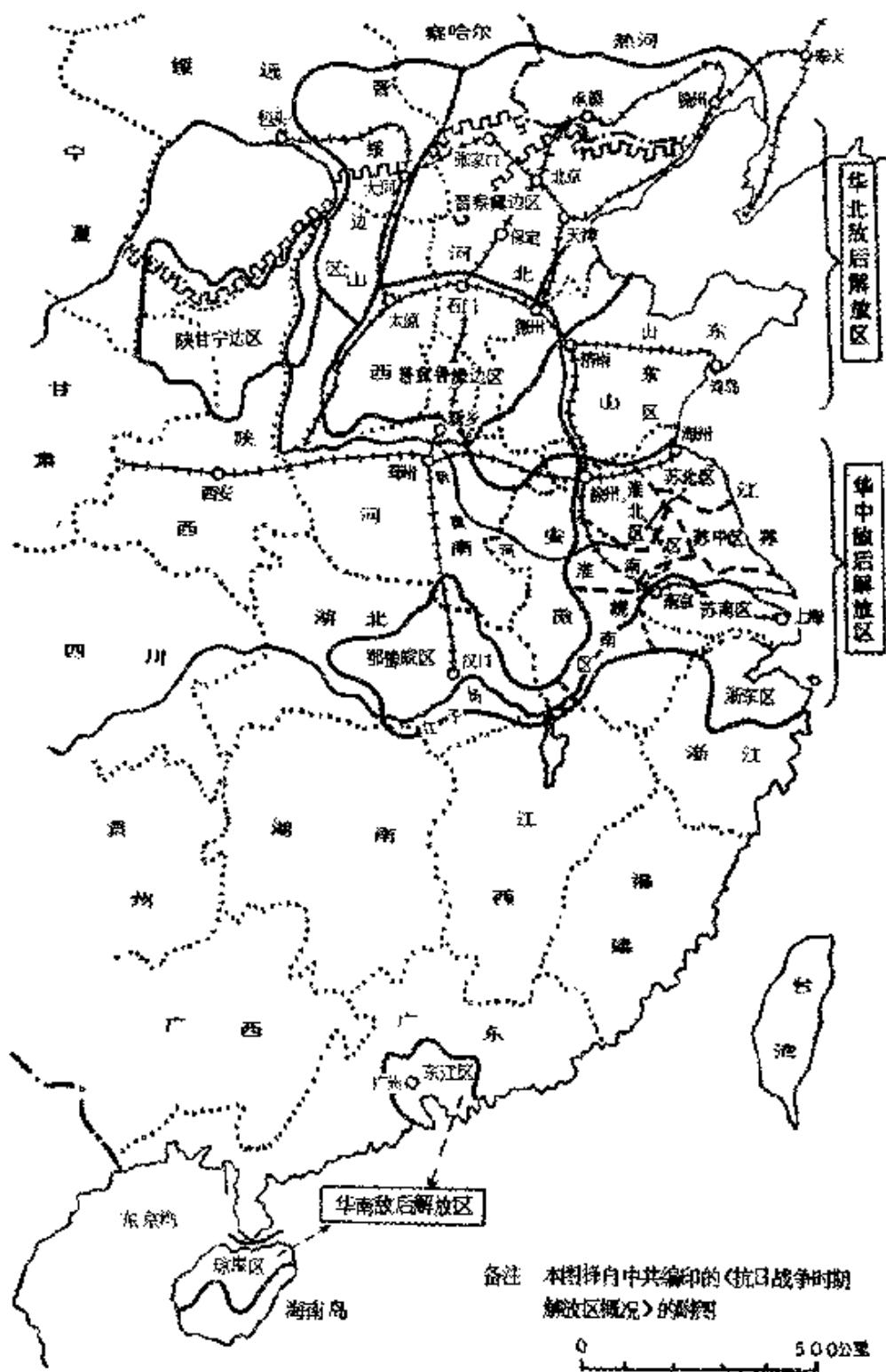


图 2 · 解放区状况略图

部，逐次建立冀鲁、冀中、冀东、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此期间，逐次建设苏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鄂豫皖等根据地。在广东方面，从1938年至1939年，在东江、琼崖建立了根据地。

1940年，八路军达80万人，其解放区人口达4,00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其解放区人口达1,300万人，至此，支持中共的人口包括游击区在内已达一亿人。

第二阶段：1941年至1942年，是解放区斗争困难阶段。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华北解放区连续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加之各地发生天灾，解放区的困苦实难形容。至1942年末，华北解放区人口减至2,500万人，八路军为30万人，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境。

第三阶段：日军在此阶段，虽也企图积极扫荡，然而，中共领导军民妥善进行防御，并同时通过生产和整风运动，奠定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基础，从而增强了军事力量。结合国际形势的转变，1944年春共军兵力增加到47万人，民兵达200余万人，解放区人口（包括游击区）达8,600万人。共有14个解放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晋绥边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区、浙东区及华南的东江区、琼崖区。这14个解放区，成为全中国人民解放的原动力。

一、晋察冀边区的建立

中共1937年9月在山西北部内长城线一战之后，对日军回避正面作战，而潜入日军侧面或后方展开游击战。10月末，中共首脑决定在山西五台山附近建立基地，开始积极的

地下工作。

注：山西五台县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故乡。阎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土地的大半为阎的亲朋或山西官僚所占有，佃农和小自耕农都从属于他们，牢固地维持着旧中国特有的支配关系。

负责建设根据地任务的，是第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聂先在10月23日于五台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11月7日设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后在1938年1月10日于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民临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表宣言，决定建立边区政府。在2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有40个县的县政府代表和120万民众的各种团体、少数民族、国共两党的代表等共140余人出席大会，推选宋邵文、胡仁圭、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吕正操等九人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边区的行政组织及省政府的组织均待以后再行充实。至1939年3月前后，边区政府的规模已臻完备。

晋察冀边区的行政区划分为北岳、冀中、冀热辽三区，包括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满洲国热河省的南部共108个县，面积约为80万平方华里，人口为2,500万。北岳区为险要山地，不宜大部队作战。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农作物缺乏。冀中区为平原，农产品虽然丰富，但在地形上不易展开游击战。因此，北岳、冀中两区需要紧密结合，互相支援。冀热辽区山地平原交错，适于游击战，而且是连接满洲国与华北的要地。这三个地区包括华北中心的平津地区，成为政略和战略上的重要地区。

关于边区政府的成立经过，华北方面军在1939年3月下旬，以五台县为中心调查中共工作情况时提出的“八路军进入五台以后”报告中，记述如下：

1937年秋，在忻口镇战斗时，进入五台县城的八路军一部，立即开到阜平方面，在县内驻扎一部兵力，即开始了政治工作。首先更换县长，推举共产党系统的宋邵文担任县长，同时安排了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担任组织民众及抗日宣传工作，进而整备了抗战体制。同年10月根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令，在县政府、八路军、民众团体参加之下召开大会，会上决议建立“五台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在各区村设立区村动员委员会，就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卫五台等积极进行宣传。该委员会是负责动员人力、物力的机关，与农民救国会同在八路军政治部领导下进行活动。

1938年1月，在八路军的领导下，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五台县县长宋邵文任行政委员会主任，秘书蒋自力提升为县长。未过数月，蒋转调边区政府法院，由左障之继任县长。

在此期间，五台县政有了很大变化。宋任五台县长时，山西省政府对该县的领导尚有相当力量，但随着边区政府的成立和加强，其实际领导权即转入八路军之手。

二、冀中区的建立

事变开始时，在平汉路方面作战的万福麟军（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该军向南方退却之际，指挥约两个营的兵力，潜伏于冀中的深泽、安国、任邱、河间附近。至1938年4月1日，成立了冀中区行政主

任公署。

三、进入冀热辽（冀察热）区

1938年6月，邓华、宋时轮指挥的邓宋支队，拟在燕山山脉（热河省西南的国境地带）寻找根据地，建立冀察热区，企图威胁日军背后，并向满洲国伸张势力，并挺进到了平北的冀东地区。于是在该地领导民众起义，展开游击战，努力创立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日军警备严密无隙可乘，支队反受到日军攻击，于同年秋回到山西。

中共首脑派遣当时驻晋北地区的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组织北上挺进队，从1939年逐渐沿长城线扩大地盘，进行游击战。

四、晋冀鲁豫边区概况

晋冀鲁豫边区，特别是晋东南的晋冀豫区，以后中共称之为“延安是总后方，晋冀豫是前方总根据地”，对该地区非常重视，并设置了八路军司令部，以此作为统辖华北各边区的地区。但这一地区有日军、国民党军、共军的三种势力混在一起，展开深刻的心理战，边区的成长及活动状况十分复杂。

该边区在战略上分为晋冀豫（太行、太岳区）和冀鲁豫（冀南、冀鲁豫区）两战略区。晋冀豫区东至平汉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北至正太路，总面积约为29万平方华里，人口700万，全区59县，大部为适于游击战的山岳地带，居于威胁各地主要铁路的战略地位。冀鲁豫区是处于平汉路、石德路、津浦路、陇海路中间的地区，总面积31万平方华里，人口1,800万，全区118县，大部为平原，多有河川湖泊，农

产品丰富。

1937年11月太原陷落以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与华北人民同生共死、展开敌后游击战”的指示精神，在朱德、彭德怀直接指挥下，于晋东南地区展开了游击战。

这一地区，从前就潜伏有中共地方党组织，事变爆发后，以平津逃来的学生等为基干，编组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敢死队，以薄一波、戎伍胜、董天知等为领导，进行抗战工作。

一二九师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并与山西革新势力相互合作，创建了太行、太岳山地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冀鲁豫平原的第一二九师的积极活动，在1938年5月前后，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与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曾任北平朝阳大学教授）先后到达冀南，领导组织民众抗日，同年8月4日，50余县的军政代表在南宫集会，设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选出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

1941年8月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注：在草野的资料中，有关杨秀峰的活动叙述如下：

冀南区的组织者为杨秀峰夫妇。杨为河北省迁安县人，留学美国，曾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事变爆发即赶赴保定，在张荫梧组织的“保定行宫民训处干部培养所”充当政治教官。后遭日军进攻，率领该民训处人员退却，途中吸收难民加入，随后编成游击队，杨自任司令。

1938年3月，杨秀峰部在徐向前领导下，于邢台、临城、元氏方面打下了地方政权的基础，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共的关系，并在赞皇县内设置了军区司令部。后来杨往访冀中的吕正操，得到

吕的支持，在冀中区与冀南区的合作下，成立了抗战学院。学院以培养两区的军政干部为目的，由冀中区分担经费，冀南区负责教育训练。杨为院长，孙文淑为秘书主任，宋仁穷为政治主任。学院被日军扫荡破坏后，与阜平的抗日大学第二分校合并。1938年8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部完全归于中共领导。

五、山东区概况

山东区包括津浦以东，山东省的大部，河北、江苏两省的各一部，计有82县，总面积约60万平方华里，人口约2,900万。区内平原和山地交错，铁路、港湾、矿山、工商业城市较多，并有富饶的农村，适宜建立游击战的大片根据地。该地区为华北、华中根据地的联络据点，且与五台、太行根据地相策应，处于支援冀鲁豫平原抗战组织的战略地位。

早在事变以前，中共山东省地方委员会即曾在该地区进行组织活动。事变爆发后，该委员会移往泰安，企图进行山地游击战，使抗日武装组织逐渐向各地发展。1938年秋，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势力已达九个支队，三万人左右，扩大到十余县。此外，山东半岛的蓬莱、黄县、掖县也建立了抗日政权。

六、晋绥边区

该边区东以同蒲、西以黄河为界，南自离汾公路（离石——汾阳）与阎锡山势力范围相接，北至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总面积约为33万平方华里，人口322万有余，包括46县。全区皆为高原地带，北部为蒙古草原，中部、南部峻岭连绵。

1937年9月，第一二〇师侵入晋西北，于神池、宁武、朔县附近，对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该师由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领导，动员西北各地的牺牲救国同盟等抗日组织参加抗战，此即边区建设的开端。

七、华中、华南状况

在华中，1938年1月新四军组成以后，由军长叶挺指挥，在日军占领地区展开游击战，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组织解放区，如前所述，在1939年以后逐渐建立了抗日据点（八个战略区）。

华南解放区为东江与琼崖两地区。东江地区是在1938年10月广东陷落后，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时开始建立的，琼崖地区是于同年国民党海南岛守备兵团撤退后组成“广东琼崖抗日自卫队”时建立的。

边区政府组织机构

——晋察冀边区政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下所产生的边区，实际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行政特别区。因此，边区在形式上是中华民国一个构成部分，实际上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若干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施行独立自主的政权工作。1938年1月10日，于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民临时大会，宣读了决定创建边区政府的大会宣言。这是中共扩大势力的第一阶段工作，明确了边区政府组成的意义及目的。

注：本资料是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为该会指导员编写的，简称新

民会调查资料，在1938年12月7日分发有关人员，其内容摘录如下。

扩大党组织工作的实况 ——和顺县的一例

中共如何在乡村构成组织网，又如何扩充发展党的组织，虽因情况而异，但对处女地，一般则是由宣传开始进行地下工作。随后或者同时，派遣工作人员建立基层组织，逐渐扩大“点”的工作，然后向“面”发展。

然而，在不易建立基层组织的地区，则采取等待军队进入时，在一定地区内组织多数支部，逐次集结起来再行扩张的方法。

现举山西省和顺县为例：

和顺县是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建设基地的成果，是一个典型例证。华北方面军为了调查该地中共工作的实情，由宣抚班派出三崎良一调查员。该调查员从1939年5月做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他住在和顺，经过细致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调查报告。下面是报告的摘要。

山西省和顺县中共势力渗透及扶植状况

第一期（事变爆发前的抗日救国宣传时期）

1936年2月，共产党大举渡过结冰的黄河，侵入山西省内。一方面，以一部从离石向太原方面进发，转移阎锡山军的注意。另一方面，使前年潜入的党的工作人员，开始积极活动，采取所谓“声东击西”的战法。工作人员经过沁县、辽县进入和顺，选定该处为宣传据点，对民众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向阎锡山军

展开了攻心战。

这一战法收到了良好效果，阎锡山不得不哀叹：“共产党已侵入山西全境。……搞不清哪些地方是由共产党支配的。”阎锡山认为，中共号召抗日，并非为爱国而抗日，乃是为中共而抗日，因而予以反对。阎为了防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组织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但该会变成了激发抗日感情的中心，中共利用该会的组织渗透其势力，深入地侵蚀了山西青年阶层。

第二期（从事变爆发后到1938年4月，日军占领和顺县以前，主要为地下工作时期）

事变爆发后，进入和顺县的共军是第一二九师的一个营，一面派遣政治工作人员秘密发展新党员进行地下工作，一面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和开展民众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公开与秘密的活动，努力渗透赤色势力。

其公开的工作，首先是宣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高唱抗日统一战线，注意避免与阎锡山势力的对立和摩擦。另一方面，其政治工作，则是努力推动发展党员的地下工作与扶植抗日容共势力的半公开工作。

对村长的工作有如下的文件记载：

村长的自觉和基本任务

训练村长的意义

旧村长不能完成新的使命。新村长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民族意识；（二）有强烈的责任感；（三）有现代知识；（四）富有牺牲救国精神。

村长应有的自觉性

(一) 村长是村民政治上的领导者；(二) 村长是民众总动员的核心；(三) 村长是民众武装的执行者；(四) 村长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动力。

村长的基本任务是建设新山西

(一)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行民族总动员；(二) 实行民族革命，为救国而牺牲；(三) 发展抗敌救亡的统一战线；(四) 主持公道，消除社会之不平；(五) 指导人民监督政治；(六) 执行合理负担，按贫富计算分担。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政策对现有的政治势力，极力避免发生冲突，而是采取稳步渗透的方法，将中共意图巧妙地渗进阎锡山的气味之中，以内部改造为名，先行站住脚步，然后再逐渐进行赤化。

第二期是为了将牺盟会变成赤色尖兵而训练地方干部的准备阶段，是奠定扩大共产党地下工作基础的时期。

第三期（自1938年5月日军撤走至1938年11月改造和顺县政府的阶段，是准备建立财政经济政策、组织民众及武装群众的时期）

1938年5月，日军刚由和顺撤走，共军迅速回到和顺县，本想立即掌握和顺县的政权，但因仓促返回，未能作好政治准备，只得暂且放弃政权工作，集中力量争取民众及加强组织工作。首先分散安置牺盟会的中坚干部，同时利用麦、谷收割的大好时机，动员八路军驻扎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牺盟会干部义务帮助农民割麦。这种作法，是学习中共早先进行秋收暴动时的成功经验。这种平凡手段在收揽民心上取得了极大效果。以此为第一步，以后按照工作指导大纲，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宣传（收割、收获后暂时停止农民纳税、交租）。此外进一步引用国共合作公认的口号

“为民族救亡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青年阶层中结合抗战政策的观念宣传减租减息，使贫农大众领会经济利益的观念及救国抗战的义务，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对少数富农则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使之完全屈服于群众压力之下。

此外，并结合阎锡山时代公布的合理负担，宣传向富农征收高率累进税，用以救济贫农，及提供抗战财源。随着宣传及民众团体内的赤色组织的扩大，进而从事掌握县政权的工作。其方法是，使民众团体提出县政府及各区、村行政机关与民众之间需要有一个协商机关的主张。同时，在阎锡山按照中央命令成立的公开机关“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任命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使之在该委员会内部逐渐进行赤化，以确立政治的立足点。这样，对阎锡山系的县长张雨帆从内外施加压力，逐步使之执行赤色政策。例如，1938年7月，以抗战时期合理负担办法，对富户摊派了等于掠夺的过重负担。对特别富户则以紧急费用借款的名义，实际进行没收。对不服从者，以汉奸行为论，由民众团体没收其财物，并予以社会制裁。终于迫使张雨帆县长辞职。后由阎聚宝继任，但在职不到一个月，于11月由邓肇祥（共产党员）接替。邓就任县长后，对县政府加以改革，亲自领导全部工作，积极推行各项施策。

第四期（1938年11月以后，推行中共政策时期）

共军从11月前后即获悉日军对中共地方据点展开“粉碎作战”。为此，采取了分散部署，以和顺县做为提供人力、物力的兵站基地。县政府首先号召加强行政工作，实现自给自足。在12月下旬前后，判断日军即将进攻，于是全力以赴加强政治工作及武装民众工作。以各新编村长、秘书、副校长为中心，进行政治训练。对于民众，则由所属村常设文化联络员（直属县长领导）进行训练。为了加强各村自卫队的训练，由共军派出正规士兵担

任指导。

在政治方面，根据过去半年的经验，确立了财政、税收、通货、一般经济政策的体系，开始整顿了游击队与兵站财政的统一体制。

此时的县政府，被称为打倒日本拯救中国，保卫家乡保护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政府。其所负使命为动员全体人民，武装起来，肃清汉奸，加强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

笔者注：

1. 此报告书对统一战线的调查并不完全。
2. 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

中共党组织的扩充及后方扰乱工作

根据新民会调查资料，中共北方局关于扩充党内组织及扰乱后方工作下达的指示（1938年4月至9月），综合叙述如下：

华北共产党认为在城市活动是无效的，应依靠农村的组织工作以扩充实力。武汉陷落后，按照“从局部领导权向夺取全国党政军抗战领导权转移”的纲领，进行了总动员，最近（8、9月）行动渐趋活跃。同时，北方局发出指示，以扩充党组织增强实力为目标，搞好游击队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系，防止思想动摇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的混入，设立特务训练班，教授特务工作，以及设立联络信箱等。

收买宣传工作：

对临时政府各机关的团体和工作人员，展开收买工作，最近尤为活跃，并已收到实际效果，特别注意收买日华官宪派出的中

国方面的宣抚员，对他们晓以国家大义，加以利用。

对通信、交通机关的破坏工作：

要求各地区的游击队，将重点放在破坏交通及通信机关的工作上，切断我后方运输线，策划破坏华北各铁路，除炸毁供水、贮煤、桥梁及铁路的弯曲点外，并设法破坏道路、水运、电话、电信等一切交通通信机关。

对报道机关的破坏工作：

最近日本方面报道机关，发表有关共产党战败，新政府组成等消息，对民众的影响很大。为了防止宣传刊物和报纸的进入，对报社或代理贩卖人加以制裁，对购读者予以警告。

经济扰乱工作：

命令各地党员，注意当地粮食问题，防止农、矿产品出境及联银券流入。

按不同地区，进行后方扰乱工作。

研究各种实际情况，按照下列三种地区，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一）扰乱破坏工作的重点地区

此种地区为完全或大部处于日军势力之下的地区，并包括施行新民工作的地区。

在这种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扰乱工作，对中国居民实行极苛酷的征集、掠夺及强制动员等。命令村长筹措军费、粮食，倘有违反则实行放火烧庄或强行夺取等恐怖手段。此外并使村民轮流担任警戒，强迫村民破坏铁塔（架电线用）、割断电线。

据定县新民会指导部报告，共军命令每村一次供应粮食100—200斤，救国捐100—200元。

由于这种地区比其它地区受害更大，手段也极其残酷，因此，由地方成立保卫团、自卫团等联防组织，以防游击队来袭。这种

地区是将来新民会工作的重点。

（二）政治工作重点地区

这种地区是敌我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区，是组织民众的重点地区。出入村庄需有通行证，由动员会、少年先锋队等严密监视出入。

这种地区，游击队的活动较少。征集、掠夺也不太苛酷，但设有伪县公署的分区署，征收租税，进行合法掠夺，较共产地区为重。流通货币，仍用旧币和共产党的边区银行纸币，不用联银券。

（三）共产地区

这是在中间地区背后为中共占有的地区，是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走向共产的地区。这里有共军司令部、伪政府分署、伪县公署、共产系统边区银行办事处、游击队特务队总部、部队直属青年政治军事训练学校、人民自卫军总部、人民自卫委员会总部等机关。军队大多数是共产党的正规军，比较遵守纪律，征集较轻，并想出许多办法实行合法的征收。

虽未实行分配土地的革命政策，但因地区不同，有的取消欠款，有的减轻民众税款，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对耕种100亩以上的地主征收富户捐，每亩征捐一元。以村为单位，强制购买救国公债，公债票面无金额，在交纳“约定金”时记入金额。

县政方面，由军代表、各团体代表举行的地方会议负责。地方委员虽采用选举或提名的民主方法选出，但因地方会议是由该地驻扎部队推荐的人物参加，故不过是形式的选举而已。

共产党地区最为重视的工作为组织民众。八路军精心加强居民组织，并大力扶植其自卫能力。在各村的人民自卫委员会之下，组织有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少年等团体。各团体选出各自的领导者，用自费执行各自的任务。

妇女救国会负责洗衣、慰劳军属及伤病员、耕种，以及进行政治教育、宣传等；少年先锋队负责敲锣打鼓，在村内巡逻，宣传抗日，检查通行证等。

八路军为取得民众的支持，大事宣传“八路军是民众的军队，是保护民众的军队”，努力消除中国人自古以来怀有的厌恶军人的观念。

共军的政治工作

华北方面军汇集的有关中共党、政、军的调查材料，于1938年11月18日编写成情报记录，其中对于“共军政治部”所作的结论如下：

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及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我方的对策，第一要正确把握其真象，其次则要采取良好的组织行动和思想对策。

“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再就冀北共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大纲介绍如下：

冀北国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工作大纲

一、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应通过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按照中央全民抗战的原则，并遵守上级政治及军事首长的命令，处理各项政治工作，以完成军民合作及抗战建国的任务。

二、各部队政治部及政治指导员，在本军所到地区，应协同

该地抗日救国团体，遵照中央规定的人民团体组织大纲，以恢复各级行政机构。

三、各部队政治部及政治指导员，应协同地方行政机关及人民团体恢复地方秩序，以安定人民生活，巩固游击队后方的经济力量。

四、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要对部队防区的人民，进行宣传工作，唤起民众意识，激发抗日情绪，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目的。

五、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协同当地行政机关，调整生产，管理民食，实行公平合法的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充实军队给养。

六、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事前要向本军所到的地区派出工作人员，以利于军事进攻。

七、本军为了进行游击战，要经常移动。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要在本军所到地区内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联系，掩护军队的潜伏活动，以达到游击战的目的。

八、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对地方民众实行适当的军事及政治训练，以协助全军工作。

九、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对本军士兵实行政治训练，阐明抗日救国的意义，唤起士兵牺牲报国精神。

十、各级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应切实督促本军将官，使全军士兵严守军纪，服从长官命令，以严肃军队的纪律。

十一、本大纲呈请中央批准后施行。

这些政治工作是八路军所最重视的，其基本原则是：第一、官兵一致。第二、军民一致。第三、对敌宣传及优待俘虏。

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述“新民会调查资料”中，对共军的军事工作有如下叙述：

所谓组织与加强共军，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使之与政治工作表里一致，军事工作就是政治工作。

所谓组织，就是扩大共军的数量，补充正规军，建立游击队，组织民众自卫军，并且吸收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及自发的自卫团，使之纳入共产党系统之中，依靠所获得的领导权，扩大抗战力量。

所谓加强，就是要使共军本身具有一定的纪律，以期协调军民关系，“通过教育”，晓以抗战的意义和目的，“提高士兵的素质”。收买或强制改编土匪等，使之共产化。协商划定各匪间之地盘，战斗时采取协同动作，以求得抗战力量的加强。

一、游击队的组织

在河北省，作为八路正规军卫星存在的游击队约有30—40万人。游击队以少数正规军为基干，由散兵游勇、土匪及征募的民众组成。多数游击队在远离正规军司令部的地区分散活动。游击队袭击某地时，当地的流氓地痞多与之合流，进行掠夺。

游击队的组成多种多样，有的在正规军之下组织游击总部；有在远离地区独立活动的，称为游击第几师；也有与正规军同样组织起来进行活动的。

二、人民自卫军

游击队不断进行攻击，成为扰乱后方的主力。人民自卫军则主要担任防御，其行动范围较小。各地的青年政治、军事训练，是组织训练民众的准备工作，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人民自卫军的组织。这样，共军宣称要组成数百万人民大军，将是可能实现的。

河北省在日军占领时，尚无这种组织，最近才在各地逐渐出现。

人民自卫军，一般受该地驻扎部队和人民自卫委员会指挥，但在涿县、固安县一带打游击的华北抗日民众自卫军，则有自己的政治部，并掌管行政。各地情况并不一致。

三、改编与肃清土匪

共军派出政治指导员潜入土匪、败残匪、民团匪之中，进行赤化或收买工作，使之改编为共军。对于反对的匪众则进行肃清工作（使匪军互相冲突）。

东光县附近极为凶暴的土匪张国旗，由于其部下队长宋达民业已共产化，不久，张也投靠八路军，改称抗日救国第二路军。东子牙附近的赵壁臣、大城县的魏大光等也都成为共军，改称红军第二支队。此外，东光附近的土匪葛荣华、徐西平、穆金城等也都改编为八路军。以上数例，说明共产党对此等匪团正在积极进行改编工作。

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鹿钟麟组织河北省伪政府以来，在土匪中间，标榜“中央华北别动队”、“中央华北游击队”、“中央第十二旅”等中央名称的部队逐渐增多。但是，有不少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也潜入中央系统部队之中，

暗中逐渐夺取领导权，削弱中央的统制能力。共军与土匪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

共军在此种情况下，则经常散发宣传文件，指责“某某匪掠夺民众财物，极为残暴，离间军民，反对收编，拒绝训练，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妨碍抗日工作，似此行为与汉奸何异”等等，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大多数是由于争夺地盘引起的纠纷。“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十团政治部”提出的口号如下：

1. 铲除汉奸。
2. 扫清抗日障碍，巩固抗日力量。
3. 军民联合，驱逐日寇于国境之外。
4. 服从上级指挥，尊重民众利益。
5. 争取义勇军正规化。

四、共军的纪律

一般的匪军也都向民众宣传纪律条款，注意获得民心，但实际上尽做些坏事。特别是在充当袭击先锋的游击队里，混进很多当地的流氓无赖，这样的游击队所到之处，全村一片荒芜。

正规军及政治训练所所属的游击队，尚能看到纪律，但也仅是征集手段有所不同。即在征集物资时避免直接掠夺，而以巧妙、狡猾的方法，通过各种组织及政治手段达到其目的。

例如，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购买物资，以村为单位要求“救国捐”，如不应允即做为汉奸强迫服从。

当地居民深知彼等言行不一，不仅有怨言，有的地方出现了组织自卫团的倾向。但是在有实力的游击队的地区，或其宣传普及的地方，抗日的号召依然深入人心。

在共产党系统的游击队的宣传文件中，有关纪律部分摘记如下：

三大纪律

- (一) 一切行动听指挥。(二) 不许侵犯民众任何东西。
- (三) 不准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

八项注意

- (一) 积极进行宣传。(二) 必须清廉。(三) 对人要和气。
- (四) 买卖公平。(五) 借东西要还。(六) 借物损坏要赔。
- (七) 优待俘虏。(八) 不得随意大小便。(以上均按日文译出——译者)

共军的宿营办法

(一) 军队在村庄宿营时，部队首长或其代表先与村长商洽，说明人马数目，做为准备工作的参考。部队在商洽之前，不得进入人家，村长不得借故拒绝部队宿营。

(二) 村内若有公共设施，应先利用公共设施，军队不得撤开此等设施而在民宅宿营。但有时村民可以收拾公共设施安排少数民族战士宿营。军队在民宅宿营时，只能在指定的民房住宿，不准强制民众移居他室而独占好的房屋。

(三) 军队不准强夺民众食物，不准强行交换。

(四) 军队需要粮食和马料，政府可规定一定价格，军队应按规定价格付款，不得向民众提出不当要求。

五、与国民党系统游击队的对立

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的同时，也稍作整备，以败残兵为基干，收容了曾在“CC团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团，编成10个团，由匪首或旧军官担任指挥官。该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为此，在天津的国民党员深为焦虑，随着武汉陷落，这种倾向更为显著。

第二章 1939年度的治安战

一 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①

确保安定的基本设想

1938年秋，大本营决定了华北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日满华三国结成亲善的邻国。为了实现东亚和平枢纽的远大目的，华北及蒙疆必须在国防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开发利用资源方面，形成日华高度结合的地带。此外，在蒙疆，为了防共，并应造成军事上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此时，方面军以确保安定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以肃正作战为指导作战的准绳，确定了与治安建设并行的使命。

当时，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因此，方面军为完成任务，必须制订建设华北的正式施策，对此虽曾作出计划，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

① 本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以及“肃正工作”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 ——译注。

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針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

注：大本營指出的占领地区的面积和人口，据中国派遣军编写的统计资料，其情况如下：

一、全中国占领地区合计	136万平方公里
蒙疆（察南、晋北、巴盟、察盟）	36万平方公里
华北（河北、山东、山西）	61万平方公里
陇海地区（苏北16县、豫北43县）	8万平方公里
二、全中国占领地区人口合计（1936年）	17,000万人
蒙疆	552万人
华北	7,706万人
陇海地区	216万人

（以上数字有误，均按原文译出——译者）

军的思想准备，在方面军司令部编写的资料“华北一般状况”中，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确保安定的基本观念

由于国府军及共产党军都以坚持抗日为口号，故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是以武力消灭阻碍圣战的国共两军。同时，更重要的，是依靠皇军的存在，作为今后治安建设的核心。现在民心尚未安定，不断受到敌方威胁，因而治安建设的根本即在于尽量显示皇军的威力。

事变的结果表明，必须完全把握民心，使民众心悦诚服。为此贯彻圣战……共存共荣的大义……清除弱肉强食的肤浅理论……严禁放火、掠夺、强奸……（中间略——笔者）

皇军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与皇军威武，显示其表里的一致。应以恩威并用，成为指导圣战的根本观念。

治安肃正的根本方针

方面军为了确保当时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是为了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重要地区的治安，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间，分三期进行治安肃正工作，结果使各项施策渐入轨道。

方面军各时期的治安肃正方针如下：

一、肃正作战

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二、各项治安工作

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特别注意下列各项工作：

（一）复活县政，重建自卫组织，建设乡村自治。

（二）开通道路及水运，建设通信设施，以利于讨伐及补给，

并振兴民间企业。

(三) 做好归顺匪众的转业工作，以杜绝流氓游民。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同时，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而把握民心。

(四) 恢复商业贸易机构及运输事业，以利于物资交流。

三、培植、整顿亲日武装团体，使之成为维持当地治安的核心。

二 肃正作战与治安工作概要

要 点

华北方面军在制订分发“治安肃正大纲”之前，即已按照该大纲的宗旨制订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由年初开始，推行各项治安肃正施策。于1939年2、3月间，肃正冀中地区，在该地区全面完成了分散部署兵力。3月上旬占领海州周围地区，打开陇海铁路的东方门户。同时在该地区扩大了分散部署兵力。7月对蒋系中央军，继晋南作战进行了潞安作战，在晋南一带扩大了势力。此外，各兵团逐渐扩大主要城市周围及铁路两侧的治安地区。至第三期末的1940年3月前后，收到了如下的成果。

蒙疆地区除在全区扩大势力之外，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后套作战，将治安区推进到安北、西山咀一线。

在山西省，晋西、晋南地区的山岳地带，虽有山西军及蒋系中央军的残余，东部省境仍有共产党各军存在，但平定了包括铁路两侧广大的晋中主要地区。在河北、山东及新黄河以东的河南、安徽、江苏省，除省境一部分外，采取分散部署兵力，基本上被我占有。敌较大部队仅残存于山西省

境及山东省东部地区。

这样，华北治安经过三期的肃正，与以前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进展。

1939年度的主要肃正作战，参看另表。

各项治安工作，随着肃正区域的扩大迅速开展，在1939年1月前后，仅仅限于铁路两侧数公里的治安地区，经过三期肃正，在蒙疆，全部县（旗）均已恢复了县（旗）行政；在华北的388县当中，已有312县恢复了行政。

为了恢复县政，复活了被破坏的行政组织，重建被毁灭的自卫组织，振兴产业，安定民生，整顿金融，复兴经济，以期民心之安定。进而恢复并重建交通、通信及运输，以利于开发产业，加强警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教育训练青少年，以期清洗抗日思想，早日恢复治安。一切措施皆以治安为第一，在军的领导下彻底施行。

在此期间，还促进了日本扩大生产所渴望的重要资源的开发，从而结合华北肃正建设，确立了日满华牢不可破的国防圈。

然而，自第二期以后，共军逐渐显著抬头，特别在第三期内，逐次蚕食蒋系军及杂牌军，迅速地扩大其势力。因而治安的恢复与其表面现象不同，一股隐患正在暗中滋长。

方面军针对此种形势，将1939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分三期施行。

第一期 1939年1月～5月

第二期 1939年6月～9月

第三期 1939年10月～1940年3月

华北方面作战区分一览表

自1938年12月
至1940年3月

作战名称	期 间	参加部队	说 明
冀中作战 (南号作战)	自1939年 2月2日 至1939年 2月20日	方面军 军 直 110D、27D 10D 12A 114D	歼灭在深县、南宫附近蠢动之敌，我军包围占领敌人之根据地冀县，在各要地部署必要的兵力，逐次扫荡四山游击之敌。
鲁西作战	自1939年 7月3日 至1939年 7月9日	方面军 军 直 14D、10D 35D 12A 32D、114D	扫荡鲁西地区内顽强进行工作的共军，战果虽然不大，但对鲁西各要冲配备了进攻的兵力，治安圈显著扩大。 (共军约2万)
晋东作战 (一号作战)	自1939年 6月10日 至1939年 8月25日	方面军 军 直 10D、35D 1A 20D、36D 108D、109D 4B	歼灭盘踞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中央军及朱德的共军，突破其坚固阵地，克服地形的困难，歼灭所在之敌。尔后以一部常驻潞安及沁源，扩大治安地区。 (中央军约8万，共军约2万)
太行山脉 肃正作战 (步号作战)	自1939年 11月11日 至1939年 12月7日	方面军 军 直 110D 驻蒙军 26D 2B 1A 3Bs 4Bs 9Bs	从涞源南方地区扫荡盘踞在阜平周围的共军，彻底烧毁其根据地设施。 (共军约2万5千)
东斋堂附近 扫荡作战		方面军 军 直 15B 驻蒙军 2B	扫荡盘踞在怀来南方长城线附近之共军，摧毁东斋堂附近的根据地。 (共军约5千)

	自1938年 12月18日 至1939年 1月10日	第一军 20D、 108D、 109D	歼灭盘踞在晋县、大宁附近的山西军，捣毁其根据地，使山西军战斗意志显著下降，收到战略上的极大效果。 (阎锡山指挥的5个师约1万)	
第	扫荡北部 山西军作战 (N号作战)	自1939年 3月1日 至1939年 3月22日	第一军 109D 3B _s 7FB (协)	扫荡山西省西北部的山西军及共军，同时展开积极的宣传及宣抚工作。 (山西军及共军约3万)
一	五台作战 (十号作战)	自1939年 4月16日 至1939年 7月4日	第一军 36D、109D 3B _s 、4B _s 10D } 7FB } (协)	讨伐肃清山西省东北部，特别是五台山周围的共军，尔后于要地驻兵，扩大治安圈。 (共军约645百)
军	扫荡潞安 周围作战 (寸号作战)	自1939年 10月2日 至1939年 10月9日	第一军 20D、109D 4B _s 3FD (协)	歼灭企图收回潞安平原而聚集于该地周围之敌，并夹击各处之敌，扫荡附近地区。 (中央军6个师约2万)
	东作战	自1939年 12月3日 至1939年 12月18日	第一军 37D 41D 108D 4B _s } 一部 9B _s }	敌人企图以山西南部为重点，展开冬季攻势，各战区与之策应，广泛向我攻击。我军以果敢的反击摧毁敌之攻势。
	苏北作战 (卜号作战)	自1939年 2月26日 至1939年 3月16日	第十二军 5D、21D、 114D、6B _s 华中派遣军的 一部、 第4舰队 } 协力	以切断敌人海陆补给为目的，占领淮阴、海州及附近的盐田，击破所在之敌，摧毁敌人鲁苏战区的基地。 (于学忠部下4万5千)

第 十 二 军	讨伐于学忠 作 战	自1939年 3月25日 至1939年 4月25日	第十二军 5D、21D、 114D 7FB (协)	击溃拟横断津浦线北进的于学忠军，敌人分散为小部队，夜间向山东省南部逃窜。
	鲁南作战 (牛号作战)	自1939年 6月7日 至1939年 6月25日	第十二军 21D 32D 5Bs	对盘踞在鲁南地区的于学忠、沈鸿烈军及共军，一齐展开进攻，击破顽强抵抗之敌，摧毁敌人游击根据地。 (敌约10万)
	鲁东作战	自1940年 1月29日 至1940年 2月15日	第十二军 21D 32D 5Bs 华中派遣军第 3舰队 (协)	为了全面肃清分散盘踞在鲁东道东部的大小匪团，部队向广大的正面分进，向东方压迫敌人，各部队适时封锁间隙，痛击各处的敌人。
	春季反击作战 (毛号作战)	自1939年 4月3日 至1939年 5月31日	驻蒙军 26D 2Bs KK	抢先反击敌之4月攻势，以粉碎其企图。各部队奇袭敌人将其包围，与败退的敌人主力发生遭遇战，或追击敌人，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蒙疆地区 冬季反击作战	自1939年 12月11日 至1940年 1月12日	驻蒙军 26D KK 2Bs 一部	作为冬季攻势的一环，邀击向包头及绥远方面各警备地区来攻的敌人，继续向其反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次 后套进攻作战 (巴号作战)	自1940年 1月14日 至1940年 3月1日	驻蒙军 26D KK 2Bs 27D 110D 37D 41D 3Bs 16Bs	为摧毁敌人的攻势企图，渡过黄河进攻伊盟地区，再转攻五原地区，击溃该地之敌。尔后，留蒙古军驻守，主力归还原地。

第二次 后套进攻作战	自1940年 3月21日 至1940年 3月31日	驻蒙军 26D KK	击破企图收回五原而来袭的 敌人。敌人掘溃五加河，使 附近泛滥，我军克服许多困 难，辗转归还原处。
---------------	------------------------------------	------------------	---

第一期肃正作战 (1939年1月～5月)

方面军在1938年11月19日完成了第十二军司令部的编制，12月2日接受了有关基本任务的大陆命第241号命令，随后由于增加了第五、第十、第二十七师团，因而，从12月中旬以后逐次改变各兵团的部署。在1939年2月中旬，又增加了已经编成的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奠定了治安肃正的基础，其部署情况如下：

一、第一军管辖地区

第一军的作战地区，限定在山西省内方面军直辖的京汉沿线地区。其兵力为三个师团（第二十、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警备京汉沿线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移防忻口镇以北（不包括忻口镇）的宁武东西地区。新编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归第一〇九师团指挥，担任太原周围地区的防卫任务。

二、方面军直辖地区

以河北省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为直辖区，兵力为四个师团（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混成第七、第八旅团）。

第二十七师团参加武汉作战以后，于1938年12月末调回华

北，在1939年年初，接替了第一一〇师团所承担的河北省东半部的防务及治安肃正的任务。

注：第二十七师团是在1938年2月13日以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改编的中国驻屯兵团为骨干，于同年7月20日在天津编成的，现又回到原驻地。

第一一〇师团，担任地区缩小到定县以北，以京汉及京古线为中心的河北省的西北方地区。

独立混成第七、第八旅团编成后，分别配属于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

第十师团参加武汉作战以后，从华中转来，担任定县、彰德间以京汉线为中心的河北省西南部的防务。

第十四师团，1月末随着骑兵集团移驻蒙疆，负责新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大部地区。

三、第十二军管辖地区

1938年11月下旬，第十二军于执行统帅权力的同时，命第二十一、第一一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负责管辖山东省全省及江苏、安徽省各一部地区。随后第五师团从华中转来青岛，于1939年1月10日隶属第十二军，使之负责管辖山东省东部。

2月中旬，独立混成第六、第十旅团编成，分别由第二十一、第一一四师团指挥。

四、驻蒙军管辖地区

1月10日骑兵集团（缺骑兵第四旅团）隶属于驻蒙军，因此，命第二十六师团移交包头及固阳地区。骑兵集团于第十二军司令部编成时，即归其指挥，担任河南省陇海沿线的警备，但由于变更隶属，从1月下旬至2月下旬之间移驻蒙疆，至3月中旬末，始完成负责地区的部署。

12月下旬，方面军根据第一期肃正计划，对所属各兵团下达任务如下：

一、驻蒙兵团继续执行原来任务，担任作战地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尤应确保察南要地，努力阻止匪军沿太行山脉向京津方向侵入。

二、第一军打击山西省北部残敌正规军，同时尽力扫荡同蒲路及正太路两侧。对同蒲以东的山地，从西方及南方掐断敌人的联络补给要地，通过封锁困死匪军。

三、方面军直辖各兵团

第十：第一一〇师团，各以主力肃清京汉路东侧地区，以其一部掐断通向京汉路西侧山地的要冲，协助第一军对山地的封锁。

第十四师团在其作战地区进行肃正工作，同时，以其一部扼住山西省边境。

第二十七师团，以主力肃清津浦路两侧地区之敌，以一部于津海道南部的津浦路东侧地区，支援该方面的第十二军的行动。

四、第十二军尽力肃清鲁北道及胶济、津浦两路沿线地区之敌，以一部占领莱州湾（旧黄河河口东侧）的要地，切断匪军的海陆交通补给。

第一期的肃正作战，趁方面军增强兵力的机会，在固定部署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肃清占领地区及邻近地区之敌，确保治安，为分散部署兵力打好基础，以期扩大治安圈。同时积极作战，切断敌人的交通补给，粉碎敌人的反攻企图。主要作战有山西南部扫荡战、苏北作战、春季反击战、对北部山西军扫荡战、五台作战等。（参看华北方面作

战区分一览表)

方面军的第一期肃正作战，收到了相当成果，据方面的“战时月报资料”记载，3月份管内治安状况大致如下：

第一、一般状况

一、敌正规军（蒋系军）的行动依旧不活跃，皆力图保持其驻防周围地区。敌人企图于4月全面展开攻势，3月末逐次下达命令。

于学忠军由阜阳方面向东北前进，月末在宿县西南地区，被尾高兵团（第十二军）击溃。

各处游击队的活动，因我军积极的讨伐，也逐渐被扼止，但数百名的匪团依然在河北平原到处蠢动。

在一般兵团或部队的连接处，依然成为匪团的安全地带。

二、国共关系在表面上似仍继续合作，但蒋介石尽力扼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国共双方的下层机构相互倾轧渐趋激化。

三、敌方抗日的民族意识，依然不容轻视，通过我军继续分散部署兵力，逐渐使民众对皇军的道义有所认识。

四、敌人对铁道袭击次数：京汉路62起，津浦路21起，正太路13起，共计112起（原文如此——译者），比前月减少32起。

第二、各兵团管区的状况

一、莲沼兵团（驻蒙军）管区

治安一般尚好，但管外邻接地区依然存在敌较强的正规军，不断伺机侵入管内，兵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攻势进行准备。

敌方各系统军队现况如下：

（一）正规军

侵入晋北地区西部长城线东侧地区的傅作义军的王子修及孟文仲部队，3月初受到配合梅津兵团N号作战（扫荡山西军作战）

的后方兵团（第二十六师团）的攻击，向长城线以西败退。傅作义及门炳岳军等接到程潜“4月下旬以后采取攻势”的命令，目前正在准备，傅作义已从兰州回五原。

（二）共军及共系匪军

盘踞在河北省东斋堂方面的共系匪团的一部约1,000人，分成三个梯团，从2月下旬侵入察南的中部，逐次渡过桑乾河，企图进入怀安西南地区。该部被常冈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谢家堡附近山中击退。灵邱方面驻有共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的主力，行动并不积极。

阴山山脉南侧地区的共军及共系匪团，目前虽不活跃，但通过群众工作正在扩大势力，该方面的国民党抗日匪团也逐渐受其影响。各地相继组成“战地动员委员会”，行动渐趋活跃。

（三）国民党游击队及抗日匪团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及察哈尔游击队，依旧分散在各地，阴山方面的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及第四路的一部共约1,000人，在大滩西方有与共系匪团合流的迹象。

第二战区第三游击队，在晋北地区浑源方面占有根据地，最近将其组织扩大为三个纵队六个独立支队，计16,000人，在察南晋北各地分散活动。

二、晋津兵团（第一军）管区

3月份的治安状况，由于N号作战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正太路北方地区的扫荡战，同时，在各地驻扎军队并进行治安工作，除河曲、偏关、岢岚方面以及五台山附近以外，在山西北部和平原地区治安有显著好转。

由3月中旬以后，敌正规军四个师从黄河右岸侵入山西南部，盘踞在潞安平原及中条山脉，有准备进行4月攻势的模样，开始活跃起来，但因我警备部队，尤其是中条山脉南部的牛岛兵

团（第二十师团）及谷口兵团（第一〇八师团）进行了先发制人的讨伐，到月末敌军并无大的活动。

敌军的状况如下：

（一）正规军

在中条山脉以内及其外围地区的正规军，以前由于我军扫荡作战曾受很大打击。其在4月攻势中的动静已如前述。敌人一向惯于反复袭击平原交通线，特别是对铁路进行袭击，由于警备队的积极努力并占领交通线附近要点，而有所减少。但是，敌人为了配合4月攻势，预料此种袭击活动将再次积极展开。

（二）山西军

在N号作战以后，敌人行动极为消极，仅在黄河两岸地区苟延残喘，但其保安队则仍分散在各地。

（三）共军

在正太路南北地区有活动模样，共军的内部活动渐趋深入细致，特别是朱德所在的晋南方面，由于工作很彻底，收集敌人的情报十分困难。

三、尾高兵团（第十二军）管区

3月上旬，继上月海州方面的肃正作战，下旬又在宿县及其西南方地区击溃了从阜阳方面东进的于学忠军，治安圈有了显著扩大。

四、井关兵团（第十四师团）管区

3月中旬以后，彻底实行分散部署兵力，经常搜寻敌人，不断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治安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作战地边界附近，特别是北部山地及其西方与西南方地区，敌人从3月下旬逐渐活跃起来，估计将出现全面的游击活动。敌情如下：

（一）正规军（蒋系军）

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主力放弃温县北方根据地，移驻清化县

北方山地及焦作东北方山地，企图东山再起。

骑兵第四师遭受我军肃正作战的重大打击，改编为新编第二十四师，移驻辉县西北地区企图反攻。但据俘虏讲，大部敌人没有战斗意志，希望投降。

孙殿英军从泽州附近，经过陵川，渐向林县方面移动，企图在彰德方面活动。

第一六六师从孟县地区向阳城方面移动。在黄河南岸的第一九六师向济源附近移动。庞炳勋部队从黄河南岸经垣曲向晋南地区移动。

（二）共军

在辉县北方山地及怀庆西方山地的共军，仍为属于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系统的部队。

（三）游击队及匪团

大部分以行政干部为队长，一部分由正规军直接指挥，但丧失战斗意志，希望投降者逐渐增多。

铁路破坏总队，在太行山脉拥有根据地，由少数人组成破坏班，秘密挺进，企图破坏铁路，但由于师团分散部署兵力，在3月份铁路破坏事故急剧下降。

五、桑木兵团（第一一〇师团）管区

各部队主要扫荡平原方面的残敌。在此期间，兵团直接指挥满城北方大册河河谷及白洋淀附近的作战（中号作战），大致完成了对管内平原地区的扫荡。同时，治安工作也有进展。平原地区的匪团主要活动于管内东方边界附近。此外，还有潜伏的便衣土匪继续到处活动。敌人的政治工作仍很强，山地方面的匪势不可低估。

六、本间兵团（第二十七师团）管区

兵团依据第一期肃正计划，3月的肃正讨伐重点依然针对南

部地区。在此期间，对其它方面的匪团也继续进行讨伐，逐渐收到成效。月末占领了管内全部县城及地方交通、经济的要冲，完成了部队的部署，有组织的匪团已不存在。但是，在新占领的白洋淀周围及接近作战地区边界地方，由于共军的抗日共产政策，致使居民逃避，交通通信被破坏。这些地方治安的恢复尚需相当努力。

七、滦州兵团（第十师团）管区

兵团继2月上旬在冀统辖下的南号作战，展开了全面讨伐，尽力剿灭鹿钟麟及石友三军的败残匪团，尤其对石友三军，积极搜捕使之溃乱。敌人败残部队逐渐逃往山西。以后我军施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各种肃正工作，管内除濮阳、内黄、清丰、涉县、林县等五县外，均已占领。新占领地区为多年来共军的根据地，赤化思想很深，因此，各地区的部队以忘我工作及积极的讨伐克服困难。盘踞在京汉路西方地区及滹沱河河谷的共军与晋察冀军的行动已不甚活跃。

第二期肃正作战

（1939年6月～9月）

4、5月时，方面军由于新编的四个师团派往华北，命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前田治中将，4月下旬到济南）担任新乡附近及其以西河南省的防卫；命原来担任该地防卫的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井关隆昌中将）担任该地以东及新黄河以北河南省的防卫；命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鹤男中将，4月末到太原）接替第一〇九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平田健吉中将，五月中旬到运城）接替第二十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命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二师团

(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5月中旬到济南)担任第一一四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卫。

考虑对苏战备，调回在华常设及特设师团，并派遣新编师团与之接交，继续进行战备。此外，与诺蒙坎事件相关联，以一部兵团调往满州，进行准备。7月，大本营命令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归国。9月，命令第十四、第一〇九师团归国。(注：第十四师团归国，延期到11月中旬以后)又在9月派遣第五师团去满州。

7月，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五旅团归属于方面军，9月，骑兵第四旅团复归方面军司令官指挥。

随着以上兵团的转出转入，方面军命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负责以北京为中心的燕京道，命第一一〇师团负责保定道及第十师团的旧作战地区，同时命原先归第十师团指挥的部队(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一〇九师团的一部)及新编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归第一一〇师团指挥。将第一一〇师团负责的涞源县归入驻蒙军的作战地区(行政依然归河北)，调回的骑兵旅团，归第三十五师团长指挥，命其防卫归德附近陇海路沿线。

方面军于5月下旬，指示第二期肃正计划，命各兵团彻底施行分散部署兵力，继续积极进行讨伐，同时利用兵团调动的会合期间，肃清潞安平原、山东省西部及东南部的国共两军，摧毁敌之策源地。其主要作战有鲁西作战、晋东作战、鲁南作战等。

通过第二期肃正计划，到期末的9月，在“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中，关于敌情及治安状况有如下的记述。

第一、一般状况

在山西省东南部地区，我军一号作战（晋东作战）结束，参加部队刚刚归还原驻地，敌认为日军败退，立即在潞安周围集中兵力，不顾我军屡次反击，声称要夺回长子及壶关，我军对此正准备予以扫荡。

阎锡山军未见有大的活动。

黄河及新黄河以南的京汉路西侧地区的敌人，乘我兵团移动之际，开始积极活动。因此，军在整顿兵团之前，拟先粉碎该敌，于是命井关（第十四）、前田（第三十五）两师团，对敌进行扫荡。

随着最近世界形势的变化、蒋政权内部和平运动的高涨，以及汪新政权的即将成立等，敌军及抗日分子的动向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国共矛盾的激化，加以汪系的策动，敌方内部斗争更加尖锐，因而近来投降归顺的匪团突然增多。

对天津水灾的紧急施策，通过本间兵团及天津日华机关的极大努力，已取得成效，逐渐恢复原状。

第二、各兵团管区的状况（笔者略）

1939年9月间华北方面军综合战果（据战时月报）

兵 团	区 别	交战次数	交战时 敌方兵力	敌军损 伤		我军损 伤	
				遗弃尸体	俘虏	战死	战伤
驻蒙军		61	5,639	524	44	16	4
第一军		365	71,165	4,075	674	194	196
第十二军		447	85,228	5,345	394	105	201

直 辖	第十四师团	45	18,600	476	52	37	97
	第三十五师团	134	17,564	447	29	16	44
	第一一〇师团	225	37,843	2,142	373 (774)	90	167
	第二十七师团	169	19,891	677	126	6	25
	独立混成 第十五旅团	44	7,400	201	10	10	15
	计	1,265	263,330	13,887	1,704	462	1,061
备 注		() 内的数字为投降者					

笔者注：从上表可以看出，（一）在华北某些地方，每日平均有42次交战。（二）给与敌方的损伤平均每日遗尸约460具，俘虏56人。（三）我军损伤平均每日战死15人，负伤35人。

另据陆军报道部发表的从中国事变爆发至1939年9月，双方死亡数字如下：

敌方遗弃的尸体（仅为目睹者） 1,120,289

日本方面（陆军）战死者 65,758

第三期肃正作战 (1939年10月—1940年3月)

9月，在南京设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华北方面军隶属其下，但方面军的任务未变。

大本营于10月将第四十一师团、11月将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编入第一军的战斗序列，命该军的第二十及第一〇八师团调回朝鲜及国内。又于1940年1月改编骑兵集团，2月编入两个骑兵联队以增加其战斗力。

第一军使第四十一师团(师团长田边胜武中将，10月23日

到临汾) 担任原第一〇八师团作战地区的防务，使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担任平遥、汾阳、离石地区的防务。由于第二十、第一〇八师团调回国内，使第三十六师团担任以潞安为中心的山西东南部的防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战为：潞安周围的扫荡作战、太行山脉的肃正作战、冬季反击作战、后套进攻作战等。由于共军势力广泛渗透、顽强进行活动，我各部队对其警备地区周围，经常反复进行肃正讨伐。

在此时期，国民政府军的冬季攻势，表现了从未曾有过的战斗意志。

在本期末，中国军的状况将在下一章叙述，在此仅就11月前后的显著动向记述如下。

方面军在1939年12月初，召开情报主任会议，根据世界形势的剧变(9月1日德军开始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16日日苏签订诺蒙坎停战协定，17日苏军进攻波兰)，并就中国的一般政情与华北方面的敌军动向，以及西北通道等问题作了说明，其中对华北方面的中国军状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周围的国民政府军，只要情况无大变化，仍继续采取消极抵抗，避免消耗战斗力。目的是要扩充实力，在其占领地区内，努力培养和扩充军政党一体化的抗战力量。

二、观察国民政府军的内部情况，其士气之低落自不待言，但也不能认为很快就会丧失抗战意志。

三、华北共军的配备状况

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

在山东方面，其势力更加迅速扩大。山西、河北的共军，过去是以扰乱我军后方、消耗战力、牵制我军行动等为目的，只是趁机进行游击而已。但是，最近他们接受的任务，规模既大而且行动积极，其情况如下：

- (一) 全面加强以西北根据地为中心的共产党阵营。
- (二) 在汪政权及华北特殊地带成立以前开展的游击工作，应加以推进。
- (三) 乘机进入冀东地区，切断京山铁路。
- (四) 加强与冀南解放军的联系，切断京汉、津浦两铁路，占领冀南各县。

四、在河北各地，国共纠纷不断发生，显示中共势力的猖獗。中共使地方自治组织共产化，蚕食国民政府行政机关，进而向国民政府军队内部伸张势力，并拉拢吸收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及土匪。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华北方面军对于中国西北，即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的共产化，极为关心。为了防止共产化，除收集各种有关情报外，从1939年以来，曾想尽各种谋略及措施。方面军在前述情报主任会议上，对中国西北状况有如下的说明：

一、在陕西方面，中共势力逐渐巩固，国共均势渐渐发生破绽。

二、回教军对苏联势力及国民政府方面的怀柔政策，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其动向与我军的谋略有最深刻的关系。

三、从苏联中亚运来的援蒋军需品渐渐减少，但另一方面沿西北通道正在逐渐加强军事设施，积极发展工业。诺蒙坎停战协定

签订后，外蒙南部兵力增强，并派出党的得力干部和工作人员，看来是在策应西北工作。

四、兰州是中国西北赤化的策源地，实际上，是西北特别区的首府。已经进驻的苏军步兵超过2,000人，技术部队及政治部工作人员等约有1,000人，飞机约达150架。其它各类特种机关、兵工厂、燃料库、飞机场等，早已完备。现在陆续建筑工厂及军用住宅。为了避免我军的轰炸，上述设施均分散郊外，同时正在大规模地构筑坑道。在新疆省，从哈密开始，由猩猩峡至迪化之间，沿途各地驻有苏联军队。

军需品的运输极端保密，故数量及品种皆不得知，但运输量估计并不大。

五、通过中苏贸易协定，苏联企图垄断西北地区的贸易。这对我国在蒙疆地区的西北贸易将有很大影响。

在肃州（今酒泉——译者）附近着手开发煤矿和油田。汽车修理厂及其它工厂设施也正相继进行建设，建筑材料的运输也很繁忙。

由苏联境内阿亚古斯到塔城间的铁路建设已经完成，现在又向迪化（今乌鲁木齐——译者）延长铺设。新疆省内的旧骆驼道路现正改修汽车路，预计年内可以竣工。

六、西北共产地区，是以苏联的支持为背景，如果英法支持的重庆政权一旦破灭，将来可能在此留下抗日动力，与此直接接壤的方面军，今后需要对之采取万全对策。

三 各方面的肃正作战

五台作战（1939年5月8日——6月25日）

在山西省，除阎锡山的山西军外，蒋系中央军也进入该

地，频繁活动。同时，中共势力的扩大也不可轻视。第一军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方面军从1938年12月中旬开始行动以来，首先扫荡了蒲县、大宁县、吉县附近的南部山西军，继而扫荡了太原西北地区的北部山西军及共军部队，重新在神池、静乐附近驻扎，以图恢复治安。于此，对西部地区实施扫荡之后，即进行五台作战，现将此次作战开始前的状况概述如下。

五台山及其东部山岳地带，东西约15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这一地区，日军从未驻兵，因而成为中共势力的巢穴。1938年秋，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过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因而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五台山附近是隶属于第一军的第一〇九师团的作战地区，该师团从1938年秋起，便在五台、东冶镇附近各部署了步兵一个大队。与此邻接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1939年春，从京汉线沿线地区移驻到北部同蒲路沿线地区后，在大营镇——繁峙间、崞县——代县间及原平镇附近各部署了一个步兵大队，另外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石太路以北地区，部署了一个步兵大队。

新归属于第一军的第三十六师团，从4月末逐次到达太原附近。方面军为了使其接替第一〇九师团的防务，先令第三十六师团集结于第一〇九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准备换防。同时，从第一〇九师团抽出一部兵力，作为军的直辖部队。

作战指导 第一军（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根据方

方面军的计划，在“5月上旬至6月下旬，以一部兵力扫荡盘踞在以台怀镇及洪家寨为中心的五台山山岳地带之敌，尔后在其要地驻兵，对该地带进行彻底肃清”的方针下，将作战分四期进行，4月18日对有关兵团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

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第一期（5月8日开始约五天）

以第一〇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部队，包围歼灭台怀镇之敌。

第二期（5月13日开始约三周）

以前期作战部队从五台、台怀镇一线及原平镇、代县、沙河镇一线，夹击西部五台山地之敌，并在各要地驻兵。

第三期（6月上旬末开始约一周）

以第一〇九师团的部队，于石咀、台怀镇一线附近准备前进，在龙泉阁南北线之间进行扫荡。

第四期（6月中旬开始约两周）

以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部队在五台、东冶镇及盂县、上社镇附近准备前进，以扫荡洪家寨附近滹沱河河谷之敌。

作战经过概要 方面军于5月1日下达了有关发起作战行动的命令。各期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第一期（台怀镇附近的扫荡）

第一〇九师团佐佐木支队（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5月8日从五台、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加纳部队（步兵一个大队为基干）9日从大营镇分头开始行动，控制五台——河口村——石咀道路及大营镇——口泉村（石咀东北约20公里）道路，切断台怀镇附近

及其以东敌之退路。

10日佐佐木支队及加纳部队之一部，向台怀镇分进，压缩包围圈，但未遭遇大股敌人，11日占领了台怀镇。

尔后，佐佐木支队沿五台——台怀镇道路，驻守各要地。加纳部队主力由来路返回大营镇途中，于口泉镇东北地区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因而转进上细腰间方面。但于该地附近，再次与优势之敌遭遇，我方不断出现伤亡。14日，会同从沙河镇前来增援之部队，将敌击溃，15日回到大营镇。

第二期（扫荡西部五台山）

方面军决定大体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作战。5月15日命令第一〇九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进行第二期作战。

18日，第一〇九师团以约六个中队兵力，从河边村、东冶镇、瓦厂、台怀镇各地，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以步兵各约两个中队为基干的部队从原平镇、代县、繁峙分头开始行动，从四面八方一齐进行扫荡，但未遇大股敌人。于是，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各队20日回归原驻地；第一〇九师团在主要地点留驻一部兵力，21日结束了第二期行动。

第一〇九师团将作战地域防务移交给第三十六师团，5月22日交接完毕。

第三期（扫荡龙泉阁）

5月22日，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六师团实行第三期作战。

第三十六师团笠原支队(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6月4日夜从台怀镇出发，途中击溃一部敌人后，5日到达石咀。其后分为三个纵队前进，在攻击龙泉阁的同时，另以一部进至其东部地区，企图切断敌人退路，但敌主力已向东方远逃，部队在其附近一带进行扫荡后，于6月8日回归石咀。

第四期（扫荡洪家寨附近）

在本期作战中，决定第十师团以步兵约两个大队为基干，通过滹沱河河谷向小觉镇进攻，协助第一军作战。方面军于6月16日按照原定计划，命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进行第四期作战。与此同时，关于作战路线，指示第三十六师团以东冶镇——洪家寨道路及五台——十里铺（洪家寨北方约20公里）道路为基准、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以关头村（上社镇东南约30公里）——小觉镇道路及车轮村（上社镇东方约15公里）——洪家寨道路为基准，并规定6月19日从东冶镇、五台出发，20日从关头、车轮村出发。

第三十六师团，19日分成三个纵队，右纵队（步兵两个中队、山炮一个中队为基干）由东冶镇经南庄道路，中纵队（步兵六个中队、山炮一个小队为基干）由五台，左纵队（步兵一个中队、山炮一个小队为基干）由南大贤（五台北方约5公里）分别向洪家寨前进，22日会合于洪家寨。其间，中纵队与左纵队曾于耿家庄附近，攻击了据守该地南北高地之敌，使其向东溃逃。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于6月20日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步兵三个中队为基干），左纵队（步兵三个中队为基干），同时向清水口（洪家寨东方约5公里）前进，于21日两纵队合击占据清水口北方高地之敌约200人，并将其击溃。

第十师团的一部，17日到达洪子店（小觉镇东方约25公里）南北一线，尔后分成两个纵队前进，途中击溃小股之敌，22日到达小觉镇，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取得了联络。

当时第一〇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的回忆如下：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当时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后为大佐）的回忆如下：

一、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拥有根据地，曾经认为可以逐步判明其情况。但是，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二、虽然采用在满洲施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四、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部队，均过于笨重，因而无法追踪行动轻快的共军。

鲁南作战（1939年6月7日——6月25日）

敌情及作战准备概况 鲁南地区（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山东省东南部地区）自徐州会战后，因日军未曾驻兵，致使石友三、沈鸿烈（原青岛市长）等国民政府军在该地占有势力。于学忠任苏鲁战区司令官后，与共军共同在山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国民政府军第五十一军自4月上旬以来，分成小部队通过我警戒网，进入沂水、莒县、诸城附近。第五十七军在苏北作战时败退到诸城，但从4月下旬，又进入蒙阴、沂州以北地区。沈鸿烈指挥下的保安队、新编师等，部署于上述正规军的外围地区。共军的山东纵队则以泗水地区为根据地。估计泰山山脉以内中国方面的总兵力，包括正规军、杂牌军、共军共为五万——七万人，结成联合战线，以图再起。

第十二军决定剿灭上述中国军队，并对该地区进行肃正，乃以第五师团为基干，并增加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各一部，从6月上旬开始作战。

作战经过概要 各部队于6月4日从沂州、太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邱、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冒酷暑突破泰山险阻，到处击溃敌人，并直向莒县、沂水附近进攻。

9日，从北部进攻的部队占领莒县、沂水，从西部及南部进攻的部队，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压缩包围圈，击溃了各地之敌。

敌部队企图避我攻击，向沂水西部山地、日照附近、蒙阴南方云蒙山逃遁。我方各部队穷追败敌予以严重打击。

方面军从6月15日进一步增加兵力，攻击正在沂水北部山地集结之敌，同时攻击云蒙山敌人，使其溃乱。更于25日包围攻击集结于蒙阴北部山地之敌，取得了战果。

当时的第十二军参谋松田正雄大尉（后为中佐）对此次会战回忆如下：

一、本作战是第十二军根据自己的意图而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摧毁在我方驻地外围附近蠢动的敌游击据点，同时，在进攻地区的要地部署兵力。

二、敌主力为国民党系统部队，估计不会具有较强战斗力。由于敌人的战术是以游击战为主，我方则采取彻底的分进合击的方式指导作战，在所有道路上埋伏小部队，大张罗网，然后压缩包围圈。

三、空军部队在本作战中，特别紧密地给以合作，但为了使分进部队便于按规定的计划进行活动，曾要求其将重点置于搜索和联络方面。

四、作战期间，正值酷暑，第一线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作战，在局部取得了相当战果。特别是第五师团长今村均中将，于作战结束后，仍长时期留驻于沂州附近，期使扫荡完满成功。对此，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中将也十分赞许。

五、作战结果，在短期内未曾出现铁路事故等，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游击根据地又形复活，并开始在胶济路、博山路方面进行活动。

通过此次作战，看来，国民党的游击据点已被扫清，并且没有由共产党取代的迹象。

鲁西作战（1939年7月3日—7月9日）

鲁西地区（津浦路以西山东省西部地区）自徐州会战后，虽屡次实行扫荡，但因我部队未曾驻兵，其治安恢复极差。特别是由于共军的侵入，已可判断赤化工作正广泛深入地渗透到该地。

方面军决定剿灭该地区共军及其匪团，杜绝其活动的根

据，以扩大治安圈。为此，命第十二军及方面军直辖兵团，于7月上旬进行了扫荡作战。

本作战由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第十四师团主力及第十、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以及由第十二军的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参加。

负责南部地区的第十四、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的各部队于6月末开始行动，相继攻克了城武、定陶等敌根据地。北部地区的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各部队于7月初开始行动，南北呼应，对鲁西一带进行扫荡。

当时担任邻接鲁西的河南省治安肃正作战的第十四师团长井关隆昌中将，在复员后的上奏书中，对该地区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师团于1939年5月中旬，将河南省北部（指旧黄河以北——笔者）的治安警备任务移交第三十五师团，将主力移驻于河南省南部（旧黄河以南，新黄河以东——笔者），司令部设于开封，直至回国（同年12月19日由青岛起航——笔者）前，担任该地之警备。在此期间，特别对河北、山东、河南省境附近残敌，予以歼灭，并粉碎敌人由新黄河沿岸进行游击的企图，以分散部署于各要地的警备部队，经常地反复进行讨伐，多次进行由师团长指挥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一扫管区内的残敌和匪团。另外，恢复自卫组织（指伪军——译者），奠定了治安的基础。

驻蒙军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一、1939年度驻蒙军的治安肃正概要

驻蒙军根据方面军的计划制订的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努力促进占领地区内的安定。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期，

还实行了对管区外的太行山脉肃正作战、五原进攻战等计划外的大规模作战。另外，由于诺蒙坎事件的刺激，加强了对苏、对外蒙的戒备。

首先，在第一期中，骑兵集团划归方面军后，于三月上旬，使之接替了第二十六师团及蒙古军在包头、固阳、萨拉齐地区的警备任务。各兵团为了扩大治安圈，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肃正讨伐。但是，共军以内长城线山岳地带为根据，逐步增强其部队的战斗力，而我方仅以小部队进行奇袭的战法，往往不能应付。另外，为了摧毁敌根据地而实施的长期间、广范围的作战，使用大队以上的兵力进行，实为必要。（注：4月，在国民政府军发动春季攻势时，我军先发制人，以春季反击战粉碎其春季攻势。）

在第二期中，努力肃清内长城线山岳地带之共军及阴山山脉国民党游击队和匪团，同时谋求扩大治安地区，完成部队的分驻。于8月将安北及涞源县划入方面军的作战区。安北是在4月春季反击战时即行占领，由骑兵第十四联队担任了该地的警备。涞源县的防卫任务（不包括行政），8月20日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接替了第一一〇师团。由涞源通往保定一线的南部地区，治安极差，主要利用由涞源通往北方的道路。从而，主要以地形上的理由，将其划归驻蒙军的作战地区。

进入第三期时，管区内的治安肃正工作大有改进，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对管区外实行了大规模的肃正作战和进攻战。

以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行动为中心，记述如下：

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肃正讨伐

1. 谢家堡附近的讨伐

旅团于1939年度上半年，为了肃正涿鹿、怀来、蔚县，前后6次进行了谢家堡讨伐作战。谢家堡位于接近涿鹿县南境的内长城线以北地区，是在北拒马河上游山岳地带的共军根据地。为了逼近谢家堡，旅团除进行上述讨伐外，各部队相继击破敌人据点，推进驻兵地域，对抱有敌意的居民施行怀柔政策，努力扩大治安区，进而摧毁其根据地。

再者，军于进行“春季反击战”之际，旅团曾实行“宣、涿、蔚三县附近肃正作战”，以期改进管区内的治安。

2. 灵邱周围的讨伐

旅团于1938年10月进驻灵邱县，至同年底连续进行三次讨伐。但是，因该地区是接近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心的根据地的一部，尤其是灵邱南部山区是以上寨、下关镇为根据地的共军势力范围，故肃正工作极为困难。其村政权是由党所领导，居民从儿童到老农都彻底受过抗日教育的训练，壮年男子被征参军，各个村落均设有训练所。

1939年6月初以来，共军的行动转趋活跃。不仅在灵邱县，即便在浑源、应县也在农民中强制征兵，企图扩充部队。同时，尽力组织各地居民，建立游击队，整备通讯联络设施。因此，旅团必须摧毁其策动的根源。7月，进行了下关镇附近的肃正讨伐，但因雨未获成果，仅扫荡了灵邱以北地区的土匪。

10月，当旅团将灵邱地区防务移交给第二十六师团时，利用兵力会合之际，与该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协力，再

次对下关镇附近进行讨伐。24日开始行动，28日凌晨急袭下关镇，但共军早已退避，未曾发生大的战斗，摧毁各种根据地设施后，于30日返回灵邱。（注：灵邱、涞源县将是确保治安极为困难的地区）

3. 涞源县的警备

1939年8月，独立步兵第四大队移防涞源县。20日，与第一一〇师团的该地警备部队进行了接交。

涞源县，以内长城线分为南北两地区。南部地区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大部分为山地，故道路险恶，尤其是山区内道路两侧，悬崖峭壁较多。共军利用地形，经常伏击我运输部队。因此，地形险峻的南部地区的道路，由于治安不良不能通行。在北部地区，运输联络也必须严加警卫。

当地居民大部从事农业，但因产量不多，贫穷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困难，我县行政威令仅能及于驻扎地周围与主要道路附近。与此相反，中共势力则早已渗透全县。杨成武指挥的共军独立第一师即在该县编成，居民和士兵间多有亲友关系，互相保有深厚感情。因此，我警备部队在其军、政、民一体的敌性地区中，仅能保持着点与线的状态。

4. 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

旅团于1939年秋以来，对管区内东部及南部山地，彻底实行了肃正讨伐，同时，促进实现各项建设措施，以图强化治安。10月10日，旅团发布的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如下。

1939年度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

第一 方针

一、本期肃正旨在扩大第二期肃正之成果，同时实现军政民一体，期使治安日益加强，从而进一步促进切实可行的建设措施具体化。

二、工作要点，对东部及南部山地，为了扫荡共匪巢穴，应以武力讨伐肃正为主，对其它地区，为实施各项建设措施，应以一般肃正工作为主。

三、加强、扩充地方警备机关，与促进治安工作相结合，于期末基本上能以实施中队的集结为目标。

四、本期自本年10月至1940年3月，为期6个月。

第二 要领

其一 军队进行的讨伐肃正

一、各警备队之部署大致不变。

二、各区警备队仍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在东部及南部山地内结合修筑道路，将一部兵力向前推进，分驻于内长城一线，防止匪贼入侵警备区，同时以之作为扫荡共匪之据点。为此，其一部兵力分驻如下：

1. 怀来区警备队 谢家堡附近

2. 蔚县区警备队 倒水口附近

3. 涞源区警备队 独山城及东圈堡附近

三、东部及南部山地地带的讨伐，除由原来负责的警备队进行外，随时以旅团主力进行讨伐。

四、对其它地区出没无常之敌，应不失时机地由各分散部队自行出动讨伐，以期促进一般治安工作。

五、各分散部队，应尽力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更需注意与邻接部队的联络和协力，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

其二 一般治安工作及新秩序建设措施

一、要领

地方警备机关的活动及一般治安工作，必须与军队的讨伐密切结合，同时加强警备用的道路及通信设施，以使居民安居乐业，促进和平建设。

二、关于地方警备机关

1. 对政府警察机关及铁路局路警，进行指导训练，以期提高其能力，使之逐渐能以独立进行讨伐，确保治安，并能胜任铁路的守备。

2. 警备机关之配置，必须适应治安状况。应做到期末进行中队集结时，在确保治安上，也不得发生任何差错。

3. 对自卫团，随着警察机构的增强，逐步进行整顿，以期提高其素质。同时，尽量收回民间枪械，并减轻居民的财物负担。

三、对东部及南部山地内之共军有关粮秣的处理

1. 为确保农民所有粮秣，不被匪团利用，责成政府有关机关，将村民收获的粮草运往安全地带，加以管理。必要时，可派遣军队进行保护。

2. 进行第一项措施时，尚须保护其它地区的粮秣不被掠夺，并严加监视向山地内运入粮秣物资，绝对防止共军获得粮秣。

四、户口调查及民匪分离

严密实行户口调查，并在各户安设门牌，以防止残匪尤其是匪首的潜入，而且便于搜查。特别是冬季旧正月前后，更应注意实行。

为了防止匪贼潜入，提高宣传、宣抚效果，应努力作好民匪分离工作。

五、关于青少年的训练

对青少年应加强训练，以期提高其素质，并尽力对受训者进行表扬和利用，从而通过此等青少年，促进一般人的思想觉醒。

六、警备道路、通信设施的整备

在修复被水灾破坏的道路的同时，应迅速修筑下列各道路。

1. 察南管区内

- (1) 西河营—王喜洞道路
- (2) 明铺—王喜洞道路
- (3) 攀山堡—柳树王—太平堡—谢家堡道路
- (4) 桑园—沿河城道路
- (5) 永宁—大庄户道路
- (6) 延庆—对九石道路
- (7) 蔚县—端骨町—阳原道路
- (8) 北水泉—瓦窑庄道路
- (9) 西河营—永宿—洞沟道路
- (10) 永宿—倒水口道路

2. 涞源县内

- (1) 上庄—东圈堡—洞沟道路
- (2) 涞源—腰站道路
- (3) 涞源—牌坊—独山城道路

七、宣传、宣抚及救济抚恤工作

1. 方面军及政府均应熟悉治安的恢复状况、各种建设的进展实情、民生向上的真相等，藉以抵制敌方荒唐无稽的反宣传。适当地作好抚恤工作，尽量收揽民心，使之依附日本，造成支持新政权的形势，从而提高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志。

2. 利用飞机散布宣传文件，并于出动讨伐时，配备宣抚班随行，相机作好战地宣传工作。

5. 涞源县南部地区的讨伐战（1939年10月31日—11月8日）

旅团根据前述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企图肃正涞源县南境方面的共军地区，于11月上旬，对该方面进行讨伐。当时，盘踞在该地区的独立第一师、游击第三支队等，似以走马驿镇、倒马关、银坊、乔家河附近作为根据地。

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于10月下旬对灵邱方面进行讨伐以后，率领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大队长：辻村宪吉大佐）到达涞源，当即命令担任该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大队长：堤赳中佐）进行讨伐准备。

31日，旅团长作了必要的部署：“堤讨伐队从插箭岭，首先对走马驿镇之敌，辻村讨伐队从白石口，首先对银坊之敌，分别进行袭击，11月2日半夜以后，开始行动。”

两讨伐队2日半夜，从长城线出发。辻村讨伐队3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

3日午后，旅团长得知雁宿崖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增援辻村讨伐队。但是，共军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于4日凌晨前，即已撤离战场。

5日，旅团长判断“敌主力已向司格庄方面退走”，决定“迅速追击敌之主力，并将其捕获”。于是命辻村讨伐队为前卫，并部署其它各队，准备6日早出发。5日晨，新调入的独立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中熊直正中佐）主力到达该地。

6日晨，旅团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前进。途中驱逐小股敌人后，于同日黄昏，进入黄土岭村落。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

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作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浓雾弥漫，遮蔽了视野。

7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

16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尔后，各讨伐队各自继续战斗，将所在之敌击溃，于8日午后，占领了黄土岭一带高地。同日黄昏，独立第三大队长绿川纯治大佐到来，担任旅团的指挥（后称绿川支队），并对附近进行了扫荡。但是，在战场上，始终未发现敌人。各队损失虽然轻微，但苦于缺乏弹药粮食，只是受到空中的补给。9日夜，独立步兵第五大队（大队长：森田春次中佐）到来增援。其后，支队在军的指挥下，为彻底肃正讨伐，进行了作战准备。

与我交战的共军，是以独立第一师第三团、独立第四师第二团、教导团等约5,000人为主力的精锐部队。

三、太行山脉肃正作战（1939年11月11日—12月7日）

在驻蒙军中，阿部中将战死的消息，引起对事态的重视，从而对旅团努力加强了各种增援、补给措施及侦察联络。

在此以前，第一一〇师团为了策应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讨伐，于6日，派二个支队从唐县、完县（保定西方）出动。10日，其一支队进至银坊附近，与绿川支队取得联络，另一支队进至梁岗（完县北方约45公里）附近。此外，以第二十六师团编成的石黑支队（支队长：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队长石黑岩太佐），也于同日逐次到达涞源附近。因此，驻蒙军决定“与第一一〇师团协力扫荡银坊、走马驿镇附近的残敌”，并于10日午后，作了必要的部署。但是，方面军改变了趁本次讨伐之机实行大规模肃正作战的决心，10日傍晚，对各兵团下达了命令。其设想是“驻蒙军首先对涞源县东南地区，继而对西南地区，第一一〇师团（配属第二十七师团的一部）对满城北部及阜平地区，分别进行肃正讨伐，第一军的一部，从五台方面进行策应”。这一计划是想要彻底摧毁华北中共势力的最大根据地，实行长期的讨伐。

驻蒙军以军参谋长为首的战斗司令部（设于涞源），进行了作战准备。当前的共军扩大了监视网，并以一部经常扰乱我军后方，但其主力的动向不明。

当时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为了实行与本作战密切结合的政治工作，曾于涞源县设置办事处，进行了民情调查、宣传宣抚、警务组织等各项准备工作。

11月16日至19日，对涞源县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但各队均未遭遇大股敌人。

23日，开始第二期作战，25日，占领了共军根据地阜平。共军回避交战，分散隐匿而退，其主力似向山西西部方面退却。各讨伐队因地形险恶行动迟缓（行军时速，平地约

3公里、山地约2公里、夜间减半），不能捕获敌人。除将兵工厂、被服厂、粮秣屯积处、印刷所等全部焚毁外，并没收了文件及纸币。对残留的居民，进行了宣抚工作。

28日，由于敌情变化，发现有强大的共军部队在东部地区出现。方面军遂变更计划，命令驻蒙军与第一一〇师团对完县北部刘家台地区进行扫荡。因此，各支队停止西进，开始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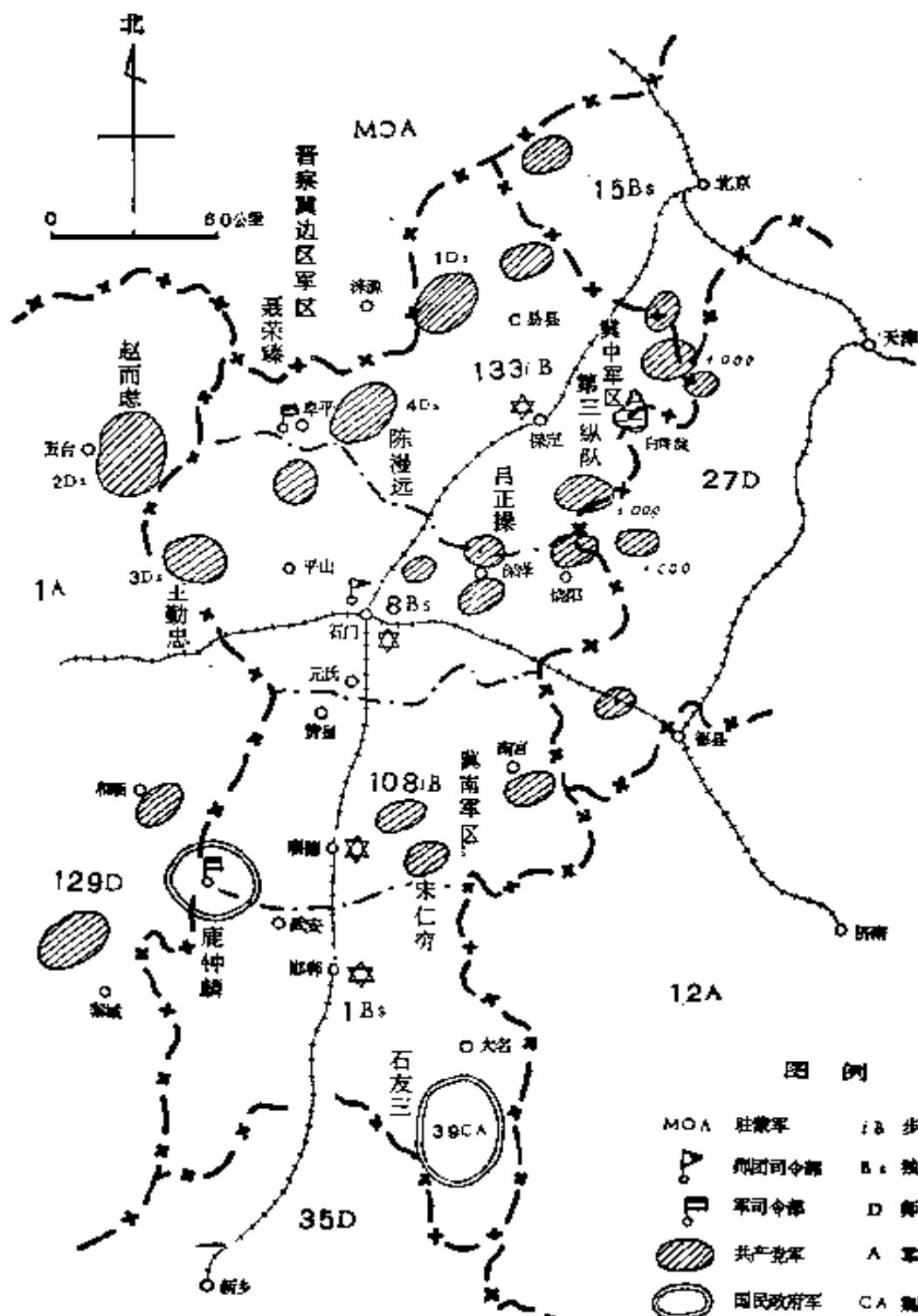
30日以后，作战进入第四期。每当各支队进攻时，共军便立即退避不与我交战。因此，各支队彻底破坏了根据地设施，于11月7日，逐次返回原驻地。

注：石黑支队为了6日返回驻地，当走出山地将要乘车时，受到尾追共军（约300名以上）的攻击，支队对此予以严重打击，使敌人溃逃。在为期一个月的本期作战中，这是支队唯一象样的一次战斗。另外，在本期作战中，驻蒙军的损失是战死4名，负伤10余名。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的治安肃正

该师团实行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时，将河北省东半部（冀东道及津海道的一部）的防务移交给第二十七师团后，改为担任河北省西北部（当时的保定道及冀东津海道的一部——后为燕京道）的防务。因此，防卫地区缩小一半，致使兵力充裕，治安肃正工作立即呈现活跃。至第一期末，管区内38个县中，除阜平县外，大致掌握在我手中，并完成了在平原方面的分散部署。

师团的配备：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定周围地区，作为师



四

- | | | |
|-----|---------------|------------|
| MOA | 驻蒙军 | i b 步兵旅团 |
| | 师团司令部 | b + 独立配成旅团 |
| | 军司令部 | D 师团、师 |
| | 共产党军 | A 军 |
| | 国民政府军 | C A 集团军 |
| | 旅团司令部 或步兵团司令部 | |
| | 步兵制、步兵制团 | |

图3·第一百一十师团管内敌情概况图
(1940年初)

团直辖地区、以特种部队与步兵部队同样实行警备。步兵第一〇八旅团于北京，步兵第一三三旅团于定县，各设司令部，分别担任保定道各半部的防务。在开展治安工作时，以大据点为中心，将小据点按卫星状态加以部署，构筑连结各小据点的呈放射状的汽车公路。其次，小据点再相互连接，形成环状线。尔后，将据点进一步向外推进扩大，修筑与上述相同的放射、环状道路。这样，环状线内的治安，有显著的恢复。

以下介绍冀南道正定县及保定道高阳县的状况，作为当时河北省内治安状况的一例。

注：华北方面军，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为了研究应进行补充和修正的事项，以及收集将来的政治经济工作基础资料，由司令部选用专家，组成调查班，秘密派往各方面。调查重点，主要是选择特定地区，进行彻底的调查，以了解共产势力的政治经济工作及其影响。本稿是1939年3月1日至29日，由司令部嘱托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所作的调查报告。

河北省内治安状况调查报告（摘要）

冀南道的一般政治形势

通过此次空前的肃正讨伐、清乡工作，区域内大部地区行政机关的组织，正在进展中。截至2月末，全部55个县中，县长、联络员均已进入的县有15个，仅县长进入的县有13个，县联络员进入的县有4个，代理县长进入的县有7个，设有治安维持会的县有5个，任命县长而未进入的县有5个，未开展工作的县有6个。

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

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成面。在那里，军的宣抚班、治安维持会、县政府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工作，得到强有力的开展。为了治安、作战、经济的复兴，必须将交通运输、通信机构的恢复、整备、创建等工作放在首位，这些工作目前也正在稳步进展中。随着治安的恢复，离铁路沿线较远的内地物资也已进入市场。

此次清乡工作，到现在虽已逐渐就绪，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山西省的山区是八路军的集结地带，平原地区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此次讨伐已被驱散。但冀南中心地带，仍有不断分散移动的敌匪中小部队，剿匪工作尚有很大困难。

另外，在现阶段，临时政府的省、道、县政府等一系列中国方面的行政机构，始终未能达到中央集权的程度。特别是县政府的行政，并未能执行临时政府的统一指令。实际上是以日军兵团长及其政务幕僚担任的特务机关长，承担县政的领导。当然县政的直接领导，是由驻扎该地的部队长担任，并由特务机关派遣县联络员予以辅助。因此，冀南道一般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石门特务机关长是心中有数的。（以下笔者略）

正定县的政治状况

皇军进入正定县是1937年10月。保定陷落后，正定县人吴赞周（现河北省省长，日本陆军毕业，前东北军中将）深知皇军的坚定决心，为防止城内居民逃亡，作了很多的努力。皇军入城时，协助组织治安维持会，并和当时的军宣抚班结成一体，努力掌握对群众的宣抚工作，使治安维持会的内容，逐渐具备县政府

工作的萌芽状态。1938年2月，终于解散了维持会，开始由县政府进行工作。治安维持会的工作人员，全部成为县政府的新职员。同时，宣抚班撤出正定县。同年6月，设立新民会的县指导部，接着县联络员到任。至此，该县已具备了建立新秩序的条件。从而至1939年3月，日军警备队、县政府、新民会等军、政、会三者，成为正定县新的政治经济领导力量。

本县人口、产业的状况，摘要记述如下。

一、人口

事变前 城内19,657人

城外246,807人

共计266,464人

事变后 (1938年7月)

城内20,351人

城外244,553人

共计264,904人

总的来看，减少了1,500人。其中城内人口的增加，乃是由于从县内治安不稳地区逃到城内避难的增多了。

二、产业

事变前运出产品，棉花约240万斤，花生130万斤，上等土布10万斤，蔬菜5万斤。上等土布在绥远方面，其它在天津方面上市。运入产品主要是，食盐150吨，谷类2万余石，此外尚有煤、布匹、石油、烟草等。事变后，城内居民和其它县一样，主要是商业资本家未向京津地区逃亡，随着农村全面的平静化，城市与农村间的联系，也正在逐步恢复。

国共两党的活动状况

事变前，从本县国共两党的活动情况来看，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后进入该县，针对该县是地方教育中心的情况，着重对中学

的教员、学生进行工作。因此，事变当时，这些党员及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几乎全部逃亡。国民党于1938年（年代疑原文有误——译者）设立国民党党部，专门对青年进行训练和指导；但党的基层组织并无任何发展。至事变前，党部被撤消，踪影全无。其后，从事变后到最近，在作战的关键时期，八路军趁我后方警备能力薄弱之际，从山西省五台方面窜来，深入开展抗日游击工作。通过八路军政治部及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正定县共产党政府，进行抗日群众组织与动员工作，几乎席卷了正定县西北部的各个乡村。

另一方面，县的东南部迄今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并受其指挥。在西北部一带的共产党地区，存在着经常转移、地点不明的共产党县政府；东南部地区也同样存在着经常转移、地点不明的国民党政府。因此，调查员3月上旬到达该地时，正定县内就有临时政府（即亲日的正定县政府）、共产党县政府和国民党县政府三个政权同时存在。当然，大部敌匪被肃清，武装的对抗势力已无明显活动，但仅其地下的秘密政治工作，便成为异常复杂和难以对付的问题。

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如果能了解敌匪和敌政府的根据地，日军便可及时对其进行讨伐。但是密探的敌情报告一般都不准确，故每当讨伐之际，多半是村民挥动着太阳旗表现出欢迎的姿态，只要在村民中不出现叛变的人，便很难识别穿便衣的敌匪。

挥动太阳旗的敌占区村民，即使遵守亲日新政府的法令，他们也不接近县政府，因为如接近县政府就会被敌匪断送他的性命。所以，如果对敌占区村长或村民的生命财产采取过分手段，则不仅白白地给敌匪提供反宣传资料，还会增加群众的对日恐怖

心理，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当然，在县城就扎警备的日军，如能进一步对乡村的各个要地实行分散驻兵，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是，这在兵力上是无理的要求。县政府的自卫队如能于乡村重要地点实行分散驻兵也可以，而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这种实力。

因此，日军必须以绝对优势的武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工作方面采取比敌方更为优异的措施，推动敌我势力中间的乡村，使之归附新政权方面，此外别无良策。另外，在正定县，作为工作的一种手段，正在慎重地研究对敌占区的经济封锁问题。

保定道的一般政治形势

随着治安肃正工作的进展，保定道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治安恢复的地方，仅限于铁路沿线和以主要县城连结的地带。政治恢复的状态，在全道17个县中，县长、联络员均已入城的有10个县，仅县长入城的有3个县，日军入城而县长未入城的有2个县（定县、阜平县）。因此，在保定道全面的政治领导及政治活动，有待于河北省公署迁往保定及特务机关开始积极活动后，才可望得到发展。

高阳县的政治状况

高阳县位于保定东南约32公里处，该县人口、产业、治安等状况如下。

一、人口、行政区划及人口的增减

全县约3万户，人口约18万，行政区划是在县政府下分为3个区、144个乡。

1937年9月，日军占领保定时，城内人口约18,000人。10月，日军进行第一次轰炸及传闻八路军即将入城时，城内人口减少到2,000人。11月，吕正操率领八路军1,500人入城，由于征集粮食及

其它物资，仅仅留下的极少数地主等人也逃亡了。第二次进行轰炸更加快其逃亡。据说居民仅剩1,000人。12月，日军进入该县，驻扎约4个月，难民陆续归来，其数目恢复到4,000人。

然而，1938年4月，日军撤出县城的当日，吕正操率领八路军1,000余人再次入城，居民惧怕对汉奸的镇压及遭到轰炸的危险，仅数日便减至2,000人。9月，由于进行第三次轰炸（居民20余人死亡），以及1939年1月23日的第四次轰炸，致使居民全部离散。

1939年1月28日日军入城时，仅有100多名极贫困的居民，其后，随着治安的恢复，居民陆续增加，至3月末，城内的居民大约有3,000名。

二、产业

高阳县是华北的著名工业区，主要为织布和染料，在县城附近有许多拥有动力机械、织布机械的现代工厂，年产棉布约90万匹，麻布约15万匹。农产品则有高粱、小米、小麦、棉花、玉米、豆类等，但因全县粮食不足，尚需输入三分之一。

事变后，大部工厂因逃避战祸而停产。

三、治安状况

该县的政治工作是由驻扎部队、县政府、宣抚班、宪兵队协力推进的。由于八路军吕正操的势力强大，只有县城周围的治安能够确保。

调查员逗留期间，通往保定的道路经常被破坏，很多电杆被截断，深夜还可听到枪声。

在县城内，居民虽逐渐增加，但全属贫民，工商业资本家无回城者。事变前很兴旺的工厂，如今则大门紧闭全部停产，城内的街道使人感到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该县的农民极端贫困，城内居民大半沦为乞丐，部队的剩饭

招来一群群饥民，形成一派悲惨凄凉的景象。

四、县政

第一次日军入城时，曾一度成立县政府，施政四个月，即随日军一同撤至保定。今年2月上旬，县公署再次设立。然而，租税收入分文无有，保卫团等组织也未能建立。在此情况下，首要工作是鼓励居民回城，为此，与部队协力积极进行活动。至于正式的行政事务，要等工商业资本家的归来，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联系基本恢复后，才好开始实施。

五、抗日势力的活动状况

吕正操军队自1937年11月起的一个月及1938年4月起的10个月，前后于高阳县两度施政。第一次入城时，军政负责人颇有威望，施政仅一个月，深得民心。其善政之一，就是宣布全部豁免田赋。第二次入城后，其政治工作与第一次军政治部成员的政治工作不同，将该县隶属于1938年1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之下，调整了县的行政机构，施行了带有浓厚共产主义色彩的正规行政工作。（以下行政实施状况及同时期的群众生活实情从略——笔者）

师团继上述第一期工作，推进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并逐步取得了成果。8月，将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后为燕京道），移交给新建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同时并使之担任冀南道的防务。10月开始的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在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10月20日给现地视察的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介绍其工作要点如下。

情况报告（摘要）

（以上略——笔者）师团的治安工作，在彻底地实行兵力分散部署下，使警备道路及通信网整备完善，并通过分散、集中及

机动的方法，剿灭残匪。同时，将杜绝共产党抗日团体的活动，作为首要任务。依靠训练青年与宣传、宣抚工作，努力收揽民心。实行户口调查，以使民匪分离。收回民间武器，并依靠加强警察力量，实行保甲制度等措施，增强自卫能力。现正紧密结合这些工作，努力扩充县政，发展民营事业，实现王道乐土。

迄今，其工作情况（包括京津地区原管区在内）如下：

一、应急道路

总长	约3,965公里
动用人员	约1,737,000人

二、警备用有线通信网

专用电话线总长	约1,034公里
警察用电话线总长	约600公里

三、青年训练及自卫团

青年训练所	约545处
青年训练结业者	约80,790人
自卫团员	约64,700人

四、无条件投降

投降匪数	约7,260人
收缴降匪枪支	约4,750件

师团根据当前方面军的指示，从本年10月至来年3月间，进行第三期治安肃正工作，继续采取分散部署，力求训练周到，严肃军纪，并将工作重点置于模范肃正地区、铁路、主要道路、沿水路的两侧地带及开发资源地区，努力扫荡残敌，剿灭地下潜伏匪团，扩充整备自卫组织，制订计划彻底地实行治安工作，以期取得空前的肃正成果。此项工作正在逐步实施中。

注：师团总兵力为步兵21个大队，临时编成部队6个小队，骑兵2个中队，辎重2个中队，共计90个中队（722个小队），其分驻情况

如下：

第一一〇师团分驻情况一览表

部 队 分 驻	铁路沿线以外分驻地点				铁路沿 线上分 驻地点	合计
	中队以上 (包括 中队)	小队以上 (包括 小队)	小队以下	计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 (津田部队)	8	28	18	64	18	72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 (水原部队)	4	13	56	73	70	143
步兵第一〇八旅团 (石井部队)	1	25	44	70	41	111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 (谷口部队)	1	25	25	51	38	89
直辖部队		11	10	21	19	40
合 计	14	102	159	269	186	455

师团负责警备面积 66,248平方公里
 占领地区 47,284平方公里 (约占72%)
 未占领地区 18,964平方公里 (约占28%)
 1个中队平均负责地区 736平方公里
 (如除去未占领地区为 525平方公里)
 师团负责范围的铁路总长 711公里
 直接警备兵力 14个中队
 1个中队负责的警备范围 50公里
 (1公里约为3人)

师团交战次数，1938年8月——1939年10月约为2,250次 (每日平均约5次)，敌人遗弃尸体约为36,260具，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其次，关于第三期后半期的情况，概述如下：

1940年初，当时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对主要敌人的动向，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查。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河北省特务机关，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概述如下。

一、国共激战的结果，国民党军败退到河北省南部，加之，盛传最近即将成立新中央政府，使彼等士气大为沮丧，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

小匪团仍在暗中蠢动，反复持久地对铁路交通、通信网、列车、汽车运输以及对乡村进行破坏和袭击。同时，各伪县政权、

征收机构等为了加强抗日战线而奔走不息。另一方面，渴望和平的农民，虽早已无法忍耐彼等的物资要求，但因惧怕匪团的暴力，只有对其屈服。此等情况，对于我方民匪分离工作，已构成严重的问题。

二、共产党的新动向

1. 日英离间工作（天津党机关的指令略——笔者）
2. 利用粮食缺乏，煽动群众（掠夺粮食、放火等扰乱工作指令略——笔者）
3. 打入新民会工作（笔者略）
4. 关于利用烽火进行联络的整备、训练工作（笔者略）
5. 共产党匪团的动向

冀西、冀中军区共军，经过我多次肃正作战的创伤，尚未恢复，估计不至采取积极的行动。然而，冀察热挺进军侵入东斋堂方面，冀中军区与石友三军交战而南下的部队，已于2月28日结束战斗，正在逐渐返回旧地盘。

三、国民党军的动向（笔者略）

四、八路军的抗日工作

1. 加强各种抗日团体。
2. 为内地匪团运送粮秣及被服。
3. 通过反宣传扰乱日军后方。
4. 宣传共产主义。
5. 除奸工作。
6. 严禁向日军占领地区运送粮秣及棉花。
7. 没收联银券。
8. 强行绑架受过日军教育的青年训练所毕业生。
9. 破坏、袭击铁路、交通道路、电线、运输机关。
10. 征集新兵。
11. 为了瓦解治安军及其它武装团体，对其家属施加压力。
12. 合理负担、减息、改善生活。（各项说明笔者略）

五、河北省管区内各县收入情况（与事变前比较）

管区别 项 目	A 事变前 年度收入概算	B 1939年年度 收入(单位: 元)	比率 $\frac{B}{A}$
河北特务机关管区	1,882,070,700	233,263,334	13/100
天津特务机关管区	5,651,293,700	3,185,065,061	56/100
北京特务机关管区	1,559,058,340	901,489,189	57.1/100
石门特务机关管区	5,248,398,000	517,975,897	9.88/100
河北省管区总计	15,182,682,740	5,626,860,370	36.6/100

进入1940年，师团对管区内外之敌，进行了积极的肃正讨伐，力求扩大治安恢复地区。特别是敌根据地，因处于防卫地区境界附近，曾多次与邻近各兵团共同进行讨伐。

另外，在此时期，由于国共对立激化，造成日军、共军、国民党军三者相互作战，结果，国民党军丧失了势力。其主要情况如下。

一、获鹿、元氏西部山地的讨伐

1月中旬，水原重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石门西部山地进行肃正讨伐中，得到国共两军正在获鹿南部地区交战的情报，旅团立即对之加以攻击，使国民党军在元氏西部山地受到日军与共军双方的夹击而覆没，其后，共军迅速逃避。

二、赞皇及临城西部山地的扫荡

步兵第一〇八旅团（旅团长：石井嘉穗少将）1月下旬在赞皇、临城西部地区，对国共两军进行扫荡，摧毁了根据地的设施（行政公署、抗日学校、兵工厂等）。

三、冀中及冀南的肃正工作

2月上旬，吕正操指挥的冀中军区共军，进逼国民党系统的石友三军南下时，冀县警备队于该地南方，将吕军的一部击溃。

2月中旬，师团又收到吕军主力再次南下攻击石军的情报，当即出动主力。主要目的是要击溃吕军，怀柔石军。但是，石军受到吕军的进攻，损失甚大，并向大名以南败退，于是吕军扩大了地盘。另外，师团虽于3月初进行了讨伐，但未能找到吕军的主力部队。

除上述外，师团对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共军根据地，进行了强有力的肃正讨伐，给中共方面以深刻的影响。

1940年5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中共机关报），登载了冀南地区日军扫荡战和共军游击战的消息，其中叙述了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及第二十七师团于1940年初开始进行激烈扫荡，致使中共方面陷于困境，对日军的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对中共方面的反扫荡，作了自我吹嘘，并阐述了冀南平原游击战的特点以及今后的方针政策。

冀南的“扫荡”与“反扫荡”

（宋仁穷将军访问记）（未与中文原文对照——译者）

注：本资料是1940年7月11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邑城警备队在西家庄（武安北方约10公里）附近的战斗中缴获文件的翻译资料。括弧内标题的宋仁穷，当时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兼冀南军区司令。

其一 冀南现状（笔者略）

其二 日军的军事进攻方式（笔者摘要）

日军在战略上的进攻，采用了“分进合击”与“分区扫荡”两种方式。去年1月大扫荡时，日军由数路进兵，实行“分进合击”，夺取了城市及我方据点。继而，在今春扫荡时，完全采取了“分区扫荡”的方式，并且逐渐采用了战术上的“分进合击”，

将几个据点的兵力集中于一处进行合击，其目的在于歼灭我小部队，破坏我政治机关和群众团体，并增设小据点，建立伪行政机关，从而扩大其占领地区。

日军在平原地区的扫荡战，在战术上有许多特点，即：

- 一、惯用以快速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
- 二、努力探知我方情况，进行袭击和伏击。
- 三、行军时一般都避开沿公路的村庄、森林等隐蔽地，归路与去路各异，以防我方的伏击。
- 四、战斗时一般首先进行火力支援，其后分成小部队，徐徐接近我方。

五、日军在各兵种间的配合，比较周密良好，射击也较准确。另外，战备优良，部队的运动性较大，但有与民众脱离、地理不熟、不信任伪军等弱点。

其三 我军反扫荡的方式（笔者摘要）

我军的基本方式是采用游击战，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并不放弃运动战。第一时期即敌人分成数路，进行“分进合击”的扫荡时，我方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敌人的一路，尽力粉碎敌人的围攻。在第二期，敌人完全占领城市，并以快速部队实行分区扫荡时，我方即以小部队为单位，进行游击战。此时，地方游击队的活动甚为重要，八路军从自己的部队抽出一部，于各县配署一个连的兵力，作为游击队的骨干，进行游击训练。现在冀南地方游击队，大部均能独立进行战斗。尤其凭借两年多的平原游击战的宝贵经验，在警戒、侦察、宿营、行军、通信联络等方面，显示出较大的进步。另外，在作战上，对伏击、袭击、进攻、撤退等，也都考虑到平原地区特殊的战法。特别是平原地区与山地游击战相比，敌人具有强大的火力，而我方的装备、军事、技术素养等又居于劣势。但是，我方精通地理和熟悉民情，能自由来往于冀南

各村落之间。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与群众具有密切关系的平原游击战的基本条件。

其四 敌我的交通战

敌人为了缩小我根据地，切断我方联络，并加强其占领据点，扩大伪政权的势力范围，攫取我方资源及物资，以利于进行扫荡，最近大规模地修筑铁路及道路。因此，交通战在战略上，已具有重大的意义。

包围冀南的交通网，除京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外，在平原中部尚有沧石（沧州——石家庄）、石南（石家庄——南宫）、邯威（邯郸——威县）、大邯（大名——邯郸）等四大公路，另外，还有许多支线。

各据点均有道路互相连接，每个堡垒后方都有一条道路相通。在半年的扫荡中，敌人的道路约增加了四分之一，并计划铺设济郸铁路（济南——聊城——大名——邯郸），以此将冀南分割成南北两部。沧石路已从两端开始修筑，我方正考虑采取措施对之进行破坏。

另外，敌人在修筑道路时，使用了四种毒辣方法。

其一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广大农村纳入城市的圈内，连我方根据地都包括进去。汽车在环状路上巡逻，使我不能接近，以便于防守其占领地区。

其二是平行汽车公路。从一城至另一城，从一个据点到其它据点间，修筑平行的几条汽车公路。这样，出动汽车时，即可任选一条通行，从而避免我方伏击，防止我方的破坏。

其三是放射线公路。即以一定的县城或据点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向该中心修筑公路。以冀南柏乡县为例，向县城中心已修有八条公路，任何一条都通到外部各地。

其四是路旁挖沟法。加高铁路或公路的路基，在路的两侧挖

掘深沟，使我方不能接近或横穿，既保障道路的安全，又阻断我方的据根地。在京汉路的高邑至临城地区，已经采用此法，正在挖掘深沟。如能实现此项计划，不仅能切断冀南平原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而且能分割平原的游击区，从而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必须认识到交通战在平原反扫荡战中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敌人的这种交通设施，我方只采取零星的破坏行动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采取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行动。在冀中地区动员破路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达五六万人，但同时必须考虑到，在破路的群众当中，就有被敌强制修复道路的群众。这是白白地消耗民力。对此，首先必须大力组织群众，帮助群众从敌方的劳役中摆脱出来。所有这些均属于破坏工作范围之内。

其五 冀南平原游击战的前途

两年多的冀南游击战和一年半的反扫荡战，总的看来，我方有极大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我方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平原游击战经验，因而树立了充分的信心。在冀南地区，我军、政、民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已经奠定了坚持游击战的基础。

在敌人方面，虽然增加了若干的交通网、据点，企图“将占领的点与线，进而扩大成面”。但是，敌人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且可以说是根本失败了。

如果分析过去的平原游击战胜利的基本因素，第一是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紧密团结。在一年半的反扫荡过程中，这种团结日益密切，并且坚强巩固。第二是群众运动的初步展开。在一般的情况下，群众的向背决定一切。群众是最可靠的支柱，我们的胜利唯一的依赖是群众的援助。第三是正规军、游击队、群众武装三者的有机结合。就好比正规军为骨、游击队为筋、群众自卫队为肉，互相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当前，冀南处于非常严重的时期，我们通过灵活运用过去的经验，坚决依靠群众，必须做到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建设，粉碎敌人的扫荡，据此，坚信一定能打破这次危机。

四 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华北方面军为了掌握当地中共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的实施状况，于1940年3月——5月，向各方面派遣了调查班。本资料是从各调查班的报告书——“冀南边区抗日赤化工作实质报告书”、“冀中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各项工作的状况调查资料”及“冀南行政参议会工作报告书”——之中，摘录若干，分类进行了整理，以下记述是中共各项工作实施状况。

文教（思想）工作

在察南地区，以革命的救国三民主义为基础，教育成年男女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以发挥其高度的抗战精神和行动能力为指导方针，并以教育儿童，培养其成为优良的第二代国民为目的。在社会教育方面，指导一般群众，对村政给予影响。另外，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居民，则主要是针对日方所实施的欺骗教育的阴谋予以彻底的揭露。

在冀中地区，以灌输抗日革命思想为目的，由县党委、军政治部等主持，对各村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对一般群众以讲演和演剧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各地学校教育一般按以下各点实行。

一、小学校全部改称抗日小学校，教科书统一以抗日抗战作

为内容。儿童的作文、图画、游戏等，也都要注意灌输抗日意识。

二、儿童学生，除按军队方式以连为单位进行组织外，并编成宣传队，儿童剧团、慰劳队，使其参加工作，边教育，边努力加强抗战气氛。

三、在以行政系统划分的小学区中，指定中心小学校，以此作为指导教育的核心，形成对其它小学校进行督促指导的组织。

四、教育者，由受过抗日共产教育的人员充当，县政府的教育科员（党员），经常巡回视察各小学校，担任指导。

五、扩大设置各种教师进修学校、干部训练班，努力大量培养抗日工作干部。各教师要同时进行军事训练，以抗战言论集、抗日报纸等为教材，使其受到彻底的抗战教育。

社会教育一般按以下各点实施

一、群众教育，凡达到参加自卫团年龄的适龄男女，一律强制使其接受社会教育，经费由村公所负担，学习课目为国难讲话、时事问题解说、政治军事常识、识字、歌曲等。

二、在察南，利用冬季农闲实行社会教育，称之为“冬季工作”。县政府首先组成“冬学运动实施委员会”，决定实施方法，区村也组织同样的委员会负责办理和进行该项工作。

三、在冀中地区，鼓励推广各地方的报纸刊物，以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之理解持久战、游击战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等，强调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另外，应用宣传教育方式，指导群众在政府支援下，自发地改善各自生活，参加抗战。

宣 传 工 作

在各县组织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发行群众报纸，散发给政治机关、自卫团、救国会等机构。

对于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群众，其教育方法是：（1）散发传

单、小册子。（2）通过训练班，对干部进行专门教育。（3）秘密设置夜校和识字班。（4）秘密派遣教师打入日方教育机关，使之进行抗日教育，促使民心背离日本。

组成宣传队从事文化娱乐工作，要注意运用适合大众兴趣的传统娱乐形式。

县区的各机关及小学校，分别于所在地办理壁报，其登载内容，主要有新闻、漫画、打油诗、歌曲、标语等。

通过边区政府的机关报纸（晋察冀边区抗敌报），募集捐款，以加强群众的抗日意识及扩大读者面，另外，县政府号召开展支援抗战的捐献运动。

经济工作

在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中，对群众课以所谓“合理负担”，实际是很重的“累进负担”。例如土地，根据其所有亩数，按每10亩为10元，20亩为40元，30亩为80元，40亩为160元，实行课税。对待富农则施加特别压力，横征暴敛。另外，还有所谓“平均地权”，如果地主不能忍受“合理负担”，而将土地变卖时，则由农民协会以廉价收买。其产品棉花、谷物等，都通过农会的调查，不许随意进行买卖。对谷物除允许留下最少限度的自用粮外，其余全部归公，作为共军的军粮及抗战战士家属的补助粮使用。

此外，共产党于1939年秋以来，制订了100万元的军费捐款计划。各县、区、村都组织了临时现金动员委员会，捐款按资产的多少，分摊给各户，强迫用现金或谷物缴纳。对于纸币，不说说联银券，连河北银行券，也严禁使用，全部使用边区及中国、中央、交通、农工等银行纸币，特别要使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纸币大量流通使用。

从1939年8月起，于各县、村组织了棉花公司，除以100斤

棉花30元的廉价进行收买外，还分配给由党领导经营的织布工厂，防止棉花外流。

禁止使用日货及其它外国货。

禁止运出所有物资，尤其对棉花严加管理，当发现运出者时，便以汉奸论处，实行枪决。盐、砂糖、火柴、电池、纸、药品等各种物资，利用行商，主要从天津方面运入。眷写器具及药品则通过铁路沿线城市的外国人设立的基督教会的信徒，以教会名义，交由共产党地区的基督教会，向共军和政府等进行交纳。

为了防止耕牛的减少，不准食用牛肉。公布禁烟、禁酒的命令。金属废弃物资全部交给农会。废除婚丧嫁娶的乐队，禁止浪费金钱。家畜的买卖，必须经农会批准。直径一尺以上的树木，全部在农会登记，不得随意采伐使用。

另外，禁止养狗，由打狗队各村巡回，尽力将狗消灭。因为狗不仅吃粮食，其吠声还可能暴露共军的夜间行动。

在冀南地区，为了巩固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困难的平原游击战，以期军事、政治的顺利发展，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冀南行政主任杨秀峰在区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公布实行如下的战时经济政策。

甲、妥善的土地税制度

首先整理田地的租借关系，废除分摊纳税，按累进税率实行公平负担制。

乙、战时经济制度

统一收支、公开财政、严惩贪官污吏，保证发给最低生活费。

丙、调整并确保金融

整理收回各地方纸币，禁止流通伪纸币和伪货币，限制法币的流通地区，设立地方银行。

丁、发展、改善合作事业

组织农产品的运输，供给物品和调整价格，建立低利及无息的借贷制度。

戊、统辖贸易

设立贸易局，有计划地输出土产品和吸收敌区物资，组织游击区的产品交换。

己、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战时生产，奖励发展农村副业及手工业。

庚、调整粮食

设立粮食管理机构，调整粮食的生产、消费、运输、分配和贩卖。

在察南地区，由于中共方面的势力逐渐伸展到平原地区，抗日政府从1939年2月，便加强了财政部门，对山区农村，经过数个月的田赋调查，确立了周密的田赋税制。平原的农村，因与日军势力交错，未能进行充分的调查，只规定了适当的税额。同时，为了将群众从日军方面争取过来，对纳税额又降低了四分之一，但强制交纳，严行督促。

产品向外县输出时，须向“输出货物税务所”纳税，并责成村自卫团长设立“偷运走私调查所”。为了从日军占领地区收集物资，派遣武装掩护队，企图强制收买，强行搬运。因此，游击区群众的去留，随着彼我力量的消长而变动。

产业经济政策方面，以最大努力扩充合作社。此外，通过春耕秋收运动，增加生产。设立秘密交通站，从事传送文件，运送武器、弹药、粮秣，以及管理物价、统制输出、修理制造枪械、回收废品等工作。

对抗属的优待工作

为了争取群众，以减租减息工作作为重点，取得一般群众尤

其是贫农的欢心。同时，对抗战军人家属，根据边区政府公布的优待法令，实行了特殊优待。以察南地区为例，其优待办法如下：

一、物质上的优待——赠给从违反规定者手中没收的粮食、金钱以及布类。

二、劳动上的优待——由代耕团、村自卫团帮助耕种和收获。

三、一般的优待——实行减轻或免除纳税，补助儿童学费，援助丧葬及医疗费用。

四、精神上的优待——在各种纪念日、庆祝大会上进行表彰，组织儿童慰问团进行家庭访问，指导一般群众对其表示敬意。

以上优待办法，给一般群众以很好的影响。然而，在日军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有因害怕家属受到危害，而隐瞒参加八路军的情形。因此，该项工作并未完全见诸实行。

除奸工作及民众连坐法

在察南地区，由各县各区的村自卫团的先进分子，组成“游击队除奸小组”，努力进行铲除投降分子的工作。小组以组长和二——四名组员作为除奸的行动班，并由秘书及数名侦察员编成所谓“保安小组”，使之完成秘密工作任务。另外，为了彻底团结群众，在群众中以自卫团为中心，以压制亲日投降者的活动为目的，建立了民众连坐、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1939年8月，根据边区政府命令，为了压制和防止群众中的投降通敌等活动，在每个县中都通过了“区村保甲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区村保甲实施办法”的决议，并于9月末完成了组织工作。

制造、修理枪械等工作

解放区的工业，仅是经济方面开发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察南的实例来看，山地内根据地，为了武器弹药的自给，设置了枪械

类的修理所和制造所。这些修理制造工作，表面上是由县政府、自卫团总队部干部、县工人救国会共同领导，而实际上则由经营委员会进行经营及制造技术上的领导。

武器工厂的材料来源，采取了以自卫团总队部为主，在区、村的群众团体协助下实行废钢铁回收的办法。回收的材料，立即送交边区的制造所，并按所交数量换给相应的手榴弹。但制造所的设备能力极为低劣，大部工厂是数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仅能制造步枪和手榴弹，修理也只限于简单的小修。因而也难以确保对前线的充分补给。于是，鼓励采取积极手段，袭击新政权的武装团体，扰乱日军后方兵站，从而获得武器弹药。

山西省西北部的叛乱工作（晋西事件）

以下是上述方面军派遣调查班所作“山西省西北部匪情调查报告书”的摘要：

1939年6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因恐山西省西北部的中共势力渗透，正拟对该方面的山西新军进行肃清之际，山西新军在牺盟会及贺龙指挥的第一二〇师支援下，从11月末至翌年初，攻击了阎锡山部下赵承绶所指挥的旧山西军。当时，赵承绶除任第七集团军军长外，还兼任山西省四个游击行政区之一的晋西北第二游击行政区公署主任，管辖35个县。

旧山西军由于内部有牺盟会分子扰乱，外有山西新军趁日军扫荡之际进行袭击，一举即被击溃。因此，第二游击行政区的行政权落入新军之手，主任由暂编第一师长续范亭担任，副主任由牺盟会常务委员牛荫冠担任。

此即所谓晋西事件，现就中共方面如何进行部队内的赤化工作，以及如何对阎锡山的反共措施进行斗争等，概述如下。

1936年冬，绥远事件发生后，全国抗日思潮高涨，在阎锡山

统治下的山西省建立了牺盟会（简称牺盟会），作为动员群众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争取民族革命的彻底胜利，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实现以人人享有劳动权利及按劳分配为宗旨的新社会”，会员以青年、官吏、学生等知识分子阶层为主。

其后，牺盟会员对阎锡山的以统一省民和加强军事力量为目标的抗日政策，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使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并在行政、军事方面也建立了组织基础。但是，阎锡山领导山西的抗战，能力薄弱，于是中共势力乘机侵入，致使该会与共产党的关系日趋紧密。

继中国事变爆发后，太原、临汾等地相继失陷，因此，山西军也决定开展共产党所主张的游击战。阎锡山将山西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置保安司令，使其统辖由群众组成的县游击队、保安队、政卫队、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些武装组织的骨干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在这些武装团体中，除以上组织外，还有以太原各工厂工人所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团做为基干，而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扩大了势力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山西新军。

阎锡山对于在统一战线名义下，逐渐走向赤化的山西新军的情况感到忧虑，乃于1939年6月，采取了将工卫队改编为第二〇七旅、政卫队改编为第二一二旅等对付共产党的措施。同时，拟将该新军置于旧山西军的统制之下。对此，新山西军如前所述进行了抵抗反击，并将各部队内的旧军系统军官，逐渐驱逐清洗，强行改编如下，从而促进了部队的共产化。

新部队名称	时间、地点、发动者	基础部队
决死第四纵队 (队长 雷任民)	1939年12月13日，在交城县塞则坪改编。 发动者为地区政治委员雷任民，旅政治主任刘德明。	第二〇三旅

新部队名称	时间、地点、发动者	基础部队
决死第二纵队 (队长 韩 钩)	1939年11月8日在隰县水上镇，政治委员韩钩主持。	决死第二纵队
第二〇七旅 (旅长 侯俊岩)	1940年1月2日，由政治委员侯俊岩主谋，驱逐旅长后改编。	第二〇七旅 (旧工卫队)
暂编第一师 (师长 续范亭)	1940年1月上旬，在兴县声明参加新军。	
新编四团 (团长 曹 诚)	1939年11月，第十五团发起兵变，与山西军交战后，脱离第一九六旅改编。	第一九六旅 第十五团
游击第三师 (师长 侯光远)	1939年12月30日，在兴县北方魏家滩被第四纵队强制改编。	

如上所述，新军再次编成，但于1940年1月1日又建立了“晋西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并以总指挥续范亭、副指挥雷任民的名义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一方面强调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拥护蒋介石、阎锡山，另一方面却对阎锡山部下的旧山西军，上至集团军长，下至师、旅的首脑等极力加以诽谤。其用意在于排挤这些高级干部以削弱阎锡山的统治能力，同时笼络并掌握中坚干部，争取一般官兵。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巧妙的军队赤化工作的迹象。

1940年1月20日，国防会议命令阎锡山与朱德停战。然而，其内部纠纷则在日趋尖锐。

3月19日，阎锡山就晋西事件发表宣言，声称“晋西北叛乱主谋者牺盟会的过激分子和新军，由于中共的支持，而脱离了战

区长官的统制。”对此，共产党方面的薄一波等，于4月11日解释说：“晋西北牺盟会的政策与共产党的政策之所以类似，是由于抗战建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并非与共产党合并。牺盟会与中共军队关系密切，不过是从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出发，进行必要的协力而已。”

在山西新军叛乱的同时，在行政机构中，也清洗了旧山西系统的机关和人员。但是，其行政组织仍保持了原来的系统。中共提出了“国共合作，拥阎讨逆”的口号，企图将行政机关置于山西新军的统辖下，通过新军实现中共的统治。

新军通过牺盟会系统占领县政府，或依靠新军的武力扫荡，掌握了政权的领导。1月15日，暂编第一师长续范亭就任了第二游击行政公署主任，副主任由牺盟会总会常务委员牛荫冠担任。同时发表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行政实施大纲”。这个大纲乃是企图清洗行政机关、促进宪政运动、征收合理的累进税、实行抗战经济政策、普及社会文化教育等的施政方针。

其次，所有的工人、农民、教员、青年、妇女各救国会、儿童救亡团，以及文化界救亡会等群众团体，也全部掌握在牺盟会的统辖之下。

开辟晋西北解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与大后方陕甘宁边区的联络基地。该解放区的设置，由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工作的成功，促进了行政组织的改革和群众组织的加强，从而稳步顺利地取得了成果。

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

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于1940年9月，编写了“根据中国事变经验有关无形战争——思想战的资料（草案）”，并进行了研究。下面是从其第二号“华北共军对我军的瓦解工作要领”中的摘要。

华北共军对我军的瓦解工作，为中共八路军政治部所策划，除由各师、旅、团、营、连的政治部或政治指导员等优秀党员担任执行外，还指挥共产系统的匪团、行政机关、外围团体等加以实施。其工作要领为：

“揭露日本军阀的欺骗政策，使日军下级官兵认清共军的主张和政策，酝酿反战思想，进而使之转向共产革命。”

宣传重点如下：

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

反对加重日本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中、日军民是兄弟，军阀是敌人。

八路军优待日军俘虏。

主张的要点是，此次事变是日本军阀和财阀相互勾结所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本国民不过是为满足军阀、财阀贪得无厌的欲望的牺牲品，对一般国民毫无好处，其立场与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完全相同。因此，中日人民必须相互协力，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军阀。这与过去日本共产党所主张的反战纲领相吻合。在事变约一年以后，宣传重点又转向促使我军官兵丧失战斗意志，其内容如下。

英、美、法、苏的对中国积极援助。

日军的战败与我收复失地。

揭露日军出征士兵家属及战死者遗族的惨状。

日本国内的经济压迫与反战运动的兴起。

对以上内容进行捏造和夸大的宣传。

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即：

一、适应作战的进展——在每个会战或每个战斗中所取得的局部胜利，作为全面胜利进行夸大宣传。

- 二、巧妙利用生动的材料——从日本报纸中，抓住战死者妻女的自杀，近畿地方的风灾水患，关西地方的歉收等消息，巧妙地进行宣传，以动摇日军的军心。
- 三、利用日本国内的形势——夸大宣传日本国内的经济弱点，以及由于战争长期化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以促成思想的混乱。
- 四、利用国际形势——利用苏、英、美、法的援蒋态度，宣传将爆发日苏战争，或根据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宣传日本日益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 五、同情出征士兵的处境并抓住其弱点——激发士兵在军队内的不满及渴望回国的情绪，使之丧失斗志，挑拨官兵不合。

宣传方法，最初是散布（张贴）宣传文件，在墙上写标语，利用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员进行广播等，尔后越来越巧妙，如（一）在火线上进行喊话宣传，（二）进行有策略的通信宣传等。

此外，共军非常认真地进行“俘虏工作”。鼓励本国军民尽力捕获日本军官，对他们加以优待，并热心地进行思想工作。然后，以对日本军民进行赤化工作作为条件将他们释放（以下笔者略）。

俘虏工作是共军对日军的一项重要的思想工作，散布（张贴）劝诱投降的印刷品，或利用日本士兵俘虏的名义劝降，或将共军通行证撒布在我军附近，宣传其优待情况，以期做到便于投降，并对护送投降士兵者，给以相当的奖励。另外，还以悬赏办法鼓励其军民捕捉我军官兵。因此，我军士兵单独或数名一起行动时，受到当地居民或共军便衣队的突然袭击而被俘者不在少数。其它还有利用中国妇女企图进行引诱劫持的。

我方官兵因负伤而被俘时，彼等不仅不加以危害，不没收金钱物品等，也不作任何污辱、谩骂和处刑。相反，却给以优待，

对负伤者给以治疗。除用日语巧妙宣传并探听军情外，还特别灌输共产思想，以搅乱我军及国民的思想。对俘虏的思想教育是由曾在日本留学的政治部人员或朝鲜人共产党员等充任，每日进行数小时的教育，更于每天用一小时，提出课题，进行讨论。另外，每天在娱乐时间，通过演剧进行思想工作，作为辅助教材。其它还通过政治部的年轻女工作人员，经常接近俘虏，以学习日语为名，宣传共产主义。

讯问俘虏的内容为：有关我军的兵力配备，各兵团的战斗力，下级官兵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倾向等。

召开共军士兵及地方群众大会，使俘虏登台，发表攻击日本军阀和财阀、歌颂共军及共产主义的讲演或演剧。此外，还指导俘虏写感想文章，以此作为宣传材料，寄送其战友，劝告投降，或对其家属及所属部队等发出“生命安全，目前正受到共军的优待，过着幸福生活”之类的通信。另外，对愿意回国的俘虏，以发展同志、进行反战运动、与日本共产党协作、宣传优待俘虏情况等为条件，发给旅费，并派兵护送，予以释放。不愿回国者则编成特殊部队，从事对我军的反战工作。

1937年7月至12月间，经驻中国的宪兵队办理归来的俘虏为27名，他们归来后，或到原部队或到宪兵队自首，或被逮捕，因而释放时承担的条件，均未能实现。

五 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收集

1938年，关于方面军及有关机关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于前章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及新民会调查科的情况中，已有所记述。进入1939年，对中共的认识有所提高，调查研究也有了进展。在此，根据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记录加以介

绍，并将驻中国宪兵团的情报业务及华北灭共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记述如下。

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

方面军于1939年12月1、2两日，举行了情报工作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者，有方面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各军、直辖各兵团及驻中国宪兵团司令部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等。

会议的开头，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作了如下的报告，指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对此，迫切希望有深刻的认识，努力组织周密的情报网，掌握敌人抗战力量的实际情况。

当此世界情势急转，远东即将展开新的事态之际，情报工作者必须耳目更加敏锐，对各种事态的判断更加正确。我占领地区内的治安状况，因各兵团的最大努力，正处于逐步提高的阶段。尤其是最近，随着世界情势的转变及树立汪政权工作的进展，可以看出，敌方的军、政、党等各方面的抗战力量，逐渐呈现动摇的景象，不胜庆幸之至。但是，仔细观察当前形势，敌方的抗战力量正在日益隐蔽而顽强地发展，确为无可掩盖的事实。

以地方武装为中心的抗战组织及以共军为背景的群众抗战组织，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其秘密活动。如今更驱使怀有抗日情绪的华北群众，进一步向抗日的道路上迈进。然而，在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破上述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这是各位已经深刻认识到的。

为此，首先必须弄清其组织，并进一步弄清作为其组织基础

的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根据及核心，必须使皇军的威力单刀直入地插进其要害。因此，目前各兵团情报工作的责任，就是要向皇军提供发动其威力的时期和方向。

各位对这一点要有充分认识。因此，组织锐利周密的情报网，触及敌人抗战能力的核心，掌握其实质，至为紧要。特别希望今后对于成为华北治安致命祸患的中国共产党及共军的情报工作，必须全力以赴。同时，还要努力研究思想战的对策。

对我势力范围内的一般民众以及敌区的各阶层民众，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当前帝国对华各种措施的真意和当前形势的真象，从而把握民心，粉碎敌人的抗战意识。同时必须进一步酿成协助我方建设的气氛。

第二课高级参谋滨田平为了提高情报工作，作了如下的报告。

一、讨伐成果的情报观察

过去往往认为情报工作只是让谍报人员去作，而在进行扫荡讨伐时，从获得情报的角度加以观察和利用，则作的很不够。由于讨伐是军队本身直接接触敌人，而且是不断地进行接触，如果采取一些方法、手段，则较之谍报人员更能得到可靠的情况。讨伐时不能满足于敌人的溃逃，还必须精心观察其结果，弄清匪团的性质、派系组织、装备和抗战能力以及与当地群众的关系等。为此，必须努力捕捉俘虏，获得文件。特别是进行讨伐的各级指挥官，更应关心情报工作，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每当进行讨伐时，如果指导其在上报直接战果的同时，还必须报告情报方面的成果，相信情报工作就会更加提高，讨伐也能进一步收到效果。

二、关于谍报工作

方面军的谍报机关，设有特殊情报班，于各军配属其一部人

员，或使之分担任务。特殊情报的特点，是能够比较正确地掌握敌人内部较大的动向。敌人的4月攻势、夏季攻势、9月攻势等，其发动及部署的要点，都要依靠特殊情报侦查。但是，特殊情报并不能指向所有的目标，只能抓住无数电波中所限定的目标。因为当敌人的部署固定而依靠有线电报通信时，肃正讨伐所必需的情报，如敌军匪的性质、系统、组织、抗战能力及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等等，都可能逃出特殊情报网的网眼。

因此，正确的方法是，必须在粗大的特殊情报的网眼之中，尽量配备严密而机敏的谍报网，以控制全部占领地区。

取得谍报成果的必要条件是获得谍报“人才”和适当的谍报组织。这两点如不具备，不仅不能指望取得谍报的成果，反而会影响正确的判断。谍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虽有种种，但最主要的必须具有灵敏的嗅觉及相当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常识。具备此等素质的人，通过谍报训练，才有可能收到成果。方面军训、使用曾经作为国共两党斗士活跃一时而转变了的人员，他们都比较具备上述条件，而且对国共两党也有相当的了解，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将来也有可能在各军配备上述人员。

今后的情报，必须日益精密，迫切要求查清作为敌人抗战力核心的党、军、政、民的组织及其组织基础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为此，仅仅依靠在敌人外围配置的谍报组织，从外部入手获取情报，是不能得到圆满结果的。必须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建立这样的组织，当然会有很大困难，但各兵团的谍报网，将来必须向这个领域扩展。另外，以往的宣传，对敌人地区毫无渗透力量，如果利用上述谍报网作为宣传网，我认为一定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果。

发给大家的小册子“特务工作要领”，是中国方面密探人员

的教育资料，可以作为我方从反面利用的好的参考资料。

注1：“特务工作要领”于1939年2月26日，在南京城外大胜关菜田下水沟中发现后译成日文的。该书是战前南京密探学校为培养间谍所用的教材。方面军以之作为情报工作人员必读的谍报防谍参考书，发给有关方面。

注2：在上述会议上，还就情报业务的具体事项、方面军的谍报组织、谋略工作的现况等作了说明。谋略工作除方面军实行的以外，希望各兵团也积极地实行。

注3：据第三十二师团参谋长当山弘道大佐11月6日的日记称：“师团负责地区内的匪数，约三万人，与9月末相比约增加一万人，其数字增多是根据情报网组织的情报所判断的。”但讨伐成果比9月减少约三分之一。另外，在11月7日的日记写道：“少佐以下及士兵、勤杂人员，开始了学中国话的教育，经过督促，约半年才得实现，每周进行两次。”兵团的实际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一斑。

当时，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有关人员是：高级参谋兼报道部长滨田平大佐、参谋堂之胁光雄中佐、中井春一少佐、尾关正尔大尉，一般军官茂川秀和中佐、河野又四郎少佐、前野荣吉少佐（开封情报所长）等。

此次会议，认识到共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并且针对此种情况，具体地研究了有综合、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其意义的重要。

驻中国宪乐队的情报业务

驻中国宪乐队，对国民党、共产党等的秘密组织及民心的动向予以深切关心，自建队以来，一直稳步进行活动，并且顺利地取得了成果。

1940年2月下旬，在中国派遣军的情报会议上，作了“驻中国宪兵团的情报业务现况”的报告如下。

一、情报收集重点

驻中国宪兵团按照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意图，担任了以思想情报，特别是国共方面秘密组织的活动及民心动向为重点的情报收集工作。

二、组成并利用中的情报网现状

(一) 各宪兵分队(包括北京及天津宪兵团总部)及宪兵分遣队为宪兵情报网的骨干。

配属于第一线各兵团的宪兵，分别部署在内地200个主要县城，与各宪兵团组织的情报网密切联系，以华北蒙疆的主要城市、县城等约300处为据点，构成有组织的情报网。

关于对共谍报方面，根据1939年12月方面军的命令，命所属各宪兵团组成对共谋略谍报网，当前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内，治安肃正模范地区的中国方面各机构内部，依靠监察网组织，正在建立情报网。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更加隐蔽，探知其真相也更加困难。因此，将来必须进一步加强这些谍报网，以期组成与其秘密活动相适应的、细致而强有力的谍报网。对此，目前正在研究探讨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

关于邮政谍报网

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内主要城市约百处，正在实行中国方面的邮政检查，这是文件谍报方面的有力机构，正在取得相当成果，将来颇有希望。

(二) 宪兵可利用的情报网

尽量利用领事馆警察、中国方面警察、铁路护路警察等日中

各警务机关，适应其特性，以之作为情报机关。尤其对中国方面的警察，应大力支持其情报机构的建成和整备，以便将来利用。

三、宪兵的各种主要情报收集手段

(一) 邮政检查

(二) 调查被检举的人

华北宪兵检举犯罪者的人数，每月约达3,000至5,000人。在对他们调查审讯时，从直接听到的事项中，可以获得比较确实的情报资料，常常会由此发现重要的情报。

(三) 检查及搜索

利用此种时机获得文件情报。

(四) 情报人员

(五) 无线电窃听

目前在天津、包头以搜索敌方及第三国无线电信情报机关为目的，正在实行无线电窃听。

(六) 有线电话的窃听

各宪兵团装备简易的窃听器，实行有线电话窃听。

由于驻中国宪兵团是在对共治安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部队，故将其编制的变迁概述如下。

从来，在中国驻屯军中，配属有宪兵长以下的宪兵约20余名，1936年6月新设了隶属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的驻中国宪兵团。队总部设于天津，在北平、天津各设宪兵分队。另外，在丰台、通州、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塘沽各地分别设置了由总部指挥的分遣队。

1937年6月，队总部设置了特高课，增加了兵力，加强了体制，不久适逢华北事变爆发。

1937年8月25日，根据军令陆甲第13号，实行了中国驻屯

宪兵的临时编制，并隶属华北方面军的指挥下。总人数为237名，队总部（队长：大野广一大佐）仍设在天津日本租界，直辖天津、塘沽、秦皇岛各分队。同时，在北平设置了特设北平宪兵团总部（队长：赤藤庄次中佐），指挥通州、丰台、北平西城、北平东城各分队。此外，在第一军、第二军及驻蒙兵团，另行配属了野战宪兵及兵站宪兵。

1938年8月12日，根据军令第55号，变更了编制，统一了各军配属的宪兵，重新设置了“驻中国宪兵团司令部”，下设十个宪兵团（38个分队）和一个宪兵教练所，于31日编成，总人数为1,624名，任命佐佐木到一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任期至1939年9月4日）。以后由北野宪造（任期至1940年7月22日）、矢野音三郎（任期至1941年6月30日）、城仓义卫（任期至1943年8月26日）各少将相继担任司令官。

规定驻中国宪兵团司令官“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下，指挥所属部队，掌管在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区内的保安及军事警察，并管理宪兵教育工作”。各宪兵团分别设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临汾、张家口、徐州、开封等地。驻蒙宪兵团编入张家口宪兵团内。

宪兵团司令部分为总务部（由总务、会计、第一课组成。部长为大野广一大佐）和警务部（由第二、第三课组成。部长为石田乙五郎大佐）两部。警务部第二课担任军事警察、外事防谍、经济警察、不良日人的管理；警务部第三课担任灭共工作、谋略防卫以及政治警察工作。

1941年5月22日，根据军令陆甲第17号，改变了编制，

6月24日编成。总人数为2,595名。此次改变的目的是为了将驻中国常设宪兵团的性质改变为华北派遣野战宪兵团。因此，增加了队司令部的人员，名称也改为“华北派遣宪兵团”。

华北灭共委员会

方面军于1938年11月12日，命华北灭共委员会开始工作。这是驻中国宪兵团总务部长大野广一大佐以前提出的建议，并经佐佐木到一宪兵司令官、山下奉文方面军参谋长等同意而被采纳的。大野大佐重视在华北的思想战，主张以思想对思想，而且必须以日中军、政、民的全力进行战斗。当前，首先召集各界人士，设置能够进行自由研究的综合调查部，作为军的外围机关。打算以此为中心，灵活运用其研究成果，建成一个反映华北全面灭共措施的委员会。

调查部设于北京市内的“黄城”，被称为“黄城事务所”，以研究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国共关系以及在满洲的剿共经验等开始了工作。在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与宪兵团司令部中，指定主管人负责领导业务。在“黄城”事务所，任用有才能的左翼背叛者作为军“嘱托”参与研究。由内务省、司法省、兴亚院、各会社调查部等也派送人才，逐步充实了阵容。

在当地召开例会时，有满铁调查部和从国内来的专家参加。那时在日本国内，就连进行这种研究也要受到严厉的监督，由于很难得到这类文献，所以，“黄城事务所”的研究成果，实在是贵重而有意义的资料。当时，虽说“反共”，

但大部分人并不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所以对于启蒙活动，可以说具有较大的贡献。在灭共委员会方面，当初并无显著的活动。

1939年9月26日，方面军修正了华北灭共委员会的规定，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关系。当天，方面军参谋长笠原中将，作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修正了调查部的规定，整顿了业务内容和组织。根据华北共产势力的扩张状况，提出了推行更加强有力的灭共措施的意见。修正的规定如下。

华北灭共委员会规定

第一 本委员会基于华北治安肃正的根本意义，为了灭绝共产抗日思想，以调查研究及审议思想的对策为目的。

第二 委员会分为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必要时设地区委员会。

第三 中央委员会设在北京，委员由方面军司令官从军、政、民中加以任命或委托。委员长、副委员长分别由方面军参谋长、参谋副长担任。

第四 地方委员会设在方面军直辖兵团的每个管区内，其委员由兵团长从军、政、民中任命或委托。委员长由该兵团的参谋长担任。北京附近不设地方委员会，其业务由中央委员会办理。

第五 地区委员会，由方面军直辖兵团长准照前项，在认为有必要的地区设置之。

第六 中央委员会，担任调查研究华北全面的思想对策的工作。

第七 中央委员会为了办理委员会的总务工作及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设立调查部，其规定由委员长制订，调查部设有部长、班长、调查部员及其他职员。部长由副委员长担任，班长由委员

长从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任命。调查部员由方面军司令官从军、政、民中加以任命或委托，其他配属人员，由委员长决定。

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规定

第一 调查部设于“黄城事务所”，负责有关思想对策事项的调查研究以及中央委员会的总务工作。

第二 调查部设四个班。

一、第一班担任有关下述事项的情报收集和整理工作。

- (1) 有关共产抗日团体的组织及策动情况事项。
- (2) 有关在学校、矿山、工厂等的共产抗日情况事项。
- (3) 其它有关国内、外人的思想事项。

二、第二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规划起草工作。

- (1) 关于灭共亲日对策的事项。
- (2) 关于各阶层的指导及训练事项。
- (3) 关于地方委员会的领导统制事项。
- (4) 其它关于一般规划事项。

三、第三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调查筹划工作。

- (1) 有关宣传机关事项。
- (2) 有关宣传资料事项。
- (3) 有关宣传方法事项。

四、第四班担任下述事项的调查研究工作。

- (1) 有关中国国民性的事项。
- (2) 有关灭共亲日理论事项。
- (3) 有关共产抗日管理法规事项。
- (4) 有关日、满、中及其它各国的灭共对策事项。

第三（笔者略）

笔者注：灭共委员会的日方委员的任命或委托，其情况如下。

军方关系——参谋部各课长，宪兵队司令部总务部长，同警

务部长，方面军宣抚班长。

政方关系——领事馆，内务省警保局，司法省北京公馆、朝
鲜总督府警务部，兴亚院联络部，满洲国政府
治安部等的适任人员。

企业关系——华北开发，华北交通，华北电电等各会社代表。

在调查部中，虽有能干的中国人参加，但从灭共委员会全面
来看，仅日方阵容较为完善，真正成为日中一体，则有待于1941年
8月防共委员会的建立。

除以上外，方面军及军外的情报调查机关，其主要者
如下：

1. 茂川机关（北京机关），机关长茂川秀和中佐，以对中国（重
庆）谍报谋略工作为主要任务。
2. 渡濑机关（天津机关），首任机关长多喜弘少佐，继由渡濑八
郎中佐接任，担任对苏谍报谋略工作。
3. 日高机关（方面军调防班），机关长日高富明中佐，担任以第
三国人为对象的调查防谍工作。
4.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从事变前即设于中国驻屯军司
令部内，1939年隶属于方面军的编制之内。以秋富胜次郎中佐
为班长，负责密码破译、窃听、探测方向、通信调查工作。
5.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治部，通过本部的调查班，收集治安情
报。另外，方面军第四课还通过特务机关收集治安情报。
6.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是由华北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公司的调查
研究机关及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综合统一组织，对有关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等部门，主要依据书面情报，进行各种研
究。
7. 华北交通公司特别调查班，通过铁路及道路交通状况的调查、

通信情报、间谍等，收集治安情报。

六 华北、蒙疆的政情

树立临时政府中央政权的准备

为了准备树立中央政权，首先需要合并临时、维新两政府。于是，在1938年9月20日，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会议。1939年1月、3月、7月分别举行了第三至第五次会议。这些会议是以协商交通通信、邮政、金融、海关、税收、盐税、文教、思想对策等具体事项为主，关于两政权的合并，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换意见。

第六次联合委员会会议，是9月19、20两日在南京召开的。在上海的汪兆铭，趁此机会前往南京，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了会谈（南京会谈），具体协商了关于树立中央政权事项。

注：汪兆铭从逃亡河内到现在，其行动概况如下。

汪兆铭自从提出反共和平的声明以来，一直旅居河内，对大陆各方面的和平趋势的进展，煞费苦心，但重庆的压迫也越发激烈。由于3月21日其心腹曾仲鸣被暗杀，感到旅居该地的危险。因此，为了救出汪兆铭及便于和平运动的开展，特派彭佐祯、大佐、犬养健众议院议员前往河内，于4月25日与汪一同逃出河内，5月8日平安到达上海，并以此作为今后工作的据点。

汪兆铭认识到，今后的工作首先必须与日本取得密切联系，乃于5月31日访问东京，与平沼首相等要人进行了会谈。结果，了解到日本意图在于树立新中央政府，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一

个阶段。于6月18日离开日本回国。

汪兆铭在归途中经过北京，访问了王克敏等临时政府的要人，又至上海与梁鸿志等维新政府要人进行了会谈，要求他们协助建立新政府。另外，通过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广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奔忙于对广东及其它地方的各项工作。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使纯正的国民党开始活动，大会修改了党章，同时，确定了新的内政、外交纲领，发表了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方针的声明。

日本方面大力援助汪兆铭，并且为了与东京进行联络，派遣影佐少将（1939年8月1日升任）于上海四川路设机关办事处，影佐为机关长。该机关代号为“梅华堂”，因此，参谋本部称该机关为“梅机关”，称汪工作为“梅工作”。

此时，陆军省部有关各课的基本意图是“妥善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推进汪工作，并统一集中内外措施，乘新中央政府树立前后的时机，努力迅速解决事变问题，如其不成，则断然转向大的持久战。”（10月30日陆军省部有关课所制订的“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最高方针”）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蒙疆联合委员会创设以来，金井章次最高顾问兼任代理总务委员长。1939年4月29日，经各自治政府代表的推荐，德王就任总务委员长。自此，蒙疆地方建立独立的中央政权的空气迅速高涨起来。另外，由于受树立中国新中央政权工作的刺激，8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的“树立中央政权促进大会”及29日在厚和（今呼和浩特——译者）召开的“第四

次蒙古大会”上，通过了“迅速树立独立的强有力的新政权”的决议。

驻蒙军已于5月8日准备了“蒙疆建设基本计划”。其要点为“在促进蒙疆地方的统一、提高民生、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设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此，在军的幕后指导下，蒙疆建设以1941年基本完成为目标，重新审查原来计划，迅速制订将来的具体方案。”

据此，联合委员会立即听取各界意见，开始审查“蒙疆政权强化方案”。8月11日设立“政权统一审议会”（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谘询机关）。26日该审议会就新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名称等进行协商的结果，建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工作。最大的问题是名称问题。因为当地方面，尤其是蒙古人，对蒙疆的独立，有着强烈的愿望，所以审议会提出的原案是“蒙古联合自治国组织法案”，但根据驻蒙军及陆军中央的意图，最后落实为高度自治政府。（注：德王将来独立业已内定，只是不便正式宣布，但德王常在非正式场合，自称为“蒙古邦”。）

9月1日在张家口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就任了新政权的主席，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蒙古军总司令部长官为李守信，并任命了其它政府首脑。

所谓“将蒙古作为高度的自治区，承认中国主权，实行内政独立”一事，1938年末，日本政府在决定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之际，早已承认在案。这个方案对调和希望在中央政府下统一全中国的汪兆铭，与热望蒙古独立的德王之间的对立意见，暂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汪兆铭方面与梅机关之间，在上海的交涉（详情后述）迟迟不见进展。同样，在蒙古高度自治的问题上，汪兆铭方面也难以表示同意。但于12月31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制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大纲”，并在日本方面1940年1月6日的兴亚院会议上得到了承认。在“秘密谅解事项，其一之第三，新中央政府与蒙古自治政府间关系调整要领”中，决定如下。

鉴于蒙疆在国防上、经济上、日满中三国高度结合地带的特殊性，根据现状，承认其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其权限按中央政府规定的内蒙自治法实行。而内蒙自治法的制订，预先与日本方面早已作了协商。

在中央政治会议之前，两政府代表会商，并作了书面协定：（一）中央政府基于现状，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二）关于两政府的关系调整，依照本协定精神，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另行协商。

其后，关于蒙疆的地位，于1940年11月，在日华基本条约中，用大致和以上相同的文词，作了规定，但内蒙自治法则始终未能制订。

至于驻蒙军司令部、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蒙古联合政府的关系，每当处理业务时，往往遇到种种问题。在冈部军司令官的笔记中，也有如下记述：“在政府内部，日系官吏和当地官吏，完全脱离，即在日系官吏内部，也有派系斗争。军幕僚与司令部人员，尤其是下级人员，任意与政府为难，常有强制实行的倾向。联络部隶属军司令官的统制之下，

如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进行工作，则将完全驾空于上，或政令不能统一，似此，难免有被当地方面欺骗的危险。”

新民会的活动

1939年度新民会的活动，主要是扩充地方组织，努力进行彻底的教化，以适应确保治安奠定临时政府基础的需要。

组织训练工作，作为县指导部的实际活动，采取如下措施，（一）开设青年训练所；（二）为建设乡村作准备，设置实验村；（三）指导分会的组成；（四）组成和扶植农村合作社等。

注：截至1939年末，组成分会292个，分会员125,582名，开设青年训练所115个，毕业人数为12,822名，青年团58个，团员260,337名，少年团及少女团86个，团员49,275名。

宣传启蒙工作，由中央指导部发行了报纸“新民报”、周刊杂志“新民青年”等，并整理抗日图书，禁止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及国民党的图书。各指导部寻求机会举办讲演会、电影会、日语讲习会。另外，利用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机会，于7、8月中在全华北展开了反英运动。

设置下列机关实行群众教化工作。

一、农村自治讲习会——培养讲习会的实际工作人员。

二、建设辅导委员会——促进农村改革工作，并成为农业合作社农村分会的基础。

三、新民会问事处——担任群众中的商谈、和解、调停工作。

四、新民茶馆——于进行教化的同时，听取群众的真正呼声。

五、阅报室——附设于茶馆内，陈列供一般阅览的报纸和有关新民会的书籍等。

改革工作的主要努力用之于合作社。

过去中国的合作社违反了本来目的，已成榨取机关。新民会接受从临时政府移让的有关合作社的一切经营，在新民会合作社中央会的指导下，重新组织各县合作社、乡村合作社，以谋求增进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福利。为此，合作社实行了统一购买及统一利用贩卖事业、金融事业、设备器材等。1937年末，新民会从政府接收的合作社总数为1,975个，至1939年末，增为4,104个，社员总数达143,531名。

在保定开设了新民医院，作为新民会的医疗设施。同时，在地方设立了48处按成本收费的诊疗所，努力普及卫生保健思想及掌握民心。此外，今夏大水灾之际，竭尽全力进行了救济活动。

9月12日，安藤纪三郎中将就任新民会顾问，同时对该会首脑进行了调动，并洗刷了原来的满洲色彩，以期整顿刷新该会阵容。此外，新民会会长职务，因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力辞，一直空位。至12月2日，决定推戴王委员长就任会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教一致、府会一体。同时，内政部长王揖唐、安藤顾问、缪斌中央指导部长三人，就任了副会长。顾问辅佐官片桐护郎少将就任了顾问，使部的阵容为之一新。

当时，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少将（后为中将）

回忆如下。

一、一般群众并不理解新民会是中国的机关，认为与军宣 抚班一样，是“大日本新民会”（军宣抚班由于削减陆军军费以至撤消，而与新民会合并。因此，新 民会就越发带有日本气味）。

二、新民会在最初原拟成为思想教化团体，但其后却变成 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社的 关系终至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因此，大部分 与实践不相适应的思想运动 均成泡影。军方本来自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培育，但其结局，虽 强行灌输占领军所赶制出来的“新民主义”，却非当地民众所能 接受。

三、军方对新民会的人员，尽量少安排 日本人，而多用有才 能的中国人，但获得人才并不容易。

四、总之，必须采用最容易 掌握人心的指导原则，开展与民 众生活密切关联的各种运动。

天津租界问题

1939年，日本与英、美、法各国间的关系，围绕在华权 利问题进一步恶化。

问题之一，即在日军占领地区内有关第三国的活动和权 益问题。在这方面，由于日军作战行动虽使 第三国活动受 到制约，但仍然阻碍着日军作战行动及当地政策的执行。而且中国方面利用第三国进行反日活动，特别是各国的租界， 成了争执的中心地。

在上海和鼓浪屿（厦门）公共租界中，也经常发生暴力 事件，英、美、法共同协力对抗日本，形成了难以对付的局 势。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原文如此——译者），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1938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年2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4月9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事件一发生，天津市公署立即向英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引渡犯人。15日通过日英共同搜查，检举了四名嫌疑犯。调查结果，判定其为犯人后，日本方面便要求引渡。但是，英国方面以证据不充分为理由，拒绝引渡，交涉难以进展。5月6日，天津防卫司令官（第二十七师团长）指出，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

6月13日，天津防卫司令官终于发表了隔绝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14日，自午前6时起，进入了实行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及从万国桥（今解放桥——译者）起到

白河下游，开始了盘问和检查。声明中宣布“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改变援蒋态度，根绝金融、经济、思想的扰乱政策。在英租界当局认识华北的新形势，并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前，决不罢休”。阐明了日本方面的意图。

6月23日，临时政府通过驻北京英、法大使馆，向英法两国提出以下五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华北方面军对此全力支持，并发表声明坚决贯彻这一意图。

一、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及共产系统分子立即引渡临时政府。

二、协助临时政府实行通货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及现银运出。

三、协助临时政府检查管理租界内的中国银行、钱庄及商行、公司等。

四、对违反临时政府政策的设施、言行、出版物等，严加取缔。

五、今后实行共同管理。

于是，事态从禁止法币流通的老问题，发展到新的局面。在这期间，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提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并邀集现地有关人员，在东京进行了交涉。

东京会谈从7月15日开始，有关原则问题于22日达成协议，24日进入天津问题的具体讨论。然而，26日美国政府突然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11年缔结），希图

牵制日英会谈。因此，英国态度立即转为强硬，并提出“禁止法币流通和移交现银意味着英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并且对第三国也有深刻影响，因而不能同意”的反对意见，因此，双方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当时，鉴于法币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英国及重庆政府为了维持其价值，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交涉越发难以进展，英国方面明确表现出要借国际压力，谋求会谈的对其有利开展。因此，日本方面撤回现地代表，于14日离开了东京。

18日，由于英国方面建议抛开法币问题进行讨论，因而21日会谈终于破裂。

从此，在华北，以新民会及其它民间团体为中心，展开了积极的反英运动。

注：1940年4月，英国对挪威作战失败后，转向了妥协的态度。4月下旬，根据英国方面的建议，再次举行了东京会谈。交涉得到顺利进展，终于在6月19日，达成了日英协定，20日达成了日法协定。于是，现地军队于20日18时，解除了对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

七 中国方面的状况

国民政府（蒋政权）的抗战态势

武汉陷落后，自1939年1月20日起至29日止，国民党召开了第五届五中全会。

蒋介石在会上，以“抗战第二期的政策战略”为题，发

表演说，提出基本方针：“在抗战第一期，努力消耗日本的力量、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以奠定长期抗战的基础为其主要任务；在第二期，继承前期的成果，努力发挥抗战力量，坚决达到抗战的胜利和完成建国的目的。”并且抨击了对日和平论，强调坚持抗战。另外，五中全会决议，合并原来的“国防最高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2月1日，蒋介石就任委员长，总揽党、政、军大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

关于第二期作战方针，何应钦作了如下发言。

国军的第二期作战是：一方面保持我军的有利形势，继续消耗敌人力量；同时在另一方面，积极进行部队的整备训练，培养战斗力，寻找机会，转向大规模的攻势，以驱逐入侵之敌。

为此，注意事项如下：

一、各战区的第一线，要保持从武汉转进后的状态，并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加强扩大敌占区内的游击，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造成于我军有利的形势，以便今后作战的顺利进行。

二、将全部正规军分三期实行整备训练，待训练结束后，预定开始大规模的反攻，但在情况有利时，随时进行反攻。

三、努力从事积聚武器，调整指挥机构，整备交通，扩充空军等各项工作。

关于第二期作战指导，中国国民党的党史中有如下记述。

作为本期作战的设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通过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巧妙配合，不论南北战场，均应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使敌人无暇应付。其实施要领，不仅是单纯的阻止敌人西进，在后方地

区应努力培养我军战斗力，动员群众一致抗战，即所谓“变 敌后方为前方”。

关于整训与部署

“整训”的意义在于改善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和财经，励行教育训练等，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完成今后的作战准备。

武汉会战以前的中国军作战兵力，约为200个师，但在三年后抗战第二期末，已达到296个师、29个旅，总兵力为500余万人。另外，部队的整训与作战同时进行，一方面加强第一线部队，进行积极抗战，另一方面，将长期战斗部队，撤回后方，进行了整编和训练。

抗战第二期内，重新划分的战区如下（1939年1月）。冀察、鲁苏方面为游击战区，其它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敌占区的游击。

第一战区 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 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 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部及浙江、福建两省。

第四战区 广东、广西方面。

第五战区 安徽西部、湖北北部（长江以北）、河南南部。

第六战区 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方面。

第七战区 江江西部、湖北南部（长江以南）、湖南省。

第八战区 陕西方面。

冀察战区 冀察方面。

苏鲁战区 苏北及山东方面。

另外，为了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的各战区，在桂林及天水（别名秦州——甘肃省）增设行营，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的行营。

与此同时，为了整顿党及行政机关，特别是其所属组织，于3月在日军占领地区内，设置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根据1月召开的五中全会决议，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统制战地，其目的在于使党、政工作配合军事上的需要。在各战区设置分会，统制省以下的党及行政所属组织，担当发动群众一致抗战的任务。

2月，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的主持下，召开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检查过去政治工作的缺陷，同时，讨论了今后的工作实施要领，并立即执行，其要点如下。

指出抗战第二期方针必须重视政治工作，据此，军事委员会决定“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以党为基础”，各部队一律组织特别党部，进行政治训练，使之担负特殊任务。

为此，各军事学校应制订政治训练计划，增进抗战建国中坚干部的政治才能，以巩固其信念，有重点地实行政治教育，此乃当务之急。

另外，在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同时，还须融洽军民感情，为了实现军队行动与群众力量密切配合的军民合作，必须逐步采取措施对群众进行动员、组织训练。

军事委员会于5月公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随后陆续制订了补给、训练、奖惩、纪律等20余项办法，以加强和扩大游击体制。

7月6日，当中国抗战二周年前夕，蒋介石以“告战地民

众书”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其中阐述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既扩大而又巩固，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发挥‘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近一年来，在敌人后方，我们的一切行动及配备，已经取得了与全面抗战的紧密联系。今天，在我们广阔的战场上，对敌已形成重重包围，并能进行前后夹击的形势”。号召民众积极发起游击战争。

然而，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故在国共并存的地区内，共产势力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国民党方面逐渐受其侵蚀。斯诺对此情况，叙述如下。

蒋介石采用共军的几点意见编成游击队。但是，这些新编的游击队，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其理由之一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而且，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中共的动向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38年10月，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对于今后的方针作出重要的决议。即一致确认领导抗日战争是党的责任，领导权不能让给国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统一战线内有团结也有斗争，“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妥协主义是错误的；全党应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党

的主要活动方面在于日军的后方，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或将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领导下的合法运动的想法，是错误的。

根据这个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的各个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建立了人民武装，其势力有了显著扩大。

1939年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决定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由于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日本以全力进攻中国，企图迅速处理中国问题，并准备在将来将冒险行动扩大到国际范围。为此，日军在其占领地区内，扫荡抗日根据地，并且一定要从事经济开发、树立傀儡政权。对我方则以政治攻击为主，军事攻击为辅。所谓政治攻击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并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中共为了党的团结与扩大党的势力，对日本及国民党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并且努力防止动摇。

中共中央1940年1月28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明确了当前党的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攻击和政治攻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

通过这样的斗争，共产势力显著扩大。对此，胡乔木曾有如下叙述：

截至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从三年前的四万余人，已发展到近50万人，抗击了在中国的日军的半数。在三年的作战期间，夺回了县城150处。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发展到近一亿。共产党员也从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从辽宁、察哈尔、热河、绥远直到广东、海南岛，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组织。（未按中文资料核对——译者）

在此期间，共军与人民抗日武装组织结成一体，在各地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根据中共方面的资料，其概况如下：

一、将华北第一个解放区晋察冀边区的基地——五台根据地，向北部太行山脉一带扩大，抗击日军的治安肃正，进行了活跃的游击战（反扫荡）。

二、冀中平原游击战在地形上极为困难。1938年末至翌年春，第一二〇师进入冀中，支援了吕正操的部队。其后，针对日军的扫荡，不断地进行反扫荡，使日军“将占领的点和线，进而扩大成面”的企图，未能实现。平原游击战胜利的基本要素，在于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紧密团结，以及正规军、游击队、群众武装三者的有机配合。

三、1939年春，肖克组织了冀察热挺进军，在平北、冀东地区进行游击战，开始建设冀热辽边区的抗日根据地。

四、从1937年末开始，刘伯承指挥的第一二九师，于晋东南的大行、太岳地区开辟抗日据点，在山地进行游击战，并图加强该据点。

五、在冀南，于1938年8月设置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来，与冀中相呼应进行平原游击战，特别是通过军民结合的广泛群众组织，围绕交通道路进行了斗争。

国共矛盾的激化

1938年末，国共矛盾已如前述，但进入1939年后，国共的地方冲突事件在各地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共工作。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为了加强国内统治，采取了各种措施，再次统一了C·C系统及兰衣社等组织，分别组成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另外，三民主义青年团也于9月再次实行改编，在陈诚领导下，加强了对抗共产党的青年工作。

6月，国民党公布了“异党活动限制办法”，9月又公布了“异党活动问题处理方案”。前者规定严格限制共产党的思想、言论、行动，同时还附加了实行连坐法、保甲组织和特务工作；后者则是对共采取军事处理。共产党对此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及反间谍斗争，并一心一意地努力扩大其势力。

第三章 1940年度的治安战

一 根据全面形势的剧变 所采取的各项施策

针对国际形势发展 制订应付时局的措施

在欧洲方面，1940年3月苏芬停战不久，4月战端又起。4月9日德军向丹麦、挪威进攻，立即将该两国占领。继于5月10日，德军又突然在西线大举进攻，将英、法、荷、比军的主力击败，而向英法海峡和巴黎继续进击。英国派遣军40万人在敦克尔克陷于重围，直到6月上旬才算突围成功。6月10日意大利参战，14日巴黎陷落，22日德法签订停战条约。及至8月，德国对英本土的空袭突然升级。

在日本朝野，见到欧洲战机的动向，加深了对南方的关心，随着德军“闪电战”的进展，乘有利时机南进的呼声立即抬头。于是转变外交，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确立举国一致体制等问题，顿形表面化。7月16日米内内阁总辞职，22日近卫内阁成立。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政府的《基本国策纲要》（26日阁议决定），同时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本纲要列入国家机密，决定

了日德意三国协作方针，以及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和南方问题等重大国策。

纲要的提案理由如下：

……总之，帝国为了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动，改善国际国内的形势，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在国际上，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迅速调整对苏外交；在国内，强化战时体制，充实各项战备工作，实为当务之急。

纲要的方针和事变处理要领如下：

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

方针

帝国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改善国内外的情况，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之前，应考虑内外情况，决定向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的局势转移。

对以上问题的各项准备应加紧进行。

要领

第一条：为了处理中国事变问题，应集中运用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特别要彻底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采取一切手段，务使重庆政权早日屈服。

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发展的良机，积极促其实现。

第二条：对外施策，在加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应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按下列要领进行：

一、首先以对德、意、苏施策为重点，着重于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对苏国交的飞跃调整。

二、对美应坚持公正的主张，严肃的态度，为了贯彻帝国必要的施策，对与之俱来的形势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也应深切注意其动向，尽量避免由我方引起不必要的摩擦。

三、对法属安南及香港按下述要领行事：

- (1) 为促使法属安南(包括广州湾)彻底断绝援蒋行为，并要求其同意负责对我军的补给，允许我军过境及使用飞机场，为帝国获得必要的物资给予方便。为此，根据情况可以使用武力。
- (2) 对香港，为彻底切断在缅甸的援蒋通道（指滇缅公路——译者），要求予以配合，并为消除敌意加强各项措施。
- (3) 对租界，首先要求消除敌意及撤退交战国的军队，再逐步导致由中国收回管理。
- (4) 采取前两项措施时，有关使用武力问题，按照第三条所示。

关于当时统帅部的指导思想，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冈田重一大佐回忆如下：

肩负着中国事变的重担而又对南方行使武力，这是极端冒险的行动。然而解决中国事变又别无良策。中国事变乃是国际形势之一环，如果错过这一最后机会，则不仅过去的努力成为泡影，而且日本还不得不退回到中国事变以前的状态。经过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摆脱解决中国事变的困扰，从而必须利用国际形势的非常局面。中国事变放在以后听其自然解决，当前则正是南进的天赐良机。这是统帅部内心的意思。

其后，面对新的形势，中央的各项措施都是按时局处理纲要的精神逐一进行的。9月23日华南方面军，为达到切断

援蒋补给线的目的，开始向法属安南部地区进军。27日日德意三国条约签订。

在此以前，大本营鉴于中国派遣军宜昌作战的进展情况，为了确保宜昌，6月16日向武汉地区增派近卫、第四两师团。又根据华南方面的情况，6月26日奉天皇命令将近卫师团编入华南方面军所属的第二十二军。继于7月23日以“大陆命”第438号把华南方面军调出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归入大本营直辖。这一系列调动的理由，是为了适应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谋求政战两略的步调一致，以便在运筹上作到神速自如。

这些措施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极力反对，因为中央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以及华南方面军之间，在对形势估计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派遣军认为，应结合扶植汪政权工作、“桐工作”（对重庆工作代号——译者）等的进展，对重庆政权施加军事压力，以期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而中央统帅部和华南方面军则认为，应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着重解决香港和法属安南的问题。

7月23日“大陆命”第439号，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分派了任务。在该命令中，特别强调了应付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第三国的战备问题。

“大陆命”第439号命令

一、大本营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必须努力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为适应情况的变化，迅速加强对第三国的战备。

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须按下列指示，负责摧毁敌方继续作战的意志。

(1) 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地区，并保证宁波附近要地之安定。首先加速恢复内蒙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各重要区域，以及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治安。

(2) 确保岳州以东扬子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以武汉三镇、九江为根据，摧毁敌人继续作战意图。作战区域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3) 超越上述地区的地面作战，另行指示。

(4) 适时进行全面空战，扰乱敌之战略中枢，阻止敌空军的重新编成，空战范围为中国全境。

(5) 在上述每一作战中，有关海岸及沿海水域以及空中作战，必要时应与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协商进行。

(6) 为了促使抗日势力衰亡，应加强对中国全境的谋略工作。

关于华南方面对中国的谋略工作，着由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7) 根据作战上的需要，可派出部分军队暂时进入满、中国境附近的热河省内。

三、华南方面军司令官须按下列指示，负责摧毁敌人继续作战意图。

(1) 占领广东附近、汕头附近和海南岛北部的各要地，及沿南宁——龙州道路地区，协同海军切断敌方补给联络线。

广东附近的作战地区，大致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由三水到下游的西江之间。

- (2) 超越上述各地区的地面作战，另行指示。
- (3) 当中国派遣军或中国方面舰队（指日本的侵华舰队——译者），由华南实行空中进攻作战时，应密切与之配合。
- (4) 在中国派遣军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的谋略。
- (5) 为了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应作好对第三国作战的必要准备。

根据以上各项，过去赋予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务，现已变更如下：

- 一、解除在华南地区的任务。
- 二、在保证治安稳定的地区内，增加了宁波附近地区，第十一军的作战地区包括宜昌。
- 三、空中进攻作战范围仍为中国全境，但必要时应与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协商进行。
- 四、负责加强对全中国的谋略工作，关于对华南方面的谋略工作，着由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促进汪蒋合流工作

3月30日，新国民政府成立。今后的问题是，日本将在何时承认新政权，以及签订建交条约。日本陆军当局想在承认之前，首先促成新政权和重庆政府的合流，从而全面和平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因此加紧了对重庆的工作。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思想并未得到一致，从派遣军到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意见。

有关这一情况，当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少将（后升中将）在5月上旬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曾作过如下

的发言：

其中主要的对立意见有：一、主张重点放在以重庆为对象解决事变问题的方案，和主张以扶植新政权为主而不考虑重庆动向的方案。二、主张从战胜国应得权益出发的日本本位主义的方案，和主张着重于对新中国的建设，而避免榨取政策的方案。三、主张放弃华南、华中，确保华北的意见，和与此相反的重视华中、华南的意见。由于这些对立意见，使有关部门在事变处理上大伤脑筋。

根据当时陆军省军务局课员石井秋穗中佐（后升大佐）的回忆，1940年可以说是徘徊于重庆工作和南京汪政权工作之间的一年，也就是徘徊于事变速决和长期持久的问题之间的一年。恰好就在此时，欧洲西线战场形势急剧变化，我们的视线也开始移向南方。

关于承认新的中央政府问题，曾任中国派遣军参谋的堀场一雄中佐说明如下：

中国派遣军总部当局坚持既定方针，以汪蒋合流为目标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综合各种意见，在当地统一指导各方面对重庆的工作。在五月上旬作出决定，尽最后努力争取在秋季解决事变问题。如果这一方案落空，约在年底以前作最后决定——正式承认新政权，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新局面。

关于这一问题，石井中佐回忆如下：

汪兆铭等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就曾要求我方及时予以承认。而政府当时决定，“正式承认新中央政府的时机，将考虑内

外形势而定，约在日华基本条约签订之时”。如果仅是缔约交涉，并不需很多时日。然而，就在4月11日兴亚院的联络委员会上，讨论条约起草时，对汪政权在事变解决中能起多大作用产生了疑问。另外，对“桐工作”（重庆工作）的进展却寄与很大希望。因此，不得不设法拖延签订条约和承认新政权的时间。

5月29日，兴亚院专门委员会草成条约初稿，30日拿到陆军省审核时得出的结论是：一、如果承认汪政权，就必然形成长期持久战。二、关于长期持久战的决心和处置，另行研究。三、即使承认汪政权，该政权也无发展前途。

这些意见，和过去的见解是一致的。

对于重庆的和平工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对新政权的承认长期拖延。至9月末，看出“桐工作”已经无望，从而，只能由政府进行最后的和平工作，视其结果作出决定。

我于10月初开始起草长期持久战的方案。1940年，是对重庆政权和汪政权衡量取舍问题，进行激烈争辩的一年。

4月1日，阿部信行大将被命为对华交涉的特命全权大使。他的任务是：一、对新中央政府的协作（根据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行事），二、在中国，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及日中新关系的条约签订事务（根据外务大臣的指示行事）。有关重要政策的处理及有关治安问题，应与有关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另外，与兴亚院联络部虽无直接领导关系，但有关业务可进行联系和协商。对我在华的外交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给予指示。

梅机关（对汪工作）的大部分成员均被编为全权大使的

随员，并准备根据新政府的邀请，派出影佐少将为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青木一男为经济委员会的最高顾问。日华条约交涉，从6月初开始，日本政府提出了兴亚院审议过的提案。这一提案主要是依据去年末，日华调整协议（密约）的精神加以若干修正而成的。8月28日，阿部大使和汪代主席间的条约交涉宣告结束。

国共走向妥协的努力及双方的交涉

1940年春，八路军在河北省和山西省中北部，迫使国民党势力后退，并在山东省西部进攻孙良诚、高树勋两部，而进入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地区，企图与由长江以南地区北上的新四军会合。

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的斗争，逐渐强硬。5月4日对中共东南局发出以下指示。

注：东南局是1938到1941年代表中共中央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当时的领导者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因而中共中央才要求他坚决执行中央方针。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执行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对国民党的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反动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均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局势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必须以斗争求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越出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纵无上级发给的军费，也要独立自

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根据地中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反共分子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岸，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速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由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以上按原文译出，经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对照，日文有颠倒次序及词句删改之处——译者）

如果按照这一指示使事态发展下去，其结果必将因国共全面冲突而招致统一战线的崩溃。然而在对日抗战过程中，国共分裂是不利的。因此，双方均深感有调整关系之必要。于是7月16日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统帅部派出何应钦、白崇禧，中共方面派出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进行会谈。在此以前，中共方面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所谓《六月提案》。其要点如下：

- 一、保证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 二、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解除对中共刊物的出版限制；
- 三、解放（日文原文如此——译者）游击区的地方政权；
- 四、组成陕甘宁边区23县的边区政府，使之隶属于行政院，以现边区主席林祖涵任边区政府主席；
- 五、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其所属游击队应与各战区游击队享受同等待遇；
- 六、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
- 七、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应设作战境界线；
- 八、对中共军队的武器、弹药、粮秣等的供给，应与国民党

军队同一标准。（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者）

国民党当局也于7月2日提出了相对的提案，这个提案不仅阻止中共扩大势力，并且削减中共现有的势力，限制中共的独立自主，要将中共完全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7月16日，双方讨论了经过修正的7月2日提案，即所谓《国民党的7月提案》。

周恩来把国民党的7月提案带回延安，经过研究，又提出了对中共有利的《八月提案》。其后，周恩来又于9月提出稍作让步的下列提议。

一、第十八集团军的作战地区应从第二战区扩大到山东全省和绥远一部。

二、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的全部军费应由国民党政府支给。

三、各游击队的游击区限定于战区之内，各战区内的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划分作战境界，各自在所管境界内进行战斗。

（未与中文资料核对——译者）

上述多次的交涉，并未解决任何根本问题。中共方面继续加强独立自主，以既成事实使国民党承认。而国民党方面则指责“中共不服从中央指挥，在指定战区以外进行活动，任意扩充军队，破坏中央行政系统，不攻击日军反而企图吞并政府军”。并令中共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从事抗战。

中共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和命令当然不能服从，各地的国共纠纷始终不断，尤以江苏、山东地区为甚，事态日趋恶化。

注：在国共双方交涉期间，共军对日军进行了百团大战，这是值得注

意的一件事。

现将其后状况概述如下：

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命令中共所有军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共对此命令未予服从。12月9日又再度命令中共：“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须于12月底以前过江北上，江南的新四军限12月底撤至长江以北，翌年一月末移驻黄河以北。”对此，中共方面于12月21日提出“对中共军队的扩编、补给应与政府军一律平等、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将担任封锁的政府军调往抗日前线”的强烈要求。

至此，国共关系益趋恶化，形成无法妥协的局面。

二 华北方面军关于肃正工作的施策

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共军则巧妙地乘隙渗透其势力，或以武力迅速扩大地盘。

华北方面军与占领区外围的重庆系军队相对峙，而在占领区内特别在山西北部、东部、河北一带及山东大部地区，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

1940年3月末，当时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分布状况，据中国派遣军的《战时月报》记载如下。

华北方面的敌情概况

一、内蒙地区

在后套方面，傅作义企图夺回五原，从3月中旬开始进攻，21日占领五原。到25日，由于我驻蒙部队的反击，其主力撤退到临河以东地区。

二、山西地区

3月上旬，共军第一二九师的三八五旅和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侵入林县、陵川一带（太行山脉南部地区）。给中央军第九十七军和新编第五军以重大打击，收编了第九十七军的大部官兵，新编第五军所属约3,000人向日军投降。

在晋南方面：卫立煌一面在陵川、高平集结第二十七、第九十三、第十四、第四十七军共约十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太行山区的第十八集团军。同时，卫立煌于3月19日亲赴泽州，同朱德等共军首脑会谈，协商解决国共纠纷。事后，共军陆续撤退，该地区的纷争暂告结束。

在晋西方面：山西军受国共纷争的影响，更由于共产势力的渗透，各地发生内讧，指挥紊乱，战斗力显著降低。重庆政府唯恐山西军的共产化，乃于3月中旬，命中央直系第九十军（三个师），东渡黄河进驻乡宁，对山西军进行督战。

三、河北地区

在冀南和鲁西一带，石友三军（冀南地区游击队）受共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和东进支队的压迫，兵力丧失大半，于3月中旬撤至定陶、曹县一带整编，并企图东山再起。另外，在河北省内的国民党势力也日渐衰微。冀察战区司令官鹿钟麟于4月上旬，提出辞职逃往省外。以后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该职。

四、山东地区

苏鲁战区的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军仍徘徊于泰山山脉一带，战区司令官于学忠于4月1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支部，企图加强军政两方面的活动。

在鲁北的共军，以一一五师为骨干的东进纵队（由一一五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在鲁西以一二九师正规部队为骨干的东进挺进纵队（肖华指挥），和在鲁东、鲁南的山东纵队（第一一八支队）以及在皖北、苏北的新四军部队等，为削弱国民党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正在积极行动。

鲁西地区的菏泽、郓城、平阴、肥城、济宁、鱼台、汶上、嘉祥、钜野、聊城、博平等各县的大部分均为共军所掌握。

五、华北方面占领地区内的敌兵力如下。

(1940年3月末)

正 规 军	中央军	约38万	约500,000
	中共军	约13万	
非 正 规 军 (匪团)	共产系游击队	约11万	总 数 约 735,500
	共产系匪团	约5万	
国民党系游击队	国民党系游击队	约6.7万	约334,400
	国民党系匪团	约7,000	
	纯匪团	约1,500	

(原文数字如此——译者)

六、国共对立的状况

如前所述，在华北方面，国共对立气氛日益激化。在山西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两者间的战斗正在进行。这些情况预示双方由合作逐渐走向破裂。而各处均以国民党势力的败北而告终。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今后治安肃正的对象，无疑是共产党势力。

注：1940年3月22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曾向陆军次官提出过下述报告，他提出要警惕中共和苏联的结合。要积极利用国共相剋的时机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当时，共军虽正在积极扩充军队，但尚未掌握其确实情况。

对国共相剋的观察

一、（笔者略）

二、（前段笔者略）共产党首脑自去年以来，屡次向重庆政府要求将共产党地下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合法化，承认共产党据有的地盘，支给与现有兵力相称的军费（当时只支给八路军每月60万元，新四军每月25万元的军费）。但是，重庆政权却于去年末秘密颁发了《禁止异党活动办法》，对中共上述要求予以拒绝。中共则决心壮大实力，争取就地自力生存，将分散的兵力集中统一，进而破坏当地国民党的行政组织，建立共产党的行政组织，自行征税，袭击中央军及其行李辎重，以获得武器弹药。

三、总之，在国共斗争的现阶段，重庆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华北的打算，共产党则极力巩固既得地盘，扩充武力，就地图存，进而驱逐国民党势力。这实际上不过是争地盘的斗争而已。

然而共产党一旦沟通其占领的地盘及补给路线，特别是打通西北的通道，即可直接得到苏联援助，那就无论对国民党或对日军都是严重的问题。鉴于苏联已与芬兰和解，如果重庆政府的抗战态度软化，估计苏联很可能直接援助中共。

四、中国派遣军，在当前密切注意国共相剋的动态，及时地利用有利的机会，做为解决中国事变转折点。

五、共军的编制概要（参看插表）

华北、华中治安状况概要 1940年春，当时的华北、华中部分城市的治安状况（见插表）

注：该资料是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委托新民学院职员本·田多利卫氏，于1940年2月14日至3月9日间所作的实地调查报告书的摘要。这是军外人士对治安状况的观察，颇值重视。

华北、华中各主要都市及其近郊的治安状况

地名 月日	治 安 状 况		交通通信状况		维持治安的手段	意 见
	昼 间	夜 间	铁 路	电 话 线 路		
上海市及其附近 2.14至2.28	1. 公共租界的治安状况较好，日本人和亲日人士单独行动不安全，租界地更为危险。	公共租界特别是英法租界单独行动不安全，租界地更为危险。	上海——南京，上海——杭州间列车一日运行两趟有发生。	电线被切断，电线杆被破坏等事时有发生。	英法租界公租界的部分地区由该两国军队及工部局警察维持。	英法租界及难民居住区是流氓、盗匪的温床，是治安上一大病根。
	2. 2月15日起，海军陆战队解除交通限制。				除上述地区外，由日军、日本领事馆警察、上海特别市警察维持。	
南京 2.21至2.22	1. 城市治安良好，单独行动亦无危险。	城内虽较安全，但单独行动无保证。	最近良好，夜间亦无危险。	切断电线事少。	1. 城内外由日军、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维持。 2. 汪政权的军队、警察正在培训组建阶段。	比上海诸事就绪，治安维持亦较好，但仍未完善。
	2. 城外数华里以内安全，稍远即有危险。					

徐州	2.25	1. 城市平静，城市比较安本年内陇海各地电线， 但城外2——3全，但单独线未遭破电线杆均发 华里的村庄，行动不安坏，津浦线生过破坏事 昼间单独行动全，城外则被破坏事故。 亦有危险。更危险。甚多。	1. 各主要地 点均有日 军驻在与 当地中国 警备队、 警察共同 维 持 治 安。 2. 自去年9 月在徐州 成立了中 国 青 年 党，在日 军的指导 下，培养 其成为新 民会的前 卫战士。	地处华北 华中的连 络要冲， 当地中国 警备队、 警察共同 维 持 治 安。 不断，治 安状况准 称良好。
		城内治安较城内单独行开封——大最近未遭破城内外的治 好，单独行动动亦甚危同间的列车坏。 亦无危险，但险。	一日运行一 次，开封— 新乡间的新 开线一日运 行两次，最 近时遭破 坏。	由于和敌 安由日军和 据点郑州 中国警备 接近，四 队、警察共 同担任，警 备队是由投 降兵组成 的。在市、 县自去年5 月以来已组 成河南省自 卫队。
开封	2.25	城内治安较城内单独行开封——大最近未遭破城内外的治 好，单独行动动亦甚危同间的列车坏。 亦无危险，但险。 城外则极为危 险。	一日运行一 次，开封— 新乡间的新 开线一日运 行两次，最 近时遭破 坏。	由于和敌 安由日军和 据点郑州 中国警备 接近，四 队、警察共 同担任，警 备队是由投 降兵组成 的。在市、 县自去年5 月以来已组 成河南省自 卫队。

太原、榆次 3.1至3.4	两地在城内单独行动均较安全，城外危险，省内95县仅安全。太原、榆次间的长途汽车曾发生被共军袭击等事。	太原一运城间大同间列车每日运行两趟，听令于省政府。	在夜间电线杆被破坏事故，最近渐减少。	1. 两地均有日军和中国警备队警察维持治安。 2. 最近中国方面积极加强警备兵力。	受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影响，气氛确与其他地区不同。
	1. 城内和城外治安良好。 2. 城门守卫只由中国警备队独立担任。	保定—北京本年只发生城外单独行驶一日运行过1~2次破动难于保证三次，保定一石门，一近并未发日运行两生。	1. 城内治安由日军、中国警备队警察共同负责。 2. 中国方面的警备兵力逐渐加强，各县的保安队正在组建。	在其他地区很少见的安定局面，城门并不设岗哨。	
	县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治安较好。城西北、西南的山区中共军的活动频繁。	夜间中央军侵入，拉走青年，掠夺物资。	昼间保定满城间长途汽通，保定满城间长途电行。城内电话畅通，但线路时被1939年4月切断。	少数日军和县警备队维持治安，保安队成立。	城外山岳地区有中共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队活动，其势力不可轻视。

1940年度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

华北方面军过去一年的治安肃正工作，由于各兵团的积极努力，不仅占领区内的治安已经恢复，而且各项建设的施策也逐步迈入正规，出现了正常发展的局面。但距离解决事变所需要完成的肃正建设目标尚远，必须进一步努力奋斗。因此，1940年度，不仅要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各项施策，争取治安地区的扩大，更须推动有关建设部门，为奠定东亚新秩序的基础——“华北特区”的建设而奋勇前进。

在作战方面，自去年第二期以来，共军势力逐渐抬头，及至第三期，已开始对重庆军及杂牌军进行蚕食，其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不容轻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另外，由于交通运输断绝，严重影响华北建设。因而整顿交通运输，尤其是开通内河航路，对肃正建设的促进，治安地区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治安工作，要求将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模范区”，与铁路、水路等沿线的“延长治安区”连结贯通，以逐步扩大治安区域。在“模范区”要结合巩固治安，着重加强自卫组织和扩充以自主经济为基础的合作社组织，以实现名副其实的“模范治安区”。同时，要做到食用充足，稳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努力促使民众生活的安定。

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分为两期，第一期由4月到9月末，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

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工作，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尽快建成特殊地区巩固的华北，用以示范并指导中国的治安建设。

为此，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同时，将治安建设的各项工 作集中于“模范区”的建设，要引导中国方面各行政机关，积极自觉地扩大群众组织，特别要整顿新民会以加强其领导。

另外，凡对我国生产发展有用的重要资源，应促进其开发及取得。

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于3月19日，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传达了事变第四年的“肃正建设的有关实施方案”，在会上，多田方面军司令官在训话中表明了下述决心。

实现肃正建设，其前途甚为辽远。尤其敌人积极强化地下组织，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要剿灭这种地下组织的势力，存在很大困难。在建设方面，也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带来各种障碍，欲求速见成效，看来更为困难。此外，现阶段所采取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战法，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产生不利的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方面军根据过去一年的宝贵经验和治安建设的成效，决定了下期肃正建设的方针。要求全军一致，为确保治安，促进华北特殊地区的建设。这是解决事变的关键所在，必须共同奋勉，为皇纪2600年增光。

当时的方面军司令官为多田骏中将，参谋长为笠原幸雄

中将，参谋副长为平田正判少将。参谋的阵容如下：

第一课 田村义富大佐，友森清晴中佐，加登川幸太郎大尉，赖富美夫大尉。

第二课 浜田平大佐、堂之胁光雄中佐，田中忠胜少佐，尾关正尔大尉。

第三课 副岛太郎大佐，小幡一喜中佐，堀内秀生少佐，中山忠雄大尉。

第四课 有末精三大佐，山田英男中佐，宫本悦雄少佐，浅井勇大尉。

方面军在这次会上，下达了实施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的命令如下：

一、方面军在1939年度第三期肃正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各项施策，作好本期工作。

二、所属各兵团各部队应按附件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完成各项任务。

方面军有关统一规划事项，必要时另行指示。

上述命令附件的“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如下。

一、扩大1939年度肃正工作的成果，务使讨伐肃正更加彻底，进一步加强各项治安工作，切实恢复治安，并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

二、在讨伐肃正方面，各兵团仍须继续执行“高度分散部署”现行办法，振作士气，坚持彻底讨伐，并加强谍报工作，千方百计查清敌地下组织，特别着重以下两项。

1. 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党团。

2. 肃清京汉、津浦两线中间的冀中地区，打通滏阳河及卫河水路。

三、在治安工作及各项建设方面，仍以“治安第一”为基础，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指导中国各机关，采取迅速有效措施。

1. 强化自卫能力，安定人民生活，建立合乎民情的基层组织。对模范区的一切措施，均应优先促其实现。

2. 推进“日满中连锁国防经济”的建设。

四、积极培养治安军及其他中国武装团体，使之迅速增强战斗力，在皇军的支援下，逐步成为地方治安的骨干。

五、随着治安建设的发展，日军应逐步集结，恢复常驻态势，加强教育训练。

六、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期限，为4月到9月的六个月。

会上，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在说明上述纲要之后，并作了以下讲话。

各兵团长，今后对各自作战地区的作战、政务，应负统一指挥之责，并须全力以赴进行肃正建设。各兵团特别是各军应切实掌握所在地的中国省公署，推动适合各省特殊性的政策并促其实现。对各自负责的地区，必须满怀热情，主动承担建成王道乐土，完成第一期肃正建设的任务。所谓对省公署的掌握，只是对各兵团长提出的要求，其他各下级军队指挥官不得直接干涉不必要的政务，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今后随着治安状况的好转，军队将逐步脱离政务，全力从事讨伐训练等军队任务。

接着，参谋长又反复强调了作战和政务的有机一元化问题；各兵团积极完成任务问题；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性，如何

把各项施策具体执行等。

基于上述纲要，制订的要领如下：

要 领

其一、彻底的讨伐肃正

一、为使讨伐肃正作到彻底，前期肃正计划中已有指示，除按各该项指示外并依照以下各项实行。

二、关于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讨伐问题。

1. 各兵团于治安良好地区以外之各地，仍须执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并以之为据点积极进行讨伐，

逐步使据点成为确保治安的有力支柱。

2. 各部队已经克服了长期分散部署兵力的不利条件，更应经常鼓舞士气，积极进行讨伐，以期扩大讨伐成果。

3. 发挥谍报作用，扩大谍报机能，挖出地下匪团。

三、关于讨伐重点问题

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在皇军势力到达后，着手建立政权的地区，对投降的匪团，一律按照“无条件投降”的规定处理，对投降后的匪团，要无遗漏地给以生活安排。

四、关于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问题

1. 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京汉、津浦两线之间，特别是冀中地区，要随着打通水路进行肃正讨伐。下记各兵团应以较大兵力使用于该地区：

第二〇七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十二军。

讨伐地区的范围及其时机，应与打通水路相一致。

2. 根据山西省北部地区共军的情况，由第一军及驻蒙军对之进行彻底肃正作战。其时机依据情况预定大约在6月或6月以后。

3. 第一军于4月下旬开始晋南作战，将治安区扩展到平陆、沁水及泽州平原。为此，在本作战期间给第一军增加配属以下兵力：

由第十二军派出步兵一个大队

由驻蒙军派出步兵两个大队

第三十五师团应准备以一部兵力协助本作战。

五、关于打通水路问题

为打通水路而进行的讨伐，应按以下各项实行：

1. 时机和参加兵团：

(A) 第一期

保定水路	自4月上旬	第二十七师团 第一一〇师团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石门水路	至5月下旬	
滏阳水路		

(B) 第二期

卫河水路	自6月上旬 至7月下旬	第二十七师团 第一一〇师团 第三十五师团 第十二军
------	----------------	------------------------------------

2. 实施要领

(A) 参加第一期讨伐的各兵团，于4月上旬开始行动，到4月下旬部队到达水路沿线一带结束第一次讨伐，将部队进行必要部署，尔后以此为据点进行连续反复的讨伐以打通水路。

在此期间，各作战地区内的第一水路输送队的临时办事处及其指挥的部队，均应归该地区的兵团统一指挥。

(B) 第二期的实施要领另行指示。

(C) 第一期，水路输送队的主力应按第一项指示部署于水路沿线，但须按第一、第二两期的时间划分，相应转移其主力。

(D) 讨伐实施完了后，应在水路沿线各要点经常保持足够的兵力，并准备部分水上游动兵力。

(E) 下记各兵团须于 6 月末以前，编成下述水路警备队：

第二十七师团 500名

第三十五师团 150名

第一一〇师团 500名

第十二军 350名

六、兵力转属、配属问题

1. 4月上旬，由第十二军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在晋南作战期间配属于第一军，至 5 月下旬再转属于第一一〇师团。

2. 5 月下旬，由第二十七师团抽调一个步兵大队，转属于第十二军。

3. 4月上旬，由驻蒙军抽调两个步兵大队在晋南作战期间配属于第一军。

七、关于控制兵力

根据作战的需要，为便于集中使用兵力，须准备下列兵力，必要时由方面军司令官调用。

下述兵力，在调用以前，仍可按正常情况使用。

第一军 步兵二个大队

第十二军 步兵二个大队

驻蒙军 步兵二个大队

第二十七师团 步兵一个大队

第一一〇师团 步兵二个大队

八、对占领区以外的谋略工作

对占领区以外的敌人，进行劝降以及谋略工作，除特别指示者外，统由方面军直接进行。

其二 各项治安工作的进行和经济建设的推进

按附件《1940年度建设纲要》指示各项结合本期任务进行。
(建设纲要原件缺如——笔者)

其三 对治安军及其它中国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

一、对治安军队及其它中国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除按前期计划中指示各项办理外，当地部队应直接予以指导援助。上级部队长也应亲自进行视察检阅，以促进其成长。此外，按以下各项办理。

二、关于治安军

治安军，应在本年9月以后，主要部署在所编成的地点附近的指定地区，并加以教育训练，使之成为皇军的助手，能够独立负担维持治安的任务。

本年秋计划新编成16个团，编成位置等如附表第一。

各兵团为使治安军顺利编成，应通过青年的训练，作好召募优秀青年人伍的准备工作。

三、关于剿共军和绥靖军

对剿共军，应采取逐渐整顿减缩的方针，淘汰不良分子，加强训练，使其成为可信赖的武装团体。

对绥靖军的处理，亦按上述精神办理。

注：剿共军是由投降的武装团体编成的，绥靖军是以吴佩孚绥靖委员会的地盘为基础所组织的部队，两者均非正规部队。——笔者

四、关于县警备队

县警备队是普及县政的推动力量，维持当地治安的骨干。因此，对其实力的扩充整顿，人员的刷新，部队的训练，均应抓紧。对模范地区的警备队，更应尽快整顿、训练，务必在本期末以前使其能承担上述任务。

为对县警备队进行经常性的训练指导，急需派出专职联络员。在该员未派出之前，暂由我驻县守备队派出适当的军士（上士或中士）一名，担任县警备队的训练及指导。

上述军士在派出期间应列为编外，遗缺可另行补充。

模范区警备队之枪支不足时，应由各兵团在其增加装备项下以缴获枪支给予补充。兵团增加装备用的枪支（规定限额为4,000支），其不足部分可向方面军申请借与。

五、铁路警务机关

对铁路警务机关的整顿，应按《铁路警务机关整备纲要》进行。务必使其尽早成为皇军的得力助手，能够独立担当铁路的警备。（参阅附表第二）

各兵团应积极支援、指导各铁路警务机关的充实和训练工作，经常进行检查。根据其战斗力提高的程度，逐步将警备任务向其移交，尽量收缩皇军的直接警备兵力，直至最终撤出铁路沿线。

六、青年训练

对青年的训练工作，务求进一步普及深入，用以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

其四 交通通信

一、警备道路

对作战地区的警备道路，要及早整修加固以备军用，防止在雨季发生交通中断等事故。

主要交通干线的治安一经恢复，要尽快恢复汽车运行。

二、警备通信

各警备部队所属系统间的通信，应以有线通信为主，并尽力加以扩充。

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十二军作战区内的各警备队，相互间应构成警备通信线路。

沿已开通水路的重要地区，也应构成直接水路警备和水运上所必需的通信网，努力修整有线通信线路。

其五 宣传

一、宣传工作，除按前期计划中所示有关宣传各项外，应根据以下各条指示进行。

二、占领区内的宣传

1. 务使民众了解：新中央政权的成立，即意味着蒋政权的垮台。这是亲日防共实现和平的新阶段。今后只有新政权才能为民众谋福利。

2. 新中央政权完全继承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委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代行其政务，一切有关民生福利仍按旧章以安民心。

3. 应使华北民众明了，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新民会表里一体的施政指导下，团结一致拥护华北的特殊体制，积极参与治安建设，就是真正增进民众的福利，明确华北民众努力的方向。

4. 随着治安工作的进展，各地要在适当时机，向民众说明肃正建设的具体事例，用以揭穿敌方的欺骗宣传，增强民众对日本的信赖。

三、占领区以外的宣传

大力宣传肃正建设的真相，使民众相信帝国对事变处理的坚定决心及实力。对第三国，要使之认识到，援蒋实际上并不能维护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其六 其它

本计划与各地区的特殊性如何适应问题

本计划主要是以河北、山东等地的肃正建设现状为依据而制订的。其它如在政治上有特殊地位的内蒙，治安恢复缓慢的山西、河南、苏北等地区，可根据本计划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实施计划。

附表第一

治 安 军 编 成 预 定 表		
招募地区	编成兵力	预定驻兵地点
长谷川兵团地区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二个团	北苑
	二个团	通州
	一个团	保定
本间兵团地区 (第二十七师附本间兵团)	二个团	开平
	一个团	滦县
	一个团	天津
饭沼兵团地区 (第一一〇师团)	一个团	马厂
	一个团	保定
	一个团	正定
饭田兵团地区 (第十二军)	一个团	定县
	一个团	济南
	一个团	泰安
	一个团	滕县
备 考	一、每团应征新兵定员为1,500名 二、驻兵地点根据情况可以变更。	

附表第二 铁路警务机关调整进度表

其一 方面军管区内（不包括驻蒙军管区）

一、人员装备

1939年12月末

人员 6,000 (其中日本人1,500)

步枪 5,000

1940年9月末

人员 9,000 (其中日本人3,000)

步枪 7,000

轻机枪 50

1940年12月末

人员 10,000 (其中日本人3,000)

步枪 7,000

轻机枪 100

二、接替警备任务的时间

1940年3月末

京山线全部

京古线全部

石门以北

济南以北

1940年9月末

胶济线全部

津浦线济南——蚌埠间

石太线全部

其二 驻蒙军管区内

1940年9月末

人员 1,700 (其中日本人500)

步枪 1,700

轻机枪 60

重机枪 8

1940年12月末

人员 2,000 (其中日本人600)

步枪 1,700

轻机枪 60

重机枪 8

在参谋长说明之后，平田参谋副长又就有关作战及政治经济的肃正建设实施要领，作了以下的补充说明：

其一 与作战有关的问题

一、彻底的讨伐肃正工作

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状，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极为不利，早日恢复集中部署，是我们最希望的。然而，考虑到华北治安的现状，为争取尽快恢复集中兵力，在目前一段时期，仍不得不继续执行分散部署。如果我们过早进行集中，地方治安就会再度呈现混乱，过去的努力势必化为泡影。

分散部署兵力是治安工作的支柱，以此为立足点才能进行灵活机动的讨伐，因此它应该是攻势据点。这就是说，分散部署决不是守势部署，而是对地下活动相当深入的匪团，在特殊情况下的唯一的攻势部署。要这样认识问题，并要经常保持主动灵活的弹性。

分散部署已实施了很长时期，各部队有可能完全陷入被动守势，而忘记分散部署的积极意义，不思进取。对此，分散的各部队，必须大力振奋士气，发扬积极进攻精神，充分发挥分散部署的特点。所幸目前大股匪团已分崩离析，甚少具有集体威力，即使以小部队进行讨伐，也无任何危险，这正是积极讨伐的大好时机。

目前的情况，匪团已经分散隐蔽，而致力于巧妙地扩大地下组织，企图进行顽强的抗战。对此，我之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兵力之不足，而是在于很难及时获得可靠的情报。如能克服此种困难，则讨伐肃正是轻而易举的。至今各部队虽已尽到很大努力，

但大都未能收到相应的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之谍报网存在缺欠。为了对付积极的、有组织的地下匪团，我也必须建立一套有组织的巧妙的谍报网。

为此，就需要很好地配备军队的情报机关，而统一其行动，还要巧妙地组织中国方面行政、警察等机关的活动，尤其要利用有能力的间谍人员。这是必须千方百计努力去做的。

如此，方能掌握敌匪军事、经济、政治等抗战力量的中枢和根据，一举而剿灭之。

各部队，尤其下级部队，在情报收集上，往往因袭旧套，不图创新改进。对中国方面各机关以及当地民众的组织利用等，还必须认真热情地加以指导和推动。

以上各项施策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民众，使之成为自己人。

二、讨伐的重点目标

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根据过去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这是我们在计划中明确的意图。为此，必须考虑到我军的兵力与整个治安工作的关系，如果是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乘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对情况要有正确判断，如判断错误，不仅失掉对敌剿灭之机，且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使之误认消极的讨伐行动是对的，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关这类决定，必须由高级司令部作出，不能由下级司令部擅自决定。高级司令

部根据当时当地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后，指示部队采取相应行动。作为下级部队，只应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发扬旺盛的士气，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断然不许下级部队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进行讨伐。

三、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

在计划中所指定的讨伐重点地区，是方面军从全局观点决定的。此外，各兵团也应有各自的讨伐重点地区。

京汉、津浦两线的中间地区

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目前治安肃正工作进行缓慢，治安状况极端不良。在下期必须清除祸根，取得治安肃正工作的实效。为此，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应在第十五混成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

山西北部地区

在这一地区，近来共军的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即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固之前，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因此必须对其活动严加监视，必要时立即进行讨伐。在此情况下，第一军须极力控制同蒲路北段以西地区，对以东地区的共军势力严加警戒，切勿使其扩展。

晋南地区

在我占领区中，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作战，主要是将敌全部歼灭，并迫使敌人放弃渡过黄河的企图，从而扩大我治安地区。本作战根据第一军的计划实施，随战况的发展，必要时拟令第三十五师团以一部予以策应。

四、打通水路

河北省的水路，从来即为运输物资的主要干线，由于沿岸治

安不良，至今仍未打通，各项运输不得不专赖铁路，致使物资交流受阻。其后果反而影响治安的确立，阻碍各项开发建设的进展。

方面军把打通水路问题，作为下期施策的重要内容列入计划，务希各兵团齐心协力完成这一任务。预定打通的水路颇长，限于兵力不能同时进行，拟将北路和南路分二期进行。第一期打通北路，与冀中地区的肃正工作同时进行，按前述方面军命令，统一各有关兵团的行动。

打通水路的要点

所谓肃正水路沿线，并不单指狭长的水路线的肃正工作，而是与全面的肃正作战互为因果。另外，对水路的直接肃正警备，其必要性也和确保铁路一样，虽然水路不象铁路那样经常进行运输，也无重要设施，在防护观念上两者有所差异，但在确保水路这点上，也按确保铁路同一要领乃是绝对必要的。为此，除对沿岸一带的治安维持和在水路上的直接兵力配备之外，还必须拥有水上的警备兵力，不可疏忽水上讨伐。

水路警备队

水路运输的大部为民用物资，不可能长期依靠日军进行警卫及掩护，应在治安恢复的同时，逐步将此项任务移交给中国方面的有关机关。因此，必须着手准备编成水路警备队。但在治安尚未恢复、水路警备队实力尚未充实之前，仍须由我军担任掩护。

五、控制预备兵力

根据作战需要，方面军有时可能对某地重点使用兵力，如果方面军不控制一部分预备兵力，则必须完全依赖各兵团协助。所谓控制预备兵力，以不妨碍该兵团的作战或不致招来治安上的困难为限度，为此，需要规定控制兵力的标准，作好随时可以接受任务的准备。

当抽调这一部兵力时，除特急情况外，一般均应给予充裕的

时间，各兵团无须经常集结待命。控制兵力的多少以及准备的大致标准，前面已有指示。

六、治安军及其它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培育指导

有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业经三令五申，方面军对之抱有很大期望，仍希各兵团予以协助。

治安军

由于各兵团的协助，派出军事顾问专任指导，希望在下期末以前，使其能担任部分治安任务，在兵力方面也应由现在仅有的15,000余人，到本期末再增加30,000人。为此，要求各兵团予以协助，使青年训练工作进一步普及和加强。

剿共军及和平救国军等

这些集团，与其兵力相比所耗经费过多，且有可能遗患于未来，因此，应采取逐步淘汰方针，保留精干，使其成为可以信赖的武装团体。

县警备队

为恢复治安，方面军一直对县警备队寄予最大的期待和关心。今后要按定员比例派出常驻指导员，可挪用我军部分装备，补助其武器的不足，在方面军允许的最大限度内，采取各种手段予以协助。各兵团应考虑方面军期待之殷切，对其整备扩充付出最大努力。到下期末以前，起码应在治安模范地区，能达到不直接依靠皇军，独力成为维持治安的骨干。如此，方可称为名副其实的模范地区。

此外，省、道警备队，实质上并无对其辖区进行讨伐警备的能力，只能守卫其驻在的城市。今后可否按县警备队，特别是模范地区县警备队的要求加以改编和增强，希望进行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铁道警务机关

对铁道警务机关的整备扩充问题，鉴于铁道的重要性，迫切希望为其实现而努力。各兵团应以各该警务机关为友军，援助、指导它们积极训练加强警备，务必使它们在下期末的前后，能够独力承担华北大部的铁路（不包括山西）警备任务。这次对驻蒙军作战地区内的铁路警务机关的调整，重新确定调整目标，要受交通会社的指令，这已在本年度的调整大纲中作出决定。其与各警务机关的任务交接时机，原则上已经规定，具体交接时间和方法，可根据各有关兵团长相机决定。

七、以瓦解敌军为目的的谋略工作

利用中央政权成立的机会，方面军进一步加强既定施策，对持有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将领进行怀柔工作。

在当前，方面军除正在进行谋略工作的对象以外，并拟对占领区内外的敌正规军进行工作。至于潜伏于占领区内的游击队、杂牌军、匪团等，对其中利用价值较大的也应进行工作，但总的看来有利用价值的不多。对这些集团的处理，仍按“讨伐的重点目标”所指示的要领进行，应否列入谋略工作对象，要由方面军决定。

八、交通通信

关于经常的交通警备问题，依据建设总署的计划精神进行，但各兵团对警备治安上必需的警备交通和警备通信，应尽力保证其安全畅通。特别是对方面军肃正重点地区的冀中，由于地处各兵团邻接的作战境界，因而成为治安不良的祸因，各兵团部队必须设法确保相互间的交通联络。

九、宣传

中央政权的成立，标志着对事变的处理已进入新的阶段，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为今后施策创造条件。估计这对华北人心将会产生各种影响，使之进一步理解我方的态度和方针。为此，既

可安定民心促进肃正建设工作，迫使敌人放弃抗战意图；又可使第三国对帝国的实力和既定方针加深认识，从而加速事变的解决。

十、兵力集结的问题

兵力集结，作为军队教育训练的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但这要取决于治安恢复的进度。治安恢复得慢，兵力集结也不得不推迟。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已经一年有半，为军队的建设着想，这种状态不应再行继续，各兵团应本此精神，全力以赴，促进巩固的治安早日实现。

方面军的安排是：在本年末以前，各兵团步兵的三分之一，特种部队的大部分，集结在便于教育训练的较大单位。集结所需的收容设施，现已着手进行准备，一定要使这项设施能够如期使用，以利下期肃正建设的开展。

其二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

一、华北建设的目标

随着中央政府的成立，根据华北的特殊地位，为了在国防、经济、思想各方面形成一个与日满紧密合作的地带，已决定各项建设的目标，正在争取其逐步实现。

1. 国防

为了确立我军专心对苏作战的态势，首先必须树立日本对华北的政治支配力，谋求亲日反共思想的彻底深入，使民众真正心悦诚服。

2. 经济

实行笼络民心的各项政策。对于粮食问题，首先要争取华北自给自足。对于棉花煤炭等，应与日满交流，借以提高生产力，为充实日满的总体力量作出贡献。

3. 思想

确立和推广新民会的指导理想，建设一个由真正的日中合作思想控制的华北，以促进东亚建设，不使错误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有可乘之机。

二、刷新充实以省公署为核心的地方行政

按照方面军的意图刷新、充实省以下地方行政，是防止华北中央化和治安肃正工作上至关紧要的问题。为此，首先必须加强省公署本身，改进行政措施，以期深入到各县。中国方面的人事刷新和日本方面指导力量的加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先决条件。

对中国方面的指导，各兵团长可责成所属特务机关实施之。

三、新民会的改革、加强及对其指导

新民会经此次统一改组，机构加强，阵容一新。在军的指导监督下，以实现王道为目标，以组织华北民众为使命，迈出了第一步。以后陆续发表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任命，并令其着手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但是，目前其内部未臻完备，各种工作尚未纳入正轨。因此，各兵团应迅速完成统一改组的各项措施，确实掌握好新民会，使之承担起组织民众的使命，并成为领导华北民众的真正核心。

对新民会的监督指导，应根据“中华民国新民会指导纲要”，由兵团长责成所属特务机关具体执行。要注意除随军进行宣抚的场合外，下级部队的指挥官不得干预新民会的工作。

四、经济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建设方面，考虑地理、政治、经济等有利因素，应以治安状况较好的河北省、山东省为重点地区，在施策上应以纲要所列各项为重点。

1. 调整粮食供应

目前治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粮食供应问题。为此，方面军以最大的关心与各方面积极交涉，并寻求一切解决方法，

特别在青黄不接的 6 月份，要采取应急措施，务期保证供应，以安定民心。

2. 增加对日供应重要资源

为保证日满两国的生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期待于华北资源的供应，尤其是煤炭的供应。这些物资的充分供应，适足以说明华北的特殊地位。因此，不能满足于计划所列各项指标，更须设法进一步增加煤、盐、棉花的生产，并且也要为军用物资的收集作出贡献。

3. 金融通货对策

华北的货币，联银券的流通使用，已成既定事实，且经新中央政府承认。

联银券的发行额，随华北建设的发展而急剧增加，因而对维持货币价值应给予最大关心，为此，方面军提请各有关方面注意。各兵团应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奖励储蓄，限制非紧要事业的投资。另对，外间谣传联银券将贬值一事，应严正表明既定方针不变，肃清谣言。

五、对匪区的经济工作

匪区的经济谋略工作，敌人比我方活跃，我应积极与之对抗，并采取对策破坏其抗战力量。目前，对匪区的经济工作，已经形成一个敌前作业的重要部门。为此，首先要杜绝一切物资资敌，同时要设法吸收潜存于敌区的我方必需物资。但是，对没收的旧币的使用，要事前请示方面军批准。

六、文化工作

有关文化工作，为了实现治安第一的目的，作为建设纲要的重要内容已有明确记载，兹不赘述。

曾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的有末精三大

佐，就方面军传达肃正建设施策的情况，特别对华北政治经济的概况，叙述如下：

1. 1939年末，赴任到北京之初，曾与临时政府实业部部长王荫泰晤谈，王曾表白“政治的要谛在于民生，民生的基本在于食，华北政治的先决条件在于吃饭问题”。他这种一针见血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当时的华北，尤其北京、天津等城市，缺粮情况极为严重。正如以下电文所示，请求东京等方面予以援助，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粮食的绝对量，同时，稳定华北物价和联银券币值，努力促使粮食上市。

附电文

总参四电第211号（1940.3.12）

收电人陆军次官

发电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当兹新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之际，安定占领区的民心，是巩固新中央政府及开展对重庆工作的至关重要问题。日前听取了有宋大佐有关华北粮食问题的说明，情况实为严重，如不求助于各方的认真支援，不只华北遭殃，我各占领区亦将受害，甚至其不良影响将波及日本国内。因此，派遣军拟暂时适当削减对日供应，由华中抽出一部米和面粉供给华北，以缓解其紧张形势。

华北过去依靠从满洲运进的杂粮以补主食之不足，但自满洲粮谷统购以来，流入华北之量锐减，以致加剧了华北缺粮情况，根据日满华一体、有无相通的精神，希望中央促使满洲适当开放对华出口。另外，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物价飞涨和物资屯积所致。为根本解决问题，维持联银券的币值实为重要。对此，请格外予以援助。

2. 日系势力的活动状况

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最成问题是军宣抚班、新民会、华北开发会社等。尤其是在经济界活跃的日系人士，不考虑中国人的实际情况，日系人士之间又互相拆台，造成很坏影响。为此，方面军于1940年2月23日，解散了宣抚班，3月4日统一改组了新民会，鼓励中国人的自发活动，努力促使军、政、会一元化。

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我军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实情，关心民生，深体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

3. 对共问题

来自特务机关等部门的第四课系统的政治情报，第二课系统的特种机关所提供的特别情报、谍报，和第一课掌握的来自第一线兵团的作战情报、以及宪兵队系统的治安情报，由于彼此派系不同，以致这些情报缺乏综合性和一贯性。他们在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中共，其原因即在于此。

4. 其它问题

随着汪中央政权的成立，出现了种种问题，如与华北政治经济的特殊性相关联的苏北和豫北地区的归属问题，南京倡导的东亚联盟与华北新民会的关系问题，正统国民党进入华北问题，如何对待中国青年党问题，以及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整，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方面军对思想战的指导方案

方面军在制订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计划的同时，确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印发所属单位及有关部门。

会社、团体，并要求付诸实行或予以协助。同时有限制地印发了“附录书”作为上述纲要的参考资料，该件列为极秘文件，禁止公开和复印。

方面军的目的，在于普及和贯彻灭共亲日思想。因此，要求不能单纯停留于宣传，必须使之融汇贯通于总体战的各个分野，成为进行战斗的思想武器，用以击败反动思想。尤其要通过基层组织，使亲日灭共的思想涌现于华北民众之间。就是说，要在新中央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及新民会改组的新形势下，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事变长期化的趋势，指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向，统一思想，以加强和扩大与军事、政治、经济各项政策融合一体的思想战。

当时中国驻屯军宪兵司令部总务部长大野广一大佐（后任中将）对此叙述如下：

在对共作战中，单靠武力战斗难以与之对抗。极力主张必须统筹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工作。于是，以前年黄城事务所起草、灭共委员会决定的“华北灭共对策纲要”为基础，制订了可以称为总体战大纲的“思想战指导纲要”方案。经过方面军的研讨修正后，正式决定颁布，并以命令形式促其实施。但是，因一般人对武力战斗以外的其它方面研究不够，特别是对思想战的理解不足，所以使这一大纲贯彻到基层、付诸实施，要用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战指导大纲的内容如下：

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

第一 指导精神

遵循我建国精神，消除东亚积年之祸根，重建明朗的新中国，实现东亚民族复兴，用以建设新秩序，使皇道之光普照四海。

第二 指导方针

思想战应本上述精神，发扬日本民族誓死必胜的整体力量。在此基础上，致力于瓦解敌方的抗战意志，并使中国民众，尤其要使知识阶层及青少年，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共同建设者，从而指导他们积极投入建设行动。

为此，首先日本国民均应认识到自己做为指导者的重大责任，谨言慎行。同时，应排除错误的优越感，以日华融合的同胞友爱为基础，以具体实现以下各项做为当前的目标。

- 一、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
- 二、开发产业，发扬东亚文化，以实现民政的改善及安居乐业。
- 三、纠正中国民众以往的排外的、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实现睦邻友好。
- 四、促进日满华的共同防卫、经济一体化，以完成紧密的互助体制，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

第三 指导要领

一、思想战应与武力战以及经济、民生、教育等各项工作互相配合同时并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使全部机关形成一体，而各自发挥其机能的特性。

二、使皇军官兵及侨居官民彻底理解此次圣战之目的及其成为长期总体战的道理，带头示范、谨言慎行，消除蔑视中国人的歪风，各尽职责，军民一体，欣然向新秩序迈进。

三、根除一切阻碍建设新秩序的势力及企图，特别期望根绝共军的势力及抗日运动，同时使中国民众了解和敬畏我方具有

彻长期建设战斗的实力和决心。

四、抨击、排除共产主义、错误的三民主义及依赖欧美的思想，按照新民精神进行刷新统一，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奋斗目标。

五、对于新政权，要使其履行日华协定及其它商订的事项。同时，指导民众，尤其是政府中的要人从根本上了解体会我方的指导精神，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

六、协助新民会及其它群众组织，使之在教化上、思想上、经济上以至于政治上各个方面成为领导群众行动的团体，以克服旧势力，获取群众。

七、改正教育的指导方针及内容，同时加强初等教育及训练青少年。对宗教团体亦应给以正确指导，使之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八、除开展宣传、教导工作外，应确保民众日常生活的稳定，增进民众的福利。从物质、精神两方面进行思想革新，使民众心悦诚服。

九、监视敌区及占领地区内的军民思想动向，促进敌军的内部崩溃，促进军民的和平反共气势，实现亲日融合等等，并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适应此种局势。

十、在目前情况下，有关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各项政策，应着重从思想对策的角度加以考虑，然后贯彻执行。

另外，在“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中有以下各章：

第一章 对中国人的指导

第二章 对日本人的指导

第三章 对外国人的指导

第四章 思想策动的摧毁

第五章 对敌工作

在这个小册子里，详细地叙述了具体的工作实施要领及指导上的注意事项。下面从第一、第四、第五章中分别摘录其若干节。

第一章内容为：第一节、宣传，第二节、教导工作，第三节、民众组织工作，第四节、模范地区工作，第五节、新民会的指导要领。

第一章 第三节 民众组织工作

第一 指导方针

组成华北民众组织的目的，在于使之成为华北新秩序体制的骨干。同时，在日华关系上，使之成为最确切地体现新秩序的基层组织。为此，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农村以乡村自治组织为单位，首先组成县的民众组织。

二、农村自治组织的骨干是保甲组织和合作社组织。

三、在城市中，对商业团体、文教团体等，系统地进行指导。在必要的地区，可特别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

四、农村及城市中民众组织工作的监督指导，在当地日本驻军司令官（小地区指挥官以上）的幕后指导下，由当地行政长官执行之，但各行政长官应以当地新民会指导者的身分进行指导。

五、民众组织工作，应在行政长官的监督指导下，由新民会负责。

六、有关培训华北民众指导者以及建立其横的组织工作，应指导新民会努力完成之。

七、民众的经济组织，应先从有利于改进治安与提高民生入手，然后逐渐导致经济上日华不可分的形势。为此，应以农村的基本经济组织——合作社为骨干，使之与生活必需品和土特产品的交易、配给机构连结起来，以确立符合上述意图的一系列经济体系。

上述合作社、交易机构均各设中央领导机关，避免在协助或指导上出现差错。同时，目前在中央和各地设置日军指导下之盲民合作的经济委员会，以期增强上述各个机构的运营能力。

第二 指导上的注意事项

一、此种民众组织应在指定的模范地区以及必要的地点首先建立，并以此为据点，逐渐向其它地区推广。

二、在上述模范地区，应结合组织民众工作同时开展各种工作，并与华北的各项工作相配合，首先使本地区在日华协力下，实现民众的安居乐业。

三、在建立此种组织时，需要根据其土地状况，分别轻重缓急采取适当的步骤。

四、过去在各地建立的这类组织，应逐渐统一于此种新组织。

第三 合作社指导要领

华北的合作社组织的任务，是构成东亚新秩序经济结构中的基层组织。由于合作社组织还担负着治安、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任务，因而要以完成本职任务为主，同时在推动以上各项任务中做出贡献。

一、合作社的组织

组织合作社，原则上应以乡村为主，但也不必局限于此。社员由区域内的居民互助结合，使每户都加入合作社组织，固然最为理想，但也要允许自由加入。合作社以社员交纳的股金为资

金，应使每股股金固定平均，采取无限责任制或保证责任制。

为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活动，应由各社社员中选拔干部，设立总会及理事会做为办事机关。合作社的名称，为了明确其基本性质，应加以统一。

二、对合作社经营的指导

对合作社事业的经营，应接下述方针进行指导，以发展农村产业的生产力，谋求社员的生活稳定为根本目标，并确保其经营活动的长期延续性。

合作社的业务涉及到金融、购买、贩卖、生产及消费使用等许多方面。因此，在这些业务之中，必须针对华北农村的特殊情况考虑其轻重缓急，围绕特定业务的重点，进行综合经营。

三、合作社的普及工作

在当前情况下，合作社工作除担负经济组织的本来任务外，并负有其他很多使命。如掌握民心、治安工作、筹办驻在兵团的食粮、普及联银券等等，都必须抓紧进行。但是，要合作社本身发展到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程度，在中国经济社会条件下尚难办到。因此，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上述条件，乃是当务之急。

为了使当前的合作社工作起到担负上述任务的作用，不应坐待正规合作社的成长，而应首先利用简单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互助社），或组成简易的合作社将工作开展起来。

第四节 模范地区工作

模范地区的指导目标，为了在该地区推行包括治安、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以显示模范区的新秩序，应实施以下对策：

一、对模范地区的指导，应按照第三节民众组织工作的要领进行。

二、实现指导机关的一元化统治。为此，除应明确规定各个部门的分担业务外，同时要保持紧密的联系，不要使中国方面产生政令不一的感觉。

三、在进行指导时，应考察该地区的特点，决定工作重点。调查研究其治安状况、产业经济状况、风俗民情、工作经费以及指导者的工作能力等各方面的状况，决定工作步骤及方法，使各项工作适应实际情况。

四、进行指导时，不应过于施加压力干涉，要尊重中国人的意见，参照从来的风俗习惯，努力使中国人沿新秩序的理想路线，自发地做出成绩。

五、具体的指导内容为：整顿县的行政和乡村的自治组织，统一领导合作社，并指导合作社的具体工作，指导劳工工作，增加模范地区的生产，以及整顿、加强经济流通机构等。要把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有机地连结起来进行指导。此外，还应考虑加强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以及交通、通讯，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四章 对思想策动的摧毁

第一节 监察及搜集情报

一、加强统制监察组织的对策如下：

1. 增编日军方面的警务机关。
2. 在整个华北地区改编和加强中国方面的警务机关。为此，向该机关内派人必要的日方指导员。

二、各个日华公私机关获得的情报，应及时或定期向有直接关系的机关报告或通报。

三、情报的综合整理工作，由最高军司令部负责进行。注意观察敌方，尤其是共军的组织情况、各种工作、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我方思想工作的效果等。

四、最高军司令部指令中央灭共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上述

情报中有关共军的部分。

第二节 摧毁思想策动的根源

第一、对敌方，尤其是对共产军、匪的扫荡。

一、以皇军的武力进行扫荡

1. 进行讨伐行动时，重点指向共产军、匪，彻底扫荡，摧毁其游击根据地。

2. 兵团长或守备队长，为了统一进行治安肃正工作，根据需要可统一指导当地的日本及中国方面的各个机关。

3. 为了不失时机地进行讨伐，兵团长或守备队长统辖当地各机关的情报工作，使之做出迅速、准确的匪情报告。

二、以警务机关的实力进行扫荡

1. 对共产军、匪的扫荡原则上主要依靠军队的武力讨伐，但对小股匪团及武装的共产抗日团体，也可在军的警务机关的统辖下，由各警务机关协作，编成武装警察队进行讨伐。为此，规定在必要时，可接受辅助宪兵的派遣或部队的协力。

2. 进行武力讨伐时，最重要的是要统一领导各警务机关的行动。因此，应实行以军的警务机关为中心的警务统制，在其统一指挥下进行武力镇压及搜查检举。

对非武装但有势力的共产抗日团体的检举镇压，大致以前项要领为准。

3. 为了不失时机地进行讨伐，各机关应在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迅速准确地搜集情报，并将其结果进行通报。

第二、对共产抗日团体的破坏。

其一、共产抗日分子的检举、扑灭

对共产抗日分子的搜查侦探工作，务必做到严密周到。为了准确、迅速地检举、扑灭共产抗日分子，应实施以下对策：

一、实行彻底的户口调查，并进行及时的盘查搜索。

二、为了取得准确的谍报，应获取和培养优秀的谍报员。为此，要注意利用检举、逮捕的犯人或叛变分子。

三、对有左倾嫌疑者及伪装的叛变分子，要严密监视其言行，对一般叛变者也应加以相当注意。

四、为了提高搜查侦探网的组织及机能上的实际效果，应谋求实现民众的警察化，并大力加以普及。

五、教育、训练日华双方的宪兵及警察官，在提高其知识见闻及技术能力的同时，采取培养侦探及科学的搜查等方法，以期不断提高检举效率。

其二、消灭共产抗日团体据点

共产抗日团体的主要根据地，在城市里，是外国租界或外国人杂居地等受外国权益庇护的地区，以及铁路、工厂、学校等地方。在农村、山村，则建立所谓游击区，做为策动的据点。因此，为了消灭这些据点，除采取前述措施外，还要实施下列对策。

一、对于外国租界方面，除督促外国官宪进行检举镇压外，还要采取将其诱出租界，或秘密行动的办法，直接检查搜捕。

二、对于游击区，除采取反共宣传及秘密行动，进行内部破坏，使匪民分化外，并组成以间谍、叛变分子为主的特别搜查班，积极进行检举镇压。

第三节 对思想策动的取缔

第一、取缔结社、集会及有多数人参加的活动

对共产系统及其它反国策、反时局的结社加以镇压。为此，实施以下对策。

一、对于结社、集会及有多数人参加的活动，命其事先申请许可，明确其应负的责任。

二、对非法、秘密的活动，应依靠监视及情报工作，予以检举处罚并使之解散。

三、对于带有政治、文化、或社会科学色彩者，应特别加以注意。对于其它方面也应进行充分观察。

四、应特别注意在学校、外国租界及教会内进行的策动。

第二、对言论、著作及印刷出版的取缔

一、确立检阅制度，杜绝借合法手段进行思想策动。同时，对非法的思想策动，严加取缔。

二、对于日、满及外国的出版物，应加强检阅制度，经过严格挑选方许进口。对于日本的出版物，应与国内当局保持紧密联系，采取措施防止产生不良影响。

三、对过去的出版物重新进行严密的审查。

四、对图书馆、学校、教会的检查、搜索工作，应彻底进行。

五、海关、列车及其它地方的检查工作，应彻底进行。

第三、对戏剧、电影的取缔

一、在民众娱乐中，戏剧、电影影响最大，因此在取缔管理的同时，应注意加以指导，使之成为思想诱导的工具。

二、加强检阅制度，对违反东亚新秩序建设精神的戏剧、电影，要严加取缔。

三、指导剧作家、演员及电影界人士，使之创作、演出健康、明朗的作品。

四、对于日、满及外国的电影，经严格选择后方许进口。

五、实行配给统制。

六、制作符合新指导精神的健康、明朗的电影，促使广大民众观看。

第五章 对 敌 工 作

在摧毁敌人战斗意志的同时，煽动国共抗争，使敌军从内部崩溃；鼓动敌方势力范围内的中国民众，掀起高昂的反战和平气氛；诱导民心，使之反蒋排共，归附于新政权。为此，实施以下

对策：

一、对敌方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和助长回避战争及反战的气氛，使敌丧失战斗意志，煽动官兵的不满情绪，挑拨官兵不合，使之意志颓废。同时，加强优待俘虏工作，诱敌投降和逃亡，从思想上瓦解敌方军队。

二、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关系，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地去扑灭共军。

三、彻底揭发、宣传苏联及共产党的阴谋罪恶。使尽人皆知如不迅速扑灭共产党，就不能避免苏联的赤化侵略、破坏民生福利的道理。要使民众树立排苏灭共的观念，同时，强调宣传皇军圣战的目的，诱导民心逐渐亲日。

四、强调即使继续抗战，中国也绝无战胜的可能，反而只能使国家、国民陷于贫困悲惨的结局，从而助长反战和平的气势。同时，采取措施，攻击蒋政权的错误政策，使民心背离蒋政权，归附于新政权。

五、对敌宣传，主要依靠我方飞机散发宣传品，无线电广播，邮寄宣传文件，指挥潜入敌区的工作人员，利用回教徒、天主教徒、德意人士等，以及尽量操纵外国记者为我宣传。同时，与敌区内的反共、反蒋分子秘密联系，巧妙地予以利用。

六、有关对敌宣传工作，应与华中、华南方面军、海军及大使馆方面紧密联系，使宣传方针及内容，在完全统一的步调下进行。

引用英美法苏人士及在外华侨的言论、文件，或者通过这些人士进行宣传，效果极大。因此，由中央与驻外国的大、公使馆武官取得联系，将第三国人和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的政治团体和

思想团体的名称，写进宣传文件中是有利的。

七、从敌区内部发行的报纸杂志及其它情报中，不断调查 敌势力范围内中国民众的国民精神、社会形势、国民生活及军队 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注意调查其弱点，以确定相应的宣传目标、范围、时期、材料及方法，针对重点尽力发挥。努力做到先发制人、出敌意料，并顽强地进行此种宣传。同时，应经常调查 宣传的效果，适应当时情况，及时改变方法及内容。

关于确立秩序的军律布告

为了确保治安，深深感到，必须使军队严守军纪，当地 民众严守社会秩序，以形成军民一体的体制。因而，军部为了“进一步向当地军民贯彻圣战的宗旨并促其实现，专心谋求达到此一目的”，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中国方面舰队 司令长官的名义，于1940年6月11日发布了“在大陆占领地区内，对扰乱建设新秩序者，不论其为日人、华人或是第三 国人，皆按军律严加处罚”的布告。

与过去不同的是“占领地区内实际上具有临战地区的性 质，因而不承认犯罪当事人的国籍区别”表明了有如布告中 所说的严加处罚的强硬态度。

华北方面军也发表了报道部长的讲话，彻底贯彻上述宗 旨。

但是，随着事变的发生，来华的日人猛增，其中有不少 想发横财的唯利是图者。因此，对不良日人及与之勾结的第 三国人等加以取缔，对于巩固占领地区的治安极为必要。在此以前，中国派遣军于4月29日发表了“告派遣军官兵书”，

阐明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态度，要求官兵应有思想准备。其中，关于不良日人的情况有如下叙述。由此可以了解到发布布告时的情况。

随军进入大陆的日本人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宣抚、看护方面做出了献身的活动，有的业已殉职，有的仍在继续工作。但是，从现状看，也有不少人在做着有损于日本人体面的事情。除很多人犯法以外，还有很多人在做着虽不到犯法程度，却是很不道德的事情。这虽很遗憾，但必须承认现状确实如此。

巡视一下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夜间的情况，即可看出达到何等地步。在酒绿灯红的背后，经常搞些不正当行为。有的人欺骗、恐吓中国人，以获取不正当的钱财和利益；有的人为了贪图私利，甘心资敌；有的人成为外国人、中国人的工具，竟做出不利于我方之事。更有甚者，让外国人假借自己的名义，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违抗全面的统一领导等等。此种情况若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使圣战收不到效果，而且将会导致日华两民族间永久的抗战。因此，派遣军官兵必须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纪律，促使不良日人反省觉悟，避免造成冒渎十万英灵的结局，必须以此心情努力消除不良现象。

如果十万英灵看到为了养肥不良日人而导致日华两民族再次抗争的后果，九泉之下何以瞑目？告慰英灵，只是礼拜献花是不够的。应竭尽全力，实现在其遗骨之上建立日华的永久结合。这是活下来的官兵的共同义务，也是对英灵最好的供奉。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与新民会的改组

1月的青岛会议上，决定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解散

临时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做为中央与地方的中间机关。1940年3月30日公布了该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委员会同时宣告诞生。当天并发出布告，强调“过去临时政府管辖区城内实行的政治、经济、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均一如既往进行处理，不因本会的成立而变更”、“国民政府政纲中虽有设立中央银行、统一币制的规定，但不会使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受到任何影响”，以此防止民心动摇。

国民政府在公布条例的同时，任命了以下官员：

委员长 王克敏

委员 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常务委员兼内务总署督办（兼任）王克敏

常务委员兼财务总署督办 汪时璟

常务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 齐燮元

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汤尔和

常务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 王荫泰

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殷同

常务委员兼政务厅长 朱深

在华北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告一段落后，6月6日，王克敏委员长、朱深政务厅长辞职，遗缺明令王揖唐（考试院长）、祝惺元（政务厅外事局长）分别接任。另外，汤尔和死后，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政府顾问一职自1939年10月以来一直空位，此次借委员长交替的机会，聘请新民学院副院长佐藤三郎（预备役陆军中将）、前大连市长丸茂藤平两人，于6月6日就任。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任务与权限，在该会组织条例第一条中规定为“国民政府为了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管辖区域内的防共、治安、经济以及其它由国民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并监督所辖各省、市政府，特设华北政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管辖区域应在以上三省之内。但临时政府时代管辖下的河南省北部（1市44县）及江苏省北部（17县），为便宜计，并未移交国民政府，仍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为了在江苏省北部执行行政工作，在徐州设有苏北行政专员公署）。1940年末，又增加了安徽省北部的10个县，使其管辖地区由过去的388县增加到了398县。

另外，由国民政府委托委员会的事项，即1939年末，调整日华新关系内部协议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一项所记载的，主要为在华北的日华协作事项：（一）防共及治安协力，（二）经济提携，特别是开发利用国防上需要的地下资源，以及日、满、蒙及华北之间的物资供求，（三）有关聘请、任用日籍顾问、职员等事项。

委员会所需经费，应由国民政府一并拨付，但根据已达成的谅解，暂以关税剩余的六成、盐税收入的七成及统税的收入做为委员会财政来源。委员会委员的任命是根据行政委员长提名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准许委员会拥有直属的绥靖军（治安军）。实际上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方面采取了很少受国民政府统制的自治体制。

地方行政制度，在委员会以下设省及特别市，省以下设道、市、县，并任命了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这些都

不符合国民政府的法令，但做为过渡办法，仍按以往惯例实行。道尹在警务、财政、教育、建设各方面，对县政进行指挥、监督。

1940年8月，河北省由4道划分为8道。山东省也准备由4道划分为10道。各省的道名（道公署所在地及所辖县数）如下：

河北省（130县） 保定道（清苑、22县）、真定道（石门、15县）、冀东道（唐山、11县）、渤海道（沧县、19县）、燕京道（北京、15县）、津海道（天津、12县）、顺德道（邢台、22县）、冀南道（邯郸、14县）。其中渤海、燕京、真定、顺德4道为新设，石门、唐山2市为省公署直辖，北京、天津两特别市为政务委员会直辖。

山东省（105县）（原有建制）鲁东道（烟台、15县）、鲁西道（济宁、32县）、鲁南道（益都、21县）、鲁北道（德县、37县）（此外尚有济南、芝罘两市和省公署直辖的威海卫、龙口，以及青岛特别市）。（预定新建制）登州道（烟台、10县）、莱潍道（潍县、8县）、青州道（益都、11县）、沂州道（临沂、7县）、兗济道（济宁、12县）、泰安道（泰安、7县）、曹州道（菏泽、13县）、济南道（济南、7县）、东临道（临清、17县）、武定道（惠民、13县）。

山西省（92县）雁门道（榆次、25县）、河东道（运城、36县）、冀宁道（临汾、31县）。

河南省（44县）豫北道（新乡、19县）、豫东道（开封、约25县），

苏北地区（17县）

关于新民会的改组

新民会于新政府成立前，即已着手改组。1939年末，趁刷新新民会领导阵容的机会，开始对该会的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主张新民会与军宣抚班合并、统一对民众的领导力量的呼声甚高。因而，在军部、兴亚院联络部、临时政府

及新民会首脑之间，对其具体方案进行了审议。尔后，军宣抚班子1940年2月下旬宣布解散，3月1日与新民会合并。

在此时期进行合并，其理由一方面是考虑到新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华北政治形势；另一方面则是内部问题，即为了打开新民会工作的僵局，以及节减日方的军费，其经费由中国方面负担。

3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大新民会的组成仪式。宣称：“更加发扬政教一体，官民一体的精神，更加强调思想的统一，组织的普遍化”。并且决定了以下的新纲领：

新民会纲领

中华民国新民会为新中国建设之精神团体，与临时政府表里一体，同为国家机构的民众实践组织。其纲领如下：

- 一、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
- 二、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
- 三、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
- 四、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与新纲领同时制订的新民会章程规定，“新民会分中央总会和地方总会，后者由省(特别市)总会与县(市)总会组成。中央总会由全体联合协议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机关构成。各地方总会同样由各联合协议会、委员会、事务局构成。各总会的隶属系统与行政系统相同。本会的基层组织单位为分会，由会员按地区系统和组织系统组成。”

3月3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新民会将临时政府使用过的五色旗定为会旗，象征华北的五族协和与和平。

与此同时，制订了“民国二十九年度工作实施要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年度工作的首要目标在于确立新民会的指导理论，第二目标为谋求各个组织的扩大和加强。

指导理论的研究普及工作为：由中央总会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决定对共产主义、修正的三民主义的对策，阐明新民会的政治性质，此外，并从事整理抗日图书、编制禁书目录等。

扩大组织工作的重点为：（一）努力吸收会员，指导其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组成分会。（二）使合作社、青年团等组织与组织分会工作紧密联系。（三）全面协助军方的模范地区工作。（四）在前线地区，与军方统一进行宣抚工作。

在推进上述各项措施时，应重整新民会的阵容，加强会的团结。8月17日，推举新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为新民会会长，并任命华北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省长、特别市长、苏北行政专员等为新民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形成政会统一的体制。（注：安藤、缪斌仍为副会长，片桐仍为顾问。）

三 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

方面军按上述第一期计划进行肃正建设，专心致力于完成治安工作和开发、建设华北，实行了高度分散驻兵和连续不断的讨伐。此外，方面军集结兵力，对肃正重点地区的冀中、山西北部、山西南部进行肃正作战，力图消灭敌根据地。

方面军虽将重点目标指向共军，但从实施的作战目的来看，可以区分为：既有将共军与重庆军分别作为主要对象之

时，又有将两者共同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另外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而且共军更能巧妙地躲过日军的进攻与冲击，使之转向重庆军；或者径自袭击、蚕食重庆方面的势力范围，以扩大其地盘，并组织群众实行扩军工作，逐渐扩大共军势力。

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以下就山西、山东、河北方面的各军、兵团的状况，依次加以叙述。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主要肃正作战如下：

春季晋南作战（4月17日至5月8日）

乡宁作战（5月10日至5月20日）

晋南反游击战（5月15日至6月20日）

一、春季晋南作战（1940年4月17日至5月8日）

1939年夏秋时，由于晋东作战和潞安扫荡作战，日军占领了潞安地区，但其南面山地以及中条山脉地区仍在重庆军占领之下，成为其在华北的第一个据点。此外，潞安北面山地为朱德领导下的共军根据地，企图向潞安平原扩张其势力，正与晋南重庆军相对峙。山西省西南部仍为阎锡山指挥的山西军盘踞，但由于共产党的策动，内部发生纠纷。为监视和防止该部动摇，李文率领的重庆中央军约三个师由陕西开进

乡宁一带，监督山西军进行作战。

在上述中国军当中，晋南的重庆军抗战意志特别强烈。3月中旬以后，将其一个军从黄河南岸向高平（潞安南约70公里）一带推进。晋南重庆军以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约20个师为基干，加上其它10个师，总兵力约为30个师。该军利用险峻的山地构筑坚固阵地，从黄河南岸领取补给。

进入潞安平原的共军，随着重庆军的变更部署而向北部地区后退。该方面国共矛盾表面上保持平静状态。

日方担任山西省防御任务的第一军，于1939年前半年曾得到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的加强，但从后半年夏秋起，由于第二十、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逐次复员回国，其兵力变成三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军方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部署于南部同蒲线地区，第三十六师团部署于潞南地区，另外将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北部地区，分别担任警备。

第一军长期以来企图消灭晋南一带的重庆军，以扩大治安地区。方面军也认为有此必要而将其纳入年度的计划。于是从第十二军及驻蒙军抽出一部兵力配属于第一军，令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从清化镇向泽州活动以协助第一军。

第一军命三十七师团攻击运城以南中条山脉的中国军，命第四十一师团从沁水东面、第三十六师团从陵川、高平袭击各自面前的中国军，进占泽州平原，然后搜索歼灭晋南的中国军。第三十七师团4月17日开始进攻，当晚进抵黄河一线。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20日开始攻击，击败凭据坚固阵地进行顽抗的中国军，于25日占领泽州。第三十五师团的

一部，27日占领天井关（泽州南约15公里）切断敌之退路。

以后，军方即于新占领的平陆（运城南约30公里—黄河河畔）、张马（翼城东南约30公里）、沁水、阳城、泽州驻扎部队，并在其附近进行扫荡，努力扩大治安圈。

在这次作战中，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潞安以南地区的共军，在作战将要开始前，即将地盘让与进入该地的精锐的重庆军，而退避到潞安以北地区。以后，重庆军因遭日军猛攻而败退时，共军则乘机进入沁河一带。

二、乡宁作战（1940年5月10日至5月20日）

5月上旬，由于晋南作战，致使同蒲路沿线地区的警备力量减弱，此时，前述李文指挥的重庆中央军前来袭击，于是在各地展开了激烈战斗。

第一军，决定将山西西南部的中国军在黄河左岸地区予以歼灭，定于5月10日命第三十七、第四十一两师团向乡宁方面进行作战。5月15日，第三十七师团占领乡宁后，由两师团夹击中国军，予以重大打击。军方断定预期目的已大体完成，且因晋南方面情况告急，乃命令两师团自17日开始转回。两师团在返回途中进行扫荡，于20日回到汾河平原。

三、晋南反击作战（194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第一军在上述晋南作战时，判断与我交战的重庆军为19个师2个旅，除夏县东面中条山脉外，晋南一带的重庆军，特别是第十四、二十七、七十一、九十三各军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授予攻占泽州附近的第三十六师团以奖状。

然而，重庆军始终企图反攻，夺回晋南地区，尽力加速恢复和增强其战斗力，乘乡宁作战日本警备兵力减少之际，

在晋南地区积极进行反击。我各警备队以寡兵奋战将其击退。

第一军乘重庆军出击的机会，拟消灭该军以扩大晋南作战成果。当即命令各师团进行反击。第三十六师团在泽州西面及天井关西南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在阳城地区，第三十七师团在绛县、夏县、闻喜以东地区，分别击败重庆军，使其反攻企图遭到失败。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 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平田健吾中将）自1939年6月中旬接管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南17县的防卫任务以来，尽力实行讨伐，加强警备和治安工作，几乎未得一日安宁，期使治安迅速巩固。据该师团的“情况报告”所载，截至1940年7月底治安情况如下：

目前管内敌情，不仅兵力减少到只有大约六万人，而且其作战意志及行动最近表现消极，各师的实际战斗力，相信已显著下降。

师团在作战过程中，相继获得要地。第一线部队向前推进以期扩大占领地区，并且坚决更高度地分散部署兵力，笼络民心，以巩固治安。因此，在管内尤其是平原地区，治安极为稳定，晋南地区的明朗形势深为各地所称道。

其次，回忆在作战中致力于治安工作的成效，当时师团管内处于四面临敌的华北最前线。由于各部队及机关的勤奋，使居民能较快地信赖皇军。居民人数比驻兵初期约增加四成，在东亚新秩

序下共同安居乐业的现状，出乎视察者们意料之外。县政也在迅速恢复，我军驻兵之初，县政刚刚就绪的只有9县，而现在已有14县。政治体制大致接近完备并达到行政独立自主的程度。此外，因事变而停顿的一般工业，已得到恢复，并且日趋兴旺。治安状况正在顺利恢复中。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尽管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条件下，但管内治安仍能顺利好转，其原因之一，认为是由于共军未在此地进行渗透工作。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 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传男中将）于1939年12月上旬从太原一带移驻潞安地区，与第二十师团换防后，接管了山西省沁县、榆社、武乡、黎城以南、沁河左岸地区的防卫任务。以后，即进行上述肃正作战，努力扩大和充实治安圈。师团对1940年7月末前后关于警备及治安状况所作的《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记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共军“百团大战”即将开始前，师团是如何观察共军的。

一、敌情

目前，在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八路军所属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约2,000人）在襄垣（潞安北约40公里）、潞城（潞安东北约20公里）、黎城（潞安北约40公里）、平顺（潞安东30公里）等县。中央军所属的第二十七军（约8,000人）在陵川附近，第九十三军的一部（2,000—3,000人）在高平以西沁河河谷，仅有小的蠢动，而且由于屡次与我作战，其战斗力均有显著下降。但是，

共军第一二九师专门对我交通线进行游击战，其它中央军也正企图转入游击战。敌人的主力逐渐向黄河河畔的济源、垣曲集结，但尚未发现积极行动。

二、师团的配备

师团把警备范围分为四个地区，由步兵团长山内少将指挥的步兵两个联队（步兵第二二二、第二二三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缺四中队）、野战重炮兵二中队、迫击炮一大队及其它部队担任自高平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联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自虎掌镇（潞安西北约50公里）附近，经潞安至荫城镇（潞安正南偏东约20公里）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大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以长子（潞安西约30公里）为中心地区的警备，由搜索联队担任以潞城为中心地区的警备，将工兵的主力及山炮兵一个大队及其它部队部署于潞安附近。上述各警备队分驻于约70个地方，并派出大约50个分哨，分布在约500公里之间。

三、治安

由于春季晋南作战与晋南反击作战，管内治安有显著好转。

过去山西东南地区为敌中央军在华北的唯一据点，最近由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所占据；潞安以北及东北已成朱德率领的共军根据地，其威力已深入人心。由于过去对皇军撤退后的惨祸有深刻的体验，因此，能协助我军领导民众有威望的人很少归来（指1938年日军暂时撤离这一地区时，凡协助日军者均按汉奸论处而被中国军所杀），以致各项治安工作进展迟缓。后来，由于我军在屡次作战中给了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同时进行宣传、安抚工作，逐步增强了对皇军的信赖，因而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

截至今春，从潞安开始，依次设立了潞城、襄垣、长子等县公署，新驻兵地区的泽州、高平也已成立县治安维持会，县政开始恢复。日华军民协力加强中国方面的自卫力量，并将工作重点转

向安定民生。目下民心趋于稳定，正在协力维持治安，因而管内洋溢着明朗气氛。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

(1940年6月6日——7月8日)

山西省西北部是共军一二〇师及前发生兵变的山西新军的根据地。第一军在方面军指导下与驻蒙军相配合，企图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岢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以防止该地区的共产化，并削弱中共在同蒲线北段以东策划的活动。为此，自1940年5月中旬进行了作战准备。

参加此次作战的部队为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驻蒙军的谏山、石丸两支队。第一军决定的计划如下：

一、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面对黄河作战开始前，应首先消灭岢岚附近的共军。然后从岢岚附近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驻蒙军相配合，消灭保德东南地区的共军。

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应首先消灭岚县附近及交城西面之共军，然后从该地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相配合，消灭据守在兴县及临县北部之共军。

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应向方山及临县北部地区进行作战，切断岚县及兴县方面之敌向西南方向的退路，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相配合消灭驻在之敌。

根据以上部署，6月6日开始作战，各讨伐队在各地击败共军的抵抗，于6月25日前后进入黄河左岸地区，然后返转来对所负责地区进行了扫荡。

参加此次作战的共军约33,320人，遗弃尸体3,418具，俘虏219人；日军死89人，伤79人。此次作战的特点是：共军抵抗的顽强，及伺机对日军进行攻击。

据中共方面的记录，包括此次作战在内，在1940年内山西省西北部的情况如下：

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设立后，在2月1日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制订和公布了促进宪政运动、扩大抗日革命武装力量，改善人民生活等六大施政纲领。

日军为了破坏晋西北新政权的建设，在1940年内进行了春、夏、冬三次空前的大扫荡。

在春季扫荡中，敌人集中12,000余人的兵力，占领了方山、临县、岚县。我军经过38天的激战始将敌击退，并收复上述三县。

6月，敌以两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夏季大扫荡。我军在58天内大小战斗251次，经苦战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特别是二十里铺（兴县）、米峪镇（静乐县）的战斗最为激烈。

8月，在百团大战中，第一二〇师、山西新军以及地方武装力量，全力以赴参加战斗，进入太原、忻县、崞县、朔县、大同等地后，50天内作战316次，使敌人遭到极大损失。

敌人为了进行报复，立即以两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对晋西北实行了惨酷的“三光政策”。我军经过35天、300余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以上是这一年中第一二〇师所进行的四次大的作战。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方面军在年度计划的第一期，将关系到打通水路的肃正讨伐地区，选定为津浦、京汉两线中间一带，尤其是冀中地

区，并以之作为第一重点地区，实施作战如下：

一、冀中作战（4月11日——5月31日）

方面军于3月23日召开了参加作战兵团的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会议，然后令各兵团分头准备作战。其设想为：首先对白洋淀（保定东约50公里）附近，继而对滹沱河、滏阳河、子牙河沿岸地区进行扫荡作战，以打通保定水路、石门水路、滏阳水路，然后为确保这些水路继续进行讨伐。

各兵团按照这一计划，从4月11日到16日进行了第一次扫荡作战，自18日到28日进行了第二次扫荡作战，占领各水路要点，以后到5月31日反复连续讨伐，对附近一带进行了肃清扫荡。

在此期间，冀中的共军及土匪虽然只是分散退避，但另方面在西部山地，拒马河河谷及冀东的热河、蒙疆边境、特别是在南口、蔚县方面，共军的策动却活跃起来。所在的警备队对该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另外关东军从5月8日至6月12日，接着又在7月28日以后约3个月内，将驻在热河的部队及其它讨伐队调入冀东地区，驻蒙军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也予以策应，与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相配合，对满、中边境山地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

二、冀南作战（1940年6月4日——7月31日）

方面军为实施第二期打通水路的计划，在第十二军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统一指挥下，令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一一〇师团的各主力部队参加，自6月5日至7月底，对盘踞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边界附近的共军进行了冀南肃正

作战。

首先为了消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由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的各一部自6月4日开始行动，到6日扫荡了东明周围地区的共军根据地。

接着，各兵团讨伐队为了隐匿行动意图，尽量在接近讨伐目标的前方选定出发线，6月10日从东、西、南、北各方面一齐向濮阳分进合击。濮阳周围是冀南共军巩固的根据地。12日各兵团进入濮阳附近，但共军早已分散逃避。据判断主力似在朝城西北、郓城、钜野一带，等待日军撤退后，相机重返原地。

各兵团在附近一带要地分散部署兵力，直到6月下旬为止，进行了反复扫荡，并且打通了卫河水路。

对此次作战，第十二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以下回忆：

1. 作战设想，是根据以往经验，要在当时占据地区的边缘附近悄悄地逐渐开展，缩小包围，各个击破。部署时为了不使敌人漏网，利用飞机放烟雾标出位置，仔细考虑了防止共军脱出包围的对策。

讨伐的对象固然是共军，但石友三等的部队也在附近。对此，决定凡与重庆系统无明确区别的部队，可不必犹豫一概予以攻击。

2. 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象样的战果。

3. 关于当时第十二军的治安工作：

盘踞在各兵团作战境界附近的共军根据地，军方指定为“灭共地区”，讨伐及治安工作的各项措施，均不受作战境界的约束。在研讨了由当地单一指挥官统一领导的方法后，自1940年初，部分开始实行。

军方为了使武力战的施策与思想、经济、政治范围的各种施策相得益彰，对于制订全面的治安施策曾经煞费了苦心。然而，由于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及所采取的对策不够充分，同时作为异民族的日军处于孤立地位，加以不能在经济上支援中国，因而不能制订出有效的施策。结局，只有考虑使日军占领地区的居民尽可能得到安居乐业，并以此向群众进行宣传。蒋介石在内战时，为了使共军与人民分离，采取了极端的“空室清野”政策，结果反而召来民众的反感。军方未实行这种政策。

三、山东（鲁西、鲁南）的肃正作战

扫荡陈光支队：1940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及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的主力，在鲁西地区对陈光指挥的共军东进纵队进行了扫荡。但是，并未取得显著效果。

扫荡高树勋军：此次扫荡从5月上旬至下旬，与上项作战同时进行。当时共军因受到压迫逐次南下，我军即对鲁西地区苟延残喘的高树勋军进行讨伐，并打击了该军。

鲁南剿共作战：重庆政府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痛感山东省及苏北、皖北地区共军兵力的迅速扩大，国共矛盾更加深刻，深恐中共势力渗透，因而要求部下积极进行剿共。

第十二军，为了鲁南地区的肃正，命独立混成第五、第

六旅团及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自9月中旬到10月上旬，以鲁村为中心，对蒙阴地区的沈鸿烈军及以沂水西南地区为根据地的中共徐向前军，进行彻底的反复战斗，使之四散溃逃。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 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是1939年3月在第一师团留守部队基础上编成的，5月编入第十二军的战斗序列，在与第一一四师团交接后，担任山西省西半部的防卫和治安肃正任务。另外，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以后备各部队为基干，于1939年在华北编成，隶属于第十二军，主要担任胶济、津浦沿线地区的警备。

以后，两兵团负责地区的肃正建设虽逐渐有所进展，但第三十二师团的《情况报告书》有如下的记载：

一、敌情

目下，作战地区内存在的匪团，有正规军，共产党各种部队，杂牌军以及土匪，总数约二万人。这些匪团大部分活动在与邻接兵团作战地区的边界或山地。训练、装备很差，战斗意志不高。特别是由于国共斗争日甚，匪团矛盾也加深，不断出现前来投降者。

然而，最近一部分共军从山西方面进入作战地区，逐渐对蒋系军（匪）进行拉拢或强制合并。对此活动不可忽视。

二、治安肃正工作逐渐恢复，强调治安肃正以讨伐为主。在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情况下，不分战斗兵种，断然排除万难，连续进行讨伐。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 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于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兵团为基干而编成，是继承40年来中国驻屯军传统的师团。该师团参加攻占武汉战役后，调回华北，于1939年初接替第一一〇师团担任河北省东半部的防务。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配属于该师团后，担任南部地区的警备。

关于第二十七师团管内及周围的治安状况以及肃正建设的情况，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在1940年12月1日所作《师团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叙述：

一、敌情

师团管内及周围之敌，为共军、国民党系正规军及杂牌军等。在接管防务时，其兵力约九万人，主力在津海道一带，一部分盘踞在冀东道北部山区，不断进行武装活动。在天津周围，国共双方的各抗日团体以英、法租界为根据地，活动频繁，采取暗杀、放火、破坏铁路等各种暴行扰乱治安。因此，在天津以南地区，只能在津浦线两侧数公里之间，勉强保持着艰难的治安状态。但经我连续反复进行果敢讨伐，使敌战斗力逐渐削弱，陆续向西部及南部作战地区的边缘逃避，或四处逃散。至1939年5月底，在管内已见不到有组织的强大匪团存在。

然而，残存的匪群逐渐便衣化，巧妙躲开我军讨伐，转向地下活动。现在正尽力加强及扩大其抗战力量，企图依靠游击战夺回我守备兵力薄弱的乡镇，或策划破坏主要交通线等，其活动愈来愈加阴险顽强。

为此，师团逐步加强和扩充谍报网，训练投降的匪及中国方面的自卫机关（伪军——译注），以此为骨干组织多数的特别工作队，对潜伏的匪团进行严格的侦察、剿抉以期将其消灭。同时，各地驻屯部队只要发现匪情，立即出动反复进行猛烈果敢的讨伐，使之彻底覆灭。结果，经过一定时间，敌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显著减退，使长期在师团作战境界附近妨害治安肃正工作的主要匪团退至管界以外，或向我投降。管内残存的敌匪显著减少，本年四、五月在冀中地区肃正作战告一段落时，敌之兵力不过有2,800人左右。

然而，到今夏青纱帐起，逃到管界以外的匪团重新潜入管内开始蠢动，不断袭击我小的据点、破坏交通、电线等，反复进行游击、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在8月下旬自百团攻势后至9月中旬最为活跃。各防御地区部队以最严密的警戒和果敢的讨伐，终于结束了局部地区敌人的策动。以后，随着农作物的收割，管内进行清扫，敌又重新转向地下活动。

另一方面，以天津英、法租界为中心的抗日分子，由于我方对租界严行隔离，加以日英东京会谈的进展，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英国对日态度的大转变，以及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去年9月以来蓝衣社干部的数次被检举及投降等原因，抗日活动已被扼止。如今管内治安已有显著进展。

然而，如上所述，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不仅如此，蒋介石最近也高唱将于冬季攻势中，在河北破坏铁路，袭击乡镇。对此不可有半点疏忽。（以下略——笔者）

二、治安肃正及建设

师团所采取的方针，起初将治安肃正重点放在武力方面，一

心想要消灭作战地区的匪团，以期稳定治安、改进民生，从而实现华北的明朗化，并对长期建设作出贡献。1939年4月以后，彻底实行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扼住了匪的交通，并且进行了彻底消灭残存匪群的讨伐作战。各部队不断击败多数敌人，正节节获得胜利。但是，正当此时遇到天津租界问题及去年夏季空前大水灾。为了应付这些事件，在长时期内，不能将所属的机动力量分出一部分使用。（以下略——笔者）在本年度，除高粱收割之前匪势仍将活跃一时外，大体上正在按照预定的肃正建设进度进行。在此期间（1939.1.10——1940.11.30），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敌参战兵力663,312人，敌遗尸24,476具，缴获步枪20,137支，俘虏4,491人。敌战斗力显著削弱，从而促进了治安肃正工作。另一方面，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与武力工作并行的文化政治工作，特别注意争取民众，密切结合肃正讨伐以促进各项工作。首先尽快恢复管内42县的县政，调整及扩充地方自卫组织，确立乡村自治以期安定民生。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开发产业、恢复贸易、运输等，以利于物资的流通。此外，整顿、扩充交通通信设施，使讨伐与补给得以顺利进行，并可振兴民间营业。恢复教育机关，普及小学教育，努力诱导纯洁的少年，积极训练青少年，密切军民关系等。经过努力实行这些措施，逐渐收到实效。此外，滦州及沧州地区的模范区工作正在稳步进展。治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到今年3月已奠定了基础，现正继续向前发展。鉴于这些措施效果显著，现正向其它各县推广中。

三、英法租界问题

自去年6月14日开始封锁租界以来，一年多严格的工作，顺利收到效果。受租界掩护的抗日共产分子所祸害的天津及

其附近的治安，得到极大改善。被我封锁的英、法租界当局，由于受我严格封锁及国际形势转变的影响，自去年底以来态度大有改变，如今对我提出共同搜索租界内抗日共产分子等要求均已应允。

在经济方面，租界内工商业日趋萧条，内外贸易也因我采取汇兑统一政策及输出输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已形成日商逐步蚕食外商地盘的状态。

租界封锁解除后，师团仍在严密监视租界当局的态度，指导他们协助我建设新秩序。解除封锁后，一度衰颓的该两租界，虽然表面看来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师团期望使日人势力尽量向两租界内推进，夺取他们的商权，同时，并尽可能参与其行政权。

如今，我国国力，尤其是皇军的威力深深渗透两租界，特别是我宪兵常驻租界，给英、法人及该租界内的华人以极大威胁。租界内的英国军队自本年8月18日撤出天津，以后租界的警备主要由英工部局义勇队（由英、华人组成）承担，目前似有由美国军队担任警备的趋势。

治安肃正的根本问题在于军队的精锐，但鉴于各部队长期以小部队高度分散部署，经常进行讨伐，因而特别需要保持军纪、风纪，提高教育训练，端正工作态度等。为此，强调克服一切困难，加强监督指导。此外关于官兵的素质问题。该报告书写道：

自去年以来，由于多次的补充和调动，兵员现有人数为11,546人，其中新征入伍者为1,841人；下级士官的1,896人中，新征入伍者有898人；军官中约三分之一为现役军人。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 治安肃正工作

旅团在1939年8月15日，以第一一四师团为基础在华北编成后，接管了由第一一〇师团担任的燕京道地区（涿、固安、房山、良乡、宛平、大兴、昌平、通州、顺义、怀柔、密云、三河、香河、平谷、蔚等县及北京市）的防卫任务。第一任旅团长为南云亲一郎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京市内交通大学的校舍。由炮兵大队、工兵中队、通信队驻在北京及其附近担任小地区的警备，独立步兵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西北面、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南面、第七十九大队担任北京西面及西南面、第八十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第八一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及东面各地区的警备。1940年3月会同驻蒙军进行了对东斋堂方面的肃正作战（“卜”号作战），随后，我驻兵于门头沟及房山西面山地，扩大了两个矿山地区的治安圈。

各警备队根据匪情随时出动，连续数日或十数日反复进行讨伐。在此期间，旅团经常抽出兵力加强其它方面，或按旅团计划进行肃正作战。

旅团长兼任北京防卫司令官，除担任讨伐警备外，并负责政务指导，加以暂时或长期由他指挥的部队众多，需要处理多方面的业务。关于这些实际情况，长谷川美代次少将（后升中将，在任期间为1939.10—1941.8），在冀中作战终了的1940年5月31日所写的笔记“就任以来约八个月期间的主要感想”中有如下记载：

一、敌匪的蠢动，在所谓粮食青黄不接时期特别显著。对此，各警备队不辞辛苦积极进行讨伐。然而讨匪有如驱赶苍蝇，驱之复至，徒劳无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由于匪的语言风俗与居民相同，他们在得到居民帮助，或强迫居民帮助下，出没无常，并且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二、各警备队要巩固各根据地的防备，不使敌有隙可乘，这样可增大流动兵力积极讨匪。警备队在部署兵力方面，必须考虑兵力的高度分散部署，不致减低其灵活性，以便互相支援。

三、北京周围亦有不少土匪，数十人成群地出没于各地。土匪为其生存而苦害居民。彼等骚扰的地区，匪群大小虽有所不同，但各有自己的地盘为其活动区域。

四、共军在1939年初，盘踞于北京西面的山地，但至同年年底，其势力即向北京北面山地伸张，逐渐向东接近冀察热边境的山地，终于伸展到平原。当然也有一部可由北京西面山地进入东面平原。匪中最顽强而兵力较大、地下工作巧妙的有朱占魁部，该部以涿县、固安（北京南40公里）、大兴县（北京南20公里）为地盘，频频蠢动。包森、单德贵、杨作霖等以蔚县（北京东80公里）、三河（北京东45公里）、平谷（北京东55公里）为其地盘，肖克以西面山地为地盘，黑玉春、郑九如以密云县（北京北65公里）为地盘，进行活动。

五、上述各匪的装备以步枪为主（新旧杂牌不等），只有共军有时还使用手榴弹和地雷。

六、为了不让森林多的固安方面之匪易于隐避和逃窜，命平原警备队准备大量的锯，用以采伐树木，以便了望。同时，限制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而奖励种麦。因此，在固安县地区到四、五月间麦苗发青，而靠近匪区则可看见地皮（高粱未长起能看到土色），彼我势力范围能以明显区分，甚至在高杆作物茂盛时期，

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平原地区之敌匪挖掘道路改成交通壕，为了做到各村之间的联络和防备我用汽车袭击，更掘开20—30米间隔的横断壕。为此使村民付出极大劳力。

七、北京周围的山地，树木少而岩石多，地皮外露极为险峻。在此通行的道路，多系仅能成单行前进的小道，路面又多露有尖角的石头（因流水冲去砂土所致），步行极难。当初为了便于山地讨伐而穿用水袜，不但脚疼而且袜底很快磨坏。最后决定改穿军靴，但年岁大的部队长却又感到行动不便。

八、各警备队的防卫，是在部队驻地的四周筑起高墙（利用破坏的房子和砖）和土壕，加高了望楼以便监视，增强防卫力量。因此，匪的经常来袭已显著减少。但是，上述建筑物只能抵御步枪的射击，而不能抵御火炮。

九、对居民的宣抚，使之靠拢日军，尚需下一定工夫。由于匪来，则日军讨伐，日军去，则匪又来，致使居民无论对匪或对日军均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因此在匪情严重的地方，我警备队如有长期驻扎的迹象，则村民即可放心，并与我协力，此种实例不少。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在讨匪、宣抚以及各项指导方面有很大障碍。象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所说的那样：“能使一个中国人信服就能使百万人信服。”真正做到却也困难。

我军如果能严守纪律、风纪，对居民无不正当行为，就能使居民对我敬仰信赖，这是绝对必要的。

十、中国方面的武装，有自卫团、警备队、警防队等。

警防队（司令王铁相与治安部齐燮元上将对立）驻在密云、蓟县等地。时常单独行动，或配合我军，但其实力不大。该队也有携带武器集体逃跑（3月7日在石匣镇约有30人携械逃跑），及私搞鸦片买卖的情况（以后被重新编成治安军分驻于涿县、固

安、平谷、蔚县、顺义、密云等地，与警防队相同）。

十一、关于北京的特殊性

北京是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将领、高官、财界要人等往来频繁，每次均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而过往的军队也不少。为此，由旅团长兼任的北京防卫司令官，除作战任务外，还必须考虑各种应酬、交涉等等公私事务。

此外，尚有多项业务如：为了制订北京市的防卫、防空计划及实施演习，常常要与方面军司令部、宪兵、民团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谈判；还必须采取措施整顿驻北京军人的风纪，处理“恐怖”事件，以及解决北京市民的食粮问题；又要指挥特务机关及北京兵站事务所；在宣抚工作方面，既要指导县联络员，又要与新民会保持联系；对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日华青年团、铁道护路队等还要负责教育、指导。此外，在西欧德、意军与英法军的战斗开始后，驻北京的英法军将对意军（为数极少）如何处理问题，也要加以考虑。

以上是日本方面肃正建设的概况。在此时期，中共方面的政治、扩军工作进展速度非常快。

四 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工作及军事方针

政治工作的重点

政治工作，根据各边区和各边区内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其重点有所不同。晋察冀边区具体的政治工作重点，可举察南、冀中地区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自1940年6月18日至7月19日，对察南地区的“抗日赤化工作的实质”以蔚县为中心作了实

地调查，在其报告书中以“最近的政治工作重点”为题，有如下记载：

(一) 中共工作人员，在军事上虽采取守势，但在政治工作方面，则按照共党的政策采取坚决的抗战态度，努力争取群众。

(二) 边区以自给自足及改善群众生活为目标，制订增产计划，按长期游击战方针及发展生产政策开始第一阶段工作。

(三) 为了促进边区宪政运动，在民主集中政治的名义下，着手建立类似苏维埃式的政权。

(四) 以所谓动员全民武装、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为宗旨，对过去的群众团体运动，除留少数干部维持原状外，全部编入武装团体，扩大和加强人民武装自卫队，并对他们进行训练，以便配合正规的战斗部队。

(五) 对日军占领地区，采取拉拢、瓦解等手段，不断进行地下活动，特别着重于削弱中国方面的机关，破坏和扰乱日本方面的治安和财政经济。

(六) 对日军占领地区的人民，以宣传背离日军及新政府机关为重点，采取以下方法，从民心的背离逐渐导向反抗运动。

1. 以日军对中国当地政权的干预和新政权的卖国政策等为内容，捏造诽谤宣传。
2. 广泛散布中国军人及公务人员的无礼、渎职、无能等流言。
3. 扰乱经济，例如采取抬高物价、囤积物资、现金的黑市交易等手段，以贬低蒙疆票、联银券的币值，阻止其流通。另一方面则维持和提高法币价值，扩大边区银行纸币的流通。

中央灭共委员会所调查同一时期的冀中地区西南部（由定县、安国到无极、饶阳一带地区）的情况如下：

冀中地区为建立军事、政治游击根据地的重点。但是，由于平原地带的自然条件对军事行动有一定的困难，因而努力从事政治根据地的建立。办法是先建立起分散的小根据地，然后在其中间建立中心根据地。

地方共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军内的共党组织，由于领导部门经常游动，而固定于地方的基层组织尚不健全，因此，在执行政策方面，形成以下那样由武装力量强制执行的情况。

一、各项选举虽普遍实行，但群众能够产生何等政治力量颇成疑问。

二、以武装力量为后盾动员群众，对争取中农、贫农虽有进展，但由于领导部门的游动，对群众的影响有限。

三、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实行各项经济政策的另一方面的结果，增加了物资征用的负担，改善民生的措施也不完备。

行政组织与民众组织

中共争取群众工作的特点是，一方面改革行政组织及群众组织，以期使之加强和扩大；另一方面积极行使笼络民心的政策。开辟冀南游击区的领导人杨秀峰说：“群众工作是政权工作的基础，开辟冀南游击区的宝贵经验说明了密切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关于行政组织的改革问题，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3月5日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法条例”，确定成立各级人民大会，使人民参与政治。

对于政治工作基本单位的“村”尤为重视。下面对新村政权详加说明，作为工作人员指导居民的参考资料。（注：根据灭共资料“察南边境抗日工作实况调查报告书”）

一、所谓新村政权即村公所。村政权是国家的支柱，是边区政府、县政府、区公所一切工作的基础。

二、村政权是团结人民的中心机关，是保持政府和人民密切关系的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遵照政府的命令，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选举区长、村长等工作，为抗战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三、新政权中必须排除汉奸，选举作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热心抗战的村长和办事人员，以改革村政权。

四、村中最高权力机关是村民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会位于村公所之上，为村的最高机关，由村中选举热心抗日救国受村民信赖的人做为村民代表。村长、村公所要服从村民代表会的决定。此外，由村民代表会推荐，由村公所组织的调解、经济、生产、教育等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各项工作。

五、村民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必须经常协助代表会监督各代表的工作。

其次谈到有关加强群众组织的问题。群众组织中有武装组织及非武装组织。前者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自卫队等脱产的军事组织。后者有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抗战建国会等，及各县的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些都是存在于直接生产和民众生活之中的组织。其名称、组织各地区有所不同。兹举冀中地区为例，其情况如下。（注：根据灭共资料“冀中区中部方面实情调查报告书”）

一、人民武装自卫队

为了使本区农村现有的农民自卫队，本着全民抗战精神，发挥更大作用，《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规定任务如下：

1. 协助抗日作战，开展游击战；
2. 偷察、警戒、防止泄密；
3. 维持地方治安、剿灭通敌分子、镇压汉奸、逮捕敌人间谍；
4. 传递情报、运送军需物资和伤员；
5. 破坏敌军交通、维护我军交通以及协助构筑工事。

自卫队的组织系统如下表。

自卫队的组织系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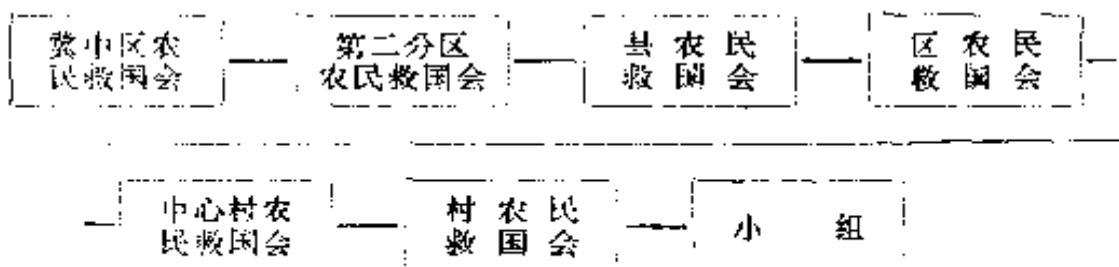
县 总 队 部	队长	1名
	军事干事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区 大 队 部	大队长	1名
	政治指导员	1名
	军事干事	1名
	政治干事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大 中 心 村 或 队 部	中队长	1名
	政治工作员	1名
	军事干事	2—4名
<u>第一分队壮年队</u>		26岁—40岁的村民
<u>第二分队青年队</u>		17岁—25岁的村民
<u>第三分队守护队</u>		41岁—55岁的村民
<u>第四分队妇女队</u>		16岁—55岁的村民
<u>第五分队儿童队</u>		11岁—15岁的男女

以中心村及大村为单位成立中队部，大村超过编制的人员及人员不足的小村编成混合部队，由附近大村的中队部指挥。在分队编制以外，组织游击小组（或班）及除奸、侦察、担架、运输等小组，或组织联络队、向导队等。

由于自卫队是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半武装组织，其特点是：能够出色地发挥固定情报网的机能，干部大多数是贫农，容易同情共产党的政策，防止村内群众的脱离，并能积极配合抗战等。

二、农民救国会

通过保护农民的日常生活利益，使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同时动员他们支援抗战，因而这是中共最重视的群众组织。



冀中地区的政治工作（行政组织、群众组织）一览图（见下页）

三、工人救国会

以游击地区的雇农、手工业者为组织对象，但人数少，活动也不积极。

四、青年救国抗日会

该会为八·一宣言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发展的青年群众组织，主要利用青年的积极性，作为群众组织的骨干。另外编成青年抗日先锋队作为青年的武装组织。

五、文化界抗战建国救国会（简称文建会）

其前身是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在文化界工作的人员为会员，从事教育、宣传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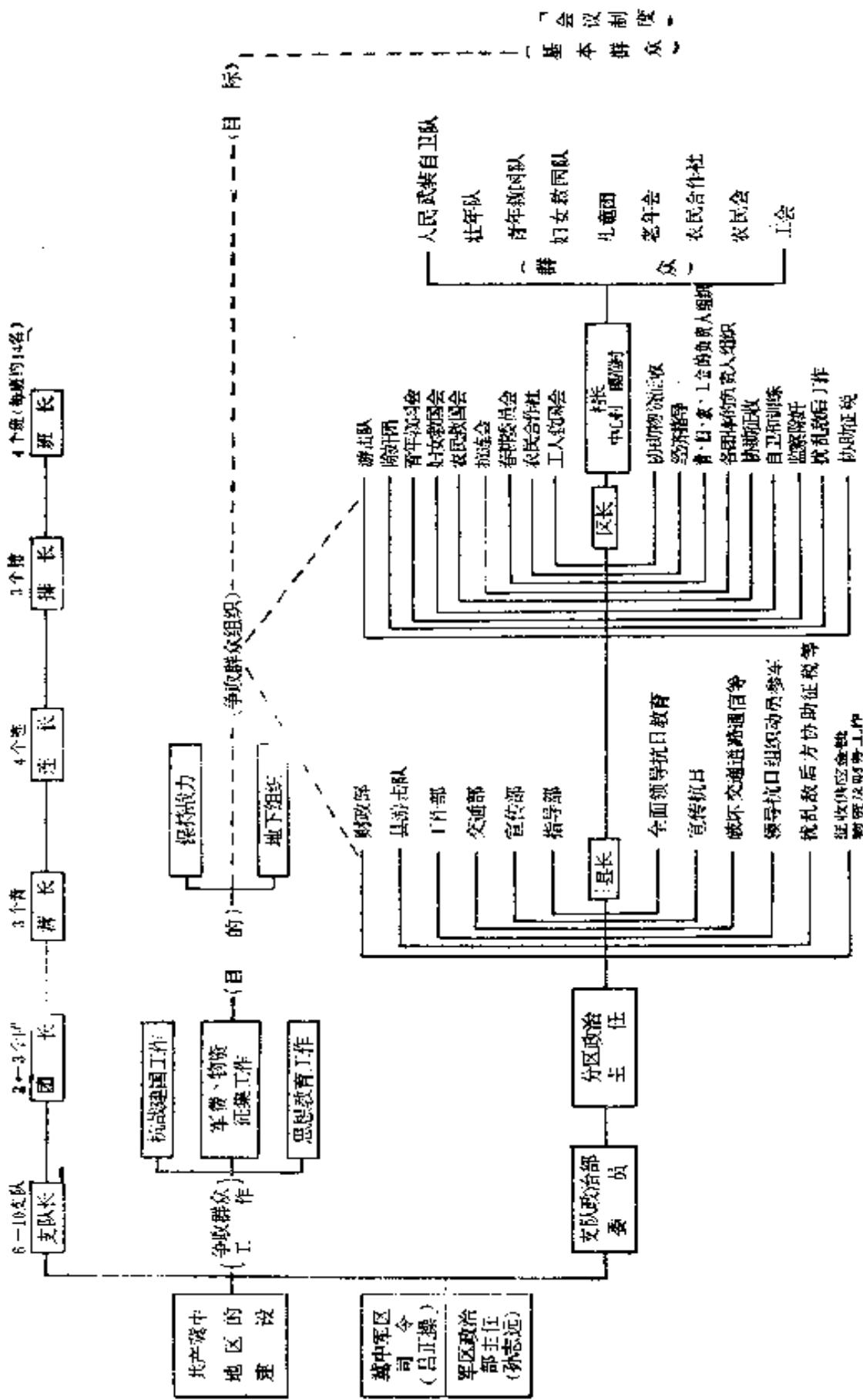


图4·冀中地区政治工作 (行政组织、群众组织) 组织系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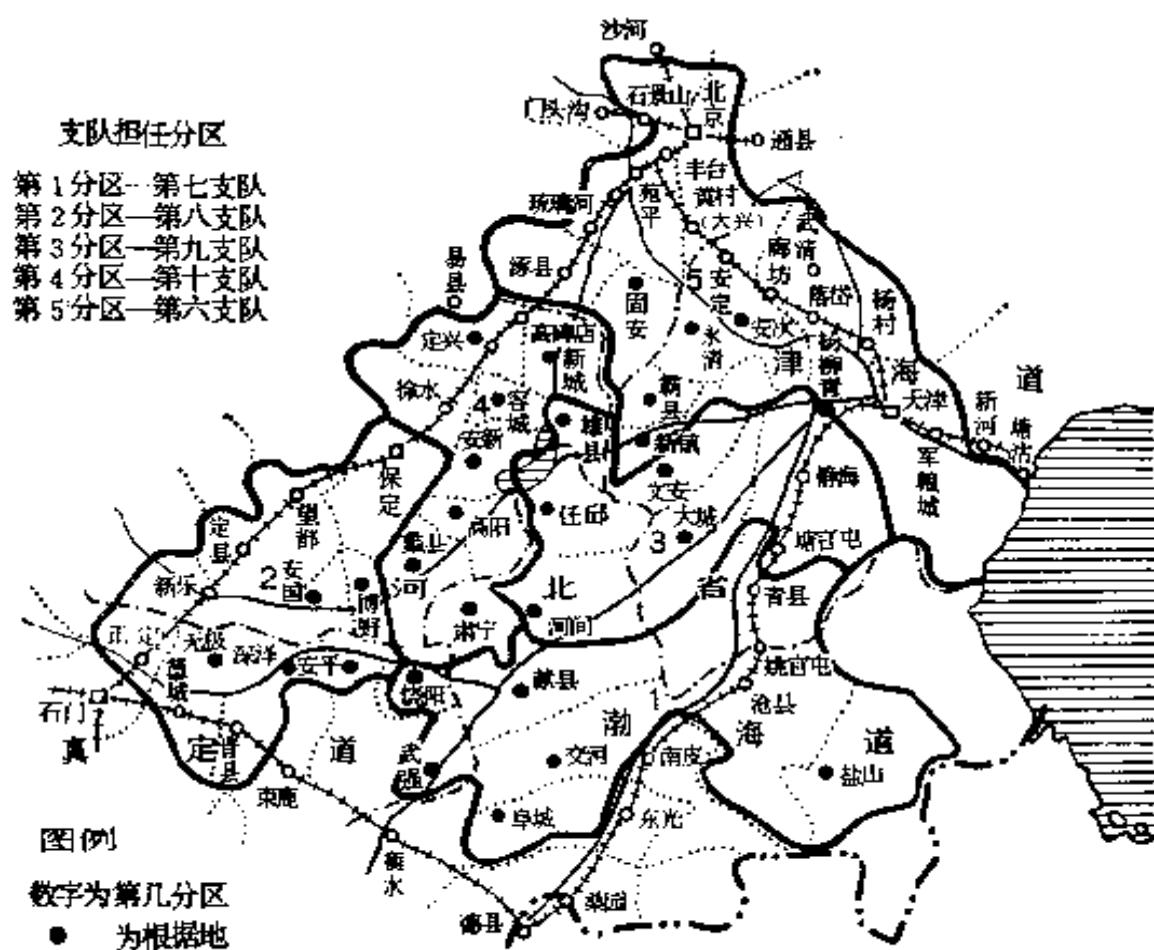


图 5·冀中区分区划及工作分担一览图

这些群众组织的共同特点是以中农、贫农为主，积极进行活动。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主张全民组织、全民抗战，但其真正的基础则是建立在中、贫农阶层。

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例

中共的地下工作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以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为目的的内部监察，一是以扩大党的力量，削弱日方力量为目的的对敌斗争。对敌斗争方面的工作大体分为宣传教

育工作、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侦察及恐怖行动。对此无需一一叙述。单举从方面军情报资料中摘录的一例——打入山西省祁县（太原南约60公里）县公署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概况，即可看出中共在亲日政权中地下活动之一斑。

祁县的赤化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开始的。当时潜入该地的工作人员，专门致力于从内部破坏阎锡山的势力，尽量扶植牺盟会、学校、农村内的反阎力量，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开始积极活动。1938年底，组成祁县县委以下的党组织，继而着手筹备青年、农民、工人、妇女、儿童等救国会以及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等。该县处于日军势力之下以后，第一任代县长王殿元（党员）即致力于赤化职员的工作，并同时负责向八路军、伪县政府（指抗日政权——译者）等供应物资。第二任县长史步鳌（支部书记——1940年10月被检举）仍继承前任工作。1939年10月以来，在城内秘密成立“日本军地区工作委员会”，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政府的秘书和各科长任委员，各科其他成员为工作员。他们从城内各商店数次征募现金、棉布、靴鞋等共值一万数千元的物资，由该委员会供给中共方面。另外通过各小组向共军提供城内日军或警备队出动讨伐的情报。并向上级党组织定期报告县财政、教育、交通状况。1940年4月以来每月对县公署职员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其秘密意图，实际上是要帮助叛乱的武装势力。

县警备队自成立以来，即有共产分子潜伏在内。1939年9月由一二〇师政治工作员协助，在队内发展了三十名共产党员，并组成县警备队第五支部，利用日军及县警备队使用的密探，秘密成立了收集情报办事处，向共军提供有关县内外日军及县警备队的装备、兵力、计划、行动等情报。此外，并配合县公署支部宣传班在城内印刷厂印刷及散发抗日传单。为了掩护这一行动，

他们拉拢日军及县警备队使用的密探，使之报告假情报等。

在县警察署内，由第一任县长介绍入党的民政股长专门负责对署员进行赤化。1939年4月又以警察署长为书记，组成警察署支部，吸收优秀分子加入上述日军地区工作委员会。

为了在小学校内成立支部和进行抗日教育，史步鳌任用共产党员为第一新民小学校长。此后，该校长秘密与县长及一二〇师政治工作员联系，在城内争取了四个小学校的校长和职员，成立了城内小学校第二支部，竭力对学生灌输共产和抗日思想。

在祁县车站，自1939年4月以来已有共产党员潜伏并逐步发展党员，1940年4月组织了祁县车站第一支部，在附近进行宣传并将该车站有关各种运输状况、设施、日军、警备队、警备手段等情报，不论大小，全部报告共方。

在祁县有军管的棉布工厂，1939年4月，由该厂工人救国会会员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工厂支部，以该厂电工长为书记，与一二九师交通队秘密联络，并多次给来袭的共军引路，幸被我军击退。

此外，在县公署以下六个支部中，分别设有秘密谍报网，收集和送出有关日军军情及新政权下的财政、教育、交通等的情报。作为外围团体的农教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救国会等，分别负责筹办各种物资，策动拒绝为日军劳动，慰劳八路军等活动。特别是青救会，积极破坏和妨害日军方面的通信线路，督促为共军送交军需物资，宣传共产抗日思想。儿童救国会也在教员的指导下，主要从事传播抗日赤化思想及向各村送信等活动。

八路军的行动方针

1940年8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中共干部会议上

作了以“坚持华北抗战和最近三年的总结”为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抗战，对决定此次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强调必须广泛地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及统一战线运动，坚持长期的、彻底的抗战。以下摘自“灭共资料”：

坚持华北抗战和最近三年的总结（摘要）

一、坚持华北抗战的条件及意义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坚持了华北抗战，广泛地开展了华北游击战，这是由于有了如下的特殊条件：

在日军占领地区的空隙，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华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广大青年的反日运动，以及与上述条件相结合的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坚持华北抗战对全国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战略上的意义——掩护西北，保卫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牵制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巩固了华中、华南战线。

政治上的意义——认识到日军征服华北是不可能的，因而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经济上的意义——削弱日军力量，促使其在持久战中必然崩溃。

二、华北抗战中所采取的行动方针

- (一) 坚决执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
- (二) 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 (三) 改善人民生活，调整阶级关系；
- (四) 武装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
- (五) 以游击战为基本战略，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

三、日军统治华北的办法

日军在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时期，企图以烧杀和恐吓占领全华北，已遭失败。

从军事进攻转向以政治进攻为主的时期，其基本方针为“治安肃正”，实行长期战的措施。即以八路军、共产党为主要对象，特别是以对山区的肃正讨伐和治安工作为重点。最近在加强以华制华阴谋的同时，破坏我国的资源财富，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实行经济封锁。

四、总结最近三年的收获

- (一) 动员了全国人民参加抗战；
- (二) 歼灭十万日军，八路军扩大到二十万人的正规部队，培养了十万游击队干部；
- (三) 建立了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广大抗日根据地；
- (四) 给了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和自由；
- (五) 实行了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抗战积极性；
- (六) 采取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振兴生产消费合作社等措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果断地进行了斗争；
- (七) 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揭露和粉碎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的无耻宣传；
- (八) 以上收获，是由于下列因素取得的：八路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军民一致），军内保持坚强的政治团结（官兵一致），依靠中共一贯正确的领导和八路军的英勇奋斗，并采取了卓越的战略战术。

五、今后的行动方针

抗战三年的成绩证明，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路线下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是正确的。今后即应遵照此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团结，国共合作，三民主义，并适应华北的形势，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措施，坚持抗战到底。

由于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日本侵略势力和汉奸的新的政治攻势更加猖狂，“以华制华”的阴谋更加毒辣，对此，我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 广泛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及坚持抗战运动，清除华北抗日阵营内暗藏的汪派汉奸，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二) 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实行民主政治，为了抗战和人民的利益，加强和扩大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努力造成全国的生动的典范。

(三) 华北抗战对决定中日战争胜负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我们有华北三年抗战的基础、全国的抗战组织、尤其是我党中央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则不论日军如何反复扫荡，如何施展政治阴谋，只要我全体人民同心协力坚持华北抗战，经过长期的扫荡和反扫荡的激烈斗争，最后以反扫荡的姿态参加全国反攻，相信定能将日军一举赶到鸭绿江边。

五 对“百团大战”的作战

(晋中作战、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

“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有如下记载：

“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

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我军受此袭击之后，为了不再发生同样过失和保持军的威信，乃企图进行晋中作战以使共军彻底消灭。”

以上记载了共军采取与过去游击战完全不同的战术，乘日军不备，突然以大部队的运动战进行攻击情况。这是初期情况，以后共军再次发动攻势，日军对其反击，一直继续到12月上旬。

此次作战可分为共军方面的第一次攻势（8月20日夜——9月上旬）和第二次攻势（9月22日——10月上旬），日军方面的第一次反击（9月1日——9月18日的第一期晋中作战）和第二次反击（9月23日——10月11日的察南南部边界反击作战，10月11日——12月4日的第二期晋中作战及10月13日——11月26日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由于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导致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反击战，进而发展到消灭共军根据地的作战。下面就作战经过概要及其影响加以叙述。

共军攻势开始前的一般情况

一、敌情及治安恢复情况

1940年7月底，华北方面军管界内的敌情及治安恢复情况，如附图。（此图略）

二、日军的警备部署

当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按一一〇师团的平均驻兵密度计算，大致在42,078平方公里约驻一个师团，568平方公里约驻步兵一个中队。

三、共军攻势的征兆

在此次攻势前，日方虽也曾得到一些情报，表明共军有进行事先侦察、移动和集结兵力、积聚物资等活动，以及居民逃避等情况，但并未看做发动攻势的前兆而引起重视。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同时，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从司令部到第一线警备队一致认为：“事后回想，确有先兆，假如联系各种情况加以分析，共军的攻势或有可能判断出来，但当时考虑得太轻率了。”

例如：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10月13日）中“袭击前的一般征兆”一段，曾有如下叙述：

一、共军向地盘以外移动

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

二、敌方谍报工作情况

敌在此次袭击约一个月前，即令很多密探进行侦察。为此，敌采取了向村民摊派情报任务、强制或绑架爱护村居民使之提供情报等手段。

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

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 8 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三、居民避难

对敌人的袭击，居民最为敏感，必须特别注意他们的动向。即此次来袭之前，井陉煤矿附近及其它地方的居民也有预先警觉而逃避的。

四、积聚物资及其他征兆

袭击前，采取向各村强征面粉，或征用民夫、搬运工具等方法，积聚粮食等物资。

五、在石门地区发生丢失修理铁路的工具，以及铁路仓库起因不明的火灾等情况。

共军第一次攻势与日军的防御战斗

关于共军奇袭时的情况，“华北方面作战记录”叙述如下：

石太路方面：

奇袭石太路沿线的敌军为第一二九师约6,000人及晋察冀边区第二、第十九团及抗日军政大学学生队等。8月20日夜，娘子关、程家底、岩会、乱流、辛兴镇、芦家庄等地我各警备队，突遭敌奇袭，公路、铁路被破坏，因而各部队无法得到增援，孤军作战，终于将敌击退。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负责警备地区内的井陉煤矿，8月20日夜，遭到敌人内外夹攻的袭击，设备彻底被破坏。

同蒲路北部方面：

从8月20日半夜遭敌奇袭，同蒲沿线及其以西地区的我警备队虽将敌击退，但铁路受到极大损坏。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往扫荡

了太原及忻县以西地区之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扫荡了原平镇以西地区之敌，29日分别返回原驻地。

同蒲路南部方面：

敌军对介休、霍县附近铁路沿线各地进行袭击，但均被我第四十一师团的各警备队击退。

东潞路方面：

经过8月20日及21日两天，决死第三纵队约1,500人一齐来袭，被我第三十六师团各警备队击退。

京汉路方面：

来袭之敌为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的一部及一二九师之一部等约8,000至10,000人。23日第一一〇师团在负责警备地区讨伐了高邑一带之敌约1,000人；25日讨伐了柏乡南面之敌约2,000人，及狐狸村残敌约1,000人；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讨伐了正在磁州以南蠢动中之新编第一旅。

以下详述石太路、同蒲线北部及京汉路方面各兵团之情况。

据中共方面资料，共军将攻击重点指向石太路沿线地区，由其最精锐部队担任。即以聂荣臻部队的十五个团向平定、石门一线，刘伯承部队的十五个团及炮兵团向平定、榆次一线进行攻击。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情况： 在共军攻击时，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部署于石太路沿线。各警备队，除一部分外，均突然遭到共军的奇袭，因不能相互支援，只得各自进行防御战斗。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和笔记，当时情况大致如下：

一、阳泉的旅团司令部及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队部的情况：

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于20日24时稍前，接到娘子关警备队长池田龟市中尉第一个打来的电话，大意说：“虽遭共军攻击，但无论如何也要独自将其击退，请放心。”接着从寿阳警备队也有同样的报告。上田参谋立即前往片山旅团长宿舍报告以上情况后，急速赶到旅团司令部（司令部距宿舍约700米），当时阳泉市内已有一部共军潜入，参谋已有可能遭到射击，情况十分紧迫。参谋到达司令部后，首先就警备问题对驻在阳泉的直辖部队作了指示，同时，大致弄清了各地情况，但有线通信业已中断，以后只有靠无线电进行联络。

阳泉警备队队部（队长：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长德江光中佐）在20日傍晚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的地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万一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日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20日白天，阳泉街上（人口约2,000）的情况也与平日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偏偏就在这天夜里，接到的第一个报告，却不是来自友军，而是敌人袭击的枪声。

旅团司令部位于街的西北侧，警备队队部位子街东的阳泉车站南侧。可以听到距队部东北约一公里处的桥梁附近的激烈枪声。南面约300米处有一座庙的高地（全街的制高点）很快被共军占领。共军从高地一面用步枪射击，一面不断发出喊声。

二、娘子关警备队的情况：

娘子关警备队（队长：池田龟市中尉）方面，8月18日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庄底一带南下的意图”。随后又接到由自卫团送来“很多共军侵入了坡底村（娘子关西约3公里）”的报告。警备队主力立即出动，当

半夜，在坡底村以南地区以快速袭击将共军击退。另外，东塔崖警备队伏击共军，使之向北退却。

20日将近半夜，另一部共军袭击了磨河滩村（紧靠娘子关西面的村子）以西的各警备队据点。

关于20日半夜至21日的战况，“娘子关警备队战斗要报”有如下记载：

20日夜，中队长带领二十人乘摩托车从地都村（河北省边境的村庄）附近出动，回到娘子关令战士下车，宣布注意事项后，刚要下令解散时，突然遭到从西面300米铁路上捷克式枪的猛烈射击。当弄清为敌人的急袭后，中队长以下20人立即向敌人攻击，时间是午夜24时。正在此时，恰巧一列车载有退伍回国的部队（车内约800人）到达娘子关车站。

笔者注：回国部队第一批800人，第二批400人。第一批到娘子关，第二批到阳泉。第一批由指挥官包括三谷炮兵大尉在内四名军官率领，兵员系由炮兵、辎重兵、卫生兵等混合组成。一开始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后来有效地使用少数武器参加了警备战斗，直接或间接给敌以显著威胁。

敌逐渐向坡底村方向退却，中队阻之于城西村南面旧关街道，正严密警戒中。

21日3时，敌约200余人企图渡河南进，中队彻夜战斗将敌击退。

21日白天，估计敌不会南下，即回中队用早饭，正在以啤酒接待回国部队时，遭到来自北边高地敌人的射击。敌逐渐增加兵力占领了河北村北面、坡底村东北面、城西村北面各高地一带阵地后，一齐开始射击。这样被敌包围，中队以少数兵力，力图阻止敌人进入，决定首先守住兵营附近。

回国部队因井陉方面情况紧张不能出发，而在娘子关待命。

回国部队从车站到兵营往返途中，就有三人受了重伤。午夜24时起天气变坏并降雨，兵营一带彻夜严加警戒。

三、寿阳警备队的情况：

20日23时前后，有电话向警备队长原田寅良中佐（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长）报告说，“马所及芦家庄一带有很多敌人在集中”。但随后由于与寿阳以南各警备据点的通信完全中断，因而情况不明。从北面来的第一个报告，是无线电报告，大意说：“遭

到优势的共军包围攻击，正苦战中。”以上情况虽用电话向阳泉的旅团司令部作了报告，但以后电话中断。

（注：与旅团之间的无线联络始终未断。）

警备队长勉励各警备队坚守阵地，同时，重视北面（盂县）地区的战况，当即向盂县派出增援部队（抽出传令兵及其他兵员30人编成混成小队，带有步兵炮一门）。

自20日夜至21日晨，各方面均已展开激战，但21日入夜即告平静。寿阳南面上湖、马所的据点，在第一夜中均已被共军攻破并占领，寿阳我实力薄弱，仅有警备队长以下约一个小队的兵力。但在由五名宪兵领导的中国县警有力协助下，使重要设施及县城得以坚守到底。

自8月22日至月底，旅团内各地区的情况如下：

一、阳泉一带的情况

20日夜，据判断直接攻击阳泉的共军兵力，至少有2,000人，但日本方面的警备兵力包括中国警备部队在内仅有约700人。即，日军：旅团司令部约30人，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队部约50人，山炮兵大队约400人，辎重兵中队约100人，连同工兵及其他，总计约680人。

中国警备部队：县警察队、保安队、警备队能使用的合计为40—50人。

20日夜，占领庙高地的共军，从高地上用日本话一面高喊：“投降吧！不投降就全部消灭！”一面进行攻击。对此，日军方面虽采取了局部反攻，但只有付出伤亡并未成功。在阳泉的日侨（约500人）中，已经认定绝望，甚至出现了穿起好衣服准备就难的景象。

开始旅团司令部对各方面的战况完全不明，经过两三天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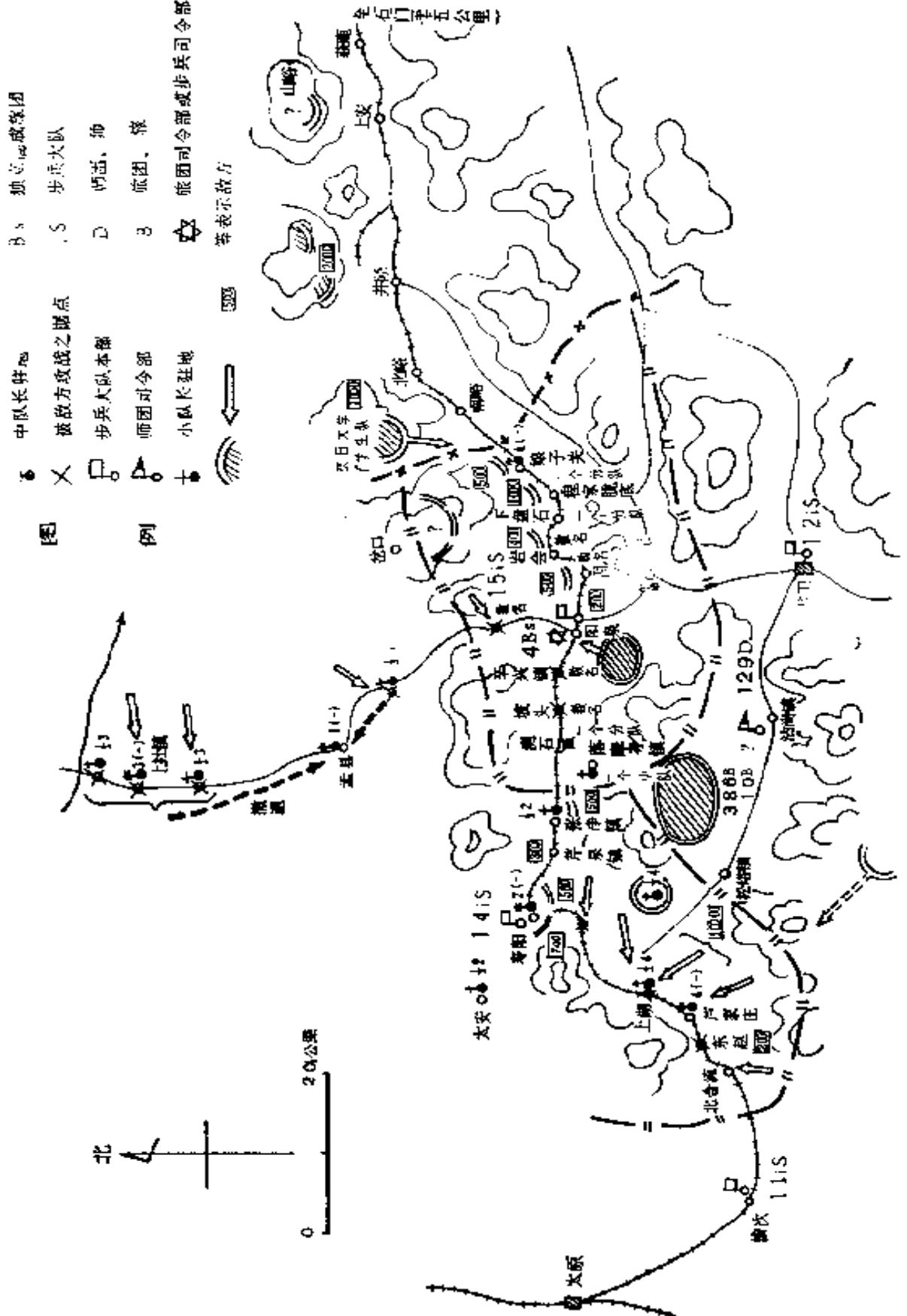


图 6. 百团大战石太线沿线地区之战况概要
(1940年8月22日—23日)

才逐渐弄清。认为从全面战况看来，阳泉以北地区战斗激烈，以东地区尚无问题。此外，从缴获的地图可以看出，石太路上的各警备队，均遭到五至十倍于我的共军攻击。阳泉西面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直到24日前，终为共军所占领。

24日，由太原用空军飞机直接联络，我飞机对阳泉庙高地果敢地进行了俯冲轰炸。25日，开来了由独立步兵第十一、第十二大队各抽一个中队的增援部队。26日以后，阳泉警备队逐次开始反击，29日将坡头、测石一带的共军向南击退。30日扫荡了东北一带地区。

二、娘子关一带情况

娘子关警备队，自22日晨遭到共军迫击炮的猛烈轰击。11时前后，共军的军使手举白旗来到娘子关送劝降书，池田队长愤然予以拒绝，并答复说：“共军须立即后退，如仍在原地不动，我方即开始攻击。”遂令军使返回。

当夜，警备队渡过桃河，奇袭正在磨河滩村集结的共军约500人，予以毁灭性打击。在此战斗中，因有回国部队（三谷大尉指挥的步兵约150人）及碰巧来娘子关的酒井装甲列车队的协助，取得了大的战果。

在东面的苇泽关方面，23日判明有共军约六、七百人进占地都村附近铁路及其南北高地。警备队于24日对苇泽关北面高地及地都村以北的共军进行攻击，并将其向北方击退。25日，在地都村北面与西进的井陉部队取得了联系。

26日，警备队向西方出击，将包围各据点的共军击退，恢复了与程家底、下盘石的联系。27日，由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派遣的增援部队（步兵约一个大队）抵达娘子关露营。警备队在严密戒备的同时，并掩护铁路及铁路用电线的修复工作。

三、寿阳、盂县方面的情况

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的警备地区方面，在从北面的上社镇一带撤出战斗中，因是山岳地带，步兵炮队等虽付出较大伤亡（战死44人），但主力则沿制高地点南下撤退至盂县。

此外，寿阳、芦家庄东北面的据点，只有盂县和太安坚守到最后，其它据点则均被共军占领。大队长以手下的兵力（约一个半小队、步兵炮一门），于25、26日向张净镇、马所进行反击。此时虽有空军协助，但共军巧妙利用地形，轰炸效果不大。

第一军司令部的紧急措施：第一军司令部（军司令官：篠塙义男中将，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21日晨从旁系电话中收到第一次报告说：“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但以后再无更详细报告，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由朝枝繁春参谋同乘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方弄清石太路沿线全面情况。军司令部乃召开紧急幕僚会议，当即采取增援措施，并派遣了军的参谋泉菜三郎中佐、朝枝繁村大尉二人前往阳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进行联络。

朝枝参谋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先乘火车至榆次，然后徒步突破敌阵，三日后至寿阳，经一周时间始达阳泉。

石太路沿线各小据点（以分队为主）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线制高点上之共军了望哨。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伤。沿途村庄，居民或逃走或被八路

军带走，房屋皆空。至阳泉旅团司令部时，全面战况业经脱险，已可安心。但是，此等局面的出现，认为是由于许多运送退伍士兵回国的列车偶然停留于娘子关、阳泉之间，使敌人判断错误，因而停止其攻势。

以后我等于援助首次反击作战后，于9月初乘飞机返回太原。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情况：关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文重少将）司令部在战斗初期采取的措施，该旅团参谋泉可畏翁中佐回忆如下：

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赏罚规则等，结果，自1940年初以来，创七个月无事故的纪录。

然而，8月20日半夜，据报告：正定至石门之间的小铁桥首先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继而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石门以西的电话线不通。21日拂晓，井陉地区又遭到优势共军攻击。据此，旅团司令部已知事态极为严重。

以上情况陆续向旅团及第一一〇师团长饭沼守中将报告，同时，从所属各大队中抽出兵力编成临时支队（独立步兵第三十三大队长指挥的步兵约四个中队为基干）后，命令立即快速向微水镇前进。旅团司令部率领直属部队（步兵约十个中队为基干）乘装甲列车快速向井陉前进。

注：据一一〇师团长饭沼守中将记录：师团长20日夜接到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电话报告，得知石门附近情况，但以后电话不通，情况不明。21日傍晚，得悉石太路全线遭敌袭击。师团长于23日派轻装甲车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前往井陉地区增援，同时，派出后方主任参谋调查现地损失情况。

旅团判断，在所负责警备地区内，共军的攻势以袭击井陉三

煤矿及石太路的要地（井陉以西险峻山地的铁路、桥和隧道）为重点。另外，并破坏获鹿、微水镇的铁路、公路，企图阻止来自石门的增援部队。各地战况如下：

一、井陉新矿的情况

新矿位于总矿的北面约1.5公里，当时约有一个分队负责警备，遭到约1,000名优势共军的围攻，在寡不敌众情况下，全矿被敌占领。各处重要设施被焚，损失极大。（注：共军利用矿井通敌分子，切断铁丝网电流，即由该处侵入。）

二、井陉总矿的情况

总矿与新矿同时受到优势共军的急袭，经警备中队长以下全员奋战，坚守所负责的地区。然而，虽明知新矿情势危急，却无法采取救援措施。（注：主力部队正向深县方面出动，煤矿警备力量减少一半）。

三、阳井煤矿的情况

阳井煤矿在总矿的西南约二公里，当时有一个步兵小队负责警备，遭到优势共军袭击，激战至21日晨，该矿得以确保。

四、井陉以西铁路警备情况

在井陉以西地区，井陉西北峪警备队（步兵一个小队）于20日半夜遭敌袭击，经各守备哨所顽强抵抗，守住各负责地区。然而部分铁路桥及其它设施被破坏。另外，该警备队情况曾一度陷于危险中。

五、增援部队的行动

旅团增援部队于21日午后由石门出发，急行军奔向井陉。但是，途中铁路及公路被破坏，因修路及排除地雷，致使前进迟缓，22日前始达井陉，与独立步兵第三十四大队长取得联络。为应付当地战况，由增援部队的主力负责扫荡新矿以北地区，及各煤矿的警备任务。另外，由于西部地区（井陉车站以西省境之间地

区) 警备小队的情况完全不明，在增援一个步兵中队的同时，首先派出得力的侦察军官去娘子关联络。(注：各自于23日取得了联络)。

旅团长痛感有必要对西部地区进行扫荡，亲自统一指挥两个步兵中队和工兵中队，自24日早扫荡西部山地，同时由工兵中队紧急修复铁路桥梁和隧道。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情况：独立混成第九旅团负责警备太原附近及北部同蒲线南段地区。同蒲路北部沿线及其以西地区的警备队，从20日半夜，虽击退前来急袭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的主力，但铁路遭到严重破坏。

注：独立步兵第三十九大队，担任沿忻县——静乐道路地区的警备，自20日半夜遭到优势共军的攻击而连续激战。但因是山地，据点相互呼应和增援极为困难，静乐地区的一部分暂时被共军占领。北部同蒲线方面的情况想来大致与各地情况相似。

旅团自22日至28日，以主力进行了反击，扫荡了所负责的地区。

第一一〇师团的情况：袭击京汉线方面的共军，是晋察冀边区军的一部及第一二九师的一部共约八千至一万人，在第一一〇师团负责地区的保定、石门、顺德(今邢台，下同——译者)各地区的铁路，遭到若干破坏。师团在23日扫荡了高邑附近，25日扫荡了柏乡以南(均在石门、顺德之间)。另外，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扫荡了正在磁州南面地区活动中的共军。

共军第一次攻势中日本方面所受的损失

一、人员的伤亡

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管内，暂时被共军占领的据点，在石太沿线的小据点约20个，阳泉——盂县——上社镇公路的据点若干个。到8月底战死者60名及多于该数数倍的负伤者。其他如华北交通系统的铁路员工、中国方面的县警备队员等也有不少死伤和失踪者。

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管内，伤亡最大的是井陉煤矿的中国矿警，日系职员（主要是技师），有的失踪（被拉走）。

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管内同蒲线以西地区的警备队也大半遭到袭击，若干小据点被孤立，遭到全歼的损失。

二、铁路破坏情况

共军的第一次攻势，以破坏交通和通信线路为目标，并且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效果，因而造成损害极大。10月15日，华北方面军向陆军省提出的“遭受损害的恢复情况”的报告中，有如下的叙述：

遭受损害的中心为石太路，京汉路及同蒲路北部虽也有一些地区受害，但运行尚无障碍。京汉路自8月25日，大致已按行车时间表开始白天运行。同蒲路也于9月8日全线通车，并最大限度地增强其运输能力，以弥补石太路的不足。石太路于9月20日紧急抢修完毕。

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密伪装得极为巧妙。

破坏的详细情况：

1. 各处破坏铁路，自8月20日半夜，与袭击同时进行，阳泉、寿阳之间直至9月4日仍不断遭到共军袭击，使抢修工作受到妨害。

2. 破坏最严重的是芦家庄西185公里处及61公里处的两座桥。前者被炸坠落，后者虽未坠落，但修复也有同样困难。

3. 对铁轨的破坏，于各地袭击的同时，进行长距离的破坏。主要是将枕木与铁轨集中一起予以烧毁，大部铁轨已不能再用，一部分铁轨则由很多村民运往内地。

4. 对车站设施，则焚毁其房屋，破坏水塔及水泵。

5. 通信方面的破坏，是将电杆从根部锯断，切断电线，砸碎磁瓶，并将铁路电杆烧弯。

6. 从爆炸结果看，估计事前对其干部进行过相当训练。另外敌人使用的炸药总量约有5,460吨。

三、井陉煤矿破坏情况

据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如下：

井陉煤是炼钢用煤，当时为供应满洲鞍山制铁所的重要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新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总矿及阳井矿虽遭优势之敌的攻击，但均被击退损坏不大。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

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是因被火烧过热而损坏。如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当时正值机械缺乏之际，仅受以上程度的损坏，实属侥幸。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

（1940年8月30日—9月18日）

遭受共军奇袭的第一军，随着对情况的判明，当即采取对共军分区、分期各个击破的办法，进行反击作战。首先命令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在石太线以南地区搜索消灭第一二九师。

“华北方面作战记录”中的部队行动概要有如下记载。

参加兵力：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步兵四个大队（配属以第三十六师团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支队）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配属以第三十六、第四十师团各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两个支队）

作战经过概要：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8月30日自太谷、榆次之间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9月1日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互相策应前进，击溃沿途各地之敌，进入松塔镇（寿阳南约25公里）及马坊镇（松塔镇南约20公里），对敌进行了扫荡并破坏其后方设施。

9月4日开始返回，至7日分别回到原地。

以后敌人仍以强力部队分散活动于各地，方面军命令与之继续作战。部队自9月9日起重新开始作战，予敌以彻底扫荡，取得相当成果后，于9月18日结束。

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如下：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

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象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凭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朝枝第一军参谋有如下回忆：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共军的第二次攻势

(1940年9月22日—10月2日)

暂时分散退避的共军，企图再次发动攻势，以相当大的兵力：从9月22日晨向同蒲线北部宁武附近，22日夜向察南的蔚县、涞源方面，24日向晋东南的辽县、榆社一带局部地区进行袭击。

察南南部方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负责地区）

9月22日夜，优势的共军袭击了察南南部的涿鹿、蔚县、涞源（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负责地区）一带的各警备队。当时我方虽受到相当损失，但驻蒙军很快转向反击，至9月底横扫了这些敌人。（详情后述）

同蒲线北部方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负责地区）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自9月中旬以来，虽扫荡了活动于宁

武以南地区的共军（第一二〇师之一部），但以第一二〇师主力为基干的共军在宁武周围逐渐集结兵力。于22日晨乘虚袭击日军。对此，独立混成第三旅团自23日开始反击作战，26—27日从宁武、忻县方面进击，扫荡了原平镇以西地区的共军。

榆社、辽县方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负责地区）

从9月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八十人）。

针对以上情况，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令独立步兵第十一、第十二大队的各主力快速奔赴前线，对榆社—辽县间的共军进行反击，至10月2日前后，扫荡告一段落。

第二期晋中作战 (1940年10月11日—12月3日)

如前所述，以第一二九师为主体的共军，经过再次采取攻势后，将主力盘踞于从武乡以东到黎城以北的山岳地带，另一部盘踞于沁源一带，对辽县——榆社——武乡道路及东潞铁路进行顽强袭击。

第一军企图趁此时机消灭该部共军主力，毁灭其根据地，以绝后患，因而进行了第二期晋中作战。其作战经过概况，“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0月11日，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辽县一带，以第三十六师团的一部从潞城一带，南北呼应搜索辽县、涉县，潞城、武乡地区之敌，进行扫荡，破坏其根据地，于11月14日结束了第二期第一次作战。

接着自11月19日，对沁县一带之敌开始第二期第二次作战。第三十七师团由沁县、虒亭镇（沁县南约40公里）、南关镇（沁县、平遥间），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由平遥、介休、霍县一带，第四十一师团的步兵一个大队由洪洞以东地区分别向沁源及郭道镇（沁源以北约20公里）一带压缩进击，但并未遭遇大股敌人，将沁河一带的共军根据地予以破坏后，各部队遂即回转，到12月3日作战完了。

由于此次作战，共军蒙受相当打击，以后遂专搞游击战，再未进行大的反击。

注：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共军遗弃尸体1,204具，俘虏240名。另据旅团战死者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中，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3名、12月4名。在共军攻势时期，损失虽很大，但并不象中共方面所宣传的那样。

晋察冀边区方面的肃正作战

察南南境反击作战（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

一、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的战斗

盘踞在攀山堡（涿鹿东南约30公里）以西至涞源西面察南南境一带的共军，自9月22日夜开始一齐向我进攻，切断通

信电线、破坏道路，不仅攻击最前线的各警备队，并且攻击了蔚县方面后方地区的据点。

当时驻蒙军为防备五原的傅作义军来攻，自9月12日，将主力集结于包头、安北、固阳地区。但判断傅军并无进攻模样，遂于20日命令各部队返回原驻地。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以两个步兵大队及炮兵团的主力参加了上项作战。正当该部尚在归途之中，共军乘虚向我进攻。且因汽车中队未至，兵力不能自如运用，加以通信电线切断，情况不明，各警备队只得单独作战。

24日，旅团长见与一中将在蔚县设战斗指挥所。据25日得到的情报，在涞源县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四大队方面，若干守备队有全部被歼之势。蔚县地区方面（由独立步兵第三大队负责），大队主力由包头归来，当即驰援永宿、草沟堡（均在蔚县东南地区）濒于危殆的守备队。在攀山堡方面也正在击退共军的顽强攻击。

于是，旅团长作了以主力救援涞源县方面的部署，但一路上到处埋有地雷，设有障碍，道路均被破坏，部队前进缓慢。

另一方面，军方对此情况也逐渐重视起来。25日以后，才以设法由第二十六师团抽出兵力以加强旅团，但共军在攻击察南方面同时，对第二十六师团管内的同蒲路北部地区也进行了攻击，因而欲抽出救援的兵力确非易事。

在涞源方面，28日晨，救援部队勉强到达县城附近。共军解除了包围向南退去。29日，应援各队进抵军的管界长城一线，随后即扫荡残敌、恢复治安、以及进行下期作战的准备工作。

关于此次作战中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敌遗弃尸体1,199具，运走尸体727具，俘虏6人；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

二、插箭岭守备队的战斗

警备涞源县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广泛分散部署于交通不便的山中。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注：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另外，在以后的共军战斗详报中，对此情况也有详细记述。）

插箭岭曾由第二中队（中队长：税所三郎大尉）守备。人见旅团长赞扬该中队：

……共军为了夺回其根据地涞源地区，经过秘密策划，由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亲自率领其主力包围涞源县城，另外派遣约两千数百名兵力一举消灭插箭岭警备队，以支援涞源平原作战，并尽快解除对其主力侧背的威胁。

中队长努力侦查敌情，在识破敌人的计划后，立即作了紧急警备部署，令各岗楼严守阵地，以防敌人来袭，同时伺机予以反击，并制订了消灭敌人的措施。

22日刚刚入夜，敌即以优势兵力将我完全包围，利用黑夜向我逼近，对阵地各部队反复顽强冲锋。中队最后与20余倍之敌相对峙，与大队主力的联络完全断绝，孤军死战整七昼夜，干部、士兵相继伤亡，弹药渐渐缺乏，但士气益发振奋，坚守阵地，毫不动摇，不断进行壮烈的手榴弹战和白刃战，直到最后。在此期

间，并曾果敢进行反击，摧毁其锐气，毙敌三百余，终于保住两公里宽的阵地，击退了敌人，其中第一、第四两岗楼为中队阵地的重点，敌人的冲锋最为激烈。负责守备第一岗楼的船冈伍长及第四岗楼的宇田伍长等远离中队主力，以不足一个分队的少数兵力，面对二、三百敌人的猛袭，毫不屈服，决死奋战坚守阵地。以后，若干增援到来，更加顽强战斗，完成了中队防御的重任。

.....

为充分说明战况，根据“第二中队战斗详报”补充如下：

(一) 22日，得到有关敌侦察班活动的情报，中队立即加强警戒。但对敌部队的行动则完全不明。

(二) 共军的装备比过去有所改善，钢盔数也见增多，判明攻击部队中有迫击炮3门、重机1挺，轻机15挺，手榴弹极为丰富，但系粗制品。

(三) 共军对阵地实行夜袭，一夜之间多次进行反复冲锋，这是过去袭击中未曾见过的战术。白天在周围高地上构筑阵地进行狙击。其射击准确度良好，一般说来部队训练有显著提高。

(四) 23日，中队积极出击，力争击败敌人，但敌兵力极为强大，不易击退。看情况，除大队队部外，各警备队似均在激战中。因而决定在救援部队到达前，死守现有阵地。

(五) 敌将兵力逐渐向北移动，采取包围形势，连夜进行攻击，而且每到夜间攻击更加猛烈。29日，见我救援部队将要到来，便逐次后退。

(六) 交战150个小时，敌战死约250名、负伤约300名；我战死1名，负伤5名。

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在9月24日的笔记中写道：“对蒙疆地区，进行如此规模并且有组织的攻势，还是第一次。今后必须加强戒备。”另外，在10月4日的笔记中，写了对此次作战的感想：

此次作战，系敌乘我兵力减少之际，又适值各大队长（笔者注：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张家口开会，故在初期我军行动不利，且因汽车部队从包头归来较迟，增调兵力困难，致使共军得以任意活动约达三天之久。回顾平素的警备措施，存在下列缺陷，对此，我深感惭愧。

（一）各守备队在民众工作方面，在领导密探组织、警察队收集情报等方面，有很多地方应该检讨。

（二）最前线部队的防御设备，一般不够完善。平素如能选好地形，确定驻兵的地点及防御设施的位置，方可以少数兵力，极小损失，坚守数日。与此相反，此次全部被歼的部队，皆因驻兵地点的地形不良及防御设施又不完备所致。

（三）最前线守备队的弹药储备极少，以致第二天即告弹药不足。

（四）对敌兵力估计过高，因此，作战行动有过于慎重之感。

三、浑源、灵邱方面的战斗（1940年10月8日—10月12日）

浑源、灵邱地区由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的第一、第二大队负责警备。在这方面，共军的活动虽无大的变化，但由于这里的治安情况一直不佳，各警备队不断在附近进行讨伐。

10月7日，联队长坂本吉太郎大佐得到情报称：“独立第一师及其他共军的大部队由涞源方面西进，正向繁峙县东部及北部边界移动中，准备伺机袭击浑源—灵邱间新建公路及各地守备队。”联队长当即命令第二大队长消灭这股敌人，以粉碎其企图。

8日午后，讨伐队在大安岭（平型关正北偏西约10公里）附近，搜索到共军并给以大的打击。8日夜，即在该地附近宿营。但驻扎在浑源—灵邱公路上的枪风岭守备队（37人）及南坡头守备队（中队主力正参加上述讨伐队，41人留守），8日半夜受优势敌人的攻击，遭到毁灭性打击，兵营也被敌占领。

9日，联队长及讨伐队长得悉上述紧急情况，急行军赶到现场，夺回守备队阵地。随后，以联队主力在浑源—灵邱公路西侧地区进行讨伐，至12日结束。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1940年10月13日—11月2日）

方面军为适应驻蒙军的情况，改变原定计划，领导了对晋察冀边区中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肃正作战。从南、北拒马河上游地区至阜平一带，由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讨伐队以及临时混成第一〇一旅团参加作战。自10月13日开始，经过三期的反复讨伐肃正，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毁灭战。至11月2日，作战虽告结束，但仍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一部在东斋堂方面作长期驻扎之势，做为打入中共势力圈内的楔子，随后又命令旅团继续进行讨伐。

从中共方面的记录看“百团大战”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在中共方面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百团大战特辑》中，以“震动全国，使敌胆寒的百团大战”为题，大书特书。其内容大部分是歌颂共产的英雄战绩，故省略细节，对其有关作战部分大要转述于下：

注：此次作战，在共军是极特殊的一次，故其实施目的以及影响值得注意。其所阐明的政治目的为：“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国内对抗战发生动摇，企图压制主张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而将投降、妥协的浪潮扩及全国。中共中央预见到反共投降高潮即将到来，因而发动百团大战，以伟大的胜利粉碎反共投降派的理论，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另一方面，在调整国共关系的谈判方面，向国民党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另外，对于军事目的则称：“粉碎日军对共产党的压制，阻止（破坏交通线）其向内地进攻。”

轰动全国的百团大战

1940年为希特勒以“闪电战”席卷西欧、国际法西斯最活跃的一年。在中国，滇缅公路被封锁，国民党统治区投降、妥协的空气浓厚，反共逆流高涨。日寇策划进攻西安、昆明、重庆，企图迫使中国投降，同时打击英、美在远东的势力，阴谋与希特勒相呼应。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动的。这就是自8月20日至12月5日所进行的大战。最初，由八路军115个团、40万人的兵力为核心参加战斗，全线同时开始攻击。进攻的目标为华北各主要交通线。攻击重点为正太铁路，作战范围为晋察冀全区、晋绥大部、热南（热河以南）等广大地区。

此次作战的特点，不同于过去的游击战，此次除八路军115个团的40万人外，并有广大地区的民兵参加。在朱司令、彭副司令统一指挥下进行作战。在敌人对我方意图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全线同时展开奇袭。作战计划是在一个月以前完成的，各军区对敌情、地形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宣传品的印制，武装团体及居民的动员，补给物资的集聚、转运等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另外，此次作战极为激烈，我方虽也损失甚大，但敌人伤亡数倍于我，使敌心惊胆寒。以此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笔者注：是企图封锁中共地区使之孤立然后分别予以消灭的政策），并在阻止敌人进攻西北和重庆方面向西南后退的同时，也阻止了当时向日本投降、妥协的逆流。

一、第一阶段

中心任务是破坏交通。攻击目标为：石太（石门—太原）、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京古、石德等铁路，代蔚（代县—蔚县）、沧石（沧州—石门）、平辽（平定—辽县）等公路。打击重点为石太铁路。战斗自8月20日夜20时至9月10日连续进行21天，完成了我预定计划。

聂部队

在聂荣臻司令的指挥下，由晋察冀46个团参加。其中15个团分成3个纵队，破坏从平定到石门之间的石太铁路，另以25个团分别向各处前进，破坏北宁路、平汉路北段（平定以北）、津浦路（德县以北）、京古路及沧石公路。

对于石太路上的重要据点娘子关，我军于20日夜，首先解决了驻在村内的伪军，然后强行攻击凭险以优势炮火进行顽抗之敌，经3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全部肃清该敌，黎明时我国旗即已飘扬于娘子关上。

炸毁井陉煤矿也告成功。20日晚，我军由优秀的工人作向导，悄悄地前进，越过外壕，破坏电网，投掷手榴弹，随后冒炮火以梯子登上丈余高墙。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冲进新矿井内，完全占领敌人的工事。我军当即破坏了新矿井的机器14、汽缸10、风车3、水库2、烟筒2、电机房、车站及其它工厂设施。据某被俘日本技师说，“损失达一亿元以上”，这些机器的修理与恢复，需半年以后方能再用。

晋察冀部队自20日至22日三天内破坏了石太路东段（从阳泉至石门之间）各处，并攻破沿线敌据点。敌（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战死一千余名，缴获步枪达一千余支。

以后继续攻击盂县内之敌，攻破北会里、东会里、河底镇、上社、中社、下社等据点，并破坏了所有的公路。

刘、邓部队

由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指挥的第一二九师：晋东南新军、冀南部队等40个团和炮兵团、特务团以及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5个团等参加了战斗。以主力15个团和炮兵团攻击平定至榆次之间的石太路，以8个团的兵力破坏了元氏至安阳（彰德）之间的京汉路，以9个团破坏了石德路南段及邯济（邯郸—济南）公路。另外，对太谷至临汾之间的同蒲路、平遥至壶关之间的白晋路，分别由第一二九师的7个团及决死队5个团，进行破坏，并以两个团负责破坏临汾、屯留公路。

当我军势如潮水扑向石太路时，敌尚在睡梦中，由于我连续奇袭攻击，震动二百华里的地域。沿线所有防守备据点及其部队均被歼灭，所有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物均被彻底破坏。

狮垴山位于阳泉门前，控制石太路，是关系作战全局的重要地点，我军迅速将其占领，并由山顶猛击阳泉之敌。阳泉为敌独

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片山旅团长，自21日上午起疯狂地开始了猛烈的反攻，恶战一直持续到29日。在此期间，敌人除动员全部兵力外，还武装了全体日本侨民，并以百余架次的飞机轮番轰炸。但我军固守山头，继续英勇反击。阳泉以西的多数据点也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的联络被切断，增援被阻止，陷于孤军作战而被消灭。我第一二九师在石太路经过20天的战斗，胜利后开始转移。敌人又以七、八千人的兵力分五路向我晋中地区进攻，企图插到我军的背后，但我军主力已经全部转移。以后又经九昼夜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合击阴谋。

在以上期间，石太路沿线的片山旅团所属德江、原田两大队被歼灭，坂井、铃木两大队及第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也被歼过半。

冀南地区方面，在陈再道同志指挥下，冀南的铁路、公路均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特别是石德路，三万余民众参加，连路基均被拆除。

贺、关部队

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指挥的第一二〇师和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共计22个团，击败同蒲路（大同——太原之间）、汾离公路（汾阳——离石之间）全线之敌，重点置于太原附近，阻击敌人向石太线增援。

8月21日，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攻占了从静乐到忻县公路上的要点康家会据点。我军乘黑夜强行袭击，突破数道铁丝网，首先占领了敌人的大碉堡，将残敌赶进小碉堡内，并逐次将其攻破，全部予以歼灭。占领该据点后，继续对同蒲路进行破坏。

二、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是对敌阵地的攻击，时间自9月22日至10月上旬。我军为了继续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将作战重点置于歼灭敌人、消

灭交通线两侧及侵入解放区的敌人据点。

其中大的战斗有：榆社、辽县战斗，晋察冀的涞源、灵邱战斗，冀中的任邱战斗，冀南的石德路及邯济公路的破坏，晋西北的同蒲路、宁武附近的袭击与破坏等。

在此，仅以榆社、辽县的战斗为例加以说明。榆辽公路为敌人横断太行山脉费时一年余修成的，由片山旅团设坚固据点负责掩护。但因我军攻击，所有据点悉被扫除，道路被彻底破坏。

9月23日晚，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陈司令（指陈赓司令员——译者）指挥下攻击榆社城，将400余敌人压制在狭窄地区。但是，阵地四周皆为绝壁，并围以数层铁丝网，设有现代化工事构成的碉堡群。我军英勇战士在有组织的火力掩护下，把用几个长梯接起来的云梯架于绝壁之上，冒着敌人的火力，登上四丈余高的碉堡，用水浸湿棉被堵塞枪眼。我山炮火力压住敌人，工兵挖掘坑道在敌碉堡下面埋上大量炸药。25日午后开始第三次总攻，敌人的主要碉堡均被炸飞了。我突击队冲入，展开了白刃战。除少数敌人逃走外，藤本中队长以下全部战死于碉堡内。

对管头的攻击，与榆社同时进行。我军切断敌人的水源，夜间登上悬崖，接近敌人。经三昼夜激战后，日军只有数名生存，乘夜逃去。（注：管头、石匣为榆社——辽县间的据点）

25日开始对石匣敌据点攻击，当夜攻占该地。敌虽顽强抵抗，我部队却勇敢突入，以数百枚手榴弹全歼守敌。就这样，沿榆辽公路的碉堡群悉被肃清。

三、第三阶段

经我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攻击，使华北敌人陷入极端混乱局面。伪军纷纷动摇，敌占区民众为之振奋，伪政权濒于崩溃的状态。敌于忧虑愤怒之余，慌忙调动大军，对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报复“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构成首尾大战的第一

三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自10月6日至12月5日约两个月。首先在太行山区开始，逐次扩及平西、晋西北、晋察冀、雁北、太岳、冀中、冀南、大青山等地区。在本阶段，我军曾进行数次歼灭战，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即其一例。

当时，太行山脉各地反扫荡气势非常高涨。关家垴歼灭战为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常胜之师进行的。敌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10月20日从沁县出发东进，30日夜到达关家垴（武乡东面）地区，已经疲惫不堪。这时，我第五、第六、第十旅及决死队各一部展开了猛烈攻击。彻夜反复进行白刃战，31日又经数次反复冲杀，终于歼灭了冈崎大队的大部。另外，使从辽县、武乡赶来救援之敌受到极大损失。

百团大战自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华东八路军也参加了大战，并沿津浦路、胶济路、陇海路、大运河地区进行了破坏交通战、攻击数据点和反扫荡战。

四、战果与影响

此次经过三个半月大战，虽历经艰难困苦，但均被我军高昂意志所克服，因而经常掌握主动，终于在伟大胜利中完成了任务。

百团大战对国内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正当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际，粉碎了敌人企图使国内顽固派投降的阴谋，制止了顽固派的妥协逆流，振奋了人心。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同时牵制了企图进攻大后方的敌大量兵力，不仅破坏其交通线拖住其后腿，而且取得了如下战果。

在此期间，交战1,824次，敌人伤亡，计日军20,645名，伪军5,155名，俘虏日军281名，伪军18,400名，攻占敌守备据点2,993处，缴获步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它大量武

器弹药；破坏铁路948华里，公路3,000华里及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解放了煤矿工人10,000余人，铁路工人2,000余人及被拉去修路的同胞600余人。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进攻战斗，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很多报纸发表了庆祝社论，大后方的民众纷纷寄来祝词和鼓励信。但在大战中却未得到友军国民党部队任何配合协助和补充。卫立煌将军虽命令晋南部队协助，但被蒋介石命令制止。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停止抗日，忙于对我方制造摩擦。

日寇东条陆相在1941年议会上所作的一年来军事总结报告中说：“1940年度敌军（指国民党军——译者）几未进行反攻，仅有共军于8月在华北进行的大规模出击而已。”事实上八路军在抗战中抗击了敌之大部，而国民党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对我们，这就是中国抗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鲜明写照。

此次大战显示的我军威力，使敌人及国内顽固派觉醒和惊讶。以后，敌对华北解放区的残酷“扫荡”愈加强化，顽固派害怕人民力量的增大，反共活动更加积极了。

（以上未按中文资料校订——译者）

六 从“百团大战”中取得的教训和对中共的观察

第一线兵团取得的教训

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

下面提的“教训”是笔者根据第一军及第一一〇师团等

给方面军的报告摘要整理的。当时方面军特别要求各兵团提出作为教训的事项，并且每次均将其报告印发各有关方面。

第一、一般教训

一、平日对争取民心和积极灵活的治安行动

(一) 为了笼络民心，应该抓住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切实问题进行治安工作。进行宣传、宣抚工作，应尽量提示具体、简明的内容。此次，凡平日治安工作较好的地区就能得到民众的积极协助。

(二) 如从居民方面收到有关敌人情报，应不辞劳苦，立即出动。

(三) 警备队的一举一动应时刻严肃军纪，而且要采取积极灵活的治安措施。特别要显示出能使居民对我衷心信赖的实力和威容，这一点最为重要。

二、一般民众提供情报的问题

(一) 教导民众如得到有关治安工作的特殊情报，应立即通知日军。为此，必须迅速整顿和确立重要地区的保甲制度。

(二) 要巧妙利用民间的秘密帮会(青帮、哥老会等)的联络组织。

(三) 考虑建立对日军的秘密情报联络处，以便使民众可以安心为我联络情报，而无事后受害之虞。

(四) 将谍报网扩大到敌区内，且有必要进行使谍报人员打入敌部队内部的工作。

过去谍报人员住于我势力范围之内，由于共军禁止通行，而不能进行活动。另外，虽有困难，希望能做到与敌部队内主要人员取得联络。

(五) 有可疑征兆时，不能仅凭谍报人员，而要亲自进行讨

伐，实施武装侦察及捕捉俘虏。更须注意从敌区居民方面收集情报。

三、军队自行收集情报与防谍

这次经验说明，只依靠密探，在紧急情况时就会失掉价值。军队必须亲自采取下列办法积极收集情报。

(一) 由我军领导，用当地人组织训练的特别工作队潜入敌区侦察。

(二) 由我小部队进行武装侦察时，潜伏下侦察员。

(三) 用军犬、地雷、照明、巡逻及其它方法，做好发现敌人接近的防备措施。

尽力逮捕潜入我治安地区的敌人密探、工作人员等，并要利用俘虏、归顺者侦知敌人的企图。不要受共军“声东击西”的反宣传的欺骗，对便衣敌人的活动及妇女儿童的动向均须特别予以注意。

第二、共军情报活动的特点

一、利用民众

共军的民众工作，既广泛又彻底，其工作直做到我警备队的周围，拉拢或威胁民众以收集情报。共军惯于事前进行周密侦察，特别在进行袭击的前一天派出便衣到靠近铁路的村庄，向村民探听情况。例如，数日前敌人的参谋就曾化装便衣由石太路上湖站乘开往太原的火车进行侦察。

二、行动意图的隐匿及伪装

(一) 经常改变或伪称部队番号。例如令部队在行动时用旧第一旅、新第一旅、独立第一旅的称号，或令各地部队使用同一个部队的名称等，使人难以掌握其真相。一二〇师对外一律不用部队番号的标志，或散布更多杂乱的部队番号。

(二) 夸大宣传兵力，往往一面扬言袭击小警备队以一部分

进行牵制，一面却以主力向其它方面进攻（声东击西 战术）。此外，还有表面伪装进攻阎锡山的山西军，而实际是准备攻击日军的实例。

（三）在准备期间通报命令时，不用无线电 而用书面传达，对下级指挥人员不过早告知作战意图，参谋 亲自侦察石太路，对连以上干部在袭击前两、三天，对排以下干部在到达目的 地稍前才说明行动意图。对阎锡山 的山西军（作为友军）在开始攻击后才用无线电予以通报。

（四）部队到达开始攻击的地点以前，均分成 小股进行各种活动，并且以夜间行动为主，白天 分散隐蔽，停止一切移动。运送粮秣虽征用当地居民，但采用一村转 一村的接力传递方式，难以判断其运送方向。

（五）宿营时躲开大的村庄，利用山间或 小村，隔断宿营地与外部的交通，严防密探侵入，禁止村民外出。

（六）在我警备队附近，秘密通过我 警备间隙时，留下一些 部队或以地方部队部署于其它方面，令其积极活动进行牵制。

（七）袭击时所用向导，采取拉拢或强制 手段，使用平常与 我军有接触的村民或被我军使用过而逃跑的中国人。

（八）当共军袭击时，动员大批 居民予以协助，首先切断通信电线和破坏道路，使日军难以相互支援，并孤立 各个警备队。

（九）有关事前征兆

共军对隐匿企图作得非常巧妙，既周密 又彻底，仔细研讨，百团攻势开始前有如下征兆：

1. 集团的移动，特别是向地盘以外移动频繁。
2. 宣传中央军（重庆方面）北上的情报。
3. 夸示共军对中央军交战。
4. 敌人加强谍报工作，尤其是强拉爱护村民提供情报。

5. 去匪区的交通逐渐困难。
6. 居民避难，爱护村民放弃对铁路的警戒。
7. 在敌区积极集聚物资。
8. 举行秘密会议。
9. 对我友军武装团体进行策反工作。

以上情形，当初如果不是当做局部地区的现象而放过，并对之加以深入而有组织的观察，速向邻近或上级部队报告，则百团大战的企图，或有可能在事前察觉。

第三、有关警备的参考事项

一、铁道警备

在以少数兵力守备大段铁路，及敌企图进行大规模破坏来袭的情况下，单靠驱逐破坏者，或仅仅加强直接警备，是不能完成警备铁路任务的。必须尽早识破敌之企图，积极击破敌进行破坏的据点及其支援部队，为此有必要保有机动兵力，彻底进行报复攻击。否则就会使敌人力量增长得以反复进行破坏。

对于长期单独作战的小分遣队，必须充分准备粮秣弹药，构筑坚固的防护设施。

无线电通信，系按平时的通信规定设置的，出现了极大的不便和障碍，需要做好准备，更换一套按战时规定的通信设备。此外，灵活运用烽火等信号进行联络的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只有通信鸽被极有效地利用了。

二、对重要设施的特别警备

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和行动的预测不够准确，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因估计错误，致使我对保卫重要设施及加强通信联络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这种疏忽，也表现在对井陉煤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对石太路警备产生太平观念。

此外，重要地区的警备兵力不宜频繁更换。如在井陉新矿，

下级士官以下14人的分遣队每天进行更换，其警备设施也不完善。

三、兵团相互间联络协调问题

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负责地区的边境一带，因系山地，讨伐与治安工作比较困难，兵团之间的情报交换，平时也不够密切。

四、警备兵团的编组问题

独立混成旅团是参照满洲的独立守备队，精心编成的专门担任警备的兵团。对以游击战为主之敌，在警备与讨伐方面已取得大的成果。但是，在象这次的反击作战中，长期以之做为旅团进行机动作战时，则需增加通信、补给等特别配属部队。

五、提高警务机关能力

对付共军，必须全力以赴，确立最有效、最能持久的保甲制度。此外必须迅速加强铁路警务机关及煤矿警备队的训练。有关配备、设施问题要与当地部队密切联系。

第四、烧光敌根据地作战的教训

一、必须进行教育训练，使部队能以克服险峻地形，做到行动敏捷，以便在战斗时迅速迫近敌之侧背，否则，要想捕获共军是不可能的。

二、为了烧光军事设施，各纵队应分别配属工兵，令其携带炸药燃料，并且要教导他们如何进行破坏。

三、共军有时探知我对空标志而予以利用，故对符号应适当变更。

四、对收集与利用敌方资料，应于事前进行教导。过去曾有将相当重要的资料全部烧毁的事例。

五、烧毁敌根据地时，曾有民伕等（指日军带来的民伕——译者）进行掠夺、强奸等破坏军纪行为，需要注意。

六、共军采取派通敌分子或其士兵混进日军征用的民伕中，以附近村公所为联络据点，探听我方动静的方法。

七、共军在撤退时，经常将难以搬运之物埋藏于附近地下，要注意使用当地居民进行搜索。

共军方面取得的战斗教训

关于共军在百团大战取得的教训，冀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所写的战斗详报中有如下叙述。

注：以下资料载于《偕行社记事》1941年8月号

冀西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战斗详报

1940年10月29日

署名	司令	杨成武
政治委员	罗元发	
副司令	高鹏	
参谋长	黄寿发	

第一、敌（日军，下同）的优缺点（笔者摘要）

一、优点

1. 敌之阵地设施、防护工事及配备适当。
2. 敌之军事保密工作良好，不易收集情报。在我攻击前，未能探知敌人的确实兵力。
3. 敌在守备时的还击及反攻极为勇敢、坚决，防御可谓积极。9月22日三甲村（涞源县）战斗，8月22日井陉旧矿战斗等，由于敌人连续猛烈的反攻，以致我军不得不撤退。再如东圈堡（涞源县）战斗，我军占领敌人四个碉堡后，敌仅二十余人守一个碉堡，即在此情况下，敌仍集中火力反复出击。因此，我方只好放弃了两个碉堡。

4. 敌人能巧妙使用集中火力特别是掷弹筒，发挥了相当威力。在东圈堡战斗时我伤亡二百余人中，半数为掷弹筒所造成。敌人为了集中火力，事前对阵地前要点进行了测量及周密的射击准备。此外，集中射击与出击部队的联系，既密切又巧妙。
5. 敌擅长白刃战，其体力、技术均较优。
6. 敌在濒临被歼时，主动破坏武器及其它军用品，以防落入我军之手。这是精神教育的效果，值得我们学习。

二、缺点

1. 敌各据点，因配置过于分散，兵力难以及时集中。因此，敌人的出击或反攻多次受阻，以致损耗兵力，最后失去力量，转入单纯的防御。此种实例颇多。
2. 伪军多系由土匪和吸鸦片者所组成，彼等武器少、体力弱、战斗力低。
3. 敌碉堡背后的掩护设施有缺点。在东圈堡战斗时，敌伤亡中的大半是在后面被手榴弹爆炸造成的。
4. 敌人的警戒不严，当我急袭时，往往是顾不得穿好衣服就仓猝应战。
5. 敌夜间射击不准确。洮源县三甲村之敌，一夜中盲目射击，浪费了弹药。

第二、我之优缺点（笔者摘要）

进攻作战的经验过去虽然很少，但将来此种机会可能增多。各级干部必须从此次作战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灵活运用于未来。

一、在我军缺少重武器装备的现状下，袭击是特别有利的战法。在此次大战中创造了许多以袭击取得胜利的典范。但是，并非所有的袭击均获成功，其成败取决于干部的决心与指挥是否得当。

例如在南线，三团三营袭击井陉旧矿时，由于联系不佳，失

掉使用第二梯队的战机。此外，各级指挥员因缺乏坚定的攻占信心，以致未能取得彻底成功。

在北线，一团的两个连，在袭击涞源县南坡时，由于联系不好，进至最后铁丝网一线后，却在扩大战果中失败了。二十团袭击漕沟堡时，连续进攻三昼夜未能成功，即因干部决心不坚定，准备不充足，联系不好所致。

特别是，夺取敌人的碉堡或房屋后，必须坚决保住，在第二梯队扩大战果前，绝对不能放弃阵地。

袭击时，要靠果敢的一击达到目的，否则，第二次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必须抓住时机，以必胜的信心，勇敢的行动，在短时间内消灭敌人。

二、要正确判断敌人的兵力，绝不允许过高估计敌人兵力而产生恐怖情绪。

三、甲村战斗中，从涞源增援之敌不过百余人，而我干部竟报称有150人。

第一团的侦察连在进攻金家井时，该地之敌为数十人，但侦察连判断为百数十人，就不战而退了。

在防止过高夸大敌人兵力的同时，也必须纠正轻视敌人的错误。例如，去年反扫荡时，第一次在涞源附近的战斗中，由于轻视敌人而被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完成。此次涞源战役，也有同样错误。例如，22日夜袭之所以未能取得战果，即因对敌缺乏正确判断所致。

在调查敌情时，不仅要调查兵力、装备、防御工事等情况，还必须查明指挥官的能力及个性，反战、灭战的程度，平日与民众的关系及受我宣传的影响如何，敌人所施行的欺骗、教育情况，以及士兵的军事素养、年龄、战斗能力等，以便对彼我力量做出准确的对比。

三、开辟与选择前进路线及确定队形时，应注意避免无意义的损失、选择能完成战斗目的的最好方法。

笔者注：共军对这样以大部队进行运动战、攻坚战未有经验，其所提出的教训多系有关基本战斗原则的检讨，因而大部予以省略。

第三、各种战斗要领（笔者摘要）

一、围攻碉堡法

抓住奇袭的时机最为重要。对掩护工事要集中使用黄色炸药。在进行破坏时，以火力掩护一齐冲进。这是三团各营攻击井陉新矿时使用的方法。三团攻击东圈堡时，依靠地道进攻成功。

在三甲村用以下方法强行突破：

首先，适当地部署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对据守于坚固房屋中的敌人，采用火攻较好。将装有硫磺的手榴弹投入屋内，使之爆炸，效果很大。三团试用此办法已获成功。今后应制造此种手榴弹。投入浸透硫磺的棉花，虽也能使房屋燃烧，但不如手榴弹的效果大。

二、关于通过铁丝网和外壕的办法（笔者略）

三、攻击堡垒及围墙时注意事项（笔者略）

四、对敌人的反攻和反击应注意事项

有不少实例，是由于使用第二梯队的方法不当而未能成功的。如井陉新矿、漕沟堡、上庄的战斗，其失败原因即完全由于未能充分掌握第二梯队，以致使第一梯队不能抓住时机扩大战果。

五、关于追击

在以前的战斗中，急追、猛追皆不彻底。无论多少人皆不允许以困难为藉口放弃追击。

六、关于通讯联络

在此次作战中，我通信联络错误很多，必须加以改善。

南线的葵家庄战斗，由于团指挥部无特殊标志，致使通信员一个晚上未能找到团长。另外，在第二十团，营、连、排曾失掉联络。在三甲村战斗中，一、三团发生错误的重要原因，也是由于不注意通信联络的方法及通信器材不齐备所造成的。

对电台的失职更有改正的必要。三团通信主任收到给首长的电报竟未报告，为此已受到处罚。

各级指挥部门要按军区规定，白天用旗，夜间用灯火进行联络。

七、关于弹药的节约及炮兵的使用

此次战役中，对节约弹药已有相当进步。例如，三团在南线战斗中，消耗子弹仅6,000发，一团在南坡头（灵邱县）战斗中只用900发。但从各个部队来看，进步还不大。例如，二团在南线消耗子弹15,000—16,000发，一团在南坡头消耗手榴弹约2,000颗，为数均过多。

炮兵的炮弹消耗数量过大，皆因炮兵缺乏经验及运用不当所致。今后禁止炮兵夜间乱射。按我射击技术的现有水平，夜间使用炮兵尚不适宜。营以上干部有必要学习特种兵种，如炮兵、骑兵、工兵等的指挥能力。

收集弹壳也是我们的重要责任，军区早已对此下过命令。今后领取弹药须以弹壳交换。不仅要收集自己的弹壳，敌人的也要收集。此次三团成绩很好，但其它各团尚未遵照执行。

八、关于白刃战

在此次战斗中，从我军进行的白刃战看，损失较大，其原因是由于体力弱、技术不熟练和不够顽强。

除以机械体操增强体力、臂力外，为了提高白刃战的技术，

还必须实行以下措施：整备防护用具，改良刺刀及建设军区的制造工厂，改善保健给养，战斗部队的干部及全体指战员每人要携带长刀一把，在进行白刃战时长刀最为有效。

九、对道路及电线的破坏工作

战役中对道路的破坏工作，不够彻底，使敌人增援部队得以很快修好。在涞源作战中，敌增援倘再延迟数日，则胜利将会更大。由此证明，我军干部对今天的交通战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交通战是一种主要的斗争形式。如不重视交通战，就不可能打败敌人的“囚笼战术”和扩大点线的计划。

我应从战略、策略的观点来认识今天的交通战，将交通战列为日常持久的工作，各部队不论向何方移动，均必须破坏敌人的交通。交通破坏成功，才是完成了任务，否则，即是失职。

（一）汽车路的破坏方法

在路面上挖成闪电形的沟，连续埋设地雷。破坏坡道。

（二）破坏铁路沿线的电线

铁路沿线的电线为数极多，沿平汉路两侧总计有64条电线，以前采取的方法是将一根电线的某一处切断，但给敌人造成损失不大。今后要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由部队在两端警戒，将其间电线全部切断，并收回所有切断的电线。如在各地均实行此种方法，则敌人修复就要困难得多。四支队一次曾获得价值十余万元的电线，而且需要一周左右方能修复，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各部队采取此种方法时，应将收集的电线送交司令部保存。

此外，占领敌阵地时，在破坏敌之工事的同时，要注意收集铁丝网。

十、关于消除游击主义

部队中残存游击主义，对部队的发展不利，必须迅速消除。

例如：

(一) 在战斗中不考虑全局，任意行动、后退等，以致打乱统一行动。

(二) 对必要的阵地，不重视占领，应该坚守的阵地也不构筑必要的工事。对应确保的阵地，在防守中缺乏顽强抵抗的毅力。此外，还有擅自脱离战场的行动，都是游击主义的表现。

(三) 虚报或不及时通报情况，也不积极的收集真实情报，有的情报未加整理，杂乱无章即向上级报告。

(四) 不注意侦察、警戒，特别是由于在战斗时期，忽略对两翼的不断警戒，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一、关于对参战民兵的指导

参战的民兵，有高昂的战斗意志，熟悉地形，但缺乏实战经验，容易陷于恐慌。由于组织性较差，必须注意不要过分使用。

此次战役中，一团将民兵派到前线，使之搬运梯子靠近城墙时，敌人炮火飞来，民兵惊慌逃跑。民兵的惊慌有可能引起部队混乱。

民兵的迫切问题是解决给养。打胜仗时，也要给民兵一些战利品。情况允许时，将发给部队的物品分一部分给民兵。密切军民关系，提高民兵热情，这对其它方面也将起到大的宣传作用。

对民兵因未受过教育而犯的错误，必须合法解决。例如，任意征用死伤人员的武器及争夺、破坏、少报、隐匿军需品，或不及时报告敌情，以及民兵违反群众纪律等情况，部队的干部必须对民兵负责人进行教育和指导。

十二、关于严守军事秘密

由于保密做的不好而遭到不必要的损失的实例很多。如此次涞源战役，政治机关发送和散发文件、宣传品，以及召开会议的时机都为时过早。《抗敌报》刊载了统一作战的意图，对此，应做为

利敌行为给以处分。此外，部队里还有在发送未经审查的文件、不肯绕道而暴露行动、泄漏部队番号和事前不进行戒严等情况。

十三、关于指挥退却战斗

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退却时无秩序、无计划、不指定掩护部队，也不占领必要阵地，而表现出混乱状态。

十四、干部的战术素养问题

最大的缺陷是牺牲精神不足及决心不当。必须强调干部平时的战术学习。（以上未接中文资料校正——译者）

华北方面军加强和调整情报机能

共军百团攻势给与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并将取得显著效果。在这以前，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分为一般情报和特殊情报，未设对共的专职参谋；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地特务机关）、宪兵团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等，虽各有其正式的调查研究及情报收集工作，但未能将所有成果加以综合利用，这是情报机能上的缺陷。另外，在中共不断进行地下活动期间，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和活动情报的收集，也没有多大成绩。此次中共方面的百团攻势，可谓恰恰击中我方这一弱点。

曾任当时第二课参谋的横山幸雄少佐有如下的叙述：

方面军以重庆为重点的情报活动，取得了相当成果。特别是在特种情报的密码破译方面，平均破译明白程度可达80%。对苏情报活动较困难，收效不大，但仍在继续努力中。至于对中共方

面的情报工作则更差，而对作战情报和治安情报的综合利用也不够好。各有关部门正在继续努力解决中。由于中共地下活动的巧妙，在他们即将显示出实力之前，很难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方面军也早已察觉到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因而逐渐扩充情报机能，于1940年8月人事调整时，采取措施设置了对中共情报专职参谋负责该项工作。但是共军恰于此时似有先发制人之意，发动了奇袭。因此，方面军参谋部，尤其是第二课痛感责任之重大，乃全力以赴进行对中共的研究和调查。

第二课一方面尽力收集中共活动的情报，并支援“黄城事务所”（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进行对中共势力的实况调查。另一方面，特种情报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为破译密码而努力。

中共的密码与重庆不同，破译极为困难，至1941年2月中旬才破译成功一部分。此项工作是开辟前人未走过的道路。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时进时退，但对中共的密码破译工作迄未停止，在调查研究及作战讨伐上均发挥了很大作用，终于“转祸为福”。（这是遭受共军百团攻势时，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的话）。

方面军对中共的观察

共军为何发动百团攻势，如何观察中共势力的实际情况，如何评价其实力，以及正在深刻化的国共关系的将来等等，是方面军当前最关心的问题。随后，对这些问题的观察，及前述对共情报的积极活动，都有明显的进步。从1940年10月上旬方面军参谋部所写“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和同年12月上旬所写“对共产军的观察”中摘要说明如下：

其一

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

1940年10月1日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

一、现有势力

从数字上看，共产军的基本部队（包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及晋察冀边区第一至第四师）大约20万人左右。共产势力（包括共系匪及其他带有共系色彩势力的总合）估计大约为七、八十万人，并以相当速度发展扩大。

二、关于国共关系

共党方面最终目的在于打倒重庆，由自己掌握中国全部主权。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实力薄弱尚不能取代国民党，故其当前的任务是以促使日本与重庆长期对抗为主。今日倘使国共矛盾激化，势必加深重庆的颓势，这对拖延日华事变的目的不相吻合。因此，中共在其力量扩大至能以支配中国的程度之前，可以看出其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表面上对重庆表示服从，另方面则阻止重庆媾和的动向。

重庆方面从来视共产党为其隶属，要求共党服从的态度则丝毫未变。

最近由于德、英开战和国际形势的剧变，以及日本对西南路线的封锁等原因，苏联地位的地位提高了，从而共产党对重庆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本年7月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协定正是这样达成的。

于是使人感到华北共产党在8月20日以后的活动，可能就是由于上述协定，为显示自己力量，或是基于协定中所约定的某种积极活动所致。

三、共产军、匪的动向

1. 共产党一向主张军队按照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以政

治工作为重点，军队对此采取支持态度。

2. 直系基干部队以山西山岳地带的根据地为中心，迄未向外积极行动，最近则尽量在根据地附近充实和扩张其战斗力及势力范围。今年夏季以来，似有扩充编制的迹象，在各地曾出现新的部队番号。同时，有情报说：在各地，尤其是在山西方面正在实行大规模征兵，此种情况估计可能与7月的国共协定有关。

共军全盘编制为数甚少，装备不良，故认为几乎不可能具有大兵团的作战能力。但其上层干部多是久经锻炼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尤其对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小股部队能以巧妙地指挥和运用，这一点值得注意。

3. 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他们回避与日军直接战斗，采取乘日军配备空虚、搜索我小部队进行袭击等方针。但最近在8月20日以后放弃了以往的方针，对山西、河北的全部及蒙疆的一部分地区，勇敢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击。破坏铁路、公路、通信线路以及袭击日军的小部队。要考慮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断然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些新的作战方式。

4. 观察到共军的通信联络技术比国民党系军队有显著的进步，无线电技术甚为优秀。

其二

方面军特报第3号

情报判断资料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

1940年12月

对共产军的观察

一、要点

华北共军从今春以来，进行了扩充和改编，估计正规军和游

游击队共计约达25万人以上。但由于8月百团大战以后，经我军4个多月的彻底扫荡，其根据地设施大部被摧毁，三年积累的战斗资材消耗殆尽，其基干部队也遭到很大损失，估计需要相当时间方能恢复。估计共军今后将蛰伏于仅有的地盘，为挽回颓势而进行顽强的建设以及继续以前的游击活动。其与重庆国民党的关系，从今秋以来，虽急剧恶化，但因此断定国共将立即分裂则为时尚早。双方仍将保持如共产党所表明的那种表面上合作的方针。共军方面的让步，是将险恶的对立感情隐忍于内心。估计大致找到了暂时妥协之点。

然而，与过去矛盾相比，其本质的对立感情已表面化，如果重庆方面以强硬的态度企图彻底压缩中共地盘，估计不但和解会有相当困难，而且，双方统制内部蕴藏的危机也将暴露，如此即给予我方进行思想攻势以可乘之机。

总之，国内外形势虽然对华北共产势力未必有利，但以之作为肃正对象予以毁灭，不消说，则是确保治安的中心课题。尤其是共军移驻华北更加直接影响华北治安，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动向。

二、扩军工作与我方的观察

共军的扩军工作似自本年5月左右开始。其内容如下：

1. 游击队的正规军化

地方游击队原来虽有某些机动性，但其活动地区有所固定。由于我军彻底实行分散部署兵力，不仅使其地盘逐步缩小，且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弱点。共军此次扩编部队，其用意在于使地方游击队逐渐正规军化，克服过去的地盘观念，机动灵活便于集中使用。同时并要解决过去因地区差别而造成的各地游击队的给养问题。

从本年4月印制的一二九师野战军暂行编制表（缴获文件）及其外围部队的太行纵队等的暂行编制表可以看出：共军的发展

意图是从游击队向正规军方向发展。按一二九师暂行编制表军队分为下列四种。

野战军（正规军）

地方军（正规化的地方游击队）

游击队（各县有100—300人的基本游击队及区游击队）

自卫队（担任乡村自卫的民众组织）

野战军及地方军、游击队均为脱产的武装组织。

2. 整顿指挥系统与确立军政一元化机构

上述两个文件表明，军队的编制似在紧缩领导机关，充实战斗单位，避免各级指挥机关的重迭，同时调整地方军队、游击队与正规军之间（野战部队）的关系。为了便于协同动作及补充兵员，由野战军的旅长兼任地方部队或游击队的支队长，并规定支队的作战指挥受野战军统一领导。

以旅为战略单位，师则统辖直属部队及所有军事机关，负责一方面的作战、部队的补充、训练，补给、卫生，以及与地方行政的联系等。

在百团大战中，各师除以过去固有编制为基础的旅以外，还统一指挥数个旅或支队等在同一方面作战的部队。如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统一指挥一直在山西西北部的一二〇师、暂一师、新编旅、独立支队及决死纵队等；又如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统一指挥一二九师和从山西省东南部到冀南地区的约12个旅及决死纵队、太岳纵队等；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统一指挥晋察冀边区部队及冀中区、冀东、冀北地区的各部队；此外，山东方面徐向前指挥的情况也是同样。

在军的改编前后，对冀中、冀南两行政区实行合并，其意图是要确立一元化的军政机构，使巩固的山区游击根据地与平原方面的资源地带，形成军事、行政上的统一，以便进行坚韧灵活的

游击战。

3. 观察

扩军工作与百团大战确有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百团大战的动机，究竟是单纯要牵制日军进攻、夸耀共军实力而采取的示威行动？或者根本就是共军战略的转移？对此，虽然尚无确实资料证明，但据说9月在延安召开的北方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从过去的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转移的各项工作任务。如把扩军内容和百团大战的周密准备等一并加以考察时，则百团大战与扩军工作均应看做是共军战略转移的一系列工作。从来对客观形势的估计自以为是的中共，过于相信其在华北工作的进展，认为在此基础上必将有飞跃的发展，因而可以想象，在扩军方面，思想上也会同样教条式地开展武装民众的工作。

扩军的结果，共产党势力明显地从质向量的方面转移。由于军队的质量下降，弱点开始暴露，有关军民脱节趋势，士兵丧失斗志，以及补给困难等的情报逐渐增多。

百团大战以来，据朱德发表的伤亡人数约达一万八千人。三年来惨淡经营积累的资材几乎全部耗尽，根据地的设施遭到破坏，加以与重庆的对立激化，军费支付已感困难。因此，要想恢复重建，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

然而共军对扩军带来的许多缺点也有充分认识。从最近在山东方面得到的有关第四期整军计划来看，特别提出要加强政治工作，教育军队做到军民一致。因此，倘使共军得到足够的时间和地域，则可不致重蹈复辙。

方面军对国共矛盾的观察

共军百团攻势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有利于调整国共关系的谈判。方面军对此问题早就抱有极大关心。兹就12月上

旬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及有关事态进展加以叙述。以下是前述“对共产军的观察”中第四项之三的结论部分。

对最近国共关系的观察

国共关系恶化的原因，如前所述，既是当地部队的冲突，也是由于国民党以执政党自居，总想用实力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内幕，则可以看出来，在重庆国民党内部主张加强抗战阵营的统一，抑制中共越轨非法行动的浓厚气氛正在兴起。

重庆政府态度强硬化的原因，固然是当地党、军生死问题的反映，但应该看到以下客观形势也是其重要原因：

(1) 看穿苏联对华援助是有限度的，因而确信即使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苏联对华的援助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2) 美、英积极的援蒋政策有望。

(3) 估计目前战局不会有大的发展，藉此机会企图强化抗战阵营的统一。

共产党对此则指出：破坏抗战阵营统一的不是共产党军队，而是高唱反共的重庆内部的投降分子，并通过所有机关展开积极的宣传和理论斗争。

国共矛盾虽然不外是合作本身内在的本质矛盾的表面化，但可以看出，重庆方面对依靠苏联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确，以及在把共军的行动看成是反蒋运动这一点上，与过去重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此外，在共军方面，其争执的中心则在于生死攸关的军费和驻地问题，因此，加深了双方对立的感情。

然而，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要想强制推行可能招来抗战阵营分裂的反共政策极为困难。共产党也因策划持久战，尽量不采取可能使国民党反动政策更加激烈的行动。因此，可以料想，双方可能把对立感情隐藏起来，从政治上的妥协方面先行打开目前

的危机。

国民政府统帅部于10月19日，以后又于12月9日严令共军“移驻黄河以北”。对此问题，方面军在1941年1月初所作“对国共斗争形势的判断”中，就曾断言：“结局，共产党方面虽将让步以至妥协，但不会完全履行重庆方面的要求，斗争的祸根依然存在，且将更加深刻化。”

至1941年1月中旬，在安徽省南部，包括新四军司令部在内的共军九千多人，遭到重庆军的攻击而溃灭，一时出现了国共或将分裂的局面。（注：即“皖南事件”）

对此，方面军在《战时月报资料》中“国共关系”一项，有如下叙述：

国共关系

一、新四军的情况

江南新四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去年12月，一部分开始向江北移驻。但是，至1月停止了移动，而且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各一部分又返回泾县一带原来的驻地，并向重庆方面要求经费、弹药，以推迟移动。对此，顾祝同自1月9日命第一三四、第五十二、第一〇八、第七等各师在泾县以南地区将新四军包围，俘虏军长叶挺及干部多人，给新四军以毁灭性打击。重庆政府又于17日命令解散新四军，将叶挺等干部交付军法会议，并严令逮捕在逃的副军长项英，警戒共军的报复。

江南新四军虽四散溃乱，但中共中央不顾蒋介石的解散命令，于1月20日，重新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及其他领导干部。23日由新任干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拥护三民主义、遵从孙中山

遗训，剿灭叛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北新四军集结于淮安以东地区，暗地建设坚固的地盘。与韩德勤部队之间的斗争正酝酿中。

二、第十八集团军的情况

顾祝同对新四军的攻击和重庆解散新四军的命令，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冲击之大是不难想象的。直到现在，对于重庆反动分子虽进行指责及示威宣传，但部队的行动大致保持冷静，看来似有回避冲突之势。在1月中旬以前，与卫立煌、阎锡山等所谓“友军”之间的联络，表面上也很积极，甚至在冀东方面极小的战斗，也以朱德的名义向何应钦报告，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事例。但是，从1月下旬这样的通报及报告即已绝迹。

自1月中旬，晋东南、冀南、山东等地共军有逐渐集结兵力的倾向。其意图虽尚不能判明，但从顾祝同对新四军进行攻击、汤恩伯集团剿共部署的具体化等情况，已可看出重庆的决心。估计共军或许是预料到对方的攻击而集结战斗力。

为了援救苏北，要调动一部分部署于山东省南部的部队。而目前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主力移动，已有征兆。

共军没有对抗蒋系军的实力，且不希望与蒋分裂，尽量缓和蒋系将领对共的感情，以期扭转形势。为此，12月朱德通电胡宗南，称赞他是黄埔的权威，抗战的伟人，不要轻信目前的谣言，为亲日分子所策动，希望能保持友好关系，向抗战建国大业迈进。并派去了联络参谋。其意图是不难想象的。

三、蒋系军的态度

重庆政府，自12月即令汤恩伯集团军移驻于河南省南部，监视共军执行命令。1月中旬下令解散新四军后，又令汤恩伯除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外，并统一指挥骑兵第二军（何柱国）、第三集团军（孙桐萱）之一部，负责剿灭豫东、皖北地区的共军。

正当1月下旬分别进行部署时，吕集团（即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译者）的“和号作战”与佐久间部队的“五号作战”开始了。

在陕西省方面，1月10日将第一战区、第八战区的管辖界限改变为豫秦省境。陕甘宁边区的北、西、南三方面均被划入第八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编入第八战区的战斗序列，且将驻豫西地区的第三十六军、新十二军也编入其属下而开始移动。

1月末，第一军（丁德隆）与第三十六军交接黄河河防，不久即将移动，其动静虽不明，可以想象，或有对共军采取积极行动的意图。

在其他方面，仍不断有局部地区的抗争。目前情况尚在防备共军的报复，一面监视其行动，一面保住自己的地盘，并未出现消极态度。

总之，国共关系正在逐渐沉静，今后无论能否达成某种妥协，但在目前共军不能以实力对抗蒋军的情况下，其活动范围只能在日军警备力量较弱的占领区内，或蒋系势力较弱的杂牌军的地盘内。从确保华北治安的观点看，必须严密监视其动向。

关于皖南事件国共双方说法不一，按重庆政府方面记录述说如下：

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首先于1940年12月31日前向长江以北移动，然后于翌年1月31日前向黄河以北移动。而新四军违抗命令未向北移动，进入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企图占领该地区。于1941年1月5日，在三溪（安徽省南部泾县、旌德县境的一个小村）包围攻击了中央军第四十师。因此，顾祝同第三战区

司令长官发布了制裁命令，自1月6日至14日打散了叛军。

17日，军事委员会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逮捕叶挺予以军法审判。

根据中共方面的记录则有如下叙述：

蒋介石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1941年1月又策划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强制命令原在安徽省南部的新四军司令部及其所属一万余人向长江以北移动，却于途中设伏以待。1月7日，竟以八万余兵力对该部进行了包围攻击。新四军部队遭到极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蒋介石此一阴谋实现后，立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并命令攻击新四军的其它部队。

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20日，任命在江北的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的军司令部于1月29日在苏北成立。此时新四军虽只有九万人的兵力，但在新的军司令部领导下，改编成七个正规师，继续坚持抗战。对反共投降派，则从大局出发，不采取任何报复及使事态扩大的部署。

国共矛盾以皖南事件为顶点而极端尖锐化，但尚未到全面决裂地步，其根本对立状态则继续存在。

七 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

(1941年1月——3月)

中共势力的盛衰及华北治安的好转

方面军经过中共百团大战的考验及采取彻底加强各项治安措施，收到极大成果。由于这一主要原因，使华北的治安在1941、1942两年有了飞跃的改进。从治安战观点看来，这

是第二阶段。

1941年是华北治安战第二阶段的第一年，以下所述即1941年1月至3月第二阶段初期有关肃正建设的情况。

年初华北方面一般敌情

华北方面军，对1941年1月当时的敌情曾有如下观察：

一、全面情况

去秋以来，急剧恶化的国共关系，由于1月的皖南事件，预料事态可能达到最坏的局面。但是，共军没有报复的决心和实力。以后国共双方则把险恶的对立感情藏于内心，似乎逐渐进入小康状态。

华北的共军正忙于处理国共冲突的善后工作，和恢复去秋以来屡遭我军讨伐所受的损耗，其活动表现消极。自1月中旬虽有逐渐集结兵力的模样，但对其企图尚无可供正确判断的资料。

蒋系各军，忙于对付共军和第四期整训，也看不出有积极的企图。在新旧正月前后，几乎连游击行动也未出现。

二、蒋系军的情况

(一) 对敌军企图的判断

敌判断我军目前不会进攻，一方面以一部在我后方进行游击及特务活动，另方面则专心致力于整训军队及对付共军，看不出有积极的企图。估计目前此种被动的持久形势仍将持续下去。

有情报称，蒋系军计划将于今春3、4月间进行反攻。但军方目前尚未见到此等征兆。然而不能断定，敌人在第四期整训结束时，是否会乘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之机进行惯例的反攻。因此，必须密切注意作好侦察。

(二) 教育训练情况

以蒋介石为首的各个将领，对教育训练极为重视，现正努力研究以实战为基础的战法和提高干部的能力。

自去年6、7月开始的第三期整训，到10月末结束。自今年1月开始预定四个月的第四期整训正在进行中，特别集中力量对干部进行教育。

另外，致力于游击战和特务工作，为了扰乱我占据地区，正在组织和训练专门的部队。

（三）各个战区敌军的主要动向

第八战区

绥远方面，因物资缺乏补给困难的情况已表面化，逃跑者不断发生。另外，虽有便衣队潜入我占据地区内部，但由于我方采取严密的警戒，未能发挥实际效果。

陕西省方面，实质上全被胡宗南掌握，一般说来，战斗力及战斗意志相当充实。目前，一方面以主力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军，另一方面担负着对阎锡山督战的任务。

第二战区

阎锡山的山西军仍无积极的战斗意志，以南部的第三十四、八十三军的一部勉强进行游击活动。最近虽重新将独立旅改编为师，但实质上战斗力并未提高。其所以改编为师，想是重庆政府要使山西军中央化的一种措施。

晋南方面的中央军，目前因整训关系，不致有较大的积极行动。

第一战区

因我第十一军在豫南作战中的进展及汤恩伯军的败退，卫立煌把黄河河防部队及整训中的各军集结于新郑、临汝地区，准备反攻，并由晋南调来一部分兵力。看其行动甚是不稳。

冀察战区

任命卫立煌兼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为副总司令，以此加强中央的统治。

鲁苏战区

韩德勤在与新四军作战后，由江苏省主席转任军事委员会参议，任命王懋功为新的战区副司令。此外，江南的第六十三师转移到江北编入第八十九军。

三、共军的情况

（一）我军扫荡作战的影响

由于去秋以来连续扫荡作战，特别是毁灭根据地的作战，物质上、精神上均给共军以极大打击。共军蛰伏于残存地盘之内，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工作。然而，由于急剧扩军，素质下降，战士逃跑现象增加，且因物资缺乏，加深了对民众的榨取。加以我军讨伐带来的战祸，造成匪区民众穷困，出现军民背离的倾向。察南大庙上附近农民袭击共产系县政府的事件，即其一例。彭德怀说，以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本年度的中心课题，其急于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势，已由此间消息得到证实。总之，共军本身内在的弱点业已逐渐暴露出来。

（二）各个地区的主要动向

晋西北贺龙集团

1940年12月初，在晋西北地区内设置了新军区。在贺龙的领导下，统一了山西新军及决死纵队，拟建设党政军一体的巩固地盘。但是，我军在山西西部作战中，扫荡了敌在兴县一带的根据地。在此次作战中，敌人很快退到陕西境内，虽强令民众“空室清野”进行逃避，但因我军驻在根据地附近反复进行扫荡，民众见共军只是宣传，并无保护民众的事实。于是靠近日本的倾向有所抬头。在1月下旬，一二〇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

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集团

冀察省境地区山地内的共军，目前正在努力补充损耗、恢复战斗力及重建被毁灭的根据地设施，虽不致有大的积极行动，但有逐渐北上的征兆。盘踞在满华国境一带的李云长冀东军区部队，活动渐趋积极。冀中地区吕正操的一部分，从12月下旬有向冀南地区方面南下的模样。

晋东南及冀南地区的刘伯承集团

遭我晋中作战打击的一二九师主力，正逐渐在辽县东南及南面的晋冀豫地区集结中，有的情报说是企图东进，有的说是要攻击重庆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军长庞炳勋）。但是，究竟是何企图尚不明确。此外，据传冀南各部队正向苏北方面移动，不知真假。在鲁西的杨勇、肖华等部队正在攻击濮阳一带的重庆第三十九集团军，看来是要占石友三的地盘，也许是故意扬言以隐匿企图，也许是为了对付卫立煌、汤恩伯的剿共部署，而令一部分部队向苏豫皖省境一带移动，以便与苏北方面保持联系。

山东方面的徐向前集团

第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整军业已结束，前者改编为六个教导旅，后者改编为五个旅。最近泰山山脉的共军在费县以北地区集结，可能有某种新的企图。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一带约有一个旅似正向苏北南下。

苏皖地区

在苏北方面，第十八集团军的一部分（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企图以主力共同盘踞于淮安以东地区，并巩固其地盘，目前尚无向北面移动的征兆。

盘踞皖北地区宿县以西的第四纵队，随着我“五号作战”（骑兵第四旅团的豫南作战）的进展，似有扩大地盘的意图。

陕甘宁边区

陕西省内的共军，号称约四万人，其主力正与包围他们的蒋系军相对抗。绥远省伊盟地区似有很多工作人员潜入进行工作，但尚未见有大部队北上。

占领地区内的治安，由于1940年秋的肃正工作而得到空前的提高。但是，离主要城市及交通沿线越远的地区治安越坏，特别是冀中、冀南接近敌区地带，仍在袭击日军警备队，不断破坏交通及电话线。此外，最近随着共产势力的东进，在冀东的蓟县、遵化以及山东的胶济沿线，扰乱治安的现象非常显著。

在城市里的恐怖事件，与1940年夏以前相比大见减少。但至1940年11月底，竟发生了方面军的参谋在北京市内白天被暗杀的事件，使方面军首脑们受到很大冲击。这是后来加强对重庆方面的特务及中共方面秘密工作进行检举和肃清的主要原因。

上述暗杀事件的经过如下：

（根据北京卫戍司令官——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一长 谷川美代次少将的笔记）

11月29日午前9时30分，方面军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二人，从中央饭店骑马上班，行至军司令部以西约300米处，遭到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用手枪射击，高月中佐背部中弹落马，送至医院即行身死。乘兼中佐虽非重伤，但也身中了两弹住院治疗。凶手可能是二人，身穿便衣，骑无牌号自行车很快逃走。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自本日起撤掉汽车上带有军官阶级的标旗。

笔者注：事后，旅团长统一指挥由其它兵团紧急派来的部队，加强对各城门的警备及对自来水、电线的保护，采取了特别警备措施。

并协助宪兵进行盘问、搜查。另外，自12月5日在北京城墙的缺口处（31处）安装了电网。直到年底将凶手及其同伙全部检举后，于1941年1月15日解除特别警备。

第四章 1941年度的治安战

一 指导对华长期战的各项措施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之前，便从战略、政治策略、思想战等各方面，根据其草案探讨了对华长期战的具体指导方针。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使人感到在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势下，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

然而，如何应付势必到来的长期战，这是过去一直多方考虑的问题。如前所述，在陆军省部方面鉴于在华日军兵力递减，为使国力和军备保有余裕以应付长期战，修改了以前的“修正军备充实计划”，由1940年7月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作出如下规定，并内部商定了兵力的分配。

1940年度平均 77万（年初85万、11月下旬72.8万）

1941年度平均 65万（预定 华北25万、华中30万、华南10万）

1942年度平均 55万（预定 华北25万、华中15万、华南15万）

1943年度平均 50万

联系上述兵力递减情况，曾经研究了在任何局势下也应固守的地区和适应局势变化可以撤出的地区。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进京，就一般局势和今后的方针汇报如下：

一、据观察，一年来，我军政治策略、战略之各项措施颇有成效。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已消耗二、三成左右，但敌方士气仍很旺盛。

二、在我军配备方面，目前军、师团的后备兵力甚为薄弱，缺乏余裕。兵力配备不齐，给作战造成极大障碍。正在扶植的新国民政府武装力量，有正规军队约15万和数量大致相等的警察部队；预计今后2年将各扩充为大约1.5倍。

三、我军在华兵力状况

华北 25万

华中 29.6万

其中第11军 21.8万

第13军 7.8万

华南 16.6万

定员外 约1.6万

计 72.8万

空军是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共计20个中队。

四、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

带、武汉地区、华北，而以华北最差。

五、占领区将按下述要领进行治安肃正。

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则对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1942年度设法肃正襄西地区及三角地带。1943年度彻底肃正占领区内部。情况许可时，打通京汉线以沟通华北、华中，但这似乎要待1944年以后方可实现。

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后升大佐）曾有如下回忆：

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保有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体势。

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推迟到1941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机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如是，对华作战的指导思想逐渐成熟，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与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

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

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对上述设想加以具体化，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如下：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点）

一、直到1941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第一期）。

1941年秋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第二期）。

二、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

三、在第一期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能力，给敌以重大压力，谋求事变得到定局。

但要考虑欧洲战局的变迁和国际政局的演变（调整日苏邦交等），妥善调整政治和军事的策略。

四、继续抓紧利用空军进攻作战的威慑作用，并开辟其它作战途径。

五、在此期间设法加强陆地、海面及空中封锁。

同时切断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骚扰滇缅公路，以海军封锁海面、以陆军进行封锁海港的作战等，加强对华经济压力。

六、充分灵活运用目的在于对华施加压力的政治谋略。

七、政务领导工作要符合“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精神，特别要为充实帝国国力、加强国防贡献力量。

八、改革体制及其它种种制度，以求适应长期战方略。

在此之前，中国派遣军于1月13日汇报了根据陆军中央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草案）编制的下述计划：

一、1941年度按照现行作战任务，大致确保现有占领区。特别要在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威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中央军。

二、在夏秋之际，最大限度地发挥空军进攻作战的威力。

三、在整个作战期间，加强对陆地及海面封锁。特别是以上海、天津及汉口为重点，严禁流入、流出。

四、根据“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制订政治策略方针。在占领区内特别设定对敌隔离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当时的意图是，无论是为顺应中央部的意旨——要在1941年内掌握解决事变的头绪，还是考虑明年以后的国际局势，都必须于本年内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二 1941年初期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

方面军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方面军于2月25、26两日召开了管内参谋长联席会议，

传达了新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

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为：鉴于国内外的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及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此项计划具体推进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也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地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以适应国际局势的转变，重新调整我国体势。据此，本计划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

本计划的指导方针如下：

方面军历来以治安第一为行动措施的指导方针。在1941年仍应沿袭执行，且应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工作，迅速恢复治安，安定民生，促进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我军的独立生存能力，以此体现日、华紧密合作地区的楷模。

至于实现此等行动措施的具体手段，应确定明确目标，而后有机地统一行动措施，矛头集中指向同一目标。由于事属紧急，必须使一切行动措施，能有重点地和统一地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

方面军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使各项行动措施迅速而有效地向前推进，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行动坚持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

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虽然按照事变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指导思想制订的长期肃正建设计划，迄今尚在研究之中，而“迅速恢复治安”分阶段的目标也不明确，但是，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

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

做为这一判断根据的敌情和治安状况，方面军对之做了如下的观察：

一、方面军面临的敌情

根据方面军的判断，蒋介石在今春4、5月间，照例企图进行局部反攻。但此次将与过去不同，不仅限定目标，而且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训练，以期取得实效。对此，我军有注意的必要。

共军由于受到我多次讨伐以及国共相争等原因，其军事行动曾一度似趋消极。但实际上，一方面是要极力避免因全面武装斗争而造成实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军、政、党一体的有机活动，在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以扩大发展党的势力。因而在我占领地区，以及蒋系实力薄弱地区，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日趋活跃，且其工作效果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从质的方面来看，其深度确是在不断提高。尽管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但华北的治安肃正工作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二、治安状况

华北的恢复治安和建设工作，逐渐走上稳步提高的途径。其原因：由于去夏以来，随着各兵团实施更加积极的措施和讨伐，以及对共军内幕和各项工作的真相逐渐了解，从而促使我军的肃正建设措施更加具体化，并增加了分析、思考的深度。

从作战方面来看我军实施的措施，诸如：烧毁根据地的设施；采取居坐战术（“蘑菇”战术之意——译者）、啖付战术（咬住不放的战术——译者）、或夜间和拂晓前突然袭击等战术；最

近还有由特种突击队编成的以敌方指挥官为目标的兵团，或利用壕沟划定敌我势力范围的方法向外扩展；以及加强经济封锁等，不断出现努力创新的迹象。再以铁路事故为例：在1939年 度，每运转1,000辆列车中，按比例就有两辆被破坏。至1940年 度减低到1.8辆。这是从统计数字中所显示的治安逐渐恢复的一例。但是可想而知，敌军现正收敛锋芒，养精蓄锐，努力推进地下工作。因此，仅据上述情况，不能认为华北治安已有进展。今后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积极具体地做好各项工作，以期尽快巩固治安。

在根据上述观察和方针制订的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的重点事项如下。

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

一、关于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全部措施均指向示范地区，特别是华北北部及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区，以便尽快体现成果。

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

二、关于剿共问题

由于对共军的外貌已逐渐认清，今后将能准确地掌握其实质，只要采取可靠行动措施，尽快将其剿灭的时期可望到来。

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对此，方面军深有体验。

此外，尚应进一步加深对共产党(军)的研究，掌握其真相，

避其所长，攻其所短，将一切努力和行动措施集中于此，以期尽快剿灭之。

三、关于作战问题

利用此次增加兵力的机会，方面军对驻于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尽量以大的兵力进行作战。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外，各兵团在各该作战地区内应一如既往积极进行肃正讨伐工作。至于新增派的兵力，准备在将来主要部署于华北北部地区。

四、关于分散部署兵力问题

为了使分散部署兵力起到进攻据点和治安支撑点的作用，如果从部署的目的及治安的实际情况等出发，对现状仔细加以研究，则可看到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固然治安现状在各地千差万别，一律集中，确有困难，但仔细领会本年度方针指示的“行动措施应重点集中”的精神，充分利用交通、通信网及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装备，并结合加强自卫团等，可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其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因此，应考虑进一步厉行这方面的教育训练，并加强领导。

五、关于对中国方面行政机关的指导问题

为使我军以治安第一为基础的各项措施，形成中国方面行政机关全力协助的重点，必须尽量渗透政治力量。

以上，虽是一向应特加注意的问题，但仍有轻视中国方面的行政机关、使之软弱无力的倾向。如此，不但与我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同时亦不符合通过精心哺育，使其协助我军巩固治安的本意。据此，在本年度内，应努力做到，大力培养中国方面行政机关，授以应有的实权，使其自觉认清巩固治安的职责，以发挥其行动的积极性。

近期以来，诸如华方独自建立各种防共机关，以及即将参加

3月30日开始的华北全区域的治安强化运动，凡此等等，都使人想到：我军以前的措施已逐步产生效果。

对这些机关，应给以实权和责任，避免不必要的干涉。应经常由大处、高处加以监督指导，特别是对其长官尤应注意，力戒无谓的掣肘。我军只应明确指出应达到的目标，对实施方法的细节，则任其自理。

对职员中素质不良、工作不力，甚至近乎消极抗日的不良分子，应予淘汰，代之以由新民学院，新民会、中央训练所等培养和再教育出来的少壮官吏，使之铲除陋习，主动做好工作。

六、关于治安军问题

在1941年度内，应使治安军的主力逐渐向冀东道方面集结，使其达到能不依靠日军、独立承担确保该地区治安的任务。

以上计划，对促进治安军的实力，提高其它警备机构的能力，减轻我军负担并最后替代我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军尚应继续领导，并极力防止治安军与其它机关发生摩擦。同时，在问题的处理上，力求做到稳妥圆满，从而使其真正能成为政府的绥靖部队，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关于促进农村自治自卫的问题

实现政治力量的渗透，绝非短期所能奏效。因此，乡村不能坐待自上而下的行政渗透，而必须自力更生进行建设。尤其是稳步推进推动乡村自卫工作。

为了尽快地恢复占领地区的治安，在争取农村民众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不使成为共产势力的温床。相反进而使之主动驱逐共产势力，则是极为重要的。鉴于农村自治自卫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政治特色，因而，以此做为措施的中心，使其自发地掀起自治活动，这是巩固治安的第一步。为达到自治的目的，必须加强自卫组织。要改变过去的方针，逐步加强自卫团的武装力量，使农

村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共军，为恢复治安做出贡献，奠定安居乐业的基础，从而促进自治。

八、关于示范地区工作问题

关于示范地区的工作，本年度的目标，是将各地区原来的任务，进一步加以检查研究，而后竭尽全力使之在本年内贯彻实现。

本来，指导示范地区的目标，在于高度发挥各该地区有关治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工作效果。从而，显示模范的新秩序的姿态，逐步向外地普及、推广。但鉴于各个地区的情况，应使其各自采取与其本来任务相适应的措施。例如被指定为以开发重要国防资源为目标的示范地区，则应杜绝因治安不良而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发生。

九、关于新民会问题

应使新民会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

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同时，逐步由县城走向农村推进工作，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为此，在扩大对新民会本身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促进和扩大乡村自治自卫组织，并与民众打成一片，形成以新民会地方分会为核心，依靠其斗争力量及组织力量，驱除共党势力。

再者，华北的民众团体，在以新民会为主的原则下，应使中国青年党或劳工基层组织、爱路组织，在其工作方面避免与新民会发生摩擦，以便逐步达到统一的指导方针。

十、关于经济建设问题

为彻底开发利用国防资源，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首先应以提高占领地区人民生活、安定民心为当务之急。应明确认识到，在民心背离的情况下，所从事的各项建设或国防资源开发

利用等工作，都不能取得预期成果。因此，方面军在经济建设上，应一方面力求稳定民生，一方面充分开发利用重要国防资源，提高我军独立生存能力。并且要妥善安排两者之间的有机配合，以达到增加生产、流通物资为重点的施策方针。

重点地区，仍为示范地区。在进行具体指导时，应一如既往，尽量任用华人和努力吸收当地资金。近来，当地资金逐渐出现，对此须注意推动。

十一、关于加强经济封锁问题

对于所在地的敌区和匪区，虽早已实施经济封锁，但由于有关计划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未臻完善，迄今收效不大。为了取得封锁的实效，需要采取更高度的统制措施。近日内，方面军即将制订相应的大纲，下达指示。

十二、关于我军就地自给问题

方面军考虑到可能就地筹办的军需物资的质量、价格、补充数量以及预算等问题，确定主要对与被服、粮秣有关的各类物品，及部分武器、医疗器材、建筑材料实行就地筹办。部分武器材料亦可就地维修，并应利用当地装卸力量，以保持、增强我军的战斗力和机动力。对间接的经费，在可能范围内，考虑用华方预算加以解决。上述我军就地自给问题，随着治安的稳定，生活的改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以及粮食、金融、通货各项政策的具体化，正处于逐年提高的过程。

在本年度内，方面军应致力于沟通日、满、华的军需实际情况，并调整各军需产业之间的关系。此外，考虑到准备应付更大的非常时局，要在提高民生的同时，利用培养当地人力、物力资源，以进一步扩大我军就地自给能力，并要厉行节约、降低消费、撙节军费开支，以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机动力。

关于部队的教育训练及其它各项措施如下：

一、部队的教育训练

方面军为使治安建设取得更大成果，在各项施策中必须以 皇军的精锐强大为主。鉴于战局的长期化及高度分散部署兵力 的现况，应特别注意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加强训练。为此，必须 彻底贯彻领导者以身作则的精神教育，并经常监督指导，特别 要严格执行信赏必罚及干部教育的方针，以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关 细节，统以“1941年度关于教育的指示”为准则。在方面军所 进行的特别教育中，对于炮兵、工兵军官，应充实方面军炮兵、工兵 训练队的定期教育、实施临时的军官以下的集中教育及巡回 教育。关于对步兵军官编成训练队问题，应做好准备工作，尽快促 其实现。在考虑筹办干部候补生队，及整顿充实各下级士官候 补生队，特别在提高教官、助教的师资质量的同时，应排除万 难，根据中央的规划积极实施学校教育、选拔合格人才，分别派遣 学习，并使其在学完归还后从事普及教育工作。

二、关于提高部队效率及兵员保健的对策

关于通过一系列措施，破除陈规旧习，创造性地提高部队 效率的问题，虽一向为我军极端重视，但其实际效果，仍不够理 想，不能适应战时、战地的实际情况。对此必须竭尽全力彻底加以 改进。

提高部队效率的重点，在于铲除实行治安第一的障碍，并 以 “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等刷新思想为基 础，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我军的卫生状况，与1939年相比，1940年度战争病员或送 回国内治疗人数，均约激减了三成。但是，为使部队更加精锐，必 须进一步提高其体质。因此，队长以下各级干部，必须提 高对兵

员保健工作的认识和关心。应以热情亲切的态度，特别是以骨肉至亲的心情从事此项工作，并努力采取与部队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但应特别加强领导，切勿陷于保育第一，有失养成强健兵员的原则，并应注意不使产生作战军要求执行任务的障碍。

冀东作战与冀中北部作战

方面军根据年度计划，由5月末至6月中旬之间，首先开展了冀东作战（5月29日～7月21日），继而由6月6日～7月10日间又开展了冀中北部作战，收到对冀热边界地区及白洋淀附近共军彻底扫荡的成果。

冀东作战（冀号作战）

冀东地区居民，历来受满洲和中国两方的影响，强烈的亲日和反日感情相互交织。在职业方面，以务农为主，但由于地处长城线山岳地区附近，多属荒地，农民生活艰苦；而天津市周围的居民，则依靠当地的经济力，唐山附近的居民，则依据开滦煤矿等为生。本地区是中共冀察热边区根据地。1938年春季，中共第四纵队进入该地区开展游击战，同年秋，由于日、满军的讨伐，其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受到挫折。1940年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冀东军区。该军区在司令李云昌（副司令包森）之下，由第十团（团长陈群）、第十二团（团长包森）、第十三团（团长单德贵）等组成。兵力约2,000名。此外，估计尚有特务团、政治工作人员约200名，独立游击队200名。党组织在冀东区党委员会之下，设有东部地区党委员会，唐山市区党委员会，天津特别市党务

执行委员会，但对其所在地党的干部姓名以及基层组织等均不得知。同时，做为行政机构，在遵化县还成立了晋察冀边区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其细节不详。另外，在晋察热交界地区，设有以肖克为司令的平西军区，行动异常活跃。

在该地区的剿共战，一向与关东军协作，多次进行共同作战。进入1941年后，由2月23日至3月8日间，关东军在热河部队与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协同进行了“蔚平密（蔚县、平谷、密云）肃正作战”（“赤”号作战）。又从4月1日至同月末止，在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由这一时期起，共军经常有便衣进行活动，从而增加了对地下工作人员的剿抉、扫荡的困难，所谓“剿抉剿灭”一语，也从此在我军内部开始使用。

冀东作战，系由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一、第七、第九、第十六、第二十七大队参加，治安军（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部队）也出动了部分兵力。5月29日对盘山地区根据地，由四面进行了围攻。随后，急追分散退却的敌军部队，并努力挖出化装便衣的敌人。敌逐渐向西北方面移动，逃窜到满洲国的山岳地带。此次作战，至7月21日大体完成。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长谷川美代次少将（后升中将）对此次作战曾有亲笔记录如下：

一、5月3日，冀东作战预定由5月20日开始，为期30天。但由于第二十七师团的某种原因，推迟了开始日期。

二、不采取以大部队同时进攻的方式，代之以包围根据地，在包围圈内剿抉搜捕地下工作人员及便衣共军的方法。

三、努力挖出敌军隐藏的武器，取得了较大成果。

四、盘山的共军，改穿便衣与家属一起逃走。

五、敌部队四散后，我军划分地区，分别驻兵，进行扫荡。

六、7月4日有59名治安军士兵逃亡。

七、进入7月青纱帐起，行动困难。

八、7月18日召开了有关强化治安的联席会议。会上要求各县密切协作，做好进行讨伐及治安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长、县联络员、警察局长、新民会的政治工作人员等。

曾任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的大村荣中佐对此回忆如下：

第二十七师团于1941年10、11月间，进行了玉田，遵化地区的讨伐作战（“木”号作战），在两次的冀东作战中，对共侦察及剿撫工作均不彻底。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是由于中共方面的地下工作不够健全，以及我第二十七师团由中国驻屯军时代开始，就驻扎于此，对作战地区情况深为熟悉之故。

冀中北部作战（冀北作战，新号作战）

在方面军的指导下，由第一一〇师团主力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各一部参加。对敌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根据地的白洋淀以北地区进行了肃正作战。

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注：朱占魁，以后于11月27日在大李各庄（保定南方约30公里）被我第一一〇师团步兵第一六三联队俘获。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展开

(3月30日～4月3日)

以“保卫华北”为重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藉该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的时机，主动加强华北治安工作，由3月30日开始，以五天时间，对全华北的军、政、会各机关及全体民众，进行总动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为此，王揖唐委员长于20日发出布告，强调指出：“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作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同时，并对实施目标做了如下的指示：

1. 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
2. 加强扩大民众组织；
3. 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王委员长于3月30纪念日的当天，就确立华北自力防卫体制的必要性做了说明，要求大力开展治安强化运动。

中国方面，以自己的职责，主动积极地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是前所未有，值得注目的事情。此种运动，以后相继举行了第二次（7～9月）；第三次（11～12月）；第四次（1942年3～6月）；第五次（10月），在肃正治安上取得极大的成果。

另一方面，我华北方面军也与中国方面紧密联系，为支援此一运动的全面展开，制订了如下计划：

“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

1941年2月15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

第一、实施方针

一、利用3月3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时机，使华北全体官民在建设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并要达到下列目的：

1. 务使认清确立治安一事，中国官民的职责，比日军更为重大。这是导致安居乐业的首要条件，从而使其积极加强村镇自治自卫工作。
2. 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
3. 宣传华北全体官民在纪念新生华北的感召下，一致奋起，主动、积极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以摧毁敌占区和亲敌地区人民的斗志，促进亲敌的第三国的反省。

二、本运动应长期坚持，并不断扩大成果。

第二、实施要领

一、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由3月30日到4月3日之间（为期五天），开展治安强化运动，使军、政、会各机关及民众与各该地区的日军协作，从事强化治安工作。但上述运动，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经与日军各部队协商，得延长或缩短。

二、军、政、会各地方机关，与各该地区的日军协商制订本运动的工作计划，但应考虑各地的情况，在军、政、会各机关及民众的有机配合下，融洽地进行各项工作。

三、各地日军，应按各该地区的现状指导中国方面，使其主动积极地对强化治安做出贡献。

四、工作内容，概以下述要项中适合当地实情者做为实施重点：

-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 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 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1、2条）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 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演剧及小册子等方式。）

第三、宣传实施要领

一、预备宣传

3月中旬，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由王委员长，齐治安总署督办，林情报局长等作关于强化治安的必要性的广播。其内容，由同盟通信社、中华通讯社进行报道。

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张贴贯彻上述内容的“传单”和“宣传画”。

二、运动中的宣传

对中国军、官、民和日军协力，主动、积极从事治安工作的实况，由各地日、华新闻通讯记者、摄影班、电影班加以报道，并向第三国通讯社提供资料。

华北广播协会向管内及敌地区进行广播，并由地方各电台作为本地新闻进行广播。

三、事后宣传

根据各地日军的报告，组织本运动的综合战绩材料，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

王委员长以广播形式对本运动的成绩加以总结，并提出继续

向强化治安迈进的要求。

参谋长或军报道部长广播感想。

(以上向中国全国转播并对敌区广播)

除令武德报社发行图片特辑号外，并利用兴亚照片厅进行宣传。

令华北电影公司向各电影院提供新闻影片，此外，我军也购进影片，在各地巡回放映。

根据方面军的观察，此次运动在全华北广大范围内蓬勃展开，收到预期的成果。应该看到，这是由日方在幕后暗中极力指挥下所促成的。这是以政务委员长为首的中国各界要人，率先活动于第一线，并在一元化的领导下开动所有的宣传、报道机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自觉和热情，从而展开了前所未见的军、政、会、民，同心合力的民众运动。

三 对华北地区共党实力的观察

方面军，早在1938年秋季即认定共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并为查明其实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密，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以共军“百团大战”为契机，方面军上下，全力以赴采取措施，始逐渐取得一些成果。

方面军司令官，在1941年1月10日的兵团长集会上训示说：“在加深对共党及其工作调查研究的同时，具体地掌握其实质，从而制订出适合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对策……必须以超越他们的热情和魄力，顽强进行作战和政治工作。”

在1月27日方面军的情况报告中也提出：“我军应探明其组织和活动的根源所在，采取军政统一的措施，尽速将其剿灭”，力图促进调查研究工作。在4月10日的方面军情况报告中又提出：“由于逐渐掌握了共党及共军的真相，我军当前正以百倍信心采取措施，迅速将其剿灭的时机指日可待”。

“我军基于过去的经验和研究，在采取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具体措施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这表明在调查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在此期间，对调查研究作出贡献的机关，不止一、二处，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即其中之一。黄城事务所做为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组织逐步提高了它的性能，受到宪兵司令部的热情支援，扩大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在对共施策的建议、启蒙、宣传等方面（如发行《剿共指南》）颇为活跃。

值得注目的是，在当时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表格从略——译者）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说明治安情报活动日益受到重视。

注：《剿共指南》为1941年6月15日创刊的一种月刊。其目的是，为了剿灭中共，首先应正确了解敌方各项工作，为我制订剿共对策，做出贡献。主要发给活跃在剿共第一线的部队及政治工作人员。（由各部队本部，特务机关，宪军队，国策公司等掌握。）关于该刊的性质，编者在创刊号中作了如下说明：“华北民众之敌是中共、八路及抗日分子，如不将彼等消灭，就不会有华北治安的稳定，没有治安的稳定，就没有民众的安居。有了华北一亿老百姓的乐业，才能有华北新秩序。在未消灭共产党、八路军

前，华北圣业则难奏效”；“对于擅长真假虚实，奸策权谋，谎言诡辩的共产党、八路军，必须具有明察秋毫看穿其用心的能力。从其地方工作的主要因素中，寻求中共大局的动向；综合前线地方的形势找出其全面的实质。”“近代的武装斗争，政治为主要的因素。在剿灭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进攻手段的八路军时，我方的武装斗争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

根据《剿共指南》，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概要如下。（以下按日文原著译出，未予校正——译者）

注：《剿共指南》编辑人员对本资料附有如下说明：

关于组织方面的保密工作，共方做得十分严密，特别是党组织较其它组织的保密程度更高。因此，要求材料完全可靠，殊属困难。本资料系以截至1941年8月期间的情报为基础加以编纂的。以后有所变动，在所难免。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的机能（笔者略）

二、中共中央部（笔者略）

三、北方局

与事变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的情况相同。其地点游动于山西省辽县（即左权县，以下同——译者）、武乡、黎城及河南省的涉县（涉县属河北省——译者）等各县境间，与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共同行动。

书记 杨尚昆

组织部长 李雪峰（或刘锡五）

宣传部长 李大章

宣传委员 克寒（兼新华日报华北版主任）

军事部长 朱德（或彭德怀）

统战部长 杨尚昆

秘书长 李伯剑（杨尚昆之妻）

委员 朱德、陆定一、罗瑞卿、彭德怀、邓少萍、林祖涵、贺龙、聂荣臻、刘伯承

（一）北方分局

由于华北党组织及其影响地区的扩大发展，根据1938年延安中共第六次扩大委员会决议，于1939年初设置了北方分局。分局所在地点为河北省平山县，管辖区域为河北省的北部、山西省东北部、察哈尔省的南部。在设立北方分局的同时，并组织了晋察冀北区党委员会（原名晋察冀边区党委员会，1941年改称北区），冀中区党委员会，平西区党委员会，冀东区党委员会等。

书记长 彭真

秘书长 姚伊林

机要科长 周亮

组织部长 刘仁

干部科长 张瑞华

社会部长 徐建国

军事部长 聂荣臻

统一战线部长（书记兼任）

晋察冀北区党委员会（在平山县）

书记 刘澜涛

组织部长 赵振声

民运部长 林铁

社会部长 李博

第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涞源县）

书记 不详

管辖县 龙华、徐水、蔚县、易县、满城、涞源。

第二地区党委员会（在五台县）

书记 张连奎

管辖县 繁峙、代县、盂县、五台、寿阳、忻县、定襄、
阳曲（太原）、崞县。

第三地区党委员会（在唐县）

书记 李广

管辖县 阜平、定北、唐县、望都、完县、曲阳。

第四地区党委员会（在平山县）

书记 栗再温

管辖县 灵寿、行唐、建屏、井陉、平山、平定。

第五地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李光汉

管辖县 浑源、灵邱、广灵、阳原、天镇、应县。

察北特别地区党委员会（在张北）

书记 不详

管辖县 德化、多伦、商都、宝昌、集宁、张北。

冀中区党委员会（在安平县）

书记 黄敬

组织 刘亚林

宣传 周国舟

社会 张国坚

军事 黄奥义

第六地区党委员会（在束鹿县）

书记 张达时

管辖县 赵县、深南、束鹿、元氏、栾城。

第七地区党委员会（在安国县）

书记 孙 明

管辖县 安国、无极、深泽、晋县、定南、藁城、新乐、
安平、深北、正定。

第八地区党委员会（在饶阳县）

书记 罗玉川

管辖县 文安、饶阳、武强、河间、交河、献县、大城、
献交、任河、青建国。

第九地区党委员会（在博野县）

书记 吴立人

管辖县 望都（南）、高阳、蠡县、清苑、博野、安新、
肃宁、之光、徐水。

平西区党委员会（在房山县）

书记 马辉之

第十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新城县）

书记 马载

管辖县 固安、雄县、霸县、永清、安次、容城、定兴、
新涿、宛平。

冀东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不详

东部地方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周文彬

管辖县 遵化、丰玉遵、迁遵兴、迁涿卢、昌滦乐。

唐山市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不详

天津特别市党务执行委员会（所在不详）

书记 不详

（二）山东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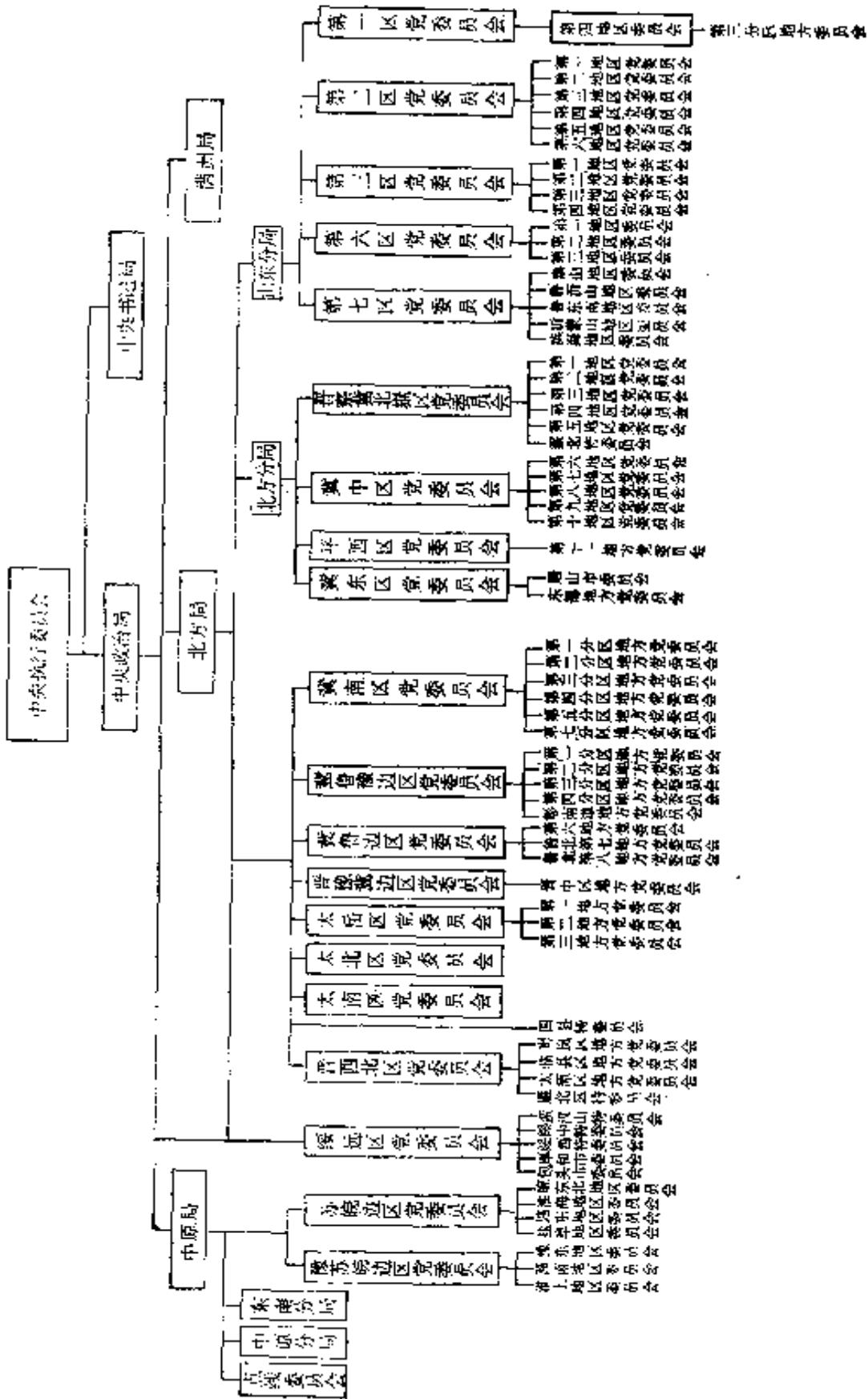


表1·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表

该分局与北方分局同时成立，首任书记为原山东纵队司令郭洪涛。1940年郭氏转调延安，由原山东纵队政治委员朱瑞继任书记。山东分局为山东省党的最高机关，游动于山东省沂水、费县、蒙阴、临沂等各县境内，管辖陇海线以北江苏省、河南省及山东省全部地区（卫河以北为冀南区）。

（以下笔者略，以下各项的细节亦略去）

（三）冀鲁边区党委员会（在乐陵，于1938年3月组成）

（四）冀南区党委员会（在威县，于1938年7月组成）

（五）冀鲁豫边区党委员会（在清丰、于1940年4月成立）

本地区事变前即设有直属于河北、河南、山西各省委的党组织。事变后，于1940年3月下旬，原在山西省东南省境的第一一五师第二纵队东进至此，迫使丁树本部队南下后，即驻扎该地，纠集旧党员，于同年4月，成立本委员会。

（六）晋冀豫边区党委员会（在涉县）

1939年1月间，撤销了原来的山西省委，重新组成本委员会。

（七）太岳区党委员会（所在不详）

（八）太北区党委员会（在榆社县）

（九）太南区党委员会（在平顺县）

（十）晋西北区党委员会（在兴县，约在1940年2月间组成）

（十一）绥远省委员会（又称：绥远区党委员会，在大青山。1938年9月成立）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组织概况

根据“剿共指南”，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的概况如下：

晋察冀边区政府

以陕甘宁边区为根据地的红军，由于1937年的国共合作，利用参加抗日战线机会，打着“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招牌，开始了致力于争取民众的工作。1937年12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为建立边区政府打下了基础。翌年，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选出了宋邵文、胡仁奎、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孙志远、李杰甫、娄凝先、吕正操等九人的行政委员会，并决定以宋邵文为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该政府管辖地区，包括山西东北部，察哈尔南部，河北北部、中部。下设行政机关，有行政主任公署一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十三处。

晋察冀边区政府：

主任 宋邵文

副主任 胡仁奎 秘书处长 刘奠基

民政处长(兼)胡仁奎 财政处长(兼)宋邵文

教育处长 刘奠基 实业处长 张 苏

司法处长 王斐文 经济部长(兼)胡仁奎

粮食总局长 邵式平 贸易总管理局长 胡仁奎

行政委员会委员

聂荣臻、吕正操、宋邵文、胡仁奎、娄凝先、孙志远、张苏、
刘奠基、李杰甫。

附属机关：

防卫队、公安总局、晋察冀边区银行、贸易总管理局、粮食总局、印刷局、石印局、晋察冀日报、边区导报社、抗战工厂、警务训练班、税务训练班等。

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在安平县）

随着军区的发展，在吕正操的领导下，于1938年3月成立了

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管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主任 吕正操

副主任 徐达本 副主任 李耕涛

秘书主任 吴砚农 财政科长 王焕如

民政科长 高持真 教育科长 王心田

实业科长 苏杰如 司法科长 张津田

视察主任 郑绍周

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盂县）

专员 吕东

管辖县 五台、繁峙、代县、崞县、忻县（东）、定襄、
盂县、平定（北）、寿阳（北）。

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灵邱县）

专员 李涛

管辖县 灵邱、广灵、浑源、应县。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易县）

专员 陈一凡

管辖县 蔚县、涞源、徐水、满城、定兴、易县、龙华。

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唐县）

专员 张冲

管辖县 完县、望都、唐县、定北、曲阳、阜平、新乐。

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平山县）

专员 程宏毅

管辖县 正定、获鹿、井陉、建屏、平山、灵寿、行唐。

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房山县）

专员 朱基文

管辖县 宛平、房良、涞涿、涞水、宣涿怀、昌宛。

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安平县）

专员 英树声

管辖县 献县、饶阳、安平、武强。

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定县）

专员 兰田

管辖县 晋北、晋南、晋深极、安国、深泽、宁北、束北、赵县、藁城、深南、藁无、束冀、栾城、定南、深北。

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邱清哲

管辖县 大城、青县、河间、任邱、文安、建国。

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安新县）

专员 张孟旭

管辖县 安新、新安、清苑、蠡县、博野、之光、高阳、肃宁。

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李凤林

管辖县 安次、永清、固安、霸县、雄县、容城、新涿、新城、定新。

（原书缺第十二——译者）

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遵化县）

专员 朱麒林

管辖县 莒平密联合、迁遵兴联合、丰滦迁联合、平密兴联合、蔚玉宝联合、丰玉遵联合、昌滦乐联合、蔚玉三联合、遵化、迁滦卢、玉田。

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不详）

专员 张李进

管辖县 龙赤、龙延怀、昌宛、丰滦崇、龙崇宣。

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

关于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的组织状况，在《剿共指南》中有如下的记载。

一、晋察冀边区军区

现以聂荣臻为司令，统辖冀西、冀中、平西、冀东等四个军区。

(一) 冀西军区 (1937年10月成立)

1937年9月在平型关对日作战中一败涂地的八路军，10月以后，以一一五师的一部为中心，以聚集河北省北部的残兵败卒、保安队、自卫团等为基础，整编为抗日军，组成晋察冀边区部队，创设了该军区。到11月共成立了四个军分区。

军区司令 聂荣臻

政治部主任 舒同

晋察冀边区军 约30,000人

第一军分区

司令 杨成武

副司令 高鹏

政治部主任 罗元发

所属部队 第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团、
游击第一、二、三支队。

管辖县 易县、涞水、涞源、定兴、徐水、蔚县、阳原、
广灵、灵邱、浑源。

第二军分区

司令 郭天明

政 委 赵尔卢

所属部队 第四、十九、二十六团、特务团，（主力在五台县、一部分在平山县）

管辖县 五台、盂县、平定、寿阳（北）、定襄、代县、繁峙。

第三军分区

司 令 黄永胜

副司令 詹才芳 政 委 王 平

所属部队 二十团、游击军第一、二、三支队。晋察冀边区游击军（第一、二、三支队，特务大队）。

管辖县 阜平、曲阳、行唐、唐县、完县、满城、新乐。

第四军分区

司 令 陈正湘 副司令 叶长庆（庚）

参谋长 王作藩 政 委 刘道生（正）

所属部队 第五团、特务团、正新行灵游击支队，平井获游击支队、教导团。

管辖县 平山、获鹿、井陉、正定、灵寿。

第五军区

为了节省兵力和便于指挥作战，由本年 5 月划归第一军分区。

（二）冀中军区（成立于1938年6月）

事变爆发后不久，当时正在组织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派遣孙志远对残存于冀中安国县地区的吕正操部队进行改编，置于八路军指挥之下。于1938年6月，又将该部改组为十八集团军第三纵队，任命吕为司令，兼任冀中军区司令。

军区司令 吕正操

副司令 孟庆山

参谋长 沙 克

政 委 程子华

第三纵队总兵力约13,700人。

第六军分区

司 令 王长江

代理司令 张孙实

政 委 曹复兆

所属部队 邯中警备旅（第一、二、三团）十六、二十一团。

管辖区 晋县、藁城、束鹿、栾城、赵县、宁晋、深 县。

第七军分区

司 令 于权臣

副司令 崔文宪

政治部主任 饶同国

政 委 吴 某

所属部队 第十七、二十二、三十一团。

管辖区 定县、安国、安平、深泽、无极、深县。

第八军分区

司 令 常德善

参谋长 王 某

政 委 李 某

所属部队 二十三、三十团、抗日第三团。

管辖区 大城、青县、河间、献县、交河、饶阳、武 强。

第九军分区

司 令 刘子奇

副司令 不 详

政 委 魏洪亮

所属部队 第十八、二十四、三十三团（约2,500人）。

管辖县 安新、清苑、高阳、任邱、蠡县、博野、肃宁。

第十军分区

在此次冀北作战中，被击溃的朱占魁匪部，似南下，或向唐县方面败逃。

司令 朱占魁

参谋长 肖津槐

政委 帅荣

所属部队 第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团。

管辖县 新城、固安、永清、雄县、霸县、新镇、文安、容城、徐水。

回民支队

司令 马本（鸣）齐

参谋长 吴兆升

政委 郭陆顺

所属部队 三个大队

（三）平西军区（冀察热，成立于1938年12月）

1938年秋，以宋时轮为总司令的冀察热部队，由于受到日、满军彻底的讨伐，一时陷于被歼灭的境地。至12月，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组成了北上挺进军，纠集宋时轮、邓华部队，在平西、察南及热河省境，设立了临时军区，开展游击活动。

军区司令 肖克

参谋长 程世万

政委 伍晋南

所属部队 第六、七、八、九、十团，平北游击队（龙门、赤城、延庆、昌平、怀来），平西游击队总队（以宛平县为中心进行游击）。

(四) 冀东军区（成立于1938年4月）

自1938年春季以来，第四纵队以冀察热边区为根据地进入冀东展开游击战。同年秋，由于日、满军的讨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受到挫折。1940年春划归晋察冀边区，以李云昌为司令成立晋察冀边区冀东军区。在本年6月的讨伐中，摧毁其根据地，第十一支队长陈群战死。

军区司令 李云昌（又名李云长）

副司令 包森

第四纵队（现在是否尚用纵队名称，不详）

第十一团（团长不详）

第十二团（团长 包森）

第十三团（团长 单德贵）

二、晋冀鲁豫边区军区

现以刘伯承为司令，统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四个军区。

(五) 太行军区（成立于1940年8月）

随着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势力范围的扩大，5月以后，设置了十八集团军直辖的太行军区司令部，将该地区划分为五个分区，同年8月编制完毕。

军区司令 刘伯承

政 委 邓小平

政治部主任 蔡树潘

第一军分区

司 令 秦继为

政 委 郭一峰

政治部主任 杨堂永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一团）

管辖县 元氏、赞皇、临城、内邱、顺德、沙河。

第二军分区

司令 范子侠

政委 赖隔发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团）

管辖县 平定、昔阳、和顺、寿阳（南）、榆次、大谷、祁县。

第三军分区

司令政委 不详

管辖县 辽县、榆社、平遥、介休、武乡、沁县、沁源、襄垣。

第四军分区

司令 石志寺

政委 杨某

所属部队 第十一旅（三十二团）

管辖县 襄垣、黎城、潞城、长治、壶关、平顺。

第五军分区

司令 友定钧

政委 鲁瑞林

所属部队 第十二旅（三十四团）

管辖县 武安、涉县、林县、邯郸（西）、磁县。

（六）太岳军区（1939年秋成立）

太岳地区原为山西牺盟会的地盘，1939年成立太岳军区，以背叛了阎锡山的薄一波为司令。

军区司令 薄一波

所属部队 决死第一纵队

第一军分区

管 辖 县 心源、屯留、长子。

第二军分区

管 辖 县 安泽、浮山、赵城、洪洞、临汾。

第三军分区

管 辖 县 平遥、介休、灵石、霍县。

本军区内的干部兵力均不详。

(七) 冀南军区(成立于1938年3月)

由一二九师徐向前为司令。以小股匪团为基础，加上八路军的部分基干部队编成冀南军区部队，并设立了军区，以后由宋仁穷任司令，去年7月军区改编。

司令由原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就任，宋仁穷转任政治委员。

军 区 司 令 陈再道

参 谋 长 文建武

政 委 宋仁穷

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第一军分区

司 令 丁先国

参 谋 长 王明坤

政 委 刘光明

政治部主任 彭学桂

所 属 部 队 新编第九旅、第二十六团、第一军分 区游 击 队。

管 辖 县 大名(元城、魏县、漳河)、成安、临漳。

第二军分区

司 令 吴成忠

副 司 令 魏开荒

政 委 王贵德

政治部主任 贺亦然

管 境 县 高邑、柏乡、尧山、任县、南和、隆平、钜鹿、平乡。

第三军分区

司 令 张维翰

副 司 令 赵海枫

政治部主任 甘思何

所 属 部 队 新编第八旅、第三军分区游击队

管 辖 县 邯郸、永年、曲周、广平、肥乡、邱县、鸡泽、馆陶（广曲、永肥）。

第四军分区

司 令 杨鸿明

参 谋 长 陈明义

政治部主任 孙玉明

管 辖 县 冀县、新河、南宫、清河、威县、广宗。

第五军分区

司 令 不 详

参 谋 长 李连宗

政 委 不 详

管 辖 县 阜城、武邑、衡水、枣强、景县、故城。

（八）冀鲁豫边区军区（成立于1941年2月）

由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号称冀鲁豫边区部队，以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活动。本年2月于濮阳县河西李庄，以杨得志为司令，弹辅仁为副司令，正式成立了冀鲁豫边区部队，加强了行政组织，积极建设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在鲁西至豫北的地区，由原东进挺进纵队司令肖华为司令，于去春成立了鲁西军区，本年6月两军区合并。将所

属部队改编为第二纵队。任命干部如下：

第二纵队

司 令 杨得志

副 司 令 杨 勇

兼边区军政委 苏振华

边 区 军 司 令 崔田民

兼边区军政治
部 主 任 唐 亮

参 谋 长 卢绍武

因对军分区以下情况不明，暂按过去两分区原状记载如下。

旧冀鲁豫边区军区

第一军分区

司 令 朱 诚

副 司 令 颜东山

政 委 王凤梧

所属部队 第二纵队第一旅、军分区游击队

管 辖 县 南乐、清丰、内黄、彰德、汤阴

第二军分区

司 令 周柱生

副 司 令 李静宜

政 委 张应观

所属部队 第二旅、鲁西南独立团

管 辖 县 曹县、菏泽、定陶。

第三军分区

司 令 赵基梅

副 司 令 张耀漢

政 委 谢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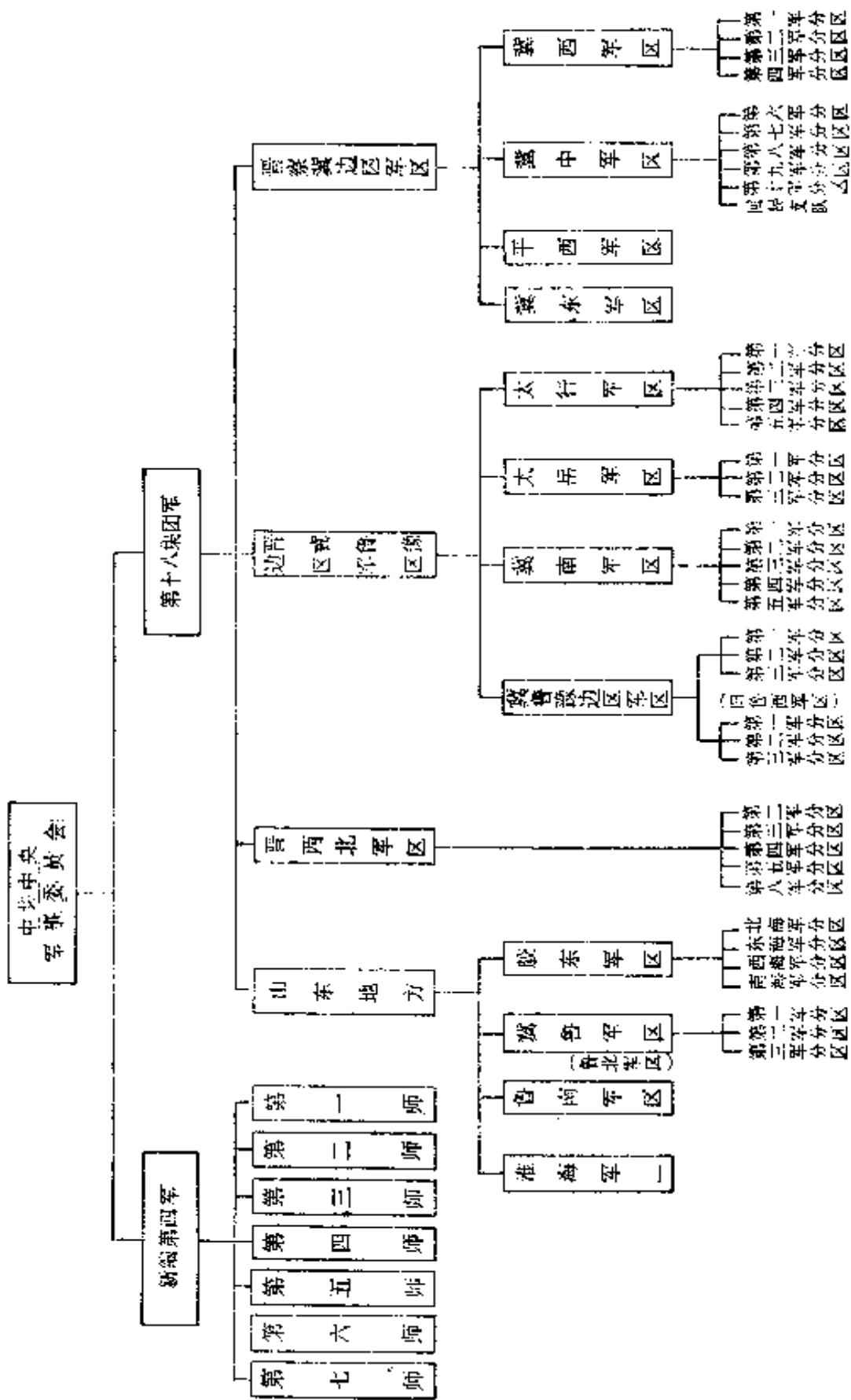


表2：中国共产党军组织系统表

所属部队 第三旅

管 辖 县 濮阳、滑县、东明。

旧鲁西军区

司 令 王叙坤

政 委 李冠元

管 辖 县 以肥城为中心。

第二军分区

司 令 冯鼎平

管 辖 县 以郓城为中心。

第三军分区

司 令 张维翰

(九) 晋西北军区(1940年11月成立)

为了统一晋西北地区各方面抗日部队的指挥系统，加强军政合一的抗战体制，以贺龙为司令，续范亭为副司令，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组成晋西北军区。该军区将全西北地区划分为四个辖区，分别设置军分区司令部。

第二军分区(第二行政战区)

司 令 彭绍辉

副 司 令 张希钦

所属部队 独立第二旅、新军暂编第一师

管 辖 县 岢岚、保德、河曲、五寨、神池、朔县。

第三军分区(第三行政战区)

司 令 张宗逊

所属部队 第二〇师、第三五八旅

管 辖 县 阳曲、静乐、岚县、忻县、崞县、宁武。

第四军分区(第四行政战区)

司 令 王尚荣

副司令 雷任民

所属部队 独立第一旅、决死第四纵队

管辖县 方山、临兴、离石。

第八军分区(第八行政战区)

司令 韩钧

副司令 侯俊岩

所属部队 第二决死纵队、工卫队(二〇七旅)

管辖县 文水、交城、汾阳、祁县、太原。

第五军分区(第五行政战区) (1941年3月新设)

司令 郭红

所属部队 第六团、警备六团、第三大队

管辖县 怀仁、右玉、平鲁、朔县(北部)。

(十) 鲁南军区

军区司令 张光冲

副司令 李荆山

管辖县 沂州、郯城、费县、泗水、曲阜、峄县、滕县、邹县、宁阳。

(十一) 淮海军区

军区司令 覃健

参谋长 张克辛

政委 金明

管辖县 赣榆、海东、沐阳、宿迁、泗阳、淮阴、涟水、灌云。

(十二) 鲁北军区(冀鲁军区)

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邢仁甫，原盘踞于乐陵、德平一带。今春改编为第六旅，建立了鲁北军区。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方面军第二课，在6月下旬对共军的战斗力、今后的意图以及国共关系等，做了如下的观察。据此，可以看出方面军的调查研究工作，比过去有了相当的进步。

注：本资料为中原会战结束后，立即进行的对敌军的全面观察。
选自7月16日召开的总军情报会议文件。

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

关于共军的军事实力，必须将其正规军、游击队和潜在于人民群众阶层内的敌性武装力量一起加以计算。因其本身战斗力低劣，即使是正规军，也超不出土匪的战斗力水平。在评价共军战斗力时，往往与其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和党的政治工作力量混为一谈，被其巧妙的游击战所迷惑，因而常有评价过高的倾向。

一、抗日意志及斗志

抗日，为共产党现阶段的中心思想。由于党的政治工作，抗日意志一般高昂。但一般群众、士兵的思想基础薄弱。因此，与其说是相信党的宣传，不如说是有“恐日”的倾向。

关于党员人数，据推测，在正规军中约占官兵的30%至50%，在地方自卫团中约占1%左右。其抗日意志坚强，成为核心力量。

在战斗意志方面，由于领导采取保存实力的方针和一般官兵恐日倾向的影响，逐渐消极和回避战斗的倾向显著。

二、人的素质

（一）干部的素质

在部队干部中，虽然尚有所谓红军时代的较长党龄和军龄的人，但大多担任所属部队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则以事变后参

加共军的知识分子占多数。由于这部分干部多属事变后仓促扩军中大量补充进来的，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在军事方面比不上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他们一般多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的干部概由有战斗经验的人充当。

（二）士兵的素质

士兵的素质，低于干部。特别是从去年春季以来的扩军工作来看，素质明显降低。（各种统计表格，笔者略。以下各项同）

从一些统计来看，士兵大部是在1939年以后补充的。由此不但可以看出共军积极扩军的意图，也可看出所谓“老八路”的比率降低了。

（三）关于训练情况

共军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极其重视。自从扩军以来，将教育机关由陕西省推进到前线，开设抗日大学分校七处，并在各师、旅、团，分别成立干部训练班、教导队、随军学校和流动训练班等教育机关，在所盘据的地区努力提高干部的素质。

从一些统计来看，全体干部中约有半数在上述军事教育机关受过正式训练，其中绝大部分充任政治指导员。

当前共军正以整训和收粮工作为重点，力图提高干部的素质。

对士兵的教育，虽以精神教育为主，但根据俘虏谈话、缴获的文件和侦察情报等推測，其进展迟缓，效果不大。

三、装备情况

野战军（指正规军及准正规军）一旅的编制定员约一万人，其装备为：

步枪 5,500支

手枪 750支

轻机枪 150挺

重机枪 24挺

迫击炮 16门

以上虽为预定标准，但兵员仅约半数，装备最高也只有半数左右。唯正规军则更少，士兵不超过3,000名，步枪不超过1,500支左右。

根据一些统计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其士兵及装备，均以去年夏季百团大战以前为顶点，以后逐渐递减。其军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单靠动员根据地民众进行补充，其扩军工作看来似已达极限。

四、扩军工作与民众武装力量

其军为了使游击队正规化而进行的第一期扩军工作，已于今年一、二月间基本结束。除新四军的大规模扩军外，华北各部队一律改为旅的编制（在晋察冀边区，仍沿用支队制）。然而，其扩军工作不仅远未达到计划要求，而且看来已很难再有进展。由本年初开始的扩军工作，据我军的观察，主要是动员民众武装的活动。

据我方的观测：其原因固然是共产党武装群众教条式理论的实践，另外也有以下的客观需要。

1. 兵器、弹药供应困难。
2. 脱产的专业部队与其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大致已达饱和点。
3. 由于我方政治力量的渗透，尤其是建立并加强了农村自卫力量，因此，使匪区感到有必要武装民众和组织民众。
4. 为了调剂匪区劳动力减少和工业建设之间的关系，农村劳动力已达不能再减的地步。

其军正在进行的群众武装运动，不单纯是武装民众，而且具有以此运动为中心进行组织民众的特点。就是说，要在有百分之

一到百分之五的党员和先进抗日分子的领导下，使之做为军的助手，灵活运用。但是，这一武装力量，仅占自卫队员的5%~10%左右，所以战斗力极为软弱。

总之，共军本身的战斗力，依然异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然而做为我治安肃正的对象，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五、关于共军意图的推测

共军目下正专心致力于扩军、整训，保存和培养其实力。从其实力来看，暂时不会进行冒险性的大规模进攻，但以收粮工作和掌握民心为目的的小规模的活动，却将逐渐活跃起来。

(一) 共军的扩军工作，从全局来看，没有显示出大的进展。即从缴获的文件等加以观察，兵员、装备与去年8月间的最高点相比，也有减少。特别由于去年我军对敌根据地的歼灭作战及后方供应困难，匪区地带人力物力资源缺乏，扩军工作陷于停滞。

由于士兵的素质低下，急需加紧训练。对此，山东、冀中方面，已在着手整训。

(二) 共军目下正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专心致力于保存和加强实力的工作，极力避免无胜利把握的战斗和无益的消耗。因此，据我军观察，共军不会单纯为了协助中央军，或只为取得宣传效果，而轻易冒险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今后可能在不致损耗兵力的范围内，采取继续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以掌握民心的方策。

(三) 由于匪区地带内的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不足，筹集粮食的工作将日趋活跃，而且当前已进入便于开展游击战的青纱帐期，

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敌人的蠢动将逐渐活跃起来。

六、对国共关系的观察

国共关系，由于目前正处于国际形势的急剧转变时期，双方均未表明态度。从中央到地方，双方关系处于停顿状态。今后如何发展变化，一时尚难预测。但据我方观察，由于中共方面的让步，上层领导之间的对立，可望进入暂时平稳状态，大致或可维持现状。

(一)关于重庆方面对共政策的预测

德苏开战，轴心国方面的负担增加。料想将会引起日本国际关系的恶化。由于苏联回到反轴心阵营，可以断定与重庆间的外交关系必将好转，重庆对抗战前途亦可稍形乐观。但苏联参战的结果，其对华援助的比重势将有所减少，同时苏联通通过共产党对重庆的牵制，也将日趋困难。因此，趁此时机，重庆有可能要确立对中共的政治领导权，以便统一国内体制，进而逐步加强对中共的镇压。

然而根据我军预测，为了牵制皇军留在满洲，重庆仍将谋求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而且出于抗战的需要，极力避免国内相争的方针亦将不变。因此，主要将采取政治手段对中共进行镇压。

(二)中共持久战的方针，不仅不会变化，而且由于德苏开战，更有必要坚持这一方针。一向以苏联实力为背景的中共，今后其对重庆的牵制，亦将不能取得较大成果。因此，中共将在表面上向重庆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但对重庆的抗战方针，则仍将进行鞭策。

当然，如果事态发展到要取消陕甘宁边区，或是重庆方面要以武力置中共于死地那样情况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从当前来看，重庆政府尚无断然采取如此强硬政策的决心。

根据上述国共关系今后的发展，虽然预想到重庆方面将会采取对共强硬的政策，但亦不会超出以政治手段确立领导权的范围。而中共则有鉴于周围形势，表面上有所让步，仍将支持重庆抗战。据此，可以料想，上层领导间的对立，将进入暂时平稳的状况。但基层方面，国、共的对立，除上述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重要因素外，还有很多直接关系到死活的问题。因此，根据我方的观测，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不过在上层领导妥协方针的影响下，不致有大的发展，将维持时松时紧的状况。

剿共工作的参考

据《剿共指南》一书摘要如下：

中共计划的减轻民众负担政策

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其主要措施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统一累进税等三项。如将其政治意义及工作步骤加以剖析，既可做为我灭共工作的参考，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农民历史的痛苦。

一、减租减息

中共抗战四年，坚持实行了“二五减租、一分利”（从原租额中减去25%，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并宣称这一政策对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减租减息的第一阶段，对地主、资本家，由各地总动员委员会进行说服教育。在第二阶段由救国会主持协商，采取根据申诉进行调解的形式。而在现在的第三阶段，则普及推广1940年2月及1941年3月20日所公布的条例。

此项条例，以不改变历来的土地关系及借贷关系为前提，在

当前战争阶段，基本上不是解决土地问题，而是在调整农村阶级关系、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宗旨下，寻求适合于当前实践要求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笼络了占华北农民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使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自然降低，因而它含有阶级斗争性质，可以巧妙地在无形之中达到其目的。

二、合理负担

中共沿袭阎锡山的总合税法，并加以发展，制订了合理负担制。但未形成所有地区的统一制度，对群众的负担也未必合理。其大要为：（一）全县的负担由边区决定，村的分摊金额由县决定，各户负担标准的等级由村公所决定，不准其它机关、个人介入。（二）将各村划分为一等村到十一等村，按等级决定分担。村内各户分为二十等级（以财产和收入状况为标准），按等级计算分担比例。总之，这种合理税制具有阶级性的累进税和统一税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与过去有明显的区别。

以山西省和顺县第四区三奇村为例，在全村183户中，富户21户，一般民户96户，免除负担并受救济者66户。合理负担的比例是，占全村户数11%的富户，担负全村粮秣的80.7%，款额的63.9%。而占88%的中、贫农则以极轻的负担享受全部利益。此种情况说明，农村旧的支配阶层的地位将逐步被消灭，一般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样一来，虽然由于支配阶层逃往城市、物资不足等原因使民众的负担过重，但可以看出，以中、贫农为基础争取民众的工作，大体上有了进展。

三、统一累进税

中共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底公布了统一累进税实施办法，并于1941年7、8月间开始逐步实行。其理由可以说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需要。

（一）由于合理负担不健全，税收机关不统一，税种繁多，人

民的负担过重和征税的无计划性等原因，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紊乱。因此，将多达20余种项目的捐税加以综合，以便征税机关在征税标准、单位、计算、次数等方面实现全边区的统一。

(二)由于合理负担制的缺陷，挫伤抗战经济力的发展，形成统一战线的障碍。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和增加边区收入，于是计划扩大和加强抗日根据地。主要在于实行更加彻底的阶级课税，促进反对封建旧习，改变历来的分散状况，统一全边区的税收工作。这对加强抗日的政治力量和民众的组织力量，具有改革的意义。

针对以上情况，在灭共政策上必须加以考虑的现阶段的特点是：

(一)统一累进税，是比合理负担前进一步的税制，这证明做为抗日推动力量的中贫农组织，有了质的变化。

(二)行政的支配力量，彻底统一了计划，实现了抗日民众团体间紧密的有机的合作体制。

(三)随着以贫农为中心的人民代表机关的健全，扩大了基层组织大众的发言权。如维持历来的合理负担不变，则将不利动员民众的工作。

所谓统一累进税，是由历来无计划的任意分摊方式，改变为根据周密调查，明确“标准亩”“富力”的统一计算单位，以及免税点和累进率的统一规定等，几乎是机械地实现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的方针。然而根据现在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条件，以及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关系，究竟能实现到何程度，尚属疑问。

以上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改革的过程，反映着中共本身的边区行政力量的发展，各种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健全，反封建斗争的前进，以及民主革命在向质的进展等重大事实，对此，必须加以注视。同时，税制是培养敌抗战力量的财政基础，也是敌以减轻

负担为诱饵，争取民众的策略，因此，必须重视并掌握其真实情况。

对游击战

本稿摘自原冀中某游击大队长对日军讨伐行动的思想。

应将扫荡战改为歼灭战

八路军游击队不仅与党、政、军、民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因此，扫荡示威进行恫吓，对他们并不能起到挫折、瓦解的作用。为了消灭他们的实力，应制订并实施以小部队的游击战一举加以歼灭的计划。

战斗准备的必要事项

一、收集情报及灵敏的行动

第一线的各据点，应构成精密的情报网，从事收集有关一切动向的情报。轻装出动，每人必须自带食粮及联络用具，尽量利用骡马，避免使用车辆。

二、炮兵及重火器会暴露企图，应控制使用。掷弹筒、轻机枪，效果较大。

战斗中的注意事项

一、情况万一陷于不利，避免无谓的消耗，速战速决，速进速退，是游击战的一贯战术。

二、增援部队，不宜过早参加战斗，应查明四周情况，力求不失良机。

三、爱护俘虏，给予安慰和优待，尽力使之投降。

敌政权机关是歼灭战的主要目标

政权机关是支配游击地区的居民和支援游击队的根本。因此，消灭政权机关远较消灭游击队的效果为大。据此，应认清歼灭的目标是各个政权，对此不可轻视。

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争取民众

一、应施行针对民众现实要求的战时行政，不断为改善民众生活，加强组织民众而努力。

二、在各行政机关中附设政治宣传队。各部队在战场配置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政治工作人员。

三、各县训练农村的优秀分子，使其担当该村的地下工作，收集有关民众动态的一切情报。

四、各级行政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应不断报告有关当地一般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供上级机关做为施政的参考。

五、与日军共同参加作战的中国警备队，应严格加强纪律，并消灭各级行政机关的不正行为。

对农村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

本稿选自某宪兵分队多次侦察的经验报告。

一、组成以检举为目的的特别班，事前进行教育。

二、捕获和利用敌方密探。

对党组织的侦察工作，应捕捉其组织内的分子。但是，最下级的党员和脱党分子利用价值很小。

捕获方法：（一）利用外围团体成员，逐步引诱或绑架其主任级人员。（二）由俘虏中查出党员。（三）逮捕来自敌区的联络员。（四）利用敌方合作人员。（五）利用有党员嫌疑的家属。

（六）逮捕后不强迫招认，要加以爱护，消除其恐怖感，使其主动招供。（七）引诱或绑架时，应在居住村外执行，不使村民察觉。

在使用时：

（一）注意要善于理解被反利用者的立场和心理。例如：在甲村逮捕者，如在甲村使用，有使其暴露汉奸身份的危险。

(二) 在使用范围上勿犯错误。即：必须注意勿使任务过大。
(三) 布置反利用工作，与其通过翻译，倒不如直接将意图充分告知被反利用者。用此方法，效果良好。

三、对村的侦察法

村是党组织的工作单位和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接触对象。通晓农村，是了解农村组织实际情况的第一步，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该村出身的领导机关的人事关系。对一村进行侦察时，应注意的事项是：(一) 中心村的组织强、党员多。在与县委和外村干部有往来的村，一般要有两名联络员。一名接待日军，另一名负责与外村联系，通知他们日军来村的情况。如果将他逮捕，即可了解其领导者——书记的情况。(三) 外围团体的成员，不了解横的组织关系，可利用他进行引诱或绑架其它嫌疑分子的工作。

(四) 通过向农民了解对统一累进税的感想，可以获悉当时有关人员的情况。(五) 小组人员中，无土地的人居多数。他们白天在田地装作佃户，监视农村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四、扩大侦察网

所谓扩大侦察网，是指由一村顺序向它村发展，直到能在一区进行一齐检举的程度而言。对于这种侦察网的扩大工作，应查明村和村的组织工作交流情况。为了交流工作，书记、宣传员、组织人员等须出席参加他村的会议和干部会。因此，我侦察目标应针对他们。此时，应使被反利用人员捕获他村的侦探人员。

五、确定检举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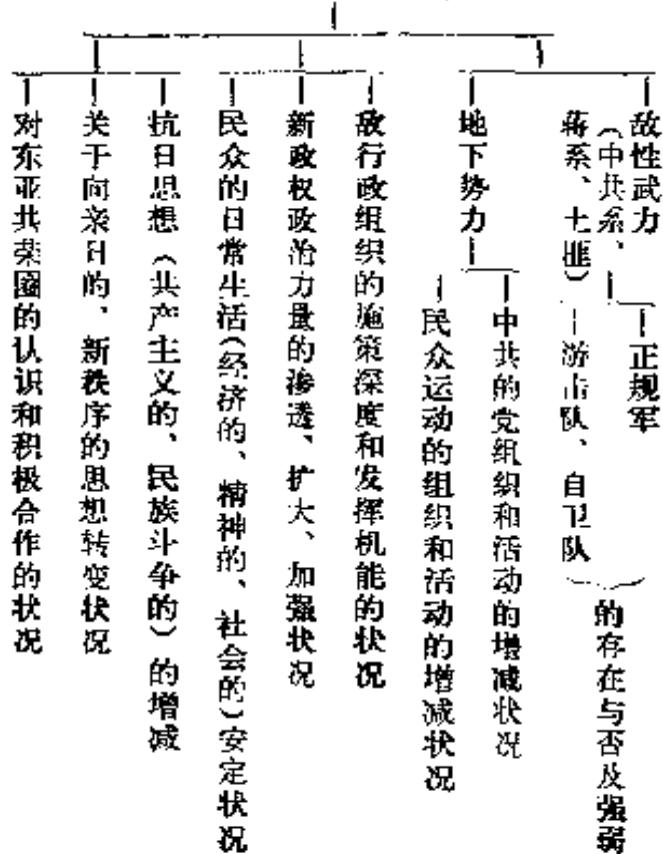
虽依情况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侦探率在 60% 以下进行检举。即使是对党组织已了解清楚，但对外围团体，特别是对其干部一级尚未侦察清楚时，进行检举也是危险的，并且将降低效果。

华北治安的实质

治安问题决不是仅仅依据一时的、表面的、局部的现象就能判断的。当然，不论在面上或深度上都必须经过长期的、慎重的研究才能确定。但当时对此认识不足，因此，在“剿共指南”中多次指出。兹摘录其“华北治安的本质”中的一节如下：

下表为判定我方占领地区及威力渗透地区内治安状况的尺度，敌性地域不在此限。即在上述地区内，由于城市和农村以及地方的特殊性等，也各有不同。同时在判定我政治力的深度时，对敌人工作的渗透程度也应加以考虑，不可满足于统计数字增减而忽略其实质。

治安的实质



四 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华北方面军认为，必须深刻理解治安战的本质，特别是共产势力的实际情况，并认清我占领地区及其周围的治安状况，对之采取相应措施方可取得实效。为此，进行了上述各项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原会战一经结束，参谋部内部负责人员之间立即进行了彻底的讨论，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我军、政、民组织的一元化，在长期计划下采取牢靠措施”的方针，逐步谋求各项对策的系统化。

关于在此期间的情况，当时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本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叙述如下：

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的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 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 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发挥多元的、综合 措施。

然而，异民族的日军是否能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

占领地区三种治安状况的标准表

地区别	治 安 地 区	准 治 安 地 区	未 治 安 地 区
军事	<p>一、治安确立，仅依靠中国警备力量即可确保安定的地区</p> <p>二、新政权的措施大破浸透、各项建设措施有进展者</p> <p>三、民心大致安定，对中方的措施合作者</p>	<p>一、军事方面的治安大致安定，被我势力其它方面尚不安定的地区</p> <p>二、新政权的措施，由于日军的经常驻在，才能实现</p> <p>三、敌方的游击行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属活跃</p>	<p>一、作战讨伐时暂时的消灭了敌人势力，但作战完了后，又成为敌人的根据地，平常为由敌人占据的所谓敌地区</p> <p>二、新政权的措施几乎没有渗透</p>
作战	<p>一、分队以下的行动自由</p> <p>二、仅以中方而的警备力，即可维持治安</p>	<p>一、大致需要常驻中队的兵力，小队以下行动不安全</p> <p>二、中国方面的武装力量不能单独确保治安</p>	<p>一、大致使用大队以上的兵力，有继续组织作战讨伐的必要</p> <p>二、中队以下的长期行动危险</p>
讨伐			
军事	<p>一、除对交通线小规模的袭扰外，几乎没有破坏行动</p> <p>二、铁路由“华北交通公社”自身体任警备</p>	<p>一、对交通、通信线的破坏频繁</p> <p>二、对日军的小警备地点袭击频繁</p>	<p>一、对交通、通信线的破坏频繁</p> <p>二、对日军的小警备地点袭击频繁</p>
袭击			
破坏			
行政	<p>一、主要县城、城镇、乡村到处设有行政机关</p> <p>二、大致遵守法令</p>	<p>一、虽已设置，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p> <p>二、在无威力下无法行他法令</p>	<p>不能设置</p>
政治			
机关			

综合的意义

学校	布置了学校逐渐普及 新民教育。	学校有名无实，甚至有的在闹变 同上
	为敌人的学校。	
物资取得 纳税	一、不用武力即可取得物 资	一、在武力支持下可能取得 物资
	二、纳税率 $2/3$ 以上	二、纳税率 $1/2$
经济 其它建设关系	一、交通通信邮政业务大 致正常	一、军用以外的交通通信机 能停止
	二、各种建设正在进展	二、建设措施尚未实施
群众组织 社会	新民会组织 普及各处	组织几乎未能普及 不可靠组织
	文化思想 情况复杂	表面亲日反共，但内在情 敌方宣传工作人员的活动等 活跃
参考		本表的标准系根据一九四一年七月华北方面军所发表的见解及有关人 员的回忆整理制成

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给予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浸透，日军只宜做其后盾。

第四课（政务）参谋则认为：保存灰色部队恰如豢养暴力团体，受其危害的是民众。其一切非法行为，将全部转嫁于日军。且有向中共通风及被蚕食之虞。因此，不应采取此等姑息方针，而应发扬王道主义，培养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与军事措施相配合，向建设“明朗华北”的大道前进。

第一课（作战）参谋的主张：不反对招抚优秀的武装团体，而培养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也属必要。但是，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当前共军正处于建军过程之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在这一方针上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方面军经过以上研究，决定从新的观点出发，为首先查明华北占领地区的治安实际情况，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将各自负责地区划分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并要求对其状况提出报告。

“治安地区”即我方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势力均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地区”指敌方势力范围的地区。（参看412页附表）。

参谋部第四课由行政方面进行了治安状况的调查，1941年6月末，华北县政控制状况如下表内容所示。

一九四一年六月末

县政控制情况表

省 别	总 县 数	恢 复 县 数		未恢 复 县 数	县政控制比率		示范地区县政控制比率	
		县公署 治维会	计 数		联络村	保甲村	纳税村	平均
河北省	一三〇	一二八	一	二九	一	78%	76%	74%
山东省	一〇五	一〇二	〇	一〇二	三	69%	55%	68%
山西省	九二	六六	九	七五	一七	64%	27%	59%
河南省	四四	四一	〇	四一	三	70%	72%	69%
苏北地区	一七	六	一	一七	〇	58%	40%	43%
淮南地区	一〇	四	〇	四	六	45%	25%	22%
计	三九八	三五七	十一	三六八	三〇	72%	61%	69%
						88%	85%	84%
						91%	79%	84%
						79%	63%	68%
						53%	59%	56%
						70%	72%	69%
						90%	90%	80%
						80%	80%	80%
						79%	79%	74%
						60%	60%	60%
						74%	74%	70%
						90%	90%	87%
						71%	71%	71%
						74%	74%	74%

备注：一、本表不包括未占领地区。二、由于山东省的联络、保甲、纳税村，山西省的保甲、纳税村，河南的保甲村的恢复率的部分材料尚未到达，故仅按有报告的县计算。

据此看来，山西省、苏北及淮南地区的县政控制情况虽较其它各省进展迟缓，但其示范地区有所进展。河北省，不仅特定地区，即全省县政普遍有所开展。

此次调查的特点是从县村的联络组织、村的保甲组织及纳税状况进行观察的。华北控制的县，平均比率虽达69%，但即使县行政机关比较完备，对其基层的控制仍极困难。华北约有30%的地区仍然为我行政威力不能达到的地方。

恢复县政的县数为368县，这是根据1940年度末，398县中的344县（86%）恢复了县政。与以前相比，治安状况有所提高，约有90%的县行政机关恢复设置。

方面军依照前载“治安状态的标准表”加以综合判断，截至1941年7月，日军与共军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

方面军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订关于肃正建设的长期计划。即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中国方面的行政及警备机关，日军则主要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敌方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为此，必须将各项措施全面系统地加以推进。但这毕竟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因此，拟订了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稍有放松的扩大华北治安区的三年长期计划。

在三年计划中逐年应达到的目标如下：

三年计划达到的目标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1941年7月	10%	60%	30%
1941年（第一年度）	20%	50%	30%
1942年（第二年度）	40%	40%	20%
1943年（第三年度）	70%	20%	10%

注：1. 未治安地区，由第二年度开始使其缩小。

2. 第三年度使其加速进展，达到满洲国的治安状况。
3. 现有兵力不减少。

按照治安状况划分的各地区的施策大纲如下：

一、在治安地区，直至县城、乡村，均设有华北政权行政机关，使之遵守法令，且有中国方面警备力量承担治安的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而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应推进文化的、经济的施策，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使中国方面积极的活动，以促进亲日反共形势的发展。

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三、“未治安地区”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断对之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使中共方面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该地区向“准

治安地区”发展。

这样地划分地区，限定时间，以扩大、巩固治安地区，不断采取主动进攻并且有计划的综合性措施，就是本计划的目标。

岛贯武治大佐对此做了如下的叙述：

历来的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剿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我军施策的目标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就是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发展。

最终目标在于把一亿民众拉到我方。为此，必须争取民心。民众向哪一方面靠拢，关键在于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换言之，亦即决定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治安的巩固，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安定的程度。因此，必须促进中国方面主动积极地工作，采取符合上述目标的各种措施，综合地、系统地加以施行。

由于是与一亿民众建立新的组织，不论投入多大兵力也不可能在短期间内著有成效。因此，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希望以三年计划，稳步取得成果。

方面军在这一期间对共政策的探讨，最主要的就是上述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岛贯武治大佐更举出以下各项加以说明。

一、隔离线的构成

古时候中国的城市用城墙围绕起来做为民众对敌人入侵的防护措施。在中国本土和满洲、蒙古之间建筑了万里长城。这对外敌人侵究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当别论，但它是保护中国本土及民众的象征。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在我保护下的民众用这样的隔离线围绕起来，划出界限加以防护，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维护铁路交通也具有成效。在京汉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以与共军根据地相隔绝，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

总之，适应对共作战的主要特点，而采取争取民众、组织民众的措施，是受到了重视的。

二、新民会的思想战

方面军扩充了新民会做为建立反共势力的精神依据。为了动员民众对共作战，根本问题在于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策划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

三、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及自卫组织与日方的合作

为建成与加强中国方面的武装和自卫力量，最后使之成为对共作战的主力，采取了各项必要措施。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进和扩大

治安肃正的成果，虽然依靠军事力量的肃正作战及与之

紧密配合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得以扩大，但只有获得当地居民的热烈支持，才能巩固所取得的成果。

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预定的计划，决定由7月7日开始，以两个月时间，开展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王揖唐委员长指出运动的方针为：“剿灭成为新生华北唯一祸患的中共及其武装团体，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而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做为工作的重点。他号召“华北民众在运动中，排除万难，予垂死之敌以最后的打击。”

运动开始后，王揖唐委员长和齐燮元治安总署督办，以及各省长、道尹、县长等分赴各该管辖地区进行巡视和鼓励，或身临前线指挥讨伐，或领导加强自卫组织，建设治安道路等，在华北展开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部分地区，由于斗争的激烈，甚至在日、中民间也出现了不少的牺牲者。

9月8日，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这次运动不仅在巩固和改善治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同时也培植了华北中国方面官民反共自卫的意识，为今后更加活跃地开展实践运动打下了基础。

特别是以农村民众自卫武装为核心的治安力量的发展，给敌方以极大威胁。根据当时情报，冀中区第八分区司令常德善针对上述情况特发出如下指令。

一、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由点、线地区逐渐加强，不断对共军中心地带采取包围进攻的形势。因此，我军应与游击队密切配合，一面袭击扰乱点、线上的日军，一面防止其外窜，加强警戒，日军出击。

二、加强人民武装，安定人民生活，掩护农民耕作，以粉碎日军的治安强化工作。

三、开展广泛的民众武装斗争，一面掀起参军热潮，一面不分男、女、老、少实施军事训练，并在学习军事技术的同时，研究敌方的技术。

另外，在晋察冀边区第一专区贸易局的“资金贷款工作总结”中指出，“7月以来，对阳曲、定襄、代县、忻县、寿县、盂县等准备贷款总数50万元，但由于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贷款总数减少了一半”。又在该局发行的题为“新形势下贸易工作的方针”小册子中，也有如下的叙述：“7月下旬对各县的贷款、放款工作，由于敌人扫荡作战以及治安强化运动，受到极大的妨害”。

华北防共委员会的建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策划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为了在组织机构上也集中全力从事反共斗争，于1941年4月8日公布了华北防共委员会的组织大纲（由16条组成）。8月24日该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典礼，任命了委员，积极开始活动。

该委员会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直属机关，联合华北一切反共力量，以加强剿共工作。这是根据日、满、华共同宣言的精神所制订的彻底消灭赤祸的永久性对策。该委员会虽为剿共工作的策划和决议机关，其决议事项须送政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命令施行。但在采取紧急对策时，委员长得权宜处理，事后再行报告。该委员会为中央机关，根据需要除在各省、各特别市设立分会外，并可设置其它必要机关。

委员长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委员由政委会委

员、各总署督办、政务、秘书两厅长、新民会正副会长以及由社会上有名望人士充任。另设包括日方人士在内的顾问、专门委员若干名。

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治安强化运动及其防共活动，岛贯武治大佐谈了以下的感想：

“政府官员亲临第一线指挥运动，培植了中国方面官民热烈的自卫反共意识，促进了基层的积极实践运动。特别是以农村民众的自卫武装为核心，发展了治安力量，对中共方面威胁极大”。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本作战的冀西地区是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处于南北约300公里、东西100公里险峻的北部太行山脉地区。该地区的共军约四万多人，在其领导下的民众，均受过充分的组织训练，其战斗力不容轻视。

方面军为了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以主力参加此次作战，采取了彻底的封锁和消灭共军及其根据地的行动。同时，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

方面军的作战计划

方面军于7月9日，根据年度计划，下达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肃正作战命令。命令中，对作战计划、宣传报道计划和收集情报计划，做了秘密指示。在本地区，虽为方面军继1939年秋及1940年秋之后，再次进行的肃正作战，但每次皆

因情况变化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作战。这次编入的年度计划，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

华北方面军命令 7月9日北京

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它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事务处理者 多田 骏

(笔者注：多田司令官7月7日晋升大将，并收到了转任军事参议官的命令)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

第一 方针

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

第二 指导要领

一、进攻兵团及包围敌区的各兵团（以下称封锁兵团）相互协助，务使充分发挥作战效果。

二、作战一开始，进攻兵团的主力应尽快进入定县及石门附近之后，努力消灭盘踞安国东方及束鹿方面直至滹沱河沿岸之敌。最低限度亦应一面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一面反转回头继续向敌区进攻。

三、进攻兵团之一部，应迅速将兵力由北京附近向良乡、高碑店间推进，配合主力进攻敌区。

四、进攻时，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特别应做到机动迅速，

在敌人化装成便衣以前，努力将其捕获。

五、击溃敌集体战斗力后，暂在敌区要地驻兵，并以之做为据点，急袭、抓捕潜伏山内及流动的敌匪，或追踪予以消灭，或烧毁、搬走敌人的设施资材等，以削弱敌人势力。

在此期间，特别应以果断、积极的行动使敌无时无地得以存身。我可根据情况，抽调兵力集中使用。

六、封锁兵团，在作战期间应紧密联系，加强封锁，防敌脱逃。为此，根据需要，除将一部分兵力向封锁线附近推进外，并加强封锁的设施。

根据情况抽出一部兵力，加强进攻兵团的战斗力，并使一部分兵力越过封锁第一线，向敌区挺进。

七、作战时，力求捕获敌军党的首脑，破坏党组织的中枢，使其组织力量陷于混乱。

八、应使敌区的民众认清此次作战的真意，并使良民和共产党分离。特别是将其优秀分子送至后方，进行宣抚，尽量使之为我所用。

九、为了达到以上两项目的，除对进攻兵团配备必要的宪兵外，应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政治工作。

十、作战结束后，进攻兵团虽各返原建制，但由于对敌区继续进行封锁，应尽量将封锁第一线向前推进，以扩大作战成果。

十一、作战确定由8月x日前后开始，大致期间为两个月，分三期进行。

第三 军队分派

进攻兵团，全部由方面军直辖。

军队分派如下。转移指挥，另下命令。

甲兵团 兵团长 第二十一师团步兵团长（盘井虎二郎少将）

第二十一师团步兵一联队

第一军步兵一个大队

(笔者注：此外炮兵、工兵、通信队、

野战医院等细节从略)

乙兵团 兵团长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井田美武少将）

步兵第一三三旅团

(笔者注：此外由第一、第十二、驻蒙

军及由第二十七、第三十五、第一一〇

师团的各种配属部队细节从略)

丙兵团 兵团长 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

第三十三师团主力

(笔者注：此外由第一、第十二军的配属

部队细节从略)

电信第五联队（细节笔者略）

预备队

第一军的步兵三大队

第十一装甲列车队主力

除以上外，对封锁兵团配属通信部队。

(笔者注：封锁兵团为第一军、驻蒙军、第二十一师团 主力及第一一〇师团，其细节略去)

第四 各兵团的行动

其一 作战准备期

一、各进攻兵团的作战准备工作，尽量隔地分别进行，努力取得突然袭击的成果。

二、作战准备期间，应加强山地训练，对困难地形以及夜间活动，应特别熟习。

三、进攻兵团大致截至8月初旬，按以下规定集结，继续进

行作战准备。

甲兵团 北京附近

乙兵团 石门附近

丙兵团 太原附近

关于预备队的石门集结，另下命令。

四、担任捕掳敌方干部、收集物资、进行宣传、修筑公路及政治工作等的特设部队，须预先进行训练。

五、封锁兵团按照方面军作命甲第334号，1941年经济封锁要领，根据需要加强措施，严防敌人脱逃。

其二 第一期作战

第一期作战，按照方面军的规定，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预定自作战开始后约两个星期。

一、封锁兵团，随着作战的开始，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

根据情况，第一军、驻蒙军，可使其一部越过封锁线向敌区挺进。特别是第一一〇师团，在滹沱河河畔进行作战时，应协助乙、丙兵团阻止敌向南、北、南方逃窜，并协助做好收集情报工作。

二、甲兵团于 $\alpha+2$ 日前进入良乡、高碑店以后，西向进攻敌区，击溃敌之集体战斗力。特别应迅速占据易县～涞源道路，以切断敌之南北交通。

三、乙兵团于 $\alpha-3$ 日，以一部由京汉沿线出发，迅速进入安平、深县一线，以阻止滹沱河畔之敌东逃，并以主力于 α 日由定县附近进入安国附近，由该地东方向南方与丙兵团的进攻相配合，努力歼灭敌人，最低限度亦须将敌向西方山地内压缩。

另以其一部于 α 日以前部署于望都附近，准备日后迅速进攻。

四、丙兵团，于 α 日以主力进入石门附近，继由束鹿方面向北

与乙兵团相配合，努力歼灭敌人，最低限度亦须将敌向西方山地内压缩。

另以其一部于 x 日前，分别部署于微水镇及井陉的北方地区，准备日后的迅速进攻。

五、乙丙兵团，继滹沱河河畔作战之后，向西进攻敌区，击溃敌集体战斗力。

六、进攻兵团的作战地界规定如下：

甲兵团、乙兵团间

定县—村雨山（西30公里）—明星山（西南9公里）—七海山（西北偏西14公里）—羽衣山（西12公里）—一天女山（西8公里）—涞源

乙兵团、丙兵团间

定县—西板村（西北8公里）—占里（西北12公里）—灵山镇（西北14公里）—辛义村（西北8公里）—棒山（西北偏西17公里）—六甲山（西北偏西18公里）—才义山（西北16公里）—南禅房（西北9公里）—大营镇

其三 第二期作战

第二期作战，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预定继第一期之后约七个星期。

一、封锁兵团，与第一期作战相同。

二、进攻兵团，在各作战区内的要地，分驻必要的兵力，并以此为据点，急袭、搜捕潜伏和游动于山地内的敌匪，或追踪歼灭，或剥抉剥灭化装便衣的敌人，或烧毁搬出敌之设施资材等，尽力摧毁敌人的战斗力。

在此期间，应以果断、积极的行动，使敌人无时无地得以存身。

三、根据情况，进攻兵团得相互调用兵力，以增加某方面的战斗力，或打破作战地界，使一部兵力向另一方面进驻。

四、在此作战期间，尽量避免战术形式的固定化，不断修正改进，力求做到出其不意。

五、有效地利用碉堡，使之能以敏捷机动兵力，防止发生意外损害。

六、作战地界另行规定。

第五 兵站、交通、通信。

一、封锁兵团，应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并给以援助。负责供应的兵团如下。

第二十一师团 甲兵团

第一一〇师团 乙兵团

丙兵团（在第一军作战地区内行动者
除外）

第一军 丙兵团（在第一军作战地区内行动）

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团、第一一〇师团以外的封锁兵团应支援在原作战地区行动的进攻兵团的供应。

二、第二十一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在北京—石门间京汉路沿线地区设置必要的供应点。随着作战的进展，应各自对所承担兵团的供应工作做到畅通无阻，按其给养兵额，输送积存大约三个月的军需物资。

第一军在东冶镇附近积聚必要的军需物资。准备时须特别保密。

三、进攻兵团，应由供应点将军需物资自行运往前方。但根据情况，也可由担任供应兵团运送之。

四、进攻兵团的人马、什物向后方运送工作，由担任供应的兵团承担。

五、努力做好征集现地物资，以及对遗弃、缴获物资的收集、后运及其利用等工作。

六、由进攻兵团的集结地点到发动作战地点的铁路输送工作，应在行动开始前以最短时间完成，并应注意保密。

七、为了适应作战期间兵力的转调，在京汉路沿线须准备必要的铁路材料。

八、易县——涞源道路修筑未完成的区域，力求结合此次作战予以完成。

九、各进攻兵团，应尽力修筑为供应、运输物资、联络等所需道路。

十~十三、（有关通信事项一笔者略）

第六 宣传、政治工作

按另外规定进行。

第七 作战后的处理

一、作战终了后，进攻部队应依次向以下地点集结，根据另外的命令返回原建制。

甲兵团 保定附近

乙兵团 石门附近

丙兵团 太原附近

二、封锁兵团为了扩大战果，应加强对敌区的封锁，尽量向封锁第一线推进。

三、作战结束后，仍需根据情况进行反复的作战，为扩大战果而努力。根据需要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宣传报道计划

7月16日

第一 方针

一、宣传报道工作，应使民众深刻理解华北共军为日中的共

同敌人，使之看清我军不将共军驱出华北决不罢休的决心和实力，并认清只有结合作战努力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工作，才能完全达到剿共目的的道理，促使日中民众协助上述各项工作。

二、应使民众周知，晋察冀边区共军的存在实为华北治安的最大隐患。肃清该共军，不但对边区民众，即对华北全区民众的生活提高，也将做出极大的贡献。

三、对作战地区内居民及共军的宣传，应以达到以下目的为重点。

(一) 使一般外围分子从共军的核心分子中分离出来，以达到使党、军分裂的目的。

(二) 策划共军与一般民众间的离间工作。

(三) 使中共中央对共军盘踞华北感到绝望。

第二 实施要领

宣传报道，应尽量做到根据具体事物，特别是用事实作证明，以取得成效。

一、作战准备期间

(一) 作战准备期间，采取一切手段隐匿我方意图。

(二) 由方面军统一规定随军记者的派遣及配属。

二、作战期间

(一) 报道

1. 方面军主要处理有关作战意义、综合战况等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一线主要报道局部的战况，官兵奋战的状况，特别要报道共产地区的实际情况，例如有关共军暴行、虚伪的政策和民众生活疲惫等情况。

2. 作战开始时禁止报道，待摧毁敌之集体战斗力的目标已经确实，方可解除禁令。具体时间由方面军通报。

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情报收集计划

方针 区分	部队	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华北宪兵团		备 考
		主要应于作战前收集的事项	主要应于作战期间及作战后收集的事项	
在收集肃正讨伐所需资料的同时并为今后确立治安的参考，特别应详细掌握共产势力的实际情况	收 集 要 项	<p>一、边区内共军各师及其它匪团的现驻区(尽量详细)以及其隶属系统、特别是根据地。</p> <p>二、共军、匪、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在。</p> <p>三、边区政府以下行政公署的所在及其主任、组织。</p> <p>四、武器弹药制造所以及仓库、被服、粮秣库、印刷所、金融机关、教育设施的所在。</p> <p>五、地形、交通通信网的状况以及军的组成装备上需要加以考虑的事项</p>	<p>六、共军、匪、各种机关等今后的动向，特别是移动情况。</p> <p>七、共军、匪的战斗力的估计及战术中的特殊事项。</p> <p>八、共方实施的对民众思想、招兵、行政、经济、金融工作(包括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等的真相，以及民众的反映。</p> <p>九、武器、弹药、器材、粮秣等及其原料的供应路线及真相。</p> <p>十、地方资源，特别是煤炭、民众必需物资等的状况。</p> <p>十一、驻军要地的资料。</p>	<p>一、主要俘虏尽量送到各兵团司令部，以便取得情报或在其它方面为我利用。</p> <p>二、努力收集各种文件，其中重要的应按顺序尽速递交方面军司令部。</p> <p>三、应特别注意勿使敌人得知我方收集情报的意图。</p>
希望报告到达的日期		每次尽量迅速送出，综合资料在9月25日以前送出。	现有资料到9月25日送出，其它收到后立即发出。	
报告要领		(笔者略)	(笔者略)	

3. 尽量利用照片。通讯、报道的检查全部由方面军进行。
4. 方面军根据需要，特别是在第一期末，发表战果。

(二) 宣传

1. 方面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对作战地区敌人及敌区居民进行宣传。第一线兵团用自己准备的宣传品及方面军颁发的宣传品，主要对进攻地区的敌人及居民进行宣传，为此，以运用政治工作班为宜。
2. 对进攻地区内的敌方宣传，应全部破坏和涂掉。
3. 对俘虏及强行拉走的居民尽量加以利用。

三、作战结束以后

- (一) 关于作战成果由华北方面军发表公告。
- (二) 第一线兵团尽快报告以下事项：

1. 敌方宣传情况。
2. 对我宣传报道的意见。

作战经过概要

此次作战因受关东军特别演习（关东军由7月上旬开始举行的大规模集中动员的秘密名称，简称为“关特演”）的影响，比方面军年度计划预定的日期推迟了约一个月，8月中旬开始发动。方面军8月初召集了情报主任参谋会议，与此同时，根据早已下达的作战计划，正式开始了作战准备工作。

中原会战结束后，指定参加此次作战的兵团第二十一师团主力向保定地区，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向太原附近分别集结。以后，第二十一师团主力根据作战计划的部队区域划分，接管了改称乙兵团的第一一〇师团的步兵第一三三旅团（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原来负责的警备地区。以改称甲兵

团的第二十一步兵团长盘井虎二郎少将所指挥的步兵第八十三联队为基干的部队，由方面军直辖向北京集结。另外，在作战计划中，改称丙兵团的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开战之前由太原向束鹿（石门东方约75公里）、辛集镇（束鹿西方约10公里）附近移动。

参加作战兵团特别是进攻兵团甲、乙、丙各兵团，在作战准备上应注意事项如下：

- 一、普遍了解共军战术。
- 二、加强通信机关（无线电装备）和厉行情报特别训练。
- 三、增加携带炸药及其它破坏器材。
- 四、方面军发动作战时，特于北京司令部内设战斗指挥所，在石门设情报所。

8月14日开始了第一期作战，作战经过如下。

第一期作战（8月14日～9月4日）

一、第一次作战（8月14日～21日）

1. 对古北口、密云地区作战。

甲兵团于8月14日由北京经铁路运输进入古北口南方地区，扫荡了属于平西军区的共军根据地古北口、密云等地区。在几天的战斗中，与担任该地区警备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以及在古北口附近担任警备的关东军各一部紧密联系，为肃正讨伐做出了努力，但迄未遭遇大敌，只有少数共军巧妙地向热河省内山岳地区逃避。

2. 对冀中南部地区作战

乙兵团、丙兵团，8月14日一齐开始行动。乙兵团由京汉路的定县、新乐附近向东南方，丙兵团由石德路（石门—德州间）

的辛集镇、束鹿附近向北方，两兵团相互呼应，对滹沱河南方地区的共军根据地展开了扫荡战。

继而，乙兵团的水上部队（步兵第一一〇联队长水上源藏大佐指挥的部队），新美部队（步兵第一六三联队长新美二郎大佐指挥的部队）分别在新乐的东南方及安国（新乐东方约60公里）南方渡过沙河；丙兵团的滨田部队（步兵第二一四联队长滨田十之助大佐指挥的部队）、河村部队（步兵第二一三联队长河村参郎大佐指挥的部队）向深泽——安平——饶阳大道以北滹沱河南岸地区压迫共军，尽力搜捕敌军，并摧毁了分散藏匿的各种设施。

在此次作战中，据悉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15日在水上部队占领其根据地大保镇（安平西方16公里）前，向西方逃去。第十八、十九两团长负伤。冀中南部地区扫荡作战的战果如下：

共军战死 570人，俘虏17人。

缴获 迫击炮2门、自动步枪2支、步枪300支、手枪51支、手榴弹1,290颗、地雷25个。此外，被服、军需品等甚多。

新任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8月18日由空路飞往石门对第一一〇师团司令部、19日乘装甲列车去晋县对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20日对保定的第二十一师团司令部，进行了就任后的首次巡视，视察了前线情况。

二、第二次作战（向冀西地区进攻，8月23日至9月4日）

方面军由于对平西地区及冀中地区第一次作战的顺利进展，决定由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部太行山脉的冀西根据地进攻，18日下达了进攻及实行封锁的命令。

8月23日～27日的进攻情况如下：

23日拂晓，甲兵团由红煤厂、涿县、涞水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北、中纵队23日傍晚进入北拒马河谷的张坊镇附近，24日急

袭肖克指挥的约有千人的部队，25日黎明，将敌压向拒马河的溪谷，击败敌军，俘600人。

23日拂晓，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盘踞于满城北方的北楼山附近的第一军区司令杨成武指挥的约有五千人的部队开始了围攻。由于一部分共军据守北楼山西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我军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肉搏战，痛击该敌，使其向北方溃逃。

23日拂晓，丙兵团由新乐、正定、井陉附近分三路纵队一面扫荡各该地区的共军，一面向西北进击，继而北进。21日攻占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阜平及冀西根据地的陈家院（石门西北约50公里）。在进攻陈家院附近时，得到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各一部的紧密合作。继于27日在抗日大学所在地的陈庄（阜平南方约30公里）附近击败聂荣臻指挥的有力部队。

8月28日～9月3日的战况如下：

乙兵团，28日以后，以其一部在久能山（易县西北约40公里）附近紧追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同时将攻击目标指向第三军分区黄永胜部，并与第二十六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部协作，对聚集于该地区内的共军进行围攻。于29日至9月2日间，在倒马关一带地区反复进行了扫荡。

丙兵团，28日以后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取得联系，对陈庄、陈家院一带及滹沱河流域继续进行了扫荡。

甲兵团则开展了蓬头（易县西北35公里）周围的扫荡战。

如上所述，8月23日以来的作战进展顺利，共军根据地的陈庄、阜平直到各军分区的根据地均归覆灭，各分区共军也由于我在各地扫荡的结果，大部化为小部队分散逃避，潜伏于各该所在地区。

截至8月31日，已查明综合战果如下。

共军战死 95人 僵尸453人。

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1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13挺、步枪450支，尚有其它军需品甚多。

摧毁设施——陈家院的边区司令部、第一至第四各军分区司令部、兵营10所、军需品仓库17处、武器弹药制造所9处、火药库7处。

第二期作战（9月4日～10月15日）

9月2日，方面军决定由4日以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命令各进攻兵团，分驻于作战地区搜索、剿灭残余共军，并消灭其根据地；各封锁兵团在继续进行封锁的同时，将其一部分驻于进攻兵团的后方地区，搜索剿灭残余的共军，并摧毁其根据地。

9月3日及9月4日分别撤消了设于石门的情报所及北京方面军司令部内的战斗指挥所。

各兵团根据上述方面军的命令使相当于步兵大队、中队的单位分驻于作战地区的各要地，一面搜索扫荡潜伏的残余共军，一面破坏敌根据地的设施和运出物资。

方面军认为，晋察冀边区的肃正工作有很大进展，大致收到了预期的成果，决定在此次作战结束后，以经济封锁巩固、发展作战成果。据此，于9月24日命令进攻兵团集结转进。

甲兵团到10月1日，在完成所担当的任务之后，逐次向新乡附近转进集结。乙兵团于11日开始转进，返回第一一〇师团长的属下。丙兵团由11日，逐渐返回原建制。

第二十一师团完成对敌经济封锁任务后，做为担当“あ”号作战（大东亚战争初期的对同盟国军进攻作战）的兵团，10月中旬以后，向胶济沿线的张店、青岛附近，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向砀山、徐州、宿县附近转进集结。

曾担任封锁的各军、兵团，由10日开始，逐次撤出其进驻的

兵力，大致以下述界线为前沿，对敌经济封锁继续到10月15日前后。

第一军 娘子关—盂县—上社—石咀—神堂堡。

驻蒙军 下关镇—上寨—浮图峪—镇边城附近之内长城线。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 镇边城—长操—周口店。

第一一〇师团 行唐—灵寿—平山—南峪。

第一军作战经过概要

兹将担任封锁的各兵团中第一军的状况概述如下：

第一军，命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参加作战。由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师团抽调必要的部队配属于该两旅团，使之具有长期的独立作战能力。该两旅团各组成数个支队，划分为占领封锁线部队和随时随地搜索敌人的进攻部队，准备作战。

8月11日至14日间，该两旅团相继开始行动，24日按计划完成了对娘子关—石咀—神堂堡的封锁线，对该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扫荡，摧毁了共军后方设施、工厂、武器制造所等，没收、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工具、火药等。

方面军直辖各兵团和驻蒙军共同向阜平平原及其南方地区进攻，为了一举围歼晋察冀边区部队的主力，以主力继续进行封锁。另以一部于8月31日突入该地区。由于共军早已四散逃避，因而未能给予重创，对当地敌人进行了搜索扫荡。

9月4日，随着方面军向第二期作战的过渡，该两旅团各以一部继续进行封锁，另以主力分散驻守于晋察冀边区部队原第二分区部队盘踞地区的附近，尽力剿灭残匪。另外并对屡次向省外逃窜企图重新集结的共军加以痛击，力图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设施。

10月10日根据方面军的命令，逐次返回原驻地。此次作战虽未能予共军以致命打击，但在摧毁根据地及由于沿省境设立了无

人区（真空地带），给共军极大的损害。

政治及宣传报道工作

方面军在进行此次作战之际，考虑到只有把行使武力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宣传报道等各项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剿共肃正作战的目的，使作战与7月初开展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为此，积极地进行了政治工作及宣传报道工作。

下面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政治工作之一例。

旅团关于与作战结合进行的政治工作，于1941年8月3日颁发的“独混四旅作命甲第127号命令”中详细地作了计划和准备，尤其重视政治工作班的活动。除令参加作战的各个支队进行组织训练外，旅团方面也严选日中人员予以周密的特别训练，做为各支队的政治工作班的基本要员，8月11日配属于各支队。

旅团计划的政治工作要领其要点如下：

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政治工作要领

第一 方针

一、配合作战开展政治工作，以搜索剔除共军的地下工作。对敌地区的居民，主要通过宣抚促使匪民分离。

二、结合上述工作，进行有关共军的调查研究。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各部队，预先做好政治工作班的准备工作，作战开始时，除按方针指示事项实施外，并使之担当搜索敌情及搜索潜伏匪徒及隐藏物品等工作。

二、对敌封锁，首先按照历来的经济封锁线及此次作战中重新划定的封锁线进行双重封锁。

三、历来的经济封锁线，继续照常封锁。新封锁线除经日军许可者外，一切人员及物资禁止通过。如有违犯者，不论其有否敌性，立即逮捕，关押或枪决。

四、封锁部队及进攻部队，应使所属政治工作班从事没收共产地区敌性物资并积极实行经济封锁。

查获没收前项敌性物资的部队，可自行将其保存或委托最近的封锁部队保管。

五、各部队可由共产地区招致有力的居民前来，并给以优待，让他们在阳泉、平定、寿阳或太原等我势力范围内看到安居乐业的情况，然后放他们回原地，用以揭露共军的欺骗。

六、封锁部队应加强两封锁线附近的政治工作，严防敌向根据地以外分散逃避。同时，为支援进攻部队的政治工作，特别是为将来实行经济封锁，尽量使政治工作班进入敌地区，从事收集情报等工作，直接协助进攻部队。

七、旅团，为了调查下列事项，组成一个调查班。

对于共军和居民以及其它地区进行调查

1、共军的实际情况及其施策的情况。

2、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项工作的要领及其组织等。

第三 组成及装备（笔者略）

第四 实施

一、各部队均配属适当的政治工作班，或将其投放于敌人之中，配合作战和封锁，使之承担以下任务：

1、对难混及良民化的共军进行宣传、宣抚，破除其反日意识。

2、查获及没收敌性武器、被服粮秣等。

3. 剿抉残余败兵及敌性居民，杜绝共产党工作人员打入活动。

4. 建立自卫的民众组织。

二、招来的居民，按照俘虏处理，于阳泉集合后，送往太原收容所，委托新民会总会加以指导，其标准为一个大队定员20人。

三、调查班应以新封锁线为根据地，对共产地区的党、军、居民等进行现地实际情况的调查，尤应掌握作战最初的实际情况，收集将来对共施策的资料。

调查研究结果，应于作战结束后约15日内报告旅团长。

第五 表扬、奖励及经费

笔者注：此项内容为特别工作费，抚恤金的支付，奖状、奖金的发放等事项。（原文略）

在肃正作战中，过去虽也进行了与之相结合的政治工作，但此次却是方面军自上而下极为关心，并经过大力准备而实施的。这是此次作战的特色。

关于宣传报道工作，方面军按照前述“宣传报道计划”，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主要使用飞机散发传单，对全部作战地区的敌人进行宣传。各兵团对进攻地区的敌人及居民，主要以飞机和由政治工作班等开展宣传活动。

特别在第二期作战部队分散驻守期间，对敌区居民进行巡回放映电影、演剧及医疗等宣抚工作，收到了很大效果。

在作战期间，动员日、中双方的报道机关，适应作战的需要，努力进行了恰当的报道。

8月24日，方面军报道部长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剿共作战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此次日军进行作战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的抗日根据地中实力最强、成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地区。今年初夏以来，日军在冀东、冀中作战中，到处击败、捕捉敌军。俘虏了第十三团长陈群，使第十军分区司令朱占魁负伤。另外还取得很大的战果。此次作战，不仅彻底粉碎了敌军事抗战力，而且由于新中国行政机关、县警备队及农村自卫团等的主动的协助，剔除了渗透于该地区的红色势力，取得剿共之实效，使治安范围得到扩大。

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步而顺利地收到实效。尤其是在靠近敌方的地区，加强了反共的自卫组织，并以警备队和其它武装团体，对散在各处的共军断然进行讨伐，省长、县长等亲临战场，挺身于剿共作战前线，更是过去未有的创举。

这一事实表明，在受共军迫害的华北民众中间，能迸发出剿共热情。

然而真正恢复华北的治安，单纯依靠新中国方面各机关的自卫活动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必须依靠日军强大的武装以彻底消灭共军根据地。

现在日军进行持续作战的冀西地带，是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南北30公里、东西100公里，处于险峻的太行山北部地区。

自1937年秋以来，聂荣臻在该地区收集残兵败将，成立了红色边区政府，在延安中共总部的领导下，从事赤化华北工作。其残余兵力，正规军、游击队总计约四万人，编制装备虽不算优秀，但习惯于山地，熟悉地理，并且依靠有彻底的民众工作基础的游击战，其战斗力实有不容轻视之处。

此次作战的特点，与历来在该地区进行的作战不同，而是使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并由政治工作班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配合了日军的军事行动。

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区周围的封锁部队配合活动，共同为歼灭华北红色政权取得的空前成果。（以下笔者略）

此次作战的成果

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〇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

遗尸 5,616具。

俘虏 3,769人。

主要缴获：

迫击炮7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54挺、自动步枪103支、火枪784支、步枪2,413支、子弹116,777发、手枪444支、刺刀3,707把、手榴弹144,504颗。（以下笔者略）

我方损失 战死84名、负伤224名。

上述数字，做为对共肃正作战战果是十分巨大的。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数字不明。然而此次作战的收获，战果尚属次要，主要在于扩大了我治安圈及对中共施加的压力，从而使之陷入经济穷困等方面。当时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曾有如下叙述：

一、配合此次作战，第一一〇师团将第一线向西推进，比以前更能增加对中共方面的压力。同时，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为了协助作战，对北京西方山地内的中共根据地区进行讨伐，扩大了驻兵地区，确保涞源——易县道路，分割了敌地区，从而更加稳定了北京附近的治安。

二、破坏了敌地区内的武器制造所、军需品储藏所等根据地设施，在经济方面也给以巨大打击。并且对于使敌区居民慑服于

我之威力方面，也收到不小效果。

三、假设我方有多余的兵力，则可继上述破坏作战之后，分散驻兵，一举使敌区成为治安地区，果能如此，当然极为有利。但此次作战则无力分散驻兵，其效果逐渐消失，致使敌方势力得以恢复。因此，殊有反复进行破坏作战的必要。如果不能做到使敌放弃占据根据地的意图，使居民背离共方，作战即不能算是彻底。

四、象晋察冀边区这样的大根据地，仅以一个兵团进行讨伐是难以取得成果的。因此，必须由方面军统一领导，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给以致命打击后，再由各兵团严密地继续予以粉碎性打击，方可望取得持久的成果。

此次作战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内的动态虽不得而知，但从“驻蒙军战时月报”对1941年末的状况所作以下记载中，即可推测彼时的作战成果。

一、晋察冀边区之敌，由于前者与我作战所受创伤未愈，加以粮食极缺，虽仍在进行局部反击以突破我封锁网，但并无以全部兵力进行反攻的企图。

二、察南东部地区的平北游击队，由于我长期进行扫荡及其他工作，已向满洲国方面逃避。但随着讨伐队的返回原驻地，最近有再次向原根据地方面移动的倾向。

教训及意见

现将当时有关人员的回忆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保存的记录（意见集）。作为此次作战教训加以整理汇总如下：

一、有关共军的事项

(一) 战术

1. 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
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在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关于指导退避作战的具体事实，据俘虏称，与日军发动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向全军重申了：“敌进我退，敌去我追，敌多我避，敌少我打”的指令。在党、军及行政机关的全面统制下，确定了退避的部署。命各机关分散混入部队之中，在严密的保卫下，先行退避，显示出党、军、政三位一体的作风。
2. 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3. 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4. 共军在进行袭击、伏击、防御战斗之际，特别注意选定有安全退路的地点做为战场。由于共军在险峻山地行动敏捷，尽量避开驮马可能通过的地区，多在山后小路进行夜间活动。
5. 共军常潜伏于离开主要交通道路的山中村落。
6. 当宿营时，通常不在大的村庄，而分散于小村或山中。
7. 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
8. 为了便于退避，有时使用石头等做为秘密路标。

(二) 战斗力

1. 共军以回避战斗为主，因而对其战斗力不能轻易判断。但其抗战意识似有较前降低模样。

2. 共军的基干战斗员约占20%—25%，其他属于强行征集的民兵，素质低劣。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敌方的宣传中出现不少“反对投降”的字句，说明内部都有投降气氛，估计这是出于防止投降的需要。然而，在第二十一师团的俘虏中发现有妇女军官，忠于共产主义，宁死不屈，拒绝自首。

3. 一般装备不良，缺乏弹药。但到作战末期，得到补充，随身携带弹药极其丰富。

4. 冀西山地内，各处多设有手榴弹制造所，原料极多。

(三) 共军的民众工作

1. 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

2. 民众对共军的态度，并非心悦诚服，似在压力之下盲目服从，但其中也有抗日思想和抗战意识狂热的分子。例如：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内曾出现如下事件：

(1) 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2) 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3) 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营部所在地。

3. 敌地区的民众，对我治安地区的情况，一无所知。

4. 敌区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这与华中的情况不同。

(四) 武器、被服及其它的隐匿要领

在周密计划下，预先准备好隐匿地点，采取的方法既巧妙又敏捷。举例说明如下：

1. 在被服工厂院中，铺石的路面，走路时听到有怪声，掘开一看，埋有被服、工具等物。在工厂内存放物品的屋里，将不同土色的地面挖开，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2. 梯田的石墙内，以及石阶的下面，隐藏着武器。
3. 把物资隐匿在山谷深处，没有人马出入痕迹的山上小屋里。
- 4.乍看象是垃圾堆的场所，在垃圾覆盖下隐藏着钢材、器械等。
5. 把物资隐匿在山脉的岩石下或村庄后面、山腰处的洞穴（从道路上不能见到）等处。

二、关于情报、宣传报道事项

- (一) 利用居民及俘虏，对搜索和刺探敌情效果极大。但对居民的话不可轻信，尽量分别听取多数人所说的情况，并须加以综合分析。
- (二) 勘察特务工作队，在难以获得居民及俘虏时使用之，颇有成效。以便进行近距离的侦察活动，价值很大。
- (三) 村内留下的人员，虽是病人，也许是密探，或是监视隐藏物资的人。对他们进行严格讯问、调查，反过来为我利用，可以取得成效。
- (四) 通过从敌方缴获的文件，容易探知敌情及隐匿设施。
- (五) 以炮兵镜细心地监视敌情很有成效。
- (六) 将搜索据点推进到封锁线外（敌地区内）对于获得情报效果甚大。
- (七) 应禁止向敌区远处派遣少数人员，使其孤立活动。

- (八) 对敌宣传，以通俗易懂的文件、绘画攻其弱点要害，对敌区的民众工作易于收效。
- (九) 印刷物不宜随便乱贴。应召开民众大会，会上由村中有力人士说明宗旨，其内容要使一般人都能接受。张贴文件不仅限于屋外，室内也有张贴的必要。
- (十) 在准治安地区，敌我的政治工作活跃展开，双方的印刷品、壁画等大量张贴，民众因而中毒，似属实情。
- (十一) 巡回放映电影、演剧等，收到很大效果。电影主要内容为治安强化运动、自卫团的活动、修筑治安道路等。
- (十二) 用医疗药品进行宣抚收效甚大。这主要说明，如从政治、经济及其它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同时进行工作，必将产生效果。

三、关于政治工作事项

- (一) 政治工作班的组成和运用，应使之与其所属部队的行动紧密配合。在封锁部队中应有重点地统一使用，在进攻部队中以担当敌情搜索、宣传等单一任务为宜。
- (二) 根据经济封锁要领，对断然进行封锁的敌区居民进行匪、民分离工作十分困难，必须与宣传、宣抚工作同时进行，并且应有重点地固定地进行工作，方有成功希望。
- (三) 民众工作，应寻求时机，与居民经常进行恳切的接触，特别是与男女青年亲密交往，易于收到实效。
- (四) 设置无人地带，认为有以下效果：
1. 可以摸出敌人对“准治安地区”的情报收集工作，民众工作，党、军的组织工作等的规律。
 2. 可使敌区居民获悉我方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从而促使其丢掉对共军的信赖。
- (五) 政治工作班的组成，虽根据情况而定，但各具如以下

形式组成，效果可能较大。

1. 班长（由日系职员或区长等信得过实力人物担任）。
2. 自卫团、合作社、新民分会等的指导员。
3. 情报宣传员。
4. 武装工作人员（特务工作队、县警备队、新民武装工作队）。

四、关于进行作战事项

（一）当探知敌潜伏人员时，应立即采取逮捕措施，企图采取翌日拂晓突然包围等办法，颇多招致失败。为此，平素即须进行夜间随时出动及在地势不平的山岳地带夜袭的训练。

（二）支队向敌区进攻时，根据敌情，成一路纵队，不如分成较小的数路纵队前进比较妥当。但必须绝对确保相互间的通信联系。

（三）共军占领阵地时，通常在其后方置有相当的控制兵力。

（四）在讯问当地居民及俘虏时，通过雇用的傭工等华人进行，效果显著。进行战斗时，使一部分部队改穿便衣，效果较大。

（五）通过固定路线，不仅不利于捕捉敌人，且有遭受伏击和触雷的危险。

（六）据俘虏称，日军到达村庄立即放火，因而易于看出其所在位置。并且指出日军后方一般警惕性都不高。

五、其它

此次作战之际，从方面军司令官到第一线兵团长等均强烈要求，对待民众必须严格遵守军纪，因而进攻作战期间，一直保持良好的纪律。另一方面，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

总之，关于我方对民众的态度，不但使我军本身，就是为我所用的密探、苦力或者有协作关系的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均感到

有更加提高道德观念的必要。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于此。

五 1941年秋季各项施策的推进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鉴于第一次、第二次的成果，为了使之更加飞跃的发展，于11月1日至12月25日间，开始了第三次的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所有敌占地区，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的配给，促进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以期安定民生。

方面军于9月10日对各兵团（特务机关）及民办公司发出通报，要求依据“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开展此次运动。并同时通报兴亚院联络部要求根据“要领”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采取相应行动。

注：由于现存资料的关系，只发表日方材料。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

1941年9月10日

冈村部队本部

第一 方针

扩大过去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采取更加机动和进攻性的活动，以期加强治安工作。为此，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实行经济封锁，促进重要物资的生产、供应，加强我战斗力和经济力，摧毁敌匪的抗战意志。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应使一般群众普遍理解，为了安定华北民生，巩固治安，必须彻底实行经济封锁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其自觉地投入运动。为此需要说明：

1. 现在敌匪的抗战能力，是依靠来自我势力范围的物资及第三国的援助才得以维持的。因此，应充分理解彻底封锁物资外流，是进一步扩大敌人目前最感痛苦的经济危机，并以此为突破口，迫其放弃抗战意志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
2. 应强调敌区物价昂贵，经济危机的严重情况，使民众自觉认识到如不切断与敌地区的经济联系，我亦必将逐步被卷入敌人的经济混乱旋涡中。

应使明确认识，凡为了个人利益和敌区进行交易者，就是扰乱大众经济生活的汉奸，必须加以打击。

二、应使民众彻底理解：为了华北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提高，必须摆脱依附英、美、苏的经济，确立东亚共荣圈的自给自足经济的重要意义。

因此，应增加华北各种资源的生产，特别是促进今年收割期农产品的上市，为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做出贡献。

三、关于自治自卫工作的组织和训练，由于前两次的治安强化运动，已有很大跃进。但是，为了使之发挥更大作用，应通过上述经济封锁及获取物资的运动，使各种自治自卫组织相互连结，加强有机活动，促进对敌匪及中共组织的攻击，以便建成牢

固的治安经济阵营。

四、应强调为了加强经济封锁，不仅需要农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需要工商业者，特别是大商人、公司、合作社等积极主动的支持。在彻底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要调整和加强物资流通机构。

五、经济封锁虽应各按其领导的指示进行，但需要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此外，还须强调采取滴水不漏的严密措施的重要性。

六、在这次运动中，应比过去更加支持和推进新民会积极主动的活动。通过此次运动，并应领导新民会进一步扩充和加强其势力。

七、应对过去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加以研究分析，在运动开始前，应做好符合形势要求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以切实体现此次运动的精神，并使运动做到重点集中。

第三、实施要领

一、此次运动，凡前两次治安强化运动计划中曾经指示的事项，一律继续遵照执行。关于经济封锁，应按“1941年度经济封锁要领”精神，在强力统制下加以实施。

二、此次运动的实施，大致规定为自11月1日至12月25日之间。但由于农产品的上市及当地其它情况，可作若干变更。

三、鉴于过去治安运动的成果及华北的现状，应对下列各点，特别加以注意。

1. 应使日华官民彻底理解此次运动的精神及要点。为了使其自觉参加运动，首先要准备好准备工作。为此，应使新民会进行活动。

2. 应对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绩进行研究，深刻探讨成敗优劣的原因，铲除祸根，整顿体势，以便使此次运动取得充分效

果。特别应改变历来依据私情，轻易变动人事的做法。在此 次治安运动中，明确规定根据成绩表现择优提拔，以期实现人事工作的明朗化。同时并淘汰懦弱无能及对形势抱观望态度的人物。

3. 为了促进各种自治自卫组织间的有机活动，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1) 做好毗邻的保甲之间的联系，以堵塞村与村，县与 县之间的空隙。

(2) 合作社，为了充分支援经济封锁及促进物资上市，应加强经营管理，特别要密切与保甲组织、交易市场、及农业仓库等之间的联系。

(3) 省、县警备队、保甲自卫团、各种武装团体及宗教 团体等，应经常密切上下之间的联系，并做好在危急时守望相助迅速救援的措施及训练。消灭由于敌匪袭击造成的被绑架和解除 武装等事故，坚定对农村自卫的必胜的信心。

(4) 明确划分各种工作队的任务，消除对立摩擦，在工 作中做到互相联系。

4. 面对敌方对治安强化运动加紧破坏的情况，应予以反 击，并进而在敌地区扩大我方势力，加强各种自治自卫组织的攻势 行动。

为了在省长、市长、道尹、县长等的一元化的领导下，一 致对敌，应实行数县联合讨伐，特别是省、县交界附近的剿匪 讨伐等。

5. 利用秋收季节，在各机关及民众密切配合下，努力做 好农作物的收集、保卫等工作。

为此，应在各地遍设农产品仓库，并加强防御设施。

6. 指导各种公司、合作社、买办、大商人及其他一般工商 业者（特别是华人方面的），使其经济观念能与新体制相吻 合。

又为了促进经济封锁和物资的上市，应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使其积极主动地支持治安强化运动。

7. 对于未经许可私自与敌匪地区进行交易或囤积居奇分子等，应指导民众把他们做为公众之敌加以排斥。此外，节约消费、奖励储蓄、回收利用废品等是稳定民众经济的最重要事项，应做为民众运动，加以开展。

8. 各矿山、煤矿、工厂、公司等使用多数华人工的场所，为了自给自卫及增加生产，尤应整顿和加强以下设施。

(1) 整顿工作人员及包括其家属在内的社员组织工作，使共军无法潜入。

(2) 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他们住在农村的生活福利设施应加以整顿，使他们主动地保卫爱护所属的矿山、公司，并培养他们成为提供劳动力的源泉。

(3) 采取上述措施时，特别应与新民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9. 过去的治安强化运动，由于各机关、团体、领导的带头示范，促使民众奋起，此种作法更应加以推广。各级领导应深入第一线进行适当的领导和鼓励，使此次运动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

省长、市长、道尹、县长等，不仅作为行政机关长官参加，并要以新民会职员身分投身运动，努力体现行政机关和新民会的表里一致，以利加强和扩大新民会的工作。

四、此次运动所需经费，另行规定。

此次运动执行情况及详细成果虽尚未明确，但经济封锁似有很大影响，兹述其概要如下：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在以后的1942年3月至6月中旬之间，又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目标，开展了第四次运动。同年10月上旬，又开展了第五次运动，提出

“完成建设华北和大东亚战争，剿灭共产党与肃正思想，确保农产、降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四大口号，使民众运动与武力肃正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南京的国民政府也与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相呼应，展开了新国民运动。国民政府以清乡工作和新国民运动为两大基本任务。前者于1941年6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自7月以来，进行了扬子江南岸地区的清乡工作。新国民运动是在“纯正国民党”四中全会（11月9日至11日）时提出，于11月30日的日、满、华共同宣言一周年纪念日，以建设新中国促进全民总奋起为目的，加以实施。

汪主席于11月26日会见中外记者团，阐述了如下旨趣：

新国民运动，是认清我们自身的弱点，并有改正的勇气，而向和平反共建国迈进，以期安定民生，确保治安的运动。此运动，不象过去的新生活运动那样，另设专门机关，而是由宣传部、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等政府机关和纯正国民党、东亚联盟等民间团体结成一体，期待民意的振兴。

如上所述，随着时局的重大变化，在华中、华北群众之间逐渐见到民意兴起的景象。

中共方面的对策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似给中共方面以相当的影响。中共方面采取各种对策的情况也逐渐查明。“剿共指南”对中共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时的情况做了如下的叙述。

中共方面的“治安强化运动”对策

一、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反宣传

当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时，中共方面对此只是用恶性的造谣宣传加以回击。但是，第二次农村武装自卫政策一经展开，中共立即显出惊慌失措。随后到第三次的经济封锁政策加强时，敌方才开始采取认真具体的对策。

敌进行反宣传的文件、新闻、传单等的大意如下：“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灭亡中国的运动，是蹂躏、污辱民众，没收金钱，替日军卖命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抓壮丁、修城墙、修道路、增加据点、征收各种捐税等……增加敌占区内同胞的痛苦，严密统治，企图防止抗日活动的运动”。“敌人不仅是掠夺金银，就连盐也不放过，因此，同胞受到极大的痛苦，敌人所说的治安强化是最残酷的罪恶手段”等等。

中共方面进行如上宣传的目的，就是企图把中共自身历来实行的强制征收、掠夺、暴行等转嫁给日军，从而转移民众怨恨的目标。

另外，对于中国方面在此次运动中的异常活跃，则宣传是“日军强迫的行动”或“日本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战斗力的下降等。”并散布谣言，把群众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和支持，说成是“由于日军的命令和严惩的结果”。

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对策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司令部，强迫敌地区内的居民，用各种方法费尽心机采取对策。在10月的联合布告中有如下叙述：敌在每次进攻前，先派出很多汉奸、特务、化装成小贩和乞丐等各种伪装人物潜入我根据地，侦察我军事政治状况，并诱惑、利用人民，调查储藏财物、粮食等的地点，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和社会治安，作为扫荡抗日根据地的内应和向导。我们必须动员军、政、民一切力量，铲除这些汉奸、特务分子，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为此，由10月15日开始实行全区戒严，同

时，并规定以下事项：

1. 加强农村的警戒

对农村要冲，分别派出青年抗日先锋队、自卫队的强壮男子站岗放哨，日夜不断，加以警戒。

2. 严密检查行人

凡未携带通行证、武器证明以及行迹可疑者，立即扣押，移交政府或驻军加以调查、处理。对武装汉奸，断然逮捕，遇有抵抗，当场击毙。

3. 切实进行户口调查

各村政府必须在限期以内造出户口调查簿，经常调查户口。军政机关应随时派遣人员协助调查。各户对来历不明者，不得任意留宿，熟人投宿时，需要取得村政府的许可。

粮食、器皿等物品，必须搬到村外远处，密藏在安全场所，实行“空室清野”。

一切盗匪行为，均被认为是对日军扫荡的策应，严加惩处。

各村居民发现情况可疑者，应据实密报，一经查明情况属实，应立即加以处分。

4. 各级政府、武装团体、群众团体等应积极领导、支援做好上述各项工作。

三、经济封锁的影响和敌方的对策

由于经济封锁，向敌地区流出的物资迅速减少，敌方物资缺乏，物价腾贵的现象到处可见。

敌北方当局，在11月10日的军政负责人会议中指出，“经济封锁是关系到中共生死的问题”。 “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非常严密，我方的物资供应仍然困难。但我方也实行了经济反封锁，禁止原料外流，同时发行纸币。联络商人努力做好吸收必要的军需物资工作。然而，由于市场各商店均关闭门户，因此有必要采取适

当的措施。”

在保定道敌区的山地方面，由于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群众贫困已达极点。因而曾发生山地农民袭击平地居民的激烈斗争事件（11月下旬唐县南城村）。敌人想方设法采取对策，想要通过破坏封锁，从京汉线以东平原，收集并输送物资，以及强迫施行统一累进税以取得物资，对我方进行扰乱。

在五台附近的敌地区出现了小麦一斗售法币30元的高价，食盐价格也高达我地区的五、六倍。

敌人对我隔断壕（惠民壕）颇感苦恼。11月18日晋察豫边区政府召开了各军分区司令部、各行政专员公署的联合会，对如何防止我方修筑封锁壕及通过封锁壕的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以上表明，我经济封锁确实给敌人以极大的影响。对此，他们采取对策，号召“加强对敌贸易战”。即：

1. 在输出方面，应制订缜密远大的计划和建立组织，通过调查各地区的产物、奖励现地物资的输出、扩大输出地区等措施，使之转向出超，用以粉碎日军经济掠夺及“以战养战”的阴谋。

2. 在贸易战方面，不要从单纯的经济观点出发，而被少数营利者所乘，移出外汇，只许交换根据地所必需的物资，外运货物售出后收取伪币（联银券），禁止再换成边区币。

3. 贸易机构，是健全贸易取得胜利的第一要素，必须依靠强有力的贸易机关和商业组织，加强对敌的贸易斗争，杜绝奸商的资敌活动。此外，为了获得对敌经济斗争最前线的堡垒，使之发挥最大的机能，强调要统一集中所有的经济力量。

四、“联防”和“封锁线”政策

该项政策系由冀南军区政治部发布的，是针对我治安强化运动、为了防止我方日常进攻造成的影响而实施的农村自卫政策的一例。

所谓联防，就是组织民众将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联合起来进行民众抗日自卫工作。封锁线就是为了巩固联防，在敌我根据地交界的附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的连锁线。

联防的任务是：

(一) 监视谍报活动。(二) 武装群众。(三) 肃清日方密探。(四) 防止联银券流入和禁止物资的流出流入。(五) 防止日方宣传的流入。(六) 防御土匪和确保治安。(七) 处理抗日工作交通情报网等。

联防组织：

在村分队、区大队、县支队等团体之外，设置将以上互相联合起来的村、区、县的各“联防站”，承担重要的任务。村联防站长，由其所在村的自卫队长担当，负责指挥所担当的几个村的通信联络及军事行动。

封锁线：

是把几个联防站连结起来，以其中最接近日方根据地的村，做为封锁村。在联防站长指挥之下，由各村的自卫队和模范班进行工作，贯彻执行封锁政策。其任务是：

1. 对于运进日方地区的物品及由日方地区出入的人员，进行检查和取缔。
2. 逮捕或杀死少数的日军、新民会员、密探及新政府方面的行政人员。
3. 遇有日军进攻时，侦察其行动、方向和企图，向联防站报告。

冀南军区指令实施的联防工作的具体内容如下：

1. 平时的办法

将平时不用的器具、物品及不能携带的物品等挖洞埋藏起来，尽可能地减少可燃性的器具和燃料，做好“空室清野”的日常准

备工作。白天由妇女、儿童或男人，夜间由壮年自卫队员或模范班员严加戒备。

出入村落，虽属工作人员亦必须出示通行证件，夜间使用暗语口令。发现土匪时做好进攻的准备。此外，并努力做好收集日方情报、侦察日军行动等工作。

2. 日军进攻时的办法

当日军接近到15华里时，向联防站区大队队部报告，派出侦察员进行侦察活动，发出警报，通知村民向指定地点集合。同时处置衣、食、燃料等物，开始“空室清野”，村内武器，由群众携带，同时与各联络站进行联系。此时的警报，用鼓声表示日军已接近15华里。十华里以内则鸣锣报警。

日军接近六华里时，由向导带路，男女老幼、伤病员开始撤退，一般男人，按照自卫队长的指挥从事通信情报工作。一有机会即开始进攻，掩护村民撤退。自卫队长要与联防站、邻村保持密切联系，指挥自卫队员进行攻击、潜伏及收集情报等工作，并负责鸣警笛，表示日军已接近五华里以内。

3. 联防戒严的办法

戒严中，退到邻村时，应向邻村报告，并受其指挥。离开邻村回本村时，共同检查有无外村人，对持有日方证明书者应隔离盘问敌情，不要加以汉奸罪，须送上级机关处理。

外村人中有行动可疑者，如为十华里以内的村民，派遣自卫队员前往调查其身分，如该村不能证实其身分时，应与十华里以外的外村村民，一同送上级机关处理。

戒严值岗放哨中，须严格遵守秘密暗号口令，并与通行证并用。如两者不兼备者，值岗人员应将其送往村分队。紧急戒严时，一般可以进村，但不准出村。戒严中，违反联防动作及故意喧嚣截噪者，应加以处罚或训戒。

4. 自卫队长在联防中的任务

训练自卫队员，提高情报通信效果，做到及时可靠；听从上级自卫队长和联防站的指挥。

以钟、铜锣、鼓进行紧急警报，通知群众日军已进入接近日内，并且根据击敲的方法表示东西南北的方向。

遇有土匪袭击时，联合邻村将其歼灭。土匪人数众多时，首先牵制，然后向县政府报告，请求游击队、正规军出动。

5. 区自卫大队的联防任务

区大队部设联防分站，与各联防站及其它区大队部保持联系，定期交换情报。

在所属区内，日方如有行动，应根据情况，指挥区内群众武装准备对日军作战。如区内有野战军或救国团队时，应对之投送情报及通知暗语口令。

每半月召开联防会议，由联防站的负责人及模范班中队长参加。

如日军占领地与我几个区相连接时，应定期召开各区联防委员会，商讨对日军的对策。

6. 县支队的联防任务

县支队设联防总站，领导联防委员会的工作。

如本县内的日方据点接连邻县时，本县得与邻县协商，设置县联防委员会，讨论联防封锁事宜。

肃正作战及其成果

1941年秋季以后，开展的对共肃正作战主要有第一军的沁河作战，第十二军的博西作战，第二次的鲁南作战等。对重庆军也进行了河南作战和汾西作战。

以对共肃正作战为主，按山西、山东等地区分别叙述如下。

沁河作战

(9月20日～10月20日)

第一军在中原会战结束后，又讨伐了晋南各地的残敌，并向新占领地区配备了警备兵力，努力进行肃正工作。但是由于地区广大，我兵力显得不足，特别是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开始后，这方面的兵力就更感薄弱。在此期间，晋南的共军加强了沁源地区附近的根据地，并迅速向南方马壁村（沁水东北约30公里）附近扩大了势力。另一方面，在中原会战中对日军进行最顽强抵抗的重庆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全军幸免溃灭，退却到原第九十三军的地盘。但因给养无着，战斗力逐渐衰退（最初兵力约20,000，到9月仅有7,000至8,000），在与共军对抗中，又被压缩到东山峪村（马壁村东方约26公里）附近，因此未能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注：据说因第九十八军是陕西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将过重任务强加于该军。）

对此，第一军曾命令第三十六师团对九十八军进行劝降，第九十八军表面应允，实际观望不前，态度暧昧。

在此期间，我军企图“击溃沁河河畔的共军，威慑第九十八军，使其归顺，从而将该地区加以肃清”。为此作出以下计划，并进行准备。关于开始作战时间，参照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进度，预定为9月下旬。

第一 方针

军决定歼灭扫荡沁源及马壁村附近、沁河河畔之共军。对敌之中央军则采取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不得已时亦将其歼灭。

第二 指导要领

一、首先歼灭府城镇、马壁村、谭村附近的共军主力。为此，一面严加保密，一面在另外地方进行作战准备，俟机迅速机动急袭敌军。

二、其次调转一部兵力，歼灭绵上镇、沁源、松交附近的共军，各兵团开始进攻的时机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三、击败敌军集团部队后，分驻于原敌盘踞的地区继续搜查、歼灭残余敌匪，消灭敌军根据地，扫清其势力。

四、对中央军（第九十八军）进行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为此，对中央军只进行警戒、监视，不进行攻击。

如果敌人主动向我进攻，可于击败马壁村附近共军之后，将其歼灭。

五、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六、作战开始为9月x日，作战期间预定约4周。（以下笔者略）

此次作战，由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各主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的各一部参加。

各兵团于9月20日在严格保密之下，向预定地点集结兵力，于22日开始一致行动。第三十六师团由南方及东方、第四十一师团由洪洞、临汾前进，当各军进入马壁村各目标地点附近时，共军似已察觉我方意图而隐匿无踪，各队几乎均未遭遇敌人。以上两师团到26日为止，彻底扫荡了马壁村附

近一带，在此期间，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灵石、介休、南关镇一线构成阻截线，防备敌人逃脱。

另一方面，中央军第九十八军对我方工作未予答复，而且采取了反抗态度，以其一部向我石哲镇警备队进攻。因此，我军决定于27日将其歼灭。第三十六、第四十一两师团于结束马壁村的扫荡后，逐步向东方转进，于28日将第九十八军彻底包围，29日开始了进攻。

第九十八军企图向东方突围，但未成功。因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指挥机关已被击溃，仓促之下未及抵抗，即陷入混乱状态，全军溃灭。在此次战斗中，俘虏敌军长武士敏以下3,007人，遗弃尸体1,348具。（注：武士敏由于重伤，收容于潞安医院后，于10月1日死亡。）

我军歼灭敌第九十八军后，除以一部兵力对东峪村周围地区残敌进行扫荡外，调转主力拟搜索久据东峪村周围地区的共军决死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六旅主力进行歼灭。至10月5日左右，判明敌准备向包围圈外突围，或分散潜伏。于是，各讨伐队于6日一齐开始前进，7日各队进入沁源附近，到10日为止，对该地区周围进行了搜索扫荡之后，返回原驻地。在此次作战中，对共军战果很小，未达预期成果。

博西作战

（“は”号作战——9月19日至10月1日）

第十二军（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将该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山地一带的共军根据地，并在9月进行了博西作战，10月进行了鄰城周围的扫荡

战，11、12两月进行了第二次鲁南作战。

博西作战的目的是要剿灭盘踞在博山（济南东南约75公里）西方地区的共军，同时做好博山附近重要资源（产煤）地区的治安肃正工作。

独立混成第六、第十旅团主力及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各一部，参加了这次作战。关于作战经过的情况，参谋本部的《主要作战梗概》一书中记载如下。

第十二军企图对盘踞在博山西方地区的共军山东纵队第四旅及第六旅的一部，围歼于胶济线以南，博山—莱芜—泰安道以西及以北的地区。首先，在作战地的四周构成两道封锁线，继而于9月19日以进攻兵团急袭、包围，在摧毁敌根据地的同时，为了搜索逃脱的敌人，对博山南方地区进行了扫荡。敌采取了“空室清野”战术，我军在作战期间几乎未能与敌大部队遭遇。于是，蹂躏敌根据地，破坏其设施，大量收集敌性物资，征集匪地区居民使之移居满洲。因此，对敌地区居民的影响极大。

注1. 交战的敌兵力约4,000人，敌遗弃尸体282具，俘虏642人；我方死2人，伤7人。消灭敌设施：兵工厂8，手榴弹制造所1，被服厂2，粮秣积存处1，区公署2。

2. 第十二军由10月10日起以第三十二、第十七师团扫荡了鲁南郯城西北地区的共军，并进行了消灭根据地作战（“ㄉ”号作战）。

第二次鲁南作战

（“ㄉ”号作战——11月5日至12月28日）

此次作战目的是要剿灭沂蒙（沂州、沂水、蒙阴）地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期

使治安肃正工作的空前提高。

第十二军根据方面军的意图，使军的主力（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第六、第七、第十旅团的各主力）及配属的第一军的各部队（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的各一部）参加作战。对该地区采取了彻底包围形势，并为急袭敌人、一举歼灭进行了准备（注：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师团于参加中原会战及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之后，10月下旬第二十一师团向胶济沿线的张店、青岛地区移动，准备作战；第三十三师团向砀山、徐州、宿县附近移动，成为第十七师团的后阵）。其规模与方面军直接指挥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不相上下。

关于此地区的敌情，第十二军参谋大桥武夫少佐有如下叙述：

沂蒙地区的共军以徐向前为总司令，以山东纵队之主力（司令张经武—第一、第二旅）及第一一五师陈光所指挥的部队为骨干，据判断兵力约为30,000人。徐向前的司令部在孙祖（沂水西南约40公里），张经武的司令部在张铁谷（孙祖西南约4公里）。这些共军，在沂州（临沂）、蒙阴、沂水的三角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颇盛，并富有矿产资源）的沂河流域发展势力，进行赤化工作。

作战经过概要如下

第十二军首先构成了对沂蒙三角地带的封锁线，同时，军的主力于11月5日拂晓，由四面一齐开始进攻。第二十一师团（步兵十一大队）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十七师团

(步兵七大队)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三十二师团(步兵九大队半)以主力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逐步压缩包围圈,努力搜索歼灭企图逃走或潜伏之敌。11月11日,第一期作战终了,由12日开始进入第二期。各兵团分驻要地,剔抉、扫荡残敌,并力图消灭其根据地。陈光指挥的一一五师的部队,向云蒙山区逃避。徐向前及张经武的司令部似潜伏在官庄(孙祖北约10公里)附近山岳地带。为此,对该山岳地带进行了彻底扫荡。

在此次作战进行中,当地中国方面各行政机关、民众团体等,做为治安强化运动的一环,与我军始终积极合作。如:沂州道尹王九思亲自指挥警备队进攻中共方面根据地侍郎宅,并参加其它扫荡战。同时还积极修筑对敌隔断线(有壕沟及岗楼阵地)。

作战持续进行近两个月,于12月28日结束。根据11月20日的调查,敌遗弃尸体1,654具,我缴获很多武器、被服,破坏了其根据地的各项设施。

第一一〇师团地区的肃正建设工作

一、钜鹿地区之一例

步兵第一四〇联队第三大队(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是被一一〇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部队。其1941年8月至12月的警备状况如下。

1. 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长约160公里)

地区) 的警备任务。

2. 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

3. 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

4. 治安状况，自1941年后半年以来日趋好转，到1942年春，已达到如饭沼师团长所希望的“在警备区内，随处都能平安无事地自由行动”的地步。

5. 加强支援、指导，务使中国方面治安军能独立活动。

二、藁城、无极地区之一例

骑兵第一一〇大队(配备步、炮兵各一个中队)担任藁城(石门东方约20公里)地区的警备工作。该队是被师团长被誉为模范地区的模范队。当时的大队长加岛武中佐(后升大佐)对该地区的肃正建设工作叙述如下。

1. 1940年秋以后，在藁城县进行了实现模范地区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严防单纯进行活塞式的讨伐，而把讨伐、肃正、治安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齐头并进。就是要切实掌握由石门特务机关派遣的县顾问、新民会员、宪兵分队员等，在共同方针下，紧密配合部队行动。同时，力图做好指导培育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工作，以便使之有效地发挥作用。

2. 选拔精通华语的基层干部(下级士官)配合优秀的华人

编成特别工作班。其任务主要是揭发检举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收集特别情报，进行群众工作等。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3. 薡城县的治安比其它地区特别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该县县长德高望重，工作有方，且与日军经常保持密切联系，掌握和领导民众极为热心等。该县长对加强县公署干部骨干的教育和编组县警备队，以及训练各村的优秀青年等工作，都尽了很大力量。因此，逃往外县的有力人士陆续归来。

4. 根据师团的指示，薡城和无极县界之间挖筑了一系列隔断壕（主要道路口设置了了望岗楼），并在该地区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和肃正工作，从而粉碎了敌方策划的活动。

5. 随着石德铁路的修建，改修了道路，并采取措施修建滹沱河桥梁工程及增产棉花、小米等，在安定民心上取得了很大成果。总之，应当相信，治安的根本，首先在于抓住民心。

该大队由1941年7月前后开始，按以下阶段逐步将治安地区推向滹沱河北岸的无极县一带（未治安地区）。

第一阶段，为了先从滹沱河北岸地区，继而向无极县推进治安肃正工作，兵团增强了兵力，进行了积极的讨伐、宣传、宣抚等工作。在此期间，一面进行滹沱河架桥工程（河宽约800米），一面以一部兵力进驻北岸地区，修筑了警备据点。继而通过特别工作队的活动，努力消除敌方的干扰破坏，并掌握各村的有力人物。在此期间，设立了县公署，县长积极从事县行政领导的警备工作。其后，修理整顿了主要道路和通信线路，确立了治安警备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宣传、宣抚工作和贯彻特别工作为重点。

第三阶段，掌握县公署、编组并加强县警备队、警察局、负责指导各乡村自卫、保甲组织等工作。

第四阶段，支持县长掌握行政机关，根据县的指导计划，促进训练青少年及群众工作。

第五阶段，在讨伐、警备、情报活动及侦破敌方地下工作等方面，尽量使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合作，从而使之能逐步接替我军。另外，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军用犬对于发现这些地道起了作用。

然而日军总象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以后逐渐得到居民的协助，肃正工作才有了显著的效果。

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

对治安战的实际情况或是讨伐、肃正作战的成果，很难全面叙述。

此外1941年秋季，山西、山东、河南各地作战顺利进展，治安强化运动也愈益高涨。12月2日，方面军发表了如下一段战报，要求面临重大时局的我军官民应更加奋起。

重庆政权为了获得反轴心国家的援助，以蒋共合作伪装统一战线，极力隐蔽与中共之间的摩擦斗争。然而在与中共盘踞地区相接的华北，两者的摩擦斗争从未间断。特别是由于我 对蒋、共两军进行的猛烈肃正讨伐，更加助长了两者的矛盾。到处展开了争

粮食夺地盘的军事冲突。重庆叫嚷的蒋共统一战线，势同缘木求鱼。以最近为例：（一）10月上旬，山西、陕西省境，傅作义部队和共军游击队的冲突，（二）10月下旬在山东省南部徐向前军和蒋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之间的冲突，（三）10月末山西南部共军第一二九师和蒋系范汉杰的冲突，（四）10月27日蒋介石命令于学忠、何柱国等对共军进攻。

如上所述，蒋、共在地方上的斗争，依然极其激烈，事态日趋严重。只有在微妙的国际环境影响下，形式上的蒋共合作的破绽才有所弥补。

其次，从我方实施的主要作战来看，规模最大的是对盘踞在山东南部的共军的作战，自下扫荡战仍在进行中。在消灭敌根据地剔抉红色地下组织等方面，业已取得很大战果。另一方面，由10月下旬开始的对山西省西南部的中央系第九十军及第一师的汾西作战，战果不断扩大。11月10日对据守禹门口洞窟阵地誓死抵抗的敌人，断然进行了夜间袭击，取得了毙敌1,555人，俘虏2,238人的战果。

另一方面，由11月1日起持续两个月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正在强有力地展开。在第一次、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加强群众自卫力量和提高反共思想为目标的基础上，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增加了对敌经济作战的内容，军、官、民正在一致奋起大力推进中。

以上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前，华北治安战的一般状况。1941年以后，时局急转直下，大东亚战争下的中国战场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一时期的华北治安战的情况，将于本书下卷叙述。